

新知叢書

現代中國經濟教程

許滌新 著
新知書店印行

7

著新滌許



7

現代中國經濟教程

新 知 書 局

自序

近百年的中國史，是一部中華民族爭取解放的可歌可泣的歷史；而近百年中國經濟的變化，則爲我們民族的顛沛坎坷的背境。苦難的中國，從古老的封建經濟，墮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深淵；又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更進一步，跌入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火坑！年復一年，情況總是每况愈下。農村經濟不斷在破產；手工工業不斷在覆滅；新式的民族工業則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狀況之下，患着未老先衰的病症。在這裏，吃苦的自然是在中國的人民。逃荒、失業、飢餓、疾病和死亡，就是百年來破產的中國經濟送給中國人民的「禮物」。

誰把這些「禮物」，誰把這些痛苦送給中國人民呢？經過一百多年的苦鬥，大家都把這些禍水認得清清楚楚了。第一是帝國主義列強；第二是傀儡「復活」的封建殘餘；第三是具有買辦性和封建性的官僚資本——中國式的獨占資本。這些毒菌結合在一道，把中國從封建經濟推入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火坑之中了！我們不僅吃生者的虧，而且吃死者的虧；我們不僅吃本國人的虧，而且吃外國人的虧！

抗戰八年，總算是勝利了！抗戰勝利的結果，在形式上，總算清算了日本帝國主義從甲午戰爭以來對於中國的侵略。但是，我們能够說從此便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火坑嗎？如果重視事實的話，我想誰也不會隨隨便便作肯定的答覆的。因爲：

第一、抗戰勝利以後，沙姆大叔已代替日本帝國主義而獨占了中國。從貿易、財政一直到政治和軍事，沙姆大叔都是握有無上的權力的。我們會反對過日本強盜的二十一條，但美國今天實際在華所享受的實權，決非二十一條所能比擬；我們咒罵過田中奏摺，但美國今天在遠東的行動，其猖獗的程度，早就超過田中奏摺了。在美國獨占資本的眼中，勝利的中國還比不上投降的日本，在他們的眼中，中國頂多是菲律賓第二而已。

第二、日本帝國在麥克阿瑟的保護之下，保存了它的軍事機構，亦保存了它的經濟機構。勝利後一年的中國經濟，比抗戰時期更加破產；但投降後一年的日本，却在廢墟中恢復起牠的工業來了！這種情形如果發展下去，你能肯定說日本的獨占資本不會捲土重來嗎？

這種危機，就是『悲慘的勝利』的結果；就是好戰份子斷喪國權拚命內戰的結果！打了八年國仗的中國，依然是災難重重，依然是在殖民地的封建經濟火坑中打滾！

但是，近百年的中國經濟，並非只有陰黑的方面而已。從太平天國的公田制度一直到目前在解放區中以土地改革爲中心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都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在千辛萬苦中摸索出來的勞作，

灌溉出來的好花！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太平天國的公田制是失敗了的，但它仍然佔有近代中國史的光輝的一頁。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現在正在解放區開展着。因為內戰，因為好戰份子的摧毀，在一個時期內，在特定的地區中，這一朵美麗的好花當然不免受到打擊，但，新民主主義的方向，乃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未來的中國必定走着新民主主義的道路，這是無可懷疑的了！

民國三十三年，作者曾在重慶寫了一本「戰時中國經濟的輪廓」。當時因為種種原因，並未能將新民主主義經濟寫進去。這個缺陷是不能自諱的。去年日本投降以後，摯友且兄曾建議把抗戰後期的經濟情況和問題，加以補充。當時作者正致力於完成「中國經濟的道路」，未能即刻從事。至十一月間，才開始這件工作。這個期間，中國是在內戰和談判的中間輾轉。動盪的局勢，使作者亦沒法拿出更多的時間來把它迅速寫好，一拖再拖，拖到上海時，只完成二章；其餘六章，是斷斷續續在匆忙中執筆的。

在起初，原想把「戰時中國經濟的輪廓」稍加整理和補充，但動筆之後，就覺得保持原來的寫法是不可能的了，這不但是材料的問題，而且是看法和體系的問題。我們不可能把戰時經濟簡單地只作為日本的殖民地經濟和中國的國民經濟的對立；我們亦不可能只把敘述限制在抗戰時期而把戰後的危機置而不顧；我們更不可能只把眼睛朝着黑暗而無視了中國經濟新生的嫩芽。因之，我便把全書的體系重新修改了。除了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一部份外，都是重新寫就的。在這裏，作者打算總結八年的戰

時經濟，並報導戰後殖民地化的危機。關於前者，我們的着眼點是在分析淪陷區的殖民地經濟、大後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和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消長；關於後者，我們着眼點則在把握收復區與大後方的殖民地經濟和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競賽。這種寫法當然是粗枝大葉的；甚且引起大人先生的痛恨。但，這是關係中國人民命運的問題。爲了使大家認清局勢，粗枝大葉的批評和大人先生的痛恨，都不是我所關心的事情！

我們確信中華民族的澈底解放和新民主主義社會之在中國實現是必然的，一如左拉所說：「真理是在前進中，沒有東西能阻止她」！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於上海

目次

自序.....一

第一章 戰前的中國經濟

- 一 從南京條約到馬關條約.....一
-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五
- 三 民族危機中的經濟國難.....二〇

第二章 戰時經濟底動態

- 一 從七七到武漢撤退.....二九
- 二 從武漢撤退到歐戰爆發.....三四

三	從歐戰爆發到太平洋戰爭	四二
四	從太平洋戰爭到湘桂淪陷	五〇
五	陰冷的勝利前夜	五七

第三章 戰時三種經濟政策的分析

一	敵寇經濟攻勢的演變	六五
二	大後方的戰時經濟政策	八五
三	解放區的財政經濟政策	一二三

第四章 戰時經濟的鳥瞰

一	烽火下的錦繡河山	一三一
二	鐵蹄下的殖民地經濟	一三三
三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後方	一四九
四	正在萌芽的新民主主義經濟	一五九

第五章 戰後的經濟危機

- 一 勝利後局勢的變化……………一七
- 二 跌價的恐慌……………一七
- 三 殖民地化的危機……………一七
- 四 殘破的農村經濟……………二九
- 五 瀕於破產的財政……………三三
- 六 三種危機的結合……………三六

第六章 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

- 一 奔騰澎湃的土地改革……………三三
- 二 積極扶助工商業……………三六
- 三 社會關係在變化……………四一
- 四 農村和工商業的繁榮……………四六

第七章 現代中國經濟的結構與各種社會力量

- | | | |
|---|-----------------|-----|
| 一 | 列強在華的經濟力量 | 二五 |
| 二 | 土地關係與地主經濟 | 二六三 |
| 三 | 沒落的地主經濟 | 二七三 |
| 四 | 畸形的資本主義經濟 | 二七六 |
| 五 | 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工資勞動者 | 三〇四 |

第八章 中國經濟的展望

第一章 戰前的中國經濟

一 從南京條約到馬關條約

爲了明白現代的中國經濟，我們必須回首去看一看近百年來中國經濟的演變。

近代的中國經濟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一個封建經濟的社會。那時中國的生產方法之廣大基礎，是由小農業和家內工業結合而成的。農村成了自給自足的小天地。農民們用手工種田，用手工紡織，而在這種自然經濟之中，農業當然佔主要的地位。但是，自然經濟並不是絕對沒有商業，沒有市場，而是說，勞動生產物之變爲商品，祇有附屬的作用而已。農民們並不爲市場而生產，但多餘的東西，就會被他們拿到附近的市鎮去出賣。所以，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各地存在着商業，存在着商業資本。

有一些人看見鴉片戰爭以前存在着商業資本，特別是土地的自由買賣，就否認中國社會的封建性。這完全是不合事實的瞎說。土地的自由買賣形成了商業資本與封建地主的結合，促進着小地主與自耕農的喪失土地，造成了土地不斷集中的局面；土地的自由買賣，包含着高利貸商業資本對農民作

深度剝削的事實，高利貸者經常利用小農的貧困，以極低的價格購得他們的土地。高利貸商業資本不但與土地之自由買賣結合，而且加強了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因為商業的發達，擴大了地主的胃口，從佃戶所搾取的剩餘生產物，除供自己消費外並變成商品投向市場中去。故商業資本雖然在某程度上腐蝕了自然經濟，但沒有破壞封建經濟，反而在原有的基礎上，加強了封建剝削。

這就是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簡略情形。鴉片戰爭把中國的海禁的大門打開了！在這個止水不波的古國裏，從此便興起波，作起浪來了！鴉片戰爭的結果是滿清政府與英國締結了南京條約，除割讓香港外，又承認了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及寧波五口通商，使資本主義列強得到深入內地的據點；規定了協定的海關稅率，使中國失去保護本國工商業的壁壘；而「在各通商口岸得購買或租借土地以建築房屋」一項，不久便成爲租界，成爲中國主權所以不能及的地區了。南京條約訂立之後第二年（一八四三），滿清政府又與英國訂立虎門補遺條約，除規定值百抽五的關稅外，並規定片面的最惠國待遇和領事裁判權。跟着，美國、法國、比利時、瑞典及挪威等國，亦與中國訂立同一性質的條約。一八五七年英法對中國進行第二次的鴉片戰爭，強迫中國訂立天津條約，除賠款一千六百萬兩（英法各半）外，增開天津、漢口、南京、牛莊、芝罘、鎮江、台灣、瓊州、淡水九處商埠，（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條約又開闢宜昌、蕪湖、溫州、北海、重慶爲商埠），擴大領事裁判權的範圍，關稅方面，入口物品繳納子口半稅百分之二·五後，沿途便不得重徵；交通方面，外國商輪軍艦可以自由航行各通商

口岸等等。這些條約是中華民族的鍊鏹，同時却是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武器。牠們以租界、割讓地及通商口岸爲根據地，以協定關稅和領事裁判權爲符護，以龐大的輪船裝載巨量的商品，把這些商品自由自在的推銷到中國的內地去了。

自此以後，中國的市場，便被歐美列強的商品所泛濫了。在國際貿易上，從一八七六年起，中國是歷年入超的。每年的海關報告，就證明了這一點；各個通商口岸的日趨「繁榮」，亦就證明了這一點。但事情還不僅如此，歐美資本主義列強除了發展對華貿易，除了發展對華的航業投資之外，亦且着手於條約商埠的公共企業之設立。一八六三年英商在上海所創辦的「大英瓦斯公司」，就是例子。不過，列強之在中國大量投資，乃是第一次中日戰爭以後的事情。

一八九四——九五年的中日戰爭，中國失敗了。這次戰爭的結果是日本和滿清政府締結了馬關條約，開闢沙市、蘇州、杭州等地爲商埠；並規定外人得在中國的通商口岸開設工廠。這麼一來，帝國主義列強便爭先恐後的在中國開辦工廠，在中國建築鐵路，在中國掠奪物資和榨取便宜的勞動力了。

國際資本主義之從自由競爭轉向爲獨占資本，是從十九世紀末葉開始的。資本主義以商品之輸出爲特徵；而帝國主義則以資本之輸出爲特徵。爲了資本之輸出，在列強的眼中，殖民地之意義更加提高了，所以，在世界已經分割完畢的帝國主義時代，列強對於半殖民地的爭奪，就更瘋狂起來。第一次中日戰爭和馬關條約之訂定，是與資本主義變成帝國主義同時的。因爲中國在中日戰爭的失敗中，

一切的腐爛情形完全暴露了，在這個時候，帝國主義列強本來是要把中國完全瓜分的，但由於中國人民的反抗和列強間本身難以協調的矛盾，故沒有實現這個目的，而改爲劃分勢力範圍。這麼一來，中國亦就從此變成爲帝國主義列強分別統治同時又共同統治的，不折不扣的半殖民國家了。

第一次中日戰爭所訂立的馬關條約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件十分嚴重的大事。它的嚴重性正不下於鴉片戰爭的南京條約。在馬關條約以前，列強對華的侵略主要是商品貿易。協定關稅，自由航行和開闢商埠的作用，都是以推銷商品搜括原料爲目的。商品底交換和流通，自然可以影響一個社會底經濟制度，但還不能根本變革一個社會底經濟結構，所以鴉片戰爭之後，歐美的商品輸入雖年有增加，雖然破壞了中國一部份舊的生產方式，但在基本上中國社會還能維持其原來的經濟制度，可是，這種情形，到中日戰爭之後便大不相同了，因爲與馬關條約的訂立同時，帝國主義列強對華的侵略從商品貿易轉變爲輸入資本。勢力範圍的劃分，工廠礦山的投資以至金融財政命脈的控制，使中國民族淪爲列強分別統治同時又是共同統治的奴隸！

資本帝國主義雖然打破了中國的自然經濟，迫使中國成爲牠們的市場；雖然「按照自己的樣子」，在中國引起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但牠們所望於中國的，乃是一個單純的市場，一個單純的原料生產者和一個單純的勞動力供給者而已，因此，牠們就很熱心的保持中國的封建勢力了。中國的土地關係和剝削關係在鴉片戰爭以後，並沒有改變，土地依然集中在地主手裏，農民依然在地主和高利貸商

業資本的剝削之下呻吟着！封建經濟雖然不能如鴉片戰爭以前一樣，是中國的唯一生產關係，但它仍然在統治着它的「半壁河山」。

就在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的槍砲、商品和資本的進攻之下，中國的封建經濟，從鴉片戰爭開始，逐漸地淪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經濟了。完成這個過程的乃是日本帝國主義迫着滿清政府所訂立的馬關條約。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

中日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列強對於中國的侵略，更為劇烈。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並沒有減輕這種侵略，並沒有改變這種趨勢，反而因為竊國大盜袁世凱的罪行使帝國主義列強在財政經濟上控制得更利害。故在這十九年（從馬關條約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對華的侵略大概可以歸納為：搶奪勢力範圍與重要港灣；搶奪鐵路的敷設權與礦山的開採權，競爭對華作間接投資及直接投資三項，茲依次述之於下：

第一、勢力範圍的劃分與重要港灣的奪取。一八九八年，德國首先佔領膠州灣，強迫中國承認膠州灣底租借權，並獲得膠濟鐵路底敷設及鐵路沿線礦山的開採權，於是，帝俄援例要求租借旅順、大連灣，並得延長東清鐵路至旅順及大連。法國租借廣州灣，獲得滇越鐵路敷設權，並與滿清政府約定

不得以兩廣雲南割讓於他國。英國租借威海衛及九龍半島全部，並約定不得以揚子江流域割讓於他國。這是帝國主義列強準備瓜分中國的初步。當時德國企圖以山東爲根據，漸次向中原各地伸入；帝俄企圖從西伯利亞及中央亞細亞侵入滿蒙新疆以至華北各省；法國企圖以安南及廣州灣爲根據，侵入兩廣雲南，進而伸展其勢力於四川。英國則企圖以上海爲據點，以中部揚子江流域爲對象，在華南則以香港及九龍半島爲據點與法國爭奪兩廣的支配權，並由緬甸西藏侵入雲南及四川；在華北則企圖以威海衛爲根據以京奉鐵路（此路係借英款築成）爲武器去阻止帝俄勢力之南下。英國的這種活動，在南方與法國衝突，在北方與帝俄衝突。爲了減少磨擦，牠在南方便與法國協定平分利權；在北方與帝俄商議鐵路協定。這麼一來，中國底重要地區都成爲英、俄、德、法、日等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了。美帝國主義因爲種種關係，眼睜睜地看着自己得不到利益，於一八九九年九月至十二月，依次向各國提議中國底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主義，要求各外國人民即使在列強底勢力範圍內也有通商航海上完全均等的待遇，英、俄、德、法、日等帝國主義，因彼此利害衝突，只得先後表示贊同，於是列強對華分別統治同時又共同統治的局面便確定了。

第二、中國現存的大部份鐵路，都是帝國主義列強爲着自己底需要，直接興築或強迫中國興築成的，而鐵路建築權的取得，往往同時又是鐵路沿線的礦山底開採權的取得，反之，亦有因爲取得礦山開採權而要求在礦山附近建築鐵路者。甲午戰爭後的十六年，帝國主義列強就是以鐵路建築和礦山開

探爲侵略的主要目標的。民國成立後，竊國大盜袁世凱爲實行武力征服全國，乃盛行締結鐵路借款契約，以謀取得作戰的巨款，故又重新出現列強爭奪鐵路權利的時代。就列強在中國的鐵路投資看來，中國的鐵路可以分爲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兩種，前者是列強自行建築的鐵路；後者是向列強借款築成的鐵路。在中國的國有鐵路中，不向外國借款單靠本國資本築成的，原只有平綏路，但後來爲了延長路線，亦不能不乞憐於日資了。列強直接投資的鐵路，計有中東（俄），膠濟（德），滇越（法），九龍（英），南滿（日），安奉（日）六條。中東鐵路始於一八九六年，膠濟鐵路始於一八九八年；滇越鐵路始於一八九五年；九龍鐵路始於一八九八年；南滿鐵路原爲中東路的支線，日俄戰後，帝俄以之割讓給日本。列強間接投資的鐵路，計有：北寧（一八九八），正太（一九〇二），汴洛（一九〇七），滬寧（一九〇三），廣九（一九〇七），滬杭甬（一九〇八），津浦（一九〇八），道清（一九〇五），粵漢（一九一一），平漢（一九〇八），南潯（一九一二），隴海（一九一二），四鄭（一九一五），吉長（一九一七），平綏（一九一八），四洮（一九二〇）等線，如以債權者而言，則北寧、京滬、廣九與滬杭甬四組屬於英國中英公司；正太屬於華俄道勝銀行，道清屬於英國福公司；汴洛與隴海二線屬於比利時電車鐵路公司；津浦屬於英國華中公司與德國德華銀行；平漢屬於英國匯豐銀行與法國匯理銀行；粵漢川屬於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南潯與平綏屬於東亞興業公司；四鄭屬於橫濱正金銀行；吉長與四洮屬於南滿鐵路公司。從外國借款來建築鐵路，並不簡簡單單的只具有

債權債務關係，而是附帶着種種條件的。概括說來，可以綜合爲：（一）一定年限內鐵路事業底管理；（二）鐵路建築工程底承辦；（三）總工程師及會計主任底任用；（四）鐵路建築上所需要的材料供給底優先權；（五）借款底手續費有高至百分之二·五者，外債實收數普通爲票面額之九五至九〇之間，甚至只有八五者，利息多爲五厘，此外還有紅利底享受，有些契約，規定在借款未償清期間，對於債權者負有一定的報酬義務，每年須從鐵路收入底純益中，於借款利息外，提出若干爲報酬；（六）以鐵路全部財產及收入，或更以關稅、鹽稅及厘金爲借款担保品，於一定期間後中國無力償還時，債權者便得扣押；（七）借款償還期限以從二十五年至五十年最爲普通。

帝國主義列強強迫中國建築鐵路，劃定鐵路所通過的區域爲自己底勢力範圍，在鐵路沿線設立工廠，開採礦山。例如英國在北寧路開採了開灤煤礦；在平漢路開採了六河溝和臨城的煤礦；在津浦路開採了嶧縣煤礦；在道清路開採了焦作煤礦；在平綏路開採了門頭溝煤礦；日本帝國主義在南滿鐵路開採了撫順和本溪湖煤礦；在萍株路開採了萍鄉煤礦；德國帝國主義在正太路開採了井陘煤礦，在膠濟路開採了坊子及洛川煤礦。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在華權益大半被日本奪去，這些鐵路和煤礦亦都落入日人手中，故中國的重要煤礦都在英日帝國主義之下。在東北，十分之九受日本的支配；在中國本部則以英國勢力爲大。鐵路建築了，外資的礦山開闢了，外資的工廠設立了，從外國運入及在華外資製造的商品就如狂潮一般的湧進內地，內地的原料則一點一滴的被牠咀吸去，中國的整個經濟機

構就跟着起了變化了。

第三、列強對華投資，可分為直接的與間接的二種。直接投資大都起於中日戰爭之後，剛才所述的鐵路投資與礦山開採，都是屬於這一類的。實際上，帝國主義列強對華之直接投資幾乎是無孔不入的。除了鐵路和礦山之外，英日在華所設立的輪船公司，支配了中國底航業；在電報電話及航空等交通機關中，亦有外國的直接投資；在紡紗業中，日英二國的資本佔有一大半的勢力；在電氣業和烟草業中，英日美佔有一半以上的投資；其他如麵粉、製鐵、榨油、火柴、造船、印刷及玻璃等業，亦都有外國資本的侵入，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差不多所有的一切工業，都有牠的優越的陣地。金融方面，中日戰爭以前，外國在中國境內設立銀行的，只有英國的匯豐和麥加利兩家。那時從事對華投資的，除東亞銀行和怡和公司（均屬英國）外，還只有匯豐銀行一家。到了中日戰爭以後，情形便大不相同了。爲了建築鐵路和開採礦山，爲了便利對華的商業活動，爲了設立工廠，爲了鞏固自己的勢力範圍，銀行是一個必不可缺的工具。中日戰後列強之所以在華拚命設立銀行，其原因就是在此。有些投資機關，表面上雖然獨立，實際上亦是受這些銀行支配的。例如中央公司，便是由匯豐銀行和怡和公司共同組成而受匯豐銀行指揮的。從中日戰爭至辛亥革命的十六年，是外國銀行及其有關機關競爭對華投資最猛烈的時期。投資的性質，一部份是鐵路借款；另一部份是政治借款。辛亥革命以後，政治借款佔絕對優勢，有些雖則在名義上叫作實業借款，實際上亦是移作軍政費之用的。這都是屬於間

接投資的範圍。

列強對華的間接投資（即借款），利益是特別優厚的。這種投資的利益甚多：（一）利息高於帝國主義本國，一般在七八厘之間，有時甚至高至一分五厘的；（二）有回扣，而這種回扣通常達百分之十，甚至高至百分之十九者（如一九一四年中法實業銀行底一萬萬法郎借款）；（三）多有關稅、鹽稅、厘金及鐵路等作為担保，由此可控制中國的財政和鐵路；（四）鐵路借款可以享受巨大的紅利（普通二成）或特別報酬；政治借款可以取得政治上的特權；（五）經手借款的銀行可以取得相當手續費並可故意抬高匯價，使中國政府借款時少收入，而在償還時多付出些。因此，中國的許多借款，實際上所得的往往與名義上所得的相差很遠。例如一九一三年袁世凱的善後大借款，名義上是二千五百萬鎊，實際只收到二千零九十七萬鎊。帝國主義列強的間接投資，完全是一種超經濟的剝削。就是因為超經濟的剝削，所以這種投資的利益優厚，是它們在本國投資所不能比擬的了；就是因為有着這麼優厚的利息，所以列強用種種方法強迫中國政府借款建築鐵路，用種種辦法爭取對中國進行的政治借款。什麼俄法借款，什麼英德繼續借款，什麼善後大借款等等，都是這個時期的產物，而國際銀行團的屢次改組（英法德三國銀行團答應美國的要求，變成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又答應日俄之要求，變成英法德美日俄的六國銀行，後來美國宣佈退出，乃變成五國銀行團了），亦明顯地證明國際對華投資的激烈化。

國際投資是帝國主義列強支配中國的一種重要的手段，國際投資與中國的殖民地化，具有一種密切的關係。雷麥教授在其名著「外在華投資」中，曾提出一九〇二年列強在華投資爲七八七、九〇〇、〇〇〇美金；到了一九一四年則爲一、六一〇、三〇〇、〇〇〇美金。十二年間，列強在華投資竟增加一倍以上。從這個簡單的數字，我們是很可以看出帝國主義列強是如何急速地在增強其對於中國經濟的支配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四年間（一九一四——一八）歐美列強無暇東顧，牠們正忙於生產軍火，正忙於支持戰爭，在這個時候，中國的民族工業便拾起頭來。

中國的資本主義工業是在鴉片戰爭以後被動地受英美等國的侵入所刺激起來的。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福州成立了機器製茶廠；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上海成立了機器碾米廠和江南製造局，就是這種開端。同光之間，中國的工業經歷了軍用工業和官督商辦二個時期。所謂軍用工業時期，那完全是官僚利用國家的資金在瞎鬧；所謂官督商辦還不是官僚們在玩着官督官辦的一套把戲？民營工業之拾頭，是一九〇五年以後之事，因爲日俄戰爭的激刺，中國的紳商們大叫「收回利權」的口號，於是商人資本亦有一部份跟着官僚資本向工業投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四年間，因爲列強無暇東顧，中國的民族工業得着一個舒展的機會。列強無暇東顧的情形可以用出入口的商船噸數的指數，作爲證明。如以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則一九一四年爲一〇五，一九一五年降至九七·一，一九一六年降至

九四·三，一九一七年降至九三·一，一九一八年降至八六了。出入口商船噸數之減少，反映出列強對華經濟侵略的減輕，於是，中國的民族資本便在紡織、麵粉、電力、火柴等部門活躍起來了。民國八年全國的新式工業的廠數及其資本額如下：

種類	廠數	資本總額（單位元）
製鐵	一〇	二一、四六七、〇〇〇
製糖	二	七〇〇、〇〇〇
士敏土	四	二、七二五、〇〇〇
製革	七	四、一〇二、〇〇〇
棉織	八〇	四六、一二七、〇〇〇
製鹽	二	六三九、〇〇〇
烟草	一七	七、〇三〇、〇〇〇
麵粉	六二	一三、七一〇、〇〇〇
造紙	七	一、七六五、〇〇〇
印刷及文具	一八	三、八一九、〇〇〇

第一次世界大戰實在給與中國民族工業以很好的機會。單從這個統計還不能看出這四年間的發

展，因此我們無妨進而作一個簡單的比較。以最佔主要的紡織業來說吧，民國元年，全國華商紡織廠有三十二個，紗錠八三一、一〇六個；織機二、二五〇台；至民國八年歐戰結束的時候，華商紡織廠增至五十四個，紗錠增至一、六五〇、〇〇〇個。若以每廠的資本額來比額，則情形就更明顯了。民國元年至四年幾年間，絲織業每年新設平均廠數爲〇·三家，平均資本額爲五〇、〇〇〇元，麵粉業每年新設平均廠數爲五·六七家，平均資本額爲九九、〇五九元；電氣業爲四家，平均資本額爲一三八、五八五元；火柴業爲四·三三家，平均資本額爲三〇、五三八元。到了歐戰時期，絲織業每年新設平均廠數增至一·六七家，平均資本額增至一七六、四〇〇元；麵粉業平均每年新設廠數仍爲五·六七家，但平均資本額已增至一六八、〇〇〇元了；電氣業的每年平均新設廠數增至七·三三家，平均資本額增至一六〇、〇〇〇元；火柴業的每年平均新設廠數雖降低至三家，但其平均資本額則增加至七三、〇〇〇元。這是資力較集中，規模較擴大的表現。

中國的民族工業，在歐戰時期嘗作某一定度的發展，但日本帝國主義則更利用這一機會肆無顧忌的向中國作盡情的侵略。以紡織業爲例，一九一三年中國全國紗錠共有八十三萬一千九百四十六枚，其中日商（在華）紗廠的錠數，還不過九萬五千餘枚，佔中國境內總數百分之一·五；華商爲四十三萬七千一百七十二枚，佔總數百分之五二·五，到了歐戰時期，華商紗廠雖有發展，但日商紗廠則發展得更快。這個時期中國全國共有紗廠八十七家，其中華商五十四家，日商三十三家，英商一家。

但五十四家華商紗廠的紗錠共一百六十五萬個，平均每家只有三萬一二千錠，而日商紗廠的錠子則有一百二十餘萬個，平均每家有二萬七千餘錠，復次，三十三家日商紗廠隸屬於十七個公司，而五十四家華商紗廠則隸屬於四十個公司。華商最大的紗廠是申新，它轄有五個廠（以此時而言），而日資的內外棉紗廠則轄有十三個廠。這種優劣的情形，就一望可知了。貿易方面，自南京條約以後，英國在對華貿易中，總是佔着第一把交椅的，歐洲大戰的爆發，給與英國的對華貿易以極大打擊，日本就在這個時候，取了英國的第一把交椅而代之。一九一三年中日貿易額爲一八四、八九〇、八四八關平兩，一九一九年爲四一、八四七、〇二九關平兩；反之，英國在一九三一年爲一一三、二五七、三五七關平兩，一九一九年雖昇至一七七、五二四、四八八關平兩，但若與日本比較起來，那是倒退得多的。在一九三一年中英貿易額約佔中日貿易額的六成；而一九一九年則祇佔四成而已。日本帝國主義是有計劃地利用時機對華進行侵略的，一九一五年這個帝國主義強盜強迫竊國大盜的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的要求，向中國作全面的控制。在這個時期，日本強盜幾乎獨占了對華的鐵路投資。一九一五年的四鄰綫是由橫濱正金銀行投資的；一九一七年的吉長綫是由南滿鐵路公司投資的；一九一八年的平綫是由東亞興業公司投資的；吉會綫（未築）高徐順濟綫（未築）及滿蒙四綫（未築）部是由日本銀行團投資的。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年間外國在華所設立的銀行只有八家，而日本就佔了五家。綜合這些情形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給與中國民族資本以拾頭的機會，更給與日本帝國主義以侵華的機

會。因為中國的民族工業發展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的結構就更深刻地起着變化；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在這個時期急速的發展了，遠東的國際關係，特別是列強的對華關係，就劇烈地起着變化。舊的均衡被打破了，英帝國主義一向在華的優勢，被日本強盜所奪去了。

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給與中國經濟的影響；大戰結束之後，歐美列強又回頭東顧，中國經濟又展開着新的一個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德俄帝國主義在遠東的勢力消滅了，在遠東的政治經濟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的，則有英美日三個國家。以對華貿易而言，其趨勢如左（單位關平兩）：

國 別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三〇年
日 本	一八四、八九〇、八四八	四四一、八四七、〇二九	五四三、七二〇、一〇九
美 國	七三、〇七七、四九九	二一一、三五五、三八三	三六四、二八六、〇一七
英 國	一一三、二五七、三五七	一七七、五二四、四八八	一七〇、九二六、九八三

在對華貿易中，日本爬上第一把交椅，美國亦壓倒了英國。在金融方面，英國在華的主要銀行雖然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以前就築成了堅固的基礎，但到此時，亦仍有「跑不動」之感，反之，日本強盜却在這個時候拚命的設立新銀行和分行。以一九二五年的情況而言，外國在華開設的銀行共有六十三家，其中日本佔四十二家，分行九十處（正金有十三，朝鮮有二十一，台灣有七等等）；美國有

六家，分行二十處（花旗有八，美豐有三，大通有二，尚有中美合辦的中華懋業銀行等等）；英國有四家，分行二十二處（匯豐有十二，麥加利有七，有利有二，尚有大英銀行）。日本的四十二家銀行差不多有一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設立的。日本在華銀行發展的速度誠為英美二國所不及，不過英國銀行在華的歷史較長，所以這個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在華的金融力量，仍是不可侮的。外國銀行曾經在中國發行紙幣，其中以匯豐銀行的紙幣信用最高，流通最廣。上海、香港及廣州成為它的主要流通市場，其次才算到麥加利、正金及花旗銀行的鈔票。這個時期，英帝國主義在華的這種金融力量，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

談到列強在華工業，這個時期仍以日本居第一位。茲以紡織業為例，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〇年中英日三國的紗廠錠數其趨勢如下：

經營主體	一九一三年（百分率）	一九二五年（百分率）	一九三〇年（百分率）
華商	四三七、一七二（五二·五）	一、九八二、二七二（五六·三）	一、四九九、三九四（五五·六）
日商	九五、八七二（一一·五）	一、三三一、三〇四（三七·八）	一、八二一、二八〇（四〇·五）
英商	一六七、九〇二（二一·〇）	二〇五、三二〇（五·九）	一七七、二二八（三·九）
總數	八三一、九四六（一〇〇）	三、五一九、八九六（一〇〇）	四、四九七、九〇二（一〇〇）

由此可見日本在華紗廠的紗錠，一九二五年比一九一三年增加到十倍以上；一九三〇年則增加到

十九倍。英國在華紡廠呈現着停滯之態；在百分率中，並且呈現着倒退。至於中國資本的紗廠，表面上此時雖有八十二家，但其中包括四個有外資關係，四個當時還在創辦，二個短期仍在停工的工廠。這四個有外資關係的紗廠（上海的崇信、鄭州的豫豐、天津的裕大和寶成），共有紡錠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枚；這四個在創辦中的及一個長年在停工中的紗廠，共有紗錠十二萬八千四百枚，若把這個數字除去，則華商在一九三〇年的實際紗廠數只有七十三個，實際紗錠數只有二百二十一萬五千枚，不及總紗錠量的二分之一。如果進一步去看看當時中日紗廠的資本構成，那就可以更加明白：中國紗廠的優勢完全是表面上的。日商紗廠數與錠數雖然少於華商而資本却多於華商，華商紗廠平均每枚紡錠只有資本五十五元八角，而日商紗廠平均每枚紡錠却有資本一百十四元七角，比華商紗廠多一倍。同時，日商紗廠所雇用的工人少於華商紗廠底一半，而其產紗量却有華商紗廠底十分之六，其轉運錠數還超過華商紗廠底十分之七以上。這是說，日商紗廠底工人數只有全國紗廠工人數百分之三十；而其產紗量却有全國產量底百分之三四·六，其轉運錠數則佔全國紗錠數的百分之四〇·五，還有，日商紗廠的織機雖然少於華商紗廠，而其產布量却多於華商紗廠，這亦表示日商紗廠底生產能力是優於華商紗廠的。其在煤業，一九二〇年外人在華經營的及中外合辦的煤礦所出的煤，共計九百四十八萬五千四百十六噸，約佔新式煤礦總產額的百分之六十六。其中日資的煤礦發展得更快，一九二三年撫順煤礦與烟台煤礦，產量為四百七十八萬二千二百噸；到了一九二五年，單單撫順一礦便增至六百七

十一萬七百二十噸，若與烟台之產量一並計算，就達到六百八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噸了。若以一九二五年全國二千三百四十七萬四千噸的煤產而論，外人經營及中外合辦的煤礦的產額便佔了一千二百餘萬噸，超過總額的一半。紡織和煤礦是中國二個比較重要的工業，用這二個比較重要的工業作例子，我們很可以看出英日，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在中國工業中，是如何佔着上風了！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九一八」事變的十三年間，英美列強從新回頭來到遠東，英美嘗攜手共同對付日本，企圖迫使日本吐出歐戰期間它在中國所獨得的權益。華盛頓會議的九國公約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日本在華的特權並未受到大的影響，特別是經濟方面，日本在華的力量是與日俱增的。英美在遠東對日的鬥爭，並沒有減輕中國民族資本的壓迫，反而在分頭並進的情況之下，給予中國的民族工業以更大的打擊。歐戰期間欣欣向榮的中國民族工業，就在這個時候顯得憔悴，這並不是說，中國的民族工業在這個時候就急激地呈現倒退，而是說，中國的民族工業雖然有點增長，在一些生產部門中，中國的民族資本在廠數或生產的絕對數字上雖然比以前增加，但外國資本在華的經營，却比中國資本發展得更快，在資力和技術設備上，牠們比中國的工廠來得更結實和更進步。茲以華商的紗廠廠數和錠數為例，一九一九年華商廠數有五十四家，一九二三年增至一二〇家，一九三〇年增至一三〇家；錠數方面，一九一九年爲一、六五〇、〇〇〇枚；一九二三年爲三、五五〇、〇〇〇枚；一九三〇年增至四、四九七、九〇二枚。縲絲業方面，上海的絲廠廠數，一九一八年爲七十一家，一九

二七年爲九十三家；一九三一年增至一一三家，絲車車數一九一八年爲一九、二〇〇台；一九二七年爲二二、一六八台；一九三一年增至二七、〇〇〇台。從這二個例子，可以證明中國的民族工業在歐戰後的十三年中，並不是沒有進展的，但可惜這種進展，沒有外國資本在華進展得那末快。前一段中日紡織業的比較中，就已證明了這一點。生絲方面，中國絲處處受到日本絲的壓迫；在煤鐵方面，中國年有增加的煤產是握在日本和英國的手中；中國極大部份的新式鐵礦更是緊緊地被日本強盜所把持。煤鐵的增產並不表示中國民族工業的進步，倒是表示日英等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經濟作更進一步的侵略吧！

至於農村經濟，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逐漸走上崩潰的道路，外國工業品的輸入，破壞了農村的家庭手工業，例如棉紗棉布破壞了農村的手工紡織業，而民國成立以後，歷年的軍閥混戰更給與農村以更大的摧殘。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被反動派所出賣了，以後十年的「血染東南半壁紅」的悲劇，統治者又進一步的對贛、閩、粵、兩湖、安徽、河南以至四川等省的農民，作無情的血洗！在這種情形之下，勞動力大量死亡了，生產機關大量破壞了。林木之種植與水利的修理自然無從談起。民國二十年的大水災，並不是單純的天災，而是人禍的結晶。這個大水災又進一步地促進全國農村的破產。看吧！讓我們來看看接踵而來的民族災難與經濟國難是如何交織在一起吧！

三 民族危機中的經濟國難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二）是中國歷史上最慘痛的一年。這一年，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九一八」事變，強佔了我國的東北；這一年，泛濫華中各省的大水災襲擊着廣大的歷年遭受兵燹的農村；這一年，世界經濟恐慌（從一九二九年起）已張開巨口吞併了整個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列強爲挽救自己的危機，競相在中國爭取市場。跌價傾銷，如荼如火的向中國襲擊。綜合這些因素，中國的國民經濟便深刻地陷入破產的深淵之中了。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用刺刀把東北四省一百二十八萬五千餘平方公里的土地（佔中國領土十分之一），從中國割開出去，把白山黑水間的三千五百萬同胞變成它的牛馬奴隸。從資源上說，中國失去了十分之七的大豆產額，失去了三分之一的森林，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鐵產，失去了三分之一的煤產；失去了十分之四的鐵路，失去了五分之二輸出貿易。土地被佔領，資源被掠奪，國內市場因之縮小；輸出貿易又因之而銳降。這一個空前的巨大的打擊，叫這個創痛巨深的中國，如何忍受得了呢！

在日本強盜的鐵蹄之下，東北四省急速地殖民地化了。「南滿鐵路株式會社」成爲統治東北的經濟中樞（七七事變後，它被鮎川義介的「日產」所代替）。所謂「滿洲國」實際就是「滿鐵王國」，

它控制了煤鐵、控制了交通，控制了機器和化學等業。其在農村，東北極大部分的土地握在「滿洲殖會社」手中。日本強盜不斷地組織退伍軍人，進行武裝移民，貪婪地奪取農民的土地房屋和糧食。日本強盜在東北是事實上的封建領主和獨占資本家！

日本強盜在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後，次年又在上海製造一二八事件，引起淞滬軍民的英勇抗戰，可惜的是投降主義者在當時掌握了國家的政權，在「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之下，幾年間，訂下了一連串的喪權賣國的條約——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和華北的經濟協定。這些協定使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力量，飛黃騰達的發展起來！據一個簡單的估計，一九三一年以後的四五年間，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的新投資，在華北達七萬三千三百萬元；在華南共達三萬九千三百萬元。以華北為例，僅僅棉紡一項，日本在這個時期所投的資本就達一萬萬日元之巨，此外，對於龍煙、井陘、宣化煤礦，對於龍煙鐵礦，對於津石鐵路，對於塘沽築港，對於化學、捲煙、麵粉及毛織等業，皆有巨量的新投資。日本強盜對於華北經濟的侵略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它們用經濟包圍的方法，去圍困開灤煤礦，啓新水泥廠和久大製碱廠與華新紡織廠等等；它們以關東軍的武力，強佔了柳江煤礦；它們以檢閱日本特務機關的無恥行爲，強迫長城煤礦加入東洋殖會社的資本。其在華中華南，敵人在「中日經濟提攜」的陰謀之下，拚命地發展其在華的金融事業與對華進出口貿易。它的在華航業，幾乎壓倒了英國的太古和怡和；它的在華紡織業，在實質上已壓倒了華商而執中國棉織業的牛耳，並且企圖以

上海和福建爲中心，猛烈地向華中華南各地伸展其勢力。

日本帝國主義這種瘋狂的侵略，不但給與中華民族以空前的災難，而且打破了華盛頓會議以來的太平洋的均勢。「九一八」以後，只有日本「法人」才能在東北存在。從一九三一至三六年的五年間，日本強盜在東北急驟地增加了十一萬萬二千餘萬元的投資，反之，英美法蘇諸國原有的七萬萬元投資，則不得不於這個時候撤退。其在中國本部，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工業貿易與金融的發展，亦使英美諸國感受到嚴重的威脅。別的不說，單單武裝走私一項，就够使中國民族工業頭痛，就够使英美列強的對華貿易受到極大的打擊了！

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之後，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爲了緩和國內的階級矛盾，爲了推銷國內過剩的商品，都把眼光射向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國家來。中國是一個廣大的半殖民地國家，是一個傾銷的好對象（因爲殖民地是有獨占的宗主國的），再加以日本強盜在這個時候的猛進，所以英美與日本強盜間的矛盾就越來越深刻，彼此間的鬥爭就越來越劇烈了。

英國爲挽救其在華的頹勢，嘗企圖透過國際聯盟的技術合作，透過建設銀公司，聯合美、法、比、意對中國來一次巨額的投資，但這種企圖被日本強盜的武力所嚇住了，所謂「天羽聲明」，就是這麼一回事！一九三五年羅斯爵士風塵僕僕，兩次到東京向日本謀取妥協，但結果亦碰了一鼻子灰，於是，英國乃運用其優越的金融勢力，援助中國建立新貨幣制度，把法幣拉進英鎊集團，以便鞏固它

在中國金融市場的霸權；同時，又以退還庚款及建設銀公司的方式，致力於長江以南的鐵道事業，並以香港為據點，致力於資助廣東的經濟建設，藉以鞏固其在華中華南的勢力。

黃金王國在「九一八」以後，對於擴展其在華勢力，更是急起直追。這個時期，美國在列強對華貿易的總額中，已壓倒英日而佔第一位。在進口貿易中，一九三二年美國佔百分之二五·四三，日本只佔百分之一四·一一，到了一九三三年，美國對華之進出口佔百分之二一·八六；而日本只佔百分之九·七一。日本在對華貿易中，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就是佔着優勢的；到如今，這種優勢被美國所打垮了。在航空事業和公路運輸方面，美國的成就更為英日所不能企及。有名的中國航空公司不是在美國的太平洋航空公司支配之下經營麼？這幾年，在中國大陸上所開關的數千公里的公路不是走着福特公司和通用公司的卡車和汽車麼？不是消耗着美國運來的汽油麼？中國的新貨幣制度，在開始時雖與英鎊聯繫，沒有多久，羅斯爵士所苦心焦思的法幣，不是在黃金王國的金融力量控制之下，變成美金系統中的一個單位麼？

除了英美之外，法西斯德國自「九一八」以來，亦拚命的向中國侵略，法西斯德國在遠東的活動是以德日聯盟為根據的。玉萍鐵路的大借款，湘黔鐵路的大借款，都是「德日合作聯盟中所規定的」。航空方面，歐亞航空公司是在德國漢沙公司促動而成的，儘管表面上說這個公司的業務行政的權力，屬於華方，但事實上，有那一點不證明德國資本在這裏發揮其支配的作用呢？第一次世界大戰

以後，德帝國主義在遠東的力量已被打破，但自「九一八」以後，却一步步在陰謀復辟了！

「九一八」以後的局勢，雖然不及甲午戰爭以後的嚴重，但帝國主義列強爲了對抗日本強盜在華之獨佔，却一步步的迫緊！東北四省已經被日本強盜用武力佔去；華北五省又在日本強盜的要挾把持之下一天比一天的特殊化；而華中華南以至華北的某些地區，則深刻地浸潤着美英德等國的資本。民族危機是空前的嚴重；經濟國難則與民族危機密切地打成一片。

中國的民族資本本來就是孱弱得怪可憐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它的黃金時代，可惜的是，這個曇花一現的黃金時代沒有多久便成陳跡了。日本強盜的劫掠和武裝走私，英美列強的商品傾銷與資金輸入，像急雨驟雨一般，給與這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中國工業以更嚴厲的打擊。這麼一來，就連一點十分可憐的陣地，亦保守不住了。開平煤礦只有依附在英資開灤煤礦局之下，才得生存；因五卅運動而長大起來的中原公司，竟至歸併於英資福公司。冶煉方面，民族資本的龍煙公司、漢冶萍公司、宏豫公司及和興鋼鐵廠，都先後停止產鐵或停止鍊鋼了。比較有成績的輕工業，到了此時，亦弄得七零八落了。華北的裕元、北洋等紗廠都拍賣給日本人；上海的申新五廠亦在二十三年拍賣給日本人。如以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六年來比較，華商紗錠從百分之五七·一減到五六·八五；線錠從百分之三三·二五減到三二·五三；布機從百分之四八·二三減至四七·九五。除了紡織業的生產規模不斷縮小之外，中國的紗布交易所甚至開拍日紗，爲日本強盜的紡織業錦上添花！縲絲業更是不堪回首。一

九三〇年中國的繅絲廠有一〇七家，車數有二萬五千三百九十五部，到了一九三五年，廠數減至三十家，車數減至七千六百九十部。火柴業雖盛極一時，但到這個時候，華商火柴業竟至於和日資合作，辦理全國火柴聯營社。中國的民族工業，在生產規模上不斷的縮小，有的竟縮小到歸併入外資的範圍之中；在運銷的領域中，更是感到走頭無路，甚至奴顏婢膝為外貨之傾銷而賣力。中國民族資本的軟弱性和買辦性，毫無保留的發揮出來了。這不是從半殖民地地苦境再進一步地向殖民地沉淪麼？

農業方面，經過一九三一年大水災之後，全國農村更加破產了。因為水災，華中一帶的農田都被淹沒了；廬舍都被颶去了！一九三三年又來一次旱災，迫得江、浙、安徽、四川、陝西等處的農民在吃樹根和觀音土，餓死和自殺的不可勝計。江西、閩西等處的農村，則在統治者有計劃的剿毀之下，人口大量的死亡；農事的破壞，更是不問可知的！在「九一八」以後的國難中，農村的破產是和城市的蕭條密切地打成一片的。這個時期的經濟國難，不僅包括工業而且包括農業；不僅包括城市而且包括農村！

有一些人拚命地在掩蓋這個時期國民經濟的破產，他們常常列舉這個時期的一些數字，證明這個時期政府如何致力於經濟建設，如何致力於建築鐵路和公路，如何致力於提高工業生產。這種武斷的宣傳，實在是不值一駁的。你這些渺小的數字怎能掩蓋這個時期的農村破產、工業萎縮、農村破產和人民大量失業饑餓和死亡的現象呢？在喧賓奪主的工業情況之下，多開幾條鐵路和公路，只能為國際

金融資本多開一些投資的道路，只能替帝國主義列強多開闢一些控制中國經濟的門徑，只能使外國商品的傾銷來得更方便更迅速吧了。至於工業生產，在抗戰前夜，曾經有一度好轉。這裏之所謂好轉，指的是中國某些出口業較前有點起色；指的是一九三五——三六年入超逐漸減低。這是因為國際資本主義在一九三二年渡過它的最低點之後，逐漸回復，因而中國在世界市場上的某些商品就有較好的銷路，並非大人先生們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所「運動」出來的。關於入超的減少，那是因為日本強盜在此時盛行走私，走私入口的商品當然沒有登記在海關的統計中；那是因為外資工廠在這個時期發展得極快，在華外廠的商品代替了一部份外貨的進口；那是因為中國的廣大民衆不斷受着「天災」人禍的打擊，社會購買力大大衰落。很明白，這並不是由於民族工業繁榮之故。如果把這些問題都綜合起來觀察，則所謂「好轉」，不是一種「當面撒謊」麼？

中國的國民經濟已經走到總崩潰的邊緣了！構成這種總崩潰的基本原因，是日本強盜的得寸進尺的侵略所造成的中華民族的民族危機，是統治者的鎮壓民衆的一黨專政，是統治者的破壞城市和摧毀農村的殘酷的十年內戰。憂時之士，都認明非抗戰無以挽救中國民族的危機；非停止內戰實現和平民主無以進行對日抗戰。「一二九」的學生救國運動就是這種表現；西安事變就是這一運動的進一步的發展。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就開始了！

離開民族解放運動來談建設國民經濟，是沒有前提的；離開政治民主化而來談建設國民經濟，亦

是沒有前提的。八年的艱苦抗戰，就是在爭取中國民族的解放；在抗戰中，理應採取自力更生的原則，準備在外援斷絕或減少時，以發展生產的成果來支持抗戰。可惜的是統治者在大後方的措施並不是如此！統治者一面以消極抗戰來向外國求乞援助，一切希望都仰賴於友邦；另一面則乘着民間資本為戰爭所摧殘的機會，壯大了官僚資本，並且把戰爭中一切負擔不由分說的壓在廣大的貧苦農民的身上。對日的戰爭，拖了八年；對於敵後抗日軍民，亦磨擦了幾年。這樣的拖，這樣的磨擦，好在「上帝保佑」，終於跟着同盟國一起勝利了！但是，中國的國民經濟呢？真是勝利得太「悲慘」了！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八年抗戰中，中國的國民經濟，在時間上是經歷着什麼一個旅程；在空間上是發生着什麼變化吧！但爲了使讀者對於這些變化有較明白的認識，還應同時花一點工夫來看看各種不同的經濟政策！

第二章 戰時經濟底動態

一 從七七到武漢撤退

爲了要把握中國戰時經濟的變化，讓我們暫且把牠分成幾個時期去研究吧！如果把它與戰局政局聯繫起來，則八年三個月的戰時中國經濟，約可分爲五個時期：這就是：從「七七」到武漢撤退；從武漢撤退到歐戰爆發；從歐戰爆發到太平洋戰爭；從太平洋戰爭到湘桂淪陷和勝利前夜。現在先說第一個時期。

中國戰時經濟第一個時期的特點是淪陷區工農業的遭罹浩劫；是國內經濟據點的逐漸轉移。

爲什麼中國戰時經濟在這個時期要呈現這些特點呢？很明白，因爲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民族資本所經營的廠礦，大半都是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而在武漢撤退以前的十六個月中，因爲特定的歷史條件與主客觀力量之優劣，使我方不得不採用戰略防禦，在消耗敵人力量的原則下，以空閒換取時間。故隨着領土之暫時喪失與敵人之摧殘，建築在沿江沿海經濟據點上的民族工業與「華北」江南一帶的農村，便不免遭罹浩劫了。而在另一方面，爲了繼續抗戰，爲了發揮大後方發

展經濟之可能性，一些民族資本之西移與政府在西南各省之工礦建設，便改變了過去側重沿海的偏在狀況，造成國內經濟重心之轉移了。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淪陷區中工農業所遭受的浩劫吧！

據各方估計，在蘆溝橋事變以前，全國屬於民族資本的紡織業，紗錠約三百萬枚，布機約二萬五千台。抗戰爆發之後，因為敵人砲火之摧毀與劫奪，因為擱置在戰區中無法生產，因為出售與第三國商人的原故，華商九十六家紗廠中損失了六十家。紗錠之損失其可以計算得出來的將近一百八十萬枚；布機之損失，其可以計算出來的將近一萬八千台。如果把小規模的染織廠計算在內，則損失紗錠當超過二百萬枚，佔總設備百分之七十；布機損失額所佔的百分比，亦復如此。麵粉業方面，戰前全國有一百一十家，其中以上海及江蘇、山東、河北的出粉能力較強，幾佔全國總產量百分之八十強。抗戰以來，敵人所摧毀的正是這些地方。估計麵粉業的損失，廠數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產粉量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此外，火柴業損失百分之五十三；繅絲業損失百分之五十強；造紙業損失百分之八十四；鹽鹼業損失百分之八十；製碱量損失百分之八十二。其他如開礦與冶煉業，亦受到極大的打擊。據經濟部的調查，「八一三」以後，上海被燬工廠二千三百七十五家，損失資金五萬萬元，上海以外，在部註冊的被燬廠數亦達一千四百六十五家，損失資金二萬四千萬元，合計全國被燬廠數三千八百四十家；損失資金七萬四千萬元。據中央工廠檢查處根據修正工廠法第一條民國二十四年上半年之

調查統計，各省市合於工廠法之工廠數為六千三百四十四家。以此為標準則損失廠當佔全數百分之六十；資金方面，如果以國民政府主計據統局所編之統計提要為根據，則損失額將達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登記工廠資本額（三萬九千零五百四十萬零九百六十五元）之一倍。這還只限於被燬的工廠而言，如果把被劫奪的算在裏面，則民族資本之損失，更是使人驚心動魄的了。

其在農村，跟着戰局之擴大與敵寇之劫掠蹂躪，耕地就大量的被破壞着，牲畜農具與種子就大量的被摧毀着。據農本局的報告（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全國七十六萬萬餘公畝中，就有四十餘萬萬公畝遭破壞的；全國二千三百萬頭耕牛中，就有八百餘萬頭遭受損失的。主要農產品的損失量，最少是百分之十九；最多的竟達百分之八十。這一幅淒涼慘淡的圖畫，是日本強盜在中華民國的大地上，用火與血畫出來的。但這些簡單的數字實在太簡單了。它只能使我們的腦海裏，僅僅有輕描淡寫的印象。史邁博士在江寧、句容、溧水、江浦及六合半縣的調查，比較詳細點。在這四個半縣內，無辜被殺的農民達四萬人，農家所遭受的損失，房屋二千四百萬元，牲畜六百七十萬元，農具五百二十四萬元，藏谷四百二十萬元，農作物損失七十八萬五千元，總計四千一百萬元，平均每家庭損失二百二十元。如果以下凱教授的調查（東南農家每年入款二百八十九元）作標準，則江南農家之損失，就等於其收入四分之三了。這是抗戰初期敵人所給與中國農村的摧毀的一個例子。跟着抗戰之進展，跟着敵後人民之奮勇抵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之飄揚，敵人對於農村之摧殘亦就更加利害。所謂殺光搶

光與燒光的「三光政策」就是明證。我們將有機會更詳細的討論這個問題。但以抗戰初期敵人的推毀而言，農村生產之受到打擊，可說是空前的了。

淪陷區中工業之遭罹浩劫，對於整個國民經濟之影響是很大的。這一浩劫毀壞了中國民族資本八九十年來在東南沿海之經營；毀壞了中國「中部和北部」各戰區的農村經濟；削弱了後來幾年中國工業農業的生產能力，成爲物價問題與物資問題的嚴重因素之一。不過，在另一方面，却包含着一種刺激作用。它否定了過去那種產業集中在東南的偏在狀況，使西南大後方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逐漸提高起來。現在，讓我們看一看經濟據點轉移的情形吧！

第一是香港在中國經濟所佔的地位——一直到它陷入敵人之手止——越來越見重要。在國軍西撤之前，過去執中國經濟牛耳的上海，無論在工業上，在貿易上，皆一落千丈。五千二百多家工廠，在「八一三」以後三個月的砲火中，燬壞了二千三百多家。從二十六年八月至二十七年一年間，上海的出口額減少四萬七千八百餘萬元，入口減少了二萬六千五百餘萬元。反之廣州、汕頭、九龍、北海各港之出入口貿易則大爲增長。計出口增加一萬五千五百餘萬元，入口增加八千七百餘萬元。以百分率來說，上海的出口在全國總額中從戰前百分之五十二，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九；廣東各港則從百分之十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入口方面，上海從戰前百分之五十九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七。廣東各港則從戰前百分之一〇·九增長到百分之二十五。華南中國各港貿易之增加是與香港息息相關的。因爲南中國

各港貿易之增加，使香港代替上海成爲這一時期對外貿易之中心。就是二十八年以後，上海工商業漸漸恢復，但香港在經濟上的地位，不但未嘗降低，反而日益重要起來，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陷入敵手之時爲止。

第二、沿海沿江的產業，雖遭受砲火的摧毀，但一些尙未接近前線的地方，却呈現着特殊的繁榮。以棉織業爲例，上海戰爭爆發後，長江北岸的通崇海區與武漢，成爲主要的生產中心。在武漢退出以前，那兒的紗業陶醉在空前未有的美景中。戰前每一包紗的利潤，最高爲二三十元，布疋每疋獲利一二元的卽爲不易得之現象。抗戰爆發後，棉紗每包利潤竟達百元，布疋每件純利達三四元，總計武漢各紗廠每日獲利約在六萬元以上。這種不平衡的現象證明沿海的民族工業雖被摧殘，但後方發展企業的可能性，顯然存在着。

第三、爲了支持抗戰，爲了大後方發展企業的可能性之吸引，沿海一些有遠見的民族資本家，在千辛萬苦中進行遷移。在遷移的過程中，不容諱言的存在着若干缺點，第一是發動遷移的工作做得太遲，它是在抗戰爆發以後才開始的，因爲發動得太遲，所以遷移的廠數並不多。上海五千多家工廠中遷移的只有一百五十二家，連同無錫、南京、鎮江各地遷出的廠，才二百餘家。這無疑是不够的。第二是遷移的廠家們沒有下決心遷入較安全的後方，都想在武漢住下去。到了在武漢發現徵用土地建設廠地均成問題之時，才計議作第二次遷移，這麼一來，時間與經費都不知浪費了多少。雖然如此，這

一部份遷移之工廠，仍是值得我們讚揚的。三十二年元旦遷川工廠聯合會在重慶所舉行的展覽會，就是抗戰初期廠長與職工爲遷移工廠而流洒的血汗所培養出來的花蕾。

這就是從「七七」到武漢撤退期間的經濟概況，在這裏，雖則沒有詳細地分別研究各部門的情形，但把握這二點——淪陷區中工農業浩劫與經濟據點之逐漸轉移，是必要的，因爲這二個特點，是後來各個時期戰時經濟發展的條件。

二 從武漢撤退到歐戰爆發

從二十七年十月底（我軍退出武漢）至二十八年八月底（歐戰爆發前夕）這十個月時間，敵寇侵華的軍事策略是「重視敵後」與「相機進攻」。配合着這一軍事策略，敵寇所採取的經濟侵略政策是「以戰養戰」。「以戰養戰」的主要辦法是攫取外匯和咀吸淪陷區的資源。在這種情形之下，貨幣戰爭便成爲主要的節目了。

事實上，中日的貨幣戰爭是從二十七年春天就開始的。敵寇在「中國北部」成立的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就是這一節目的序幕。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的一個主要任務，是在攫取「中國北部」淪陷區的外匯。針對這一點，我國政府便於是年三月實行外匯統制了。外匯統制實行之後，法幣外匯便產生黑市，而黑市匯價則是步步下跌的。二十七年八月間黑匯竟跌至七·九五二便士。但劇烈的貨幣戰爭

是在武漢撤退以後。

讓我們看看敵寇在這個時期貨幣攻勢之戰術吧。在中國北部，敵寇宣佈自二十八年二月下旬起，貶抑法幣價值在偽聯鈔六成之下，至是年三月十日即禁止法幣的流通；在中國中部，敵僞於同年五月又成立偽華興商業銀行，發行偽華興鈔。但偽華興鈔是與法幣發生聯繫的。敵寇此時在中國中部所幹的勾當，雖與它在「北部」所幹者不盡相同，但其集中法幣以套取外匯的陰謀，却是一貫的。

爲什麼敵寇在這個時候有攫取外匯之可能呢？因爲自二十七年八月下旬以後，我國政府的外匯政策是以極大的資力去維持「匯行市」。中央銀行的外匯核準金額對於請求金額之百分比率，此時降至百分之十，每週只在一萬鎊以內，而市場的需求則遠在這個數額之上，故羣趨黑市，黑市的力量一天比一天高漲了。爲了對付這種局勢，匯豐銀行於二十七年八月底即開始協助穩定上海黑市，我國的國家銀行則建立小規模的平準基金以維持黑市。二十八年三月向英國借款五百萬鎊，與中交兩行共同成立一千萬鎊的匯兌平準基金。這樣，從二十七年八月至二十八年五月，黑市外匯便定於八便士四分之三的水準之上了。

法幣外匯之這樣穩定，是以犧牲平衡準備基金爲代價的。敵寇正正看準了這一點。在二十八年五月六月間，據說敵寇曾集中一萬萬元的法幣，向外匯黑市進行衝擊。爲了對付敵寇之攻勢，政府即於是年六月七日宣告改變政策；黑市外匯即開始波動，至該月十日英匯跌到六便士半。這個水準又維持了

一個短時間。到了是年七月十八日，政府又放棄這個水準，於是跌風又起。十八日由六便士跌至五便士半；二十日跌至四便士半，以後降落的速度較緩。八月七日又因種種壓力，匯率突破四便士大關而下瀉，到八月中旬便跌至三便士。八月底雖嘗回翔，但總未能達到四便士。

這一幅外匯波動的圖畫，是包含很豐富的內容的。它呈現了中日的貨幣戰爭，表現着中國政府以放棄維持黑市外匯的辦法，使敵人套取外匯的力量，打了一個很大折扣。號稱擁有五千萬元資本的偽華興銀行，在這種打擊之下，其所巧取的法幣資本，就突然減值一千二百餘萬元；敵寇在全中國各地之無恥走私，其所得之大量法幣，亦因為匯市縮而貶低其價值了；敵寇在上海的各銀行，多是從黑市取得外匯，以付償其對印度澳洲等處所購買的商品的，但經過法幣匯率降低以後，力量便大大削弱了。其次，外匯黑市之不再繼續，不但有對付日寇之作用，而且有對付一些民族敗類從事投機的作用。政府在這個時候所頒佈的三道新法令——「非常時期禁止進口物品辦法」，「出口貨物結匯領取匯價差額辦法」，「進口貨物申請購買外匯規則」。這些辦法在實行上，雖有許多未盡善之處，但在降低外匯投機的兇焰上，是相當發生一些影響的。因為在一方面既不維持相當高價的匯率，而在另一方面，在某一限度之內，又限制外匯之申請。於是外匯的投機便逐漸削弱了。外匯投機這條路既經縮小，滾滾的游資狂流，便傾其力量去搶購商品。這就是將來物價高漲的「張本」。但，放棄黑市之維持，是可以減輕我國財政上的負擔的。

外匯之不斷波動，對於各方面的影響是很大的。因此，有一些問題就環繞着外匯問題之緊張而緊張起來。

第一是對外貿易統制的問題。因為政府要統制外匯，就必須控制外匯之來源，而爲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統制出口貿易，從出口商取得外匯。早在二十七年三月間，政府就進行這一工作了。這麼一來，便發生了出口商對於外匯黑市利益之爭論。因為政府所規定的匯率，美匯爲法幣百元值美金二十九元又四分之三，英匯爲每法幣一元值英金十二便士又四分之一；而當時黑市匯價，美匯却在十六元左右，英匯則僅七便士餘，法定匯率僅爲黑市之七折。於是出口商人便起來要求改變外匯之法價，否則，「亦應由國家以獎金或津貼等名目，補償其匯價上之損失」。當時沒有什麼結果，但到二十八年一月，政府乃將應售結外匯的二十四種商品，減少成爲十三種；二十八年七月所頒佈的「出口物結匯領取匯價差額辦法」，又將應售結匯商品，減少至四種——桐油、茶葉、豬鬃、和礦產，而且規定「依照法幣結匯之出口貿易，於實際結清匯額後，得憑結算證件，向結匯銀行取得法價與該行掛牌價格之差額」。在這個過程中，因爲某些辦法之未善，致在出口貿易上，受到若干影響；而逃避結匯者，亦時有所聞。

第二是敵人之加緊走私。敵寇在淪陷區中以暴力奪取法幣是一種辦法；而以劣貨向淪陷區及後方走私以取得法幣是另一種辦法。二十七年一年，日貨在淪陷區傾銷達二萬萬餘元，爲全部入口額百分

之六十，二十八年上半年在上海之傾銷就達八千萬元。對於後方各埠，敵人的走私，約可分爲四路：第一路是從上海經蚌埠北上入西安；第二路是由溫州，經浙贛路，向贛、湘、兩廣進發。浙贛路竟至有「敵貨列車」之雅號；第三路是以宜昌爲集中點，再由該地輸至鄂西、湘西、豫南和川東；第四路是由廣州灣經廉江、陸川而集中於鬱林，由鬱林流入桂、黔、川南。據說當時每日運入鬱林的仇貨，總數在三千担以上，每担平均以一百五十元計，則每天便有四十五萬元送給敵人了。敵人是必然用每天這四十五萬元去套取外匯的。

第三是某些奸商市儈，藉口外匯緊縮而提高物價。外匯緊縮之結果，必然先引起舶來品和以進口貨爲原料而製成的貨物的價格之騰貴，接着，那些販賣可以代替進口貨的國產貨物的商賈，亦乘機將價格提高。在上海，外匯緊縮之後，汽油、五金、西藥、皮革等，均告漲價，而與外匯無關的物品如白米，亦跟着漲價了。在重慶亦未嘗不如此。就這樣，由外匯之波動影響到物價之波動了。

這就是環繞着外匯問題而緊張起來的幾個問題。接着，我們必須看一看敵人在產業方面的掠奪。如果前一時期，敵人在淪陷區中是側重於搶掠的破壞，那末，這一時期敵人的策略就改變爲「開發」重於搶掠，「建設」重於破壞了。因此，敵人不但組織了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和偽「華興銀行」，作爲咀吸中國資源的工具，不但集中法幣套取外匯去向歐美購買侵略中國的軍火，而且組織了「華北開發會社」和「華中振興會社」，作爲直接咀吸中國資源的總機關。

在「華北開發會社」之下，交通方面，成立了「華北交通會社」，經營中國北部鐵路及其附帶事業——如港口公共汽車等。電信方面，成立了「電信電話會社」，經營有線、無線電報及電話。礦業方面，敵人開始組織「興中公司」，接收河北、山東、山西等省之礦，後改爲一業數社主義。二十八年春間，井陘、正豐、中興各礦，已達「七七」以前產量，除開灤外，敵在中國北部，一年可竊取煤八百萬噸；鋼鐵則以龍煙等礦爲中心，統計在這個時期，每日被竊量在三百六十噸至四百噸之間，以一年計算，恐要達到十四萬噸了。電力方面，則將「蒙疆電業開發會社」、「天津電業公司」、「冀東電業公司」合併爲「華北電業會社」。

在「華中振興會社」之下，敵人成立一個掠奪網，交通方面，有「上海內河汽船公司」，以上海爲中心，經營蘇州河、黃浦江上游的七條航線，江海交通有「天利汽船公司」和「華中汽船公司」，公路運輸方面，成立了「中央汽車運輸公司」，將滬寧、蘇、杭的火車予以連接；電信方面，成立了「華中電氣通信株式會社」，經營日僞間及「華中」各都市間的有線無線電報電話，與歐美及南洋取得聯絡，以至恢復中國中部和北部的海底連絡。礦產方面，則成立了「中華鐵礦株式會社」，以江浙、皖三省的二十餘處礦山爲擄取對象。

敵人這種咀吸我國資源的毒計，是很難達到它的願望的，但亦不可過於低視。不管在資金上、在器材上、在技工上，敵僞要遇到很多困難，但根據這幾年的事實，敵人在某一限度之內，的確盜取了

我國不少資源。要有效的阻止敵人的搶劫盜取，只有發展淪陷區的游擊戰爭，以主觀的力量去直接摧毀敵人的一些經濟機關。在這方面，做得最有成績的是深入敵後的英勇部隊與戰區的抗日同胞。這是值得我們去發揚推動的。

其在後方，則在進行經濟建設的工作，而內遷工廠之籌備復工與新建廠礦之籌備開工，就是這個時期的重要事件。據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出版之「統計提要」，截至二十八年年底，內遷工廠共四百一十家，復工者二百七十二家。計湖南省有一百一十九家，復工者一百十八家；四川省二百九十九家，復工者一百一十七家；陝西二十六家，復工者十六家；廣西省二十三家，復工者十三家，其他各省二十三家，復工者八家。內遷機器原料噸數共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噸，據趙銘先生之估計，計湖南佔百分之二·四五；四川佔百分之六三·二〇；陝西佔百分之〇·一九；廣西佔百分之〇·四九；其他各省佔百分之〇·四五。這些簡單之數字，告訴我們：西南大後方各省是逐漸在披上現代的外衣的，但西北各省，所佔的比重則較少。這仍是發展不平衡的表現。

內遷工廠之籌備復工與新建廠礦之籌備開工，仍是在艱苦中奮鬥的。第一件事是資金之困難。許多內遷之工廠，在遷移的時候，已耗去其大量的資金，並且在途中損失不少器材。欲復工，沒有資金是不行的，而且物價逐漸上漲，建廠開工所需資金，日益浩大。這個時期，聞政府曾對私廠放款九百萬元，其中由國庫撥出的佔四百萬元，餘經政府担保，由銀行放出。用途為：遷移放款八十萬元；建

廠放款五百七十萬元，流動資金二百三十五萬元。這項放款，從民族產業之需要看來，實在差得很遠。第二件事是器材之困難。遷移之廠，間亦運入一些機器原料，但爲了補償損失與擴大規模，現有的器材，仍是不够得很。因此除積極在後方設法自產外，其不能自製的器材，仍非仰給於外國不可。但在這裏，要碰到二個困難：其一是交通運輸之艱苦。這其間，廣州已失陷了，西南太後方只有依靠滇越鐵路（在法蘭西崩潰以前）。其二是法幣外匯之緊縮。政府對於商人申請外匯，如認爲正當需要說是可以核准，但事實上核准是十分困難的，故廠家對於所需之外匯，不得不以高價求諸黑市。外匯黑市之不斷波動，使這些從事於生產的廠家加重其負擔。第三件事是發展經濟的阻力，不但未加削弱，反而利用種種方式，在變本加厲着。有一些廠家因爲不能順利地買得地皮進行建廠；有一些廠家因爲原料與產品之來源和銷路受到不合理的管制，因而不得不縮小生產規模。製鹽與煤礦業就是如此。第四件事是敵機之不斷轟炸，使工廠之建立，遭受很大的損失，有不少工廠正在建造廠屋，就遭到轟炸而延緩其開工的時間；縱有不少工廠已經開工，亦因轟炸而不得不停止生產並不得不縮小生產規模。紡織業就是一個例子。第五件事是技工之缺乏。據統計，內遷技工人數祇有一萬餘人，以這個數目來分佈在內遷工廠，每廠祇有二十餘人而已。高級的專門人材更是不够，以鍊鋼來說，國內專家能有幾人？這就使生產擴展受到限制了。

三 從歐戰爆發到太平洋戰爭

從二十八年九月起，中國的戰時經濟，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敵人對我的進攻，軍事並不是主要的因素，所以，全國性的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是沒有了。但是，過去二十幾個月戰爭的影響——廣大領土的暫時淪陷，人民的生命與財產的毀滅，痛苦的創傷，赤裸裸地顯露出來了，而同時，因為歐洲大戰的爆發所引起的國際政局的劇化，亦在發生影響。於是，這些特點，就更顯明地呈現出來。

歐洲大戰對於中國戰時經濟的影響是不少的。因為歐洲大戰的爆發，許多逃亡在外的資金流回來了；貿易上，入口突見減少，國別的比重突見變動了；運輸上，因為安南之陷入敵手而大感困難了。這些因素，分明是影響了中國的戰時經濟的。除此之外，日本強盜又利用這個時機，逼迫英美讓步，加緊對中國的封鎖與經濟進攻。因此，困難的陰影就更顯著了。

這個時期，戰時經濟的困難，是物價的逐步上漲。各地物價，自「七七」事變之後，便發生了一些變動。變動的形態，每個時期各有其特徵。以第一時期言之，出口農作物的價格與工業日用品的價格，是作着剪刀形的發展的。前者因為上海的陷落，沿海口岸之被封鎖，出口受到障礙而跌價；後者則因生產機關之破壞和運輸之不靈而逐漸提高其價格。武漢撤退以後，農產品的價格，乃逐漸提高

了。提高的程度雖不及日用工業品之速，但與第一時期比較起來，顯然是不同的。到了這個時候，各種物品都一致漲價。以重慶的躉售物價指數為例，二十八年十月份的總指數突破了二十六年上半年平均數的三倍，達到百分之三二·三·五，以後逐步上漲，至二十九年十二月達到一、二二三·七，三十年十月竟達至二、二八四·八的高峯。在其中，工業生產品的價格，仍佔重要。計總指數二十八年爲二四一·三，二十九年爲六三四·八，三十年爲一、七八四·六，而工業品全年的平均數，二十八年爲四四一·二，二十九年爲一、〇二七·三，三十年爲二、二二〇·七，但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價格，亦在這個時候急速上漲。二十八年十月的糧價比突破二十六年上半年平均數的百分之一百，以後亦急速邁昇，至二十九年十二月達到百分之一、二二七·三；三十年十月竟達到百分之一、八五〇·一了。不但重慶如此，其他各地亦莫不如此。昆明的物價，甚且比重慶漲得更利害。至於處在敵偽鐵蹄下的上海，南京與北平等地，物價的扶搖直上，更是不待言的了。

物價暴漲的原因很多：第一是生產機關的大量破壞。後方雖不斷移入廠礦，努力開工，但規模大的，一般仍未能在這個時候出品。第二是交通運輸的困難。二十九年五月間宜昌失守之後，浙東線的貨物不能再由金華經茶陵而至宜昌；廣州線的貨物便不能再由衡陽而轉宜昌了。不但上海的貨物不能利用大江的航運，經宜昌而入重慶，而且川黔的貨物，亦不能通過宜昌至湘鄂了。至於敵寇之在安南登陸，其給予後方的影響更大；滇越鐵路被封之後，海防便失去其爲滬渝的樞紐的作用了。不要說該

路封鎖後的影響，就以當時的情況而論，留滯越境而被日寇沒收的華商貨物就有十一萬件之多，價格約值二十萬萬元以上。交通越困難，入口的貨量跟着減少而運費則跟着增加。這都是影響物價的。第三是通貨發行額的相當增加。三十年九月十一日大公報的社論這樣說：「抗戰四年來，政府所發行的法幣，已相當的達到了社會的飽和量，內地物價的高漲，主要的固由於物資的缺乏，交通運輸之困難，但也有一部份造因於通貨發行的日增」。這種說法，大體是不錯的。爲了支持這個神聖的抗戰，相當的增發通貨，是無可非議的。但，毛病乃在於通貨不能回籠。發出的通貨，絕大部份流入官僚資本的庫房，採取銀行資本與商業資本的形式，發揮其囤積居奇的作用。第四是官僚資本的囤積居奇加強了通貨增發的影響，加強了物價上昇的趨勢。最顯著的一點就是糧價的暴漲。如果工業日用品之漲價是由於物資不足。那末，糧食的漲價是不能以此作爲理由的，因爲大後方這幾年的收成很好。糧食的收成好而價格貴，並不能單以運輸來解釋，因爲米運與上面所述的交通情形沒有多大關係。此外，單以通貨的因素亦解釋不了，因爲物價飛漲中呈現着不平衡的狀態。所以，囤積居奇的「作用」，在這裏是不可忽視的。生產與運輸越困難，則囤積居奇的惡風亦就越高漲。而囤積的結果，則又在促進物價之上漲。這個時期物價之暴漲，是綜合這些原因而成的。

物價暴漲的影響，伸入到社會經濟的每一個方面。它影響了財政經濟，它亦影響了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因爲物價高漲，政府的開支必然擴大，擴大的結果，就不免影響到通貨的發行。工業方面，成

本跟物價之上漲而提高了，資金薄弱的廠家，就要感覺週轉不靈之苦，於是，生產規模便無法擴大了。其在農村，因為人工與肥料的漲價，地租高壓下的佃農與小自耕農，便無力進行生產。商業方面，物價高漲，曾刺激了貿易的活躍，但更進一步的發展，它又否定了這一作用了。這就形成戰時景氣的來臨與消逝。

戰時景氣可從二個方面來看。第一、從地域來說，上海也好，重慶也好，都自二十八年起，一致呈現景氣。上海二十八年各業利潤之優厚，竟打破了歷史的紀錄。那些光怪陸離的投機事業，跳舞廳、電影院、旅館、酒樓、賭場等業，固然利市百倍，就是生產事業中的紗廠，亦是使人驚訝的。租界中的「新申」及「新裕」等廠二十八年年底盈餘額，從二百萬元到四百萬元不等，職員的分紅，最多的可得到一百多個月，最少的亦有六七十個月。西安大華紗廠二十九年職員分紅最高達到二百個月。這證明：從孤島到大後方，各地都籠罩着戰時景氣了。第二、從業別來說，這二年，賺錢最多的部門，與其說是生產事業，無寧說是銀行與貿易。將國家銀行除外，重慶全市的商業銀行，二十八年所獲純益額在一萬萬元以上；二十九年亦復如此。銀行業獲利之所以豐，並不由於放款的利息，而是由於經營商業的利潤。經營買賣的利得，至少是在百分之七十以上，多的竟達百分之二三千。如果單是放款的利息（二三分之譜），那末，這麼龐大的收入，顯然是不可能的了。因為大家都想摘取景氣的果實，所以這個時候，銀行商號之設立，便如雨後春筍了。行莊之外，以企業公司為名的組織，

有不少是以貿易爲其主要業務的。如「大華公司」，「西寧公司」，「華府企業公司」，「川陝實業公司」，「大中煤氣實業公司」與「民生實業公司」等，對於貿易，皆投下不少的資本。這些事實，不但說明了銀行的商業化，而且說明了生產的貿易化，說明了戰時景氣的本質是什麼。

一般說來，在戰爭期間，這種畸形的景氣，是有存在之可能的。因爲：在一方面，砲火之摧毀，使生產機關大量破壞；使生產品的供給大大減低；而另一方面，軍事需要，如糧食、服裝、軍火藥品與交通工具等等，比平時需要得更多。一方面供給得更少；一方面又需要得更多，戰時物價自然會提高起來，戰時利潤亦就有存在之可能了。這一年的景氣，自然以此爲它的條件，但問題並不僅僅如此。這就是說，戰爭的消耗固然是促進物價上漲的一個原因，但它並非物價上漲的唯一原因。這方面，我們剛才已經提及了。綜合上述那些原因，物價便不斷上漲。物價上漲，利潤跟着擴大，於是資金週轉急速了；技術工人失業的數量減退了。於是，大家都說道：「景氣來臨了」。

但是，這種促動景氣來臨的原因，同時亦是催促景氣消逝的元素。這個矛盾，並不像某些人所謂，要等到戰爭結束，「戰場勞動的遣散引起了勞動的過剩，通貨信用的緊縮，引起了物價的下降，物價跌落形成利潤相對減少」的時候，才開展出來的。正相反，戰時景氣的消逝，恰恰是技工仍然缺乏，通貨尚未緊縮，物價繼續上漲的時候來臨的。因爲這種景氣是以抬高物價爲其主要內容。在初時物價上漲的刺激固可使利潤提高，但更進一步的上漲，也就降低了一般人民的購買。特別自二十九年

入秋之後，各地糧價騰貴，每人每月的伙食費突破一百元的大關。五口之家，沒有五百元是很難維持其生活的。然而一般人的收入，却遠在這個水準之下。物價漲得快，生活費亦就貴得愈利害；生活費過度的上漲，社會購買力便非低落不可。在這種情形之下，市場怎樣能不縮小呢？行市怎能不低落呢？不但如此，物價之急速提高，不但縮小了市場的銷貨量，而且給予生產者以極大的打擊。資金雄厚的廠家，因為有力可以多囤積原料，獲得囤積原料的利潤，但中小廠家却因為原料漲價而感到困難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調度無方，那就非縮小生產規模不可。商店呢？由於物價上漲，門市的開支便不得不逐日擴大。店員的伙食、地租、油火與雜項等，是日日升高的。反之，在另一方面，因為社會購買力的降低，收入却跟着物價之上漲而反比例地作相對的下降。這麼一來，一些商店便不得不辭退店員，緊縮營業範圍了。

二十九年入秋以後，這種炫耀一時的景氣，就開始褪色。渝市鍊鐵業每天出產二十噸鐵之找不到出路和一些小機器廠的停業，便是明證。三十年春，商業貿易量較上一年有顯著的跌落，亦是明證。我們並不是說工商各業從此都不賺錢，而是說一般工商業都走上蕭條的道路。縱然大囤戶們仍在大發其國難財，但他們是把商品作為投機的對象的。

在這個時期，除了物價與戰時景氣的起伏之外，尚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注意的。這就是英美凍結中日資金的問題。

上海法幣的黑市匯率，自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經政府限制供給之後，即步步下跌。但歐洲大戰爆發之後，上海匯市即呈現轉鬆，不過，從長期趨勢看來，它是逐漸低落的。在這裏，政府成立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繼續執行維持外匯黑市的政策。維持黑市的效果是維持法幣在淪陷區的信用與外國正常貿易。除此之外，對於我國是極端不利的，而因為敵偽的搗亂與民族敗類的投機活動，我國雖花費鉅大的資金，但黑市外匯仍繼續的低落下去。

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美總統羅斯福宣佈凍結日本資金，同時宣稱接受中國政府之請，亦凍結中國在美資金。除以文書維持夏威夷與菲律賓的經常中日貿易外，又專為凍結中國資金而發出兩個照會，內容大意是：美國及中國任何部份的貿易，應先向指定之十四家銀行——大通、花旗、友邦、美國運通、通濟隆（以上美商），匯豐、有利、老沙遜洋行、新沙遜洋行及銀行、麥加利（以上英國），安達、荷蘭（以上荷蘭），莫斯科國民銀行（蘇聯）——申請外匯，並經核准供給，方得進行；核准供給之外匯必須為蓄意之進出口，其進出口值又必須與其申請額相等。英荷兩國亦同時宣佈凍結中日資金，但辦法上比美國嚴厲些。（一）英國對在華資金，不論為華人抑外人所有，悉予凍結，美國則僅指定凍結中國和其他被凍結國之存款，英美資產並不在內；（二）英商銀行對於被凍結的中國外匯存戶，不論其為英鎊現金或債券，一概凍結，美商銀行則允許依黑市折合，付給法幣，如進口商為訂購美貨之需要，允許付以紐約匯票，但不保證兌現。

依凍結資金的原意解釋，是把資金運用機能加以停滯之謂，如果洋商銀行能實行這種辦法，則保有外匯的人就不能將外匯在市場上出賣，市場上的外匯貿易就沒法做成，外匯黑市就間接可以因凍結而消滅了。可惜的是外商銀行並不依原則實施凍結，外匯黑市的活動，依然如故。在凍結令到之最初一週中，保有外匯者恐被凍結而紛紛拋出，所以市價放鬆，但接着，賣空方面的補進與進口商的扒結，市場反而緊縮。八月十七日上海暗市的美匯縮到四元八七五。八月十八日中國平準基金委員會以咨文送達十四家銀行。要點爲：（一）即日起，平準基金委員會對美元現貨，將以五元又三十二分之十一的匯率，供給合法需要；（二）結購外匯者應向平準基金委員會香港辦事處申請。因爲一部份人無法向平準基金委員會獲得外匯，只有在黑市中購進，故黑市外匯的買賣，依然如故。平準基金委員會乃邀集滬港中外金融界要人，在港舉行談話，決定合作消滅黑市。自九月八日起，上海各外商銀行停止外匯貿易，除正當貿易外，一概不供給外匯，這種辦法，依然不能消滅黑市。祇有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祇有到了戰火燒斷了敵寇與英美的經濟關係，燒壞了上海對英美對南洋的貿易的時候，這一個割不斷根的肉瘤，才一刀的被割去了。

總括起來說，物價與糧價的高漲，是這個時期的經濟問題的重心。景氣的起伏，不過是物價問題的發展的另一種表現形態罷了，至於外匯黑市的存廢，則爲上一期這個問題的餘波而已。

四 從太平洋戰爭到湘桂淪陷

太平洋戰爭（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爆發）對於中國戰時經濟的影響，極為重大。在這裏，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港滬的陷落與國際通路的被切斷。太平洋戰爭一爆發，作為孤島的上海便沉淪了，接着，香港亦陷入敵手。到了三十一年春，敵寇侵入緬甸，仰光失守，滇緬路的運輸亦告中斷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國大後方的國際運輸。除西北外，祇賴航運以維持。但航運數量有限，運費昂貴，故後方物資的供應，更感不足。

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前，我國進口貿易（連淪陷區包括在內），以美國居首位，日本、香港次之；出口貿易則以香港居首位，美國、日本次之。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進口貨的來源變動了。以大後方而論，三十一年第一季進口，以廣州灣居首位，佔總進口額百分之一七·九九。廣州灣在太平洋戰爭以前，在後方貿易上本不佔重要地位，從三十一年春起，因該地有法租界的庇護，故成為主要進口的港口；香港次之，佔總進口額百分之二六·三六，仍不失為重要來源；澳門居第三位，佔百分之二五·六九，因該地為葡萄牙屬地未受敵寇封鎖之故。三十二年二月敵寇佔據廣州灣，太平洋戰爭發生以來的進口貿易形勢，至是又要起變化了。至後方出口方面，數值遠不若進口之巨；其輸出國別，亦不若進口國別之多，僅有香港、廣州灣、越南、緬甸四地。三十一年第一季，出口貨物以輸往緬甸最

多，貨物幾全爲礦砂，金屬及金屬製品，緬甸戰事發生以後，這個出口又被堵住了，好在中印貿易在此時發展起來。

金融方面最顯著的一件事，是外匯市場的重要性之降低。太平洋戰爭以前，上海的匯市，是極盡其興波作浪的能事的，但敵人之佔領上海租界與攻侵香港，使維持法幣黑市的政策，失去其存在的餘地。我方既不維持外匯的黑市，而英美在港滬的銀行又被敵寇攫去，那末，港滬之持有法幣與外匯者，便不能再事投機了。這麼一來，就把三十一年七月間英美凍結中日資金時所遇到的煩惱，以「不了了之」了。其在後方，昆明的金融市場原有緬幣之交易，但爲數甚微，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因爲商人搶購物資的關係，一度頗爲熱鬧，可是敵軍侵入緬甸之後，昆明的緬幣交易，又轉趨沉寂。

因爲外匯市場之「消滅」，敵寇再不能以法幣套取外匯，所以敵我的貨幣戰爭便改變形式了。在敵八方面，這個時候雖不能以其所劫得的法幣在港滬金融市場中套取外匯，但牠們仍可把法幣用之於搬運淪陷區甚至大後方的物資。以法幣搬運物資，在敵人以前的經濟戰略上，只佔輔助的地位，但此後成爲敵寇對我經濟攻勢的主要策略了。與這種攻勢配合的是出口走私的加強。這一點，我們將在敵我的經濟戰中詳細敘述，此地不再多說。

財政方面的大事，是英美對我的大宗借款。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英美與我國成爲同盟國。三十年代，我國便以同盟國資格向英美兩盟邦商訂大宗借款。三十一年一月底，美國國會批准對華五萬萬

美元貸款案，英政府亦於二月二日通知中國，願貸中國以五千萬鎊以內之借款。三月二十一日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與我國代表宋子文氏在華盛頓簽訂借款協定。根據貸款經過及協定內容而言，此次英美貸款與以前歷次所舉外債是不相同的。第一是政治意義與經濟意義並重。因為借款的目的不但在給與我國以經濟援助，而且亦係對我國的英勇抗戰表示敬佩，並激勵我國的抗戰精神；第二是借款數額的龐大，打破英美過去對華借款的紀錄。計自二十九年年起，英國對華借款共十起，總數只超過這一次八百五十萬鎊；美國借款一共七次，總數還比這一次少三萬零二百二十萬美元。第三是條件優厚，不但無利息及担保之規定，即對償還期限亦無規定，惟言俟戰事結束後再議，而那時所議辦法，須顧及中國的財政金融情形。

分析了金融情形之後，我們必須進而研討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後方的物資問題。物資與物價是息息相關的。據厲德寅先生的估計，「物價上漲原因之屬於物資缺乏者，在二十七年約佔百分之八；在二十八年約佔百分之五，在二十九年約佔百分之十三；在三十年約佔百分之三十三」（見三十一年六月七日大公報）。物資缺乏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後方工礦生產力的薄弱；一方面則由於運輸困難，國外物資之來源梗塞。後一個因素，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更加嚴重了。因為港滬之淪陷，這二個地方對大後方的轉運作用，大大降低了；因為滇緬公路的被切斷，大量物資的存底，雖然不少，但來源顯然是困難了。這就使大後方的物資問題，在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更為嚴重；使關心於戰時經濟

的人士，以極大的注意力來討論這個問題了。

因為物資來源的困難，物價便不斷跟着上漲。但上漲的物價，不僅限於來自國外的西藥、五金、機器及顏料等等，就是一般國內自己能生產的東西，亦跟着飛漲起來。糧食與燃料便是很顯明的例子。據中國農民銀行調查編製之十三重要城市零售物價指數，以二十九年上半年為基期，三十一年三月份之最高者為：雅安物價達四十倍，重慶達三十四倍，最低如西寧贛州亦達十七倍與十九倍。此後繼續上漲，無有已時。到十月二十八日，蔣委員長在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中提出「加強物價管制方案」。十二月十七日蔣委員長通電全國，宣佈自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起，全國各地一律以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各地的價格為標準，實行限價。據總動員委員會負責人談話，各省實施的範圍並不盡同，有的是全省各縣一律實行限價的；如湖北、江西、陝西、甘肅等省；有的是從重要都市入手逐漸推行的，如四川、湖南、廣東、廣西、貴州等省，以限價的對象而言，各省亦有不同，有的全體限價的，亦有從生活必需品着手的。施行之後，對於游資之囤積居奇，頗能給與不少的限制，但因為當時的「限價」只在「限價」上做工夫，對於提高生產，加強運輸等更重要的事情，置而不顧，遂有一些不正常的現象之發生。如「界外貿易」，「改變衡量」，「偷工減料」與黑市橫行等等，都是這個時期所發生的使人啼笑皆非的現象。故實際上，限價所給與人民的實惠，乃是黑市的高漲。到了是年四月，政府頒佈「限價議價補充辦法」及「各省市重要物品價格聯繫調整辦法」，六月間重慶市當局

又宣佈「調整限價議價物品種類辦法」，限價物品只限於八種民生重要必需品——布疋、糧食、煤炭、火柴、糖類、食鹽、紙烟及食油——與行政院所規定的房租及地租；至於工資、運輸，則仍依一月十五日所實施的限價為限，其餘的商品，則列為議價。到這裏，限價是正式宣佈失敗了，物價又像脫韁之馬一樣，大步向前狂奔了！

怎麼辦呢？增強物資供給的道路既不肯走：那只有在貨幣方面設法了，但所謂在貨幣方面的設法，並不是在有錢出錢錢多多出的原則之下，減少法幣之發行，而是停止金禁，運用黃金政策以吸收法幣，使法幣得有一部份之回籠。這麼一來，後方的金融投機又活躍起來了。太平洋戰爭以前在港滬一帶的外匯投機，現在變成後方各大城市的黃金投機了，其後美鈔投機亦逐漸抬頭起來。

黃金投機吸住了一部份游資，這對於囤積商品是有相當影響的。因為大家瘋狂的從事於金融投機，形成銀根的緊迫，故三十二年秋天的物價——棉紗、布疋、汽油和百貨——曾由穩定趨於跌落。但因黃金政策乃是一種投機代替另一種投機，又因季節關係，所以物價又於是年冬初又復回漲。三十二年的新舊年關，跳得很利害。三十三年夏初，中原戰事爆發了，敵人節節進攻，正面戰場，從洛陽、長沙、衡陽，一直到桂林、柳州和獨山，先後陷落了。約莫有半年的時間，兵慌馬亂，人心惶惶，國貨的人都不敢囤貨；而便於攜帶的黃金美鈔，則成爲有錢人的最上的追逐物了！因此，在戰爭緊張的時候，亦就是物價比較平穩的時候。軍事危機麻痺了經濟危機；黃金投機壓倒了商品投機。這

是這個時期一個最大的特點。

市場的行情是沉浸在投機操縱的洪流中；生產事業呢？民國三十年以後，沒有上升，却在下降。據三十二年成都新中國日報所引省府統計：機械工業的作業從三十年之九千一百二十八部減低至三十一年之三千零七十部；產布量從三十年之六十一萬六千一百二十疋減至三十一年之六萬零四百六十九疋。農產方面，綜合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金陵大學農學院與浙江大學農學院等團體的調查，以三十一年與二十七年比較，則貴州減少百分之三；雲南減少百分之九；廣東減少百分之十九；廣西減百分之四；福建減百分之六；浙江減百分之八；江西減百分之六；湖南減百分之十；最利害的是河南，竟縮減了百分之二十七。三十二年底後方廠礦的危機，更顯露出來了。這一年的十一月間，重慶十八家鐵廠竟有十四家停爐；四家製鋼廠中，一家已停爐；三家勉強支持。到了三十三年三月，勉強開工的祇有資委會的「資渝」、「資和」合併的冶鍊廠；民營者祇有「興隆」及「復昌」二家。此二民營之兩廠，均賴過去積存之原料維持最低之產額。至於機器業，重慶（包括巴江）原有四百餘家，三十二年秋間，歇業的五十五家；停工的十五家；是年年底，又停了七十五家。一年之間，停了三分之一。煤業方面，嘉陵江區原有一百八十六家，三十二年年底，停業四十四家，減產一百家，保持原狀的三十五家，增產的只有寶源、天府等七大煤礦而已，但這幾個大礦的生產並不是走上坡路的，三十三年春間又開始下降了。在國際交通綫被切斷的情形下，生產是應該努力提高的，但事實却走着另一條

路。這明明白是投機路線和依賴路線的惡果。商品和黃金的追逐，連一部分產業資本亦下水了，這怎能談到提高生產呢？至於美國租借法案的應用於中國，就使得人們不但把軍火指望於盟友，就是布疋和黃金亦指望於盟友，這又怎能把眼睛看一看生產呢？直到了納爾遜先生來華幫助我國組織戰時生產局時，才把那些被人們冷落的機器懶洋洋地開動起來！

但在這個時候，實行了新民主主義的陝甘寧邊區却突破困難，從最惡劣的境地走上自足自立的領域。從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這個地方的經濟，因為磨擦之加兇，因為封鎖之加強，呈現了極其嚴重的狀況。「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窩」，但是，這兒的軍政人員和老百姓，却並不對困難屈服，他們決心自己動手，建立了自己的公營經濟，建立了許多的自給工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到了三十二年，這個地方，不但實現了自給自足，而且向着豐衣足食的目標前進。在這裏，沒有投機操縱，沒有囤積居奇，大家都是實實在在地為提高生產而奮鬥！三十三年，農業生產和工商經營亦是一直擴大下去的。敵後的解放區，雖處在戰爭環境中，在生產建設上，還不及陝甘寧邊區，但它們都一樣的向前進，與水旱風蝗作鬥爭，與敵人漢奸作鬥爭，為增進農業和發展工商而努力，這是後方的人們所意料不到的！

這個時期，敵偽的勢力發展到登峯造極了。英美從港滬，從南洋退出來。敵人正在志滿意得。但是，南洋的佔領區，生產破壞了，對英美決裂之後，又不能從英美購得物資。這是它的「暫時的勝

利」底悲哀。因而它對於淪陷區的榨取就變本加厲。棉花、布疋、五金、糧食和油類，一點一滴地都成爲搶奪的對象。敵寇在經濟上潰敗的原因，是在這個時候窺見的，縱然它們曾經威迫到獨山都勻，震動了大後方的心臟——重慶！

五 陰冷的勝利前夜

這個時期的中國經濟受到戰局政局的影響是很大的。湘桂失敗的創痕在這個時候，展開出來了，但三十四年入春以後，聯合國對法西斯的進攻，特別是蘇聯紅軍的攻勢，在四月以後真是如火如荼的進展着。四月廿五日蘇軍進入柏林；五月七日德國無條件投降了。到了八月十日，日本強盜亦低首投降。八年三個多月的抗戰，到這裏，勝利的結束了！

在這個驚濤駭浪的戰局政局之下，中國經濟的變化亦是瞬息萬端的。

第一、湘桂戰事失利，長衡和桂柳都相繼失陷了。國土的喪失帶來市場的縮小與物資供應之減少。同時，游資與人口，却不斷地湧入內地。人口的集中，使需要增加；游資的集中，使它活動更加深入，更加有力。過去重慶對衡桂等地的匯兌，每日四五千元是極其平常的；桂柳淪陷以後，重慶的省外匯兌，只有西安、寶雞、老河口、三斗坪、貴陽、蘭州與昆明而已，匯款數量每日只有二千萬元就算上乘了。這種情形，不但指明游資活動的地區在明顯地縮小；而且指明東南各省的商品之流入

內地亦明顯地被切斷了。人口和游資這樣集中，而物資的供應却又比以前減少，物價之波動是必然的了。

第二、歐戰勝利的消息，對於中國經濟，亦激起一些波紋。因為歐戰結束，使人認明某些出口品可以暢銷，儘管當時還不能立刻見效，但出口的可能性是增強了的；同時，又因為進出口的可能性增強，所以一些握有洋貨的人，就不免心慌脚軟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生絲、桐油和五倍子等物，便逐步提價；而百貨及一些工業品就呈現沉滯甚至有點下跌的趨勢了。

這些戰局政局的變化，是直接影響了中國經濟的，但，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這就是：（一）通貨的大量膨脹；（二）統制政策的堅持繼續；（三）游資的擴大其活動；（四）天時不調，春荒夏旱。這幾個因素就使這個時期的經濟波動得比以前更兇了。

（一）通貨的發行，已經達到天文學的數字。抗戰抗到第八年，軍事的需要年比一年的擴大，財政的支出亦自然沒法減縮；而由於豫湘桂贛諸省重要區域的淪陷，財政的收入又較以前減少了。「在富裕階級」仍未負担其應負之戰費的情形下，財政虧缺更形擴大，通貨膨脹只有大踏步前進。據各方的推測，抗戰勝利時的發行額，是以三個萬字為單位了。

（二）管制政策在這個時期，未曾有所改善，反而是變本加厲的幹下去。以煤為例，過去只有嵐炭是限價統購的，但三十四年二月起，連焦煤亦都一齊要限價統購了。是年二月四日調整後的煤價，

每噸定為四千元，但嘉陵江區的大礦成本每噸是五千元左右；小礦則達六千元左右。如以官價用費，則大礦每噸將虧一千元，小礦每噸將虧二千元。以如此之形勢，要叫煤產不減少，分明是不可能的。同時，花紗布管制局的限價統購政策，造成了棉荒；復興公司的統購統銷政策，則摧殘了桐油生絲等物的生產和出口。中國機器棉紡業公會籌備會的呼籲（三十三年十二月）就是前者的見證；重慶市商會及生絲輸出業等四公會的呼籲（三十四年一月）就是後者的見證。這些呼籲反證出：管制政策是與生產事業不能並存的了。

（三）通貨的膨脹，使游資得着養料而迅速地更加胖大起來。因為通貨膨脹刺激了物價；物價漲了，握有商品的人，必定增加其貨幣量，因而必定增加其游資。黃金政策雖吸回了六七百億法幣，但因游資太多，所吸回的六七百億法幣若與游資比較起來，實在是渺小得不可言狀的。因之，金融市場儘管在翻天覆地的波動着，商品投機尙不至感覺到冷落。

（四）卅三年的收成一般有七八成，但豫、湘、桂以至貴州一部份，都成戰場，農事受到打擊，湘贛之米且又無法內運。故四川在供應糧食上便比以前要負擔得更多。但三十二年入秋以後即苦雨；三十三年冬春之間，又是先旱而後陰雨，雪災、牛災、荻災等等，陸續在各地發生着。到了夏天，四川、陝西、貴州、湖南等省，又都在苦旱。亢旱是糧食漲價的好藉口，因此，糧食價格自然不斷的波動起來。

這幾個因素交織起來的結果，形成了下列幾種現象：

第一是物價的不斷飛躍！物價的新飛漲是從三十三年十二月下旬開始的。在這以前，曾經有幾個月的穩定時期，如上面所說，這主要是軍事危機的麻痺作用所引起的。因此，這個穩定期是相對的。三十二年十二月下旬重慶的糧食便開始漲！新曆年關跳一次；舊曆年關再跳一次；三月初的波動則比前二次還利害。貴陽、昆明和成都等地亦都有這樣的情形。昆明「民主週刊」的增刊，慨嘆「物價上漲的速度，連作家的筆尖和排字工友的手指頭都追它不上，連老百姓的語言和思想都追它不上」。此後一步一步漲上去，到七月中旬，就達到最高峯了。各地相較，以昆明為最高，貴陽成都次之，重慶又次之。就七月二十日昆明物價而論；米價較戰前上漲八千倍；布價一萬三千倍；紗價一萬一千倍；豬肉九千倍，至於黃金美鈔，則黃金一千倍；美鈔九百倍。這種情形，是抗戰初起時所意想不到的。誰想到戰前值一塊錢的布，此時要買到一萬三千元呢？

第二、這個時期的黃金和外匯，亦盡着波瀾起伏的能事。但牠們的進展的曲線，有點兒與物價不同。黃金和美鈔的波動亦是從三十三年十二月開始的，但進度甚緩。到三十四年三月半，才急激起來。此時黃金突破四萬元，而由於是月廿八日官價提為三萬五千元之故，三十一日突破六萬大關。四五兩月，起落不大。五月廿八日財政部停售期貨，又因為調整匯率的傳說及美教會匯票價格之提高，外匯突破千元大關，金價在六月二日竟突破十萬。六月八日官價提至五萬，當日黑市漲至十二萬。此

後，逐步上升，六月廿五日財部宣佈暫行停止辦理黃金存款。金價受了刺激，又暴漲至十七萬；美鈔一千八百元。「六底比期」過後，金鈔又狂奔起來。七月四日的黃金爬至二十三萬的高峯；美鈔大票亦突破三千三百元的水準。這是戰時金融市場中金鈔的頂點，以後便要走着下坡路了。在這裏，漲跌漲，是免不了的，但大的趨向是下跌。「七底」期近，黃金跌至十六萬五千；美鈔跌至二千五百左右。七月三十日，當局宣佈開始兌付上年十一月以後應付未付的黃金現貨及本年七月底以前到期法幣折合黃金存款，同時又宣佈官價從五萬提高至十七萬元。在發現中，規定「照官價捐獻黃金百分之四十；一兩以下免捐」。提高官價本來是可以刺激黑市金價之上升的；但捐獻四成的辦法，却又澆了一瓢冷水。許多投機家對着黃金漸漸不感興趣。在勝利來臨之前的幾天中，黃金已經失色了！

這個時期，後方的經濟完全沉浸在投機熱狂中。物價在狂漲；金價在狂奔。從握有特殊條件的閩人一直到小公務人員，都在這裏翻筋斗。三十四年三月底的黃金舞弊案，不但證明了投機熱狂之風靡一時，亦且暴露了官僚機構的腐爛不堪的情況。不過這種情形是有它的根據的。當局的戰時經濟財政政策，並不在自力更生增進生產上下功夫，其唯一指望，一面是望着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物資；一面是望着吸住游資的黃金政策的魔力。於是生產事業就更加被人冷落了，游資則奉命到金融市場來投機，而這種金融政策，乃是以金鈔的追逐去代替商品之追逐而已。投機到底還是投機，在後方，誰會聽到一點關於配合反攻增加生產的氣息呢？沒有，一點亦沒有。人們的心目中只有八個字，「黃金、美

鈔」；「投機取巧」！

在這種情形之下，生產自然更加衰落了。民國二十九年間廠家和職工對於「遷建」的桃色的美夢，都完全幻滅了。「大地回春」中的趙毅哉竟變成「清明前後」的林永清。三十三年冬天，因為戰時生產局的成立，對鋼鐵和機器業定了一點貨；而湘桂一部份內遷工廠在重慶及貴陽的復工，又需要一些新的機器及其他設備，所以三十四年的春天，後方的鋼鐵業和機器業有一點起色，但是這種繁榮是暫時的，何況此時物價大漲，不合理的限價和生產局的不切實際的定價又使它們摔了一交呢？除此之外，煤業在虧本停工；酒精業在進退維谷；麵粉業因為原料和平價供給的問題，被迫停工；紡織業則在鬧棉荒和紗荒，在鬧限價太低不敷成本的風潮。勝利前夜的後方工業，是在「衰落萎縮」，是在走着下坡路！

但陝甘寧邊區和敵後解放區的經濟情形，却不是如此。為了完成「一九四五年的任務」，為了配合大反攻，這些區域的人民，正在努力着更進一步的生產，生產的確是更進一步的提高了，但在「爲了前線」的號召之下，大家在豐衣足食的條件下，熱心地節衣縮食去供應奔赴前線的部隊，嚴肅的在工作；嚴肅的在生活！

這個時候的淪陷區，是大大地起了動搖的。太平洋的戰事一天比一天的接近了敵人的大門；盟國對敵國本土和淪陷區域的轟炸，是一天比一天的利害起來；歐洲戰事的結束，希特勒德國的敗亡，

大大地給與敵偽以打擊。它現在是更加孤立了。孤立無依地受着民主國家的圍攻！經濟上的困難顯明地是比以前來得利害的。華中佔領區中的日用品工業幾乎大部份被迫停工了。一切物資，都集中在兵工生產上。在這裏，中國人的工廠——縱然是爲敵偽服務的漢奸資本，亦是不能倖免的。人民的生活則弄到「吃無米，穿無布，租一間亭子間要出頂費十兩黃金」的地步。這並不是說，這個時期以前的淪陷區不壞，而是說，勝利前夜的淪陷區經濟，被敵人榨得更兇；淪陷區人民的生活變得比以前更惡劣！

抗戰八年，勝利終於到來了。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動，這種變動把日本強盜在中國淪陷區的特權被粉碎了；使那個充滿着依賴性和投機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站不住脚而動搖起來！

第三章 戰時三種經濟政策的分析

一 敵寇經濟攻勢的演變

一 「以戰養戰」

日本強盜對於我國的侵略，滿以為可以速戰速決，但是，我國軍民的英勇抗戰，把這一個迷夢粉碎了。面對這個冷酷的現實，杉山（當時是陸相）不得不於一九三八年二月間，發表「準備長期戰爭」的文告；近衛不得不於同年五月在地方長官會議席上發表「準備長期戰爭」及「物質精神總動員」的訓詞。爲了支持這個長期侵略戰爭，它們便提出所謂「以戰養戰」的政策。用他們的術語來解釋，這就是「開發重於封鎖」。

敵寇「以戰養戰」政策之明顯施行。是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以後的事。但，在此以前，它對於某一地區，某一部門的做法，並不是完全沒有這種意味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之成立偽「蒙疆銀行」與發行偽「蒙疆鈔」，就是例子。其次，「以戰養戰」是敵寇的一貫政策，但實現這一政策的經濟戰術，却時時在變動着。因爲地區之不同，因爲條件之不同，敵寇的經濟攻勢便不斷在更動了。作者在這裏

所要敘述的，就是在看看敵人在「以戰養戰」的政策下，所採用的戰術是如何在演變着。

二 從奪取外匯到掠奪貨物

中日間的貨幣戰，是抗戰前期最惹人注目的一幕經濟戰爭，有人以為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這個貨幣戰已告一段落，這是不合事實的。中日貨幣戰並未結束，不過改變形態罷了。

敵人的金融攻勢，是整個經濟侵略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要在暴力的搶劫以外，進行深度的剝削，進行物資的咀吸，那末，通貨這個工具，是必須使用的。在淪陷區裏，在它的傀儡政權力量所及的地方，敵人當然可以用指揮刀和鎗桿作爲「保證」而發行偽鈔或軍用票，但問題並未因此就解決的。早在抗戰以前，法幣就在我們的國土建立起它的信用。雖然備受敵僞的壓迫，但它的信用仍屬堅定；因此，在金融攻勢上，敵寇不但千方百計在推行偽鈔和軍用票，而且千方百計在排斥法幣破壞法幣。

敵僞破壞法幣的戰術，是因時因地而異的。在二十六年十二月它們便成立僞「蒙疆銀行」，發行僞「蒙疆鈔」；二十七年又在北平成立僞「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僞「聯銀鈔」。爲了推行偽鈔和軍用票，敵僞就更瘋狂地排斥法幣。它們宣佈自僞聯銀票發行三個月後之二十七年六月份起禁止南方地名的法幣與雜票在華北流通；二十八年三月十一日以後，中國北方各省發行的法幣亦一律換取偽鈔逾期即禁止使用。這些辦法，是沒有發生什麼效果的。於是敵僞便採取直接破壞法幣的辦法（這

就是強制法幣貶價，於二十七年八月公佈法幣貶價百分之十，二十八年二月又續貶百分之三十，連前共貶價百分之四十，同時又禁止法幣之流通。如在開封，敵人發現人民持一元法幣者，即行沒收，六十元以下者，處以徒刑並罰款；六十元以上者處死刑。此外，散佈謠言和偽造法幣等卑鄙手段，亦層出不窮。這是二十八年五月以前，敵人在中國北部的做法。它們打算這樣就可以把法幣打出中國北部，就可以替偽聯銀券安定江山，然而事實的邏輯，却包含着許多矛盾。這些矛盾，給與敵寇的辦法以無情的打擊。因為敵寇將偽聯銀券聯系於日圓，規定偽幣與日元維持同等價格。在那個時候，國外及上海公開市場中，日元高於法幣，而法幣高於偽幣百分之二十五。這樣，上海投機商人把日元換成法幣，帶至北方換更多的偽幣，再以偽幣換成日元。投機結果，使日元有國內外兩種匯價。在上海的日匯縮短而在敵國內匯價放長些。所以，外國商人只在上海購貨，日貨只好假道上海輸出，使日本輸出商得到較少的外匯。這個矛盾打擊了敵人，亦教訓了敵人。於是它們又擴大戰爭侵略的規模，並且改變其一些作法。

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敵僞在上海成立「偽華興商業銀行」。這就是敵人把貨幣戰擴大到中國中部和南部的起點。在這個時候，敵寇的做法改變了，它們規定偽華興券與法幣聯系，並可以無限制購買外匯。爲什麼如此呢？第一是在中國北部貨幣戰的教訓。敵人用日圓直接聯系偽幣（除了換日元之外，偽幣不能換取其他任何外匯）的結果，不但未能穩定偽幣，反而把日元拖下水，反而低了日元的

匯價；使用武力壓制法幣的結果，不但未能使法幣如期退出中國北部，反而使偽幣和軍用票更加跌價了。第二是法幣在中國中部和上海的基礎，比較華北較為鞏固。第三敵人爲要補充其缺乏的物資，特別是軍火原料，非有巨量的外匯不可。它看清我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是在供給黑市外匯。利用這個機會，對於敵人是有利的。於是，不惜犧牲日元的信用，於五月十九日貶低日元對法幣的比價，從中國北部運輸大量法幣往上海，在公開市場上，套取我外匯基金。爲了套取外匯，敵寇對於中國中部的法幣，便暫時採取一種與它在中國北部不同的態度了。這就是說，它從禁止法幣轉變到利用法幣。這個時期相當長，從二十八年五月偽華興商業銀行成立的時候起，至三十年七月英美凍結中日資金的時候止，差不多有二年幾個月的時光。

「敵人對於「華中」法幣的看法，向來即分成文武兩派。武人主張積極破壞，但對於破壞後的善後，又乏妥善而有把握的對策；文派由所謂中國通和在「華中」的工商界構成，他們的主張是暗中利用。利用論派的着眼點，除了外匯市場之外，還注意到他們在淪陷區中費盡心思所建立的物資控制系統的圓滑運用」（「新經濟」第七卷第八期一四八頁）。三十年七月美國凍結中日資金，雖刺激了破壞派的抬頭，但利用論派仍未變其立場。他們以爲外匯市場雖然沒有，而各地流通的主要通貨仍是法幣。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整個局勢完全變了。破壞論派的軍人，已完全壓倒了利用論派。急烈的全面的同法幣進逼，便節節展開了。

三十年三月七日正金銀行宣佈廢止軍用票與法幣的比價，並規定以偽「中儲券」為結價標準，就是敵寇對法幣採取全面攻勢的開始。三月二十三日偽「中央儲備銀行」復強壓法幣對偽中儲券的比價為一百對七七，此後繼續壓低，到五月下旬，兩者比價竟達至二對一了。六月一日偽方規定一切債務契約均以二對一之比價結算；六月八日又頒佈收回法幣的偽命和所謂「妨害」新法幣行使的治罪條例，六月二十日先從南京上海兩地開始禁止法幣之使用。敵偽對於法幣的全面進攻，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了。

敵偽雖猛烈對法幣作全面進攻，但在實質上並未完全否定它過去對於法幣之利用。所差異的是利用的方法不同而已。過去它維持法幣對軍用票及偽鈔的比價，其作用，乃在經過這種關係，向金融市場攫取法幣的外匯；後來之全面排斥法幣，其作用不但在於使偽鈔抬頭，而且在於集中大量法幣，以爭奪戰區和淪陷區的物資。它的具體的辦法大概是：（一）以所得法幣，發給附屬於各個部隊的物資統制機關，搶購各地貨物，特別是食料；（二）發給日人各種吸收物資的組合，加強其吸收活動，大量收購木材、皮貨、羊毛和鎢礦等等。由此可見：敵寇之排斥法幣與搶奪物資，是互為表裏了。在這裏，還必須注意敵人之防禦我方的貨幣反攻，企圖阻止法幣之自內地向東流。要達到這個目的，敵寇乃加緊其對於大後方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封鎖。某專家說得好：敵人如果「不是這樣，它利用所獲得的法幣，向內地兌現成實物的事，亦就不容易辦得好。因為自缺口送出去的，可以自缺口再流回來。

這就成爲不能單方取利的公平交易了」。這種情形，使我們更明白的看出：當前貨幣戰的內容，是一個物資爭奪戰。

三 從入口走私到出口走私

在貿易與物資上，敵寇對我進攻的策略，是封鎖與走私並重的。但封鎖的規模，一天比一天在擴大着，而在與封鎖配合之下，敵寇對於走私的態度與走私所發生的作用，却是變動不居的。

敵人對我的封鎖，是在廣州與武漢被佔領之後，才系統地進行着。但我們却不能說前此敵人沒有幹這一項勾當。「八一三」戰爭爆發後，敵人便宣佈封鎖上海至中國北部沿海，再過幾天，又宣佈封鎖中國全部海岸。這僅是封鎖沿海而已，對於抗戰的根據地——後方與敵後游擊區，在這個時候，敵人還沒有嚴格的辦法。就是以沿海而論，通過香港這個吐納口，中國中部和南部的商品，都從粵漢鐵路經廣州而達內地，敵人的封鎖在實際上還是沒有極大的影響的。但是，局勢的發展，迫使敵人注視這個問題。以中國北部來說吧，游擊區不斷地在發展了。這些游擊區與天津的英法租界大都保持着密切的關係。游擊區域的棉花小麥等農產品，運入租界，經外商之手運出，從而輸入麵粉，棉製品與武器等等，這對於敵僞，是一種極大的威脅。因此，敵人便不斷設法切斷天津租界與游擊區的關係了。廣州武漢淪陷之後，敵寇對我的封鎖，在某種程度上，又大爲增強。它不斷地在沿海檢查船隻，扣留船隻，和劫洗貨物。英美法荷各國的商輪，皆不能倖免。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敵海軍發言人公然

宣佈：「第三國在中國沿海之航行，一律封鎖」。敵人爲什麼如此呢？因爲當時法國還未崩潰，滇越鐵路對我盡了極大的作用。西南後方的物品，可從這條國際線運至河內轉香港；而海外和上海的製造品，又可經香港轉河內，從這條動脈運入內地。敵人在這個時候，雖未能「解決」河內與香港，在國際貿易上，對我發生的有利作用，但封鎖東南沿海尙未淪陷的港口，並切斷上海的工業品從其他港口運入內地，却顯然是敵人當時的要着。

僅僅看敵人對沿海的封鎖還不够，我們必須進而注視敵人對於敵後抗日根據地及後方的封鎖，分析敵僞在這一方面所採用的辦法。

敵寇在淪陷區中的貿易政策，是與封鎖後方緊密地聯系着。中國中部淪陷區中的陸路，曾經有一個時候被日軍封鎖；開放之後，在水陸要道，設立敵方海陸軍檢查站，對於貨運，進行控制。二十八年二月間，敵軍司令部規定有關軍事的物品二十一種——鋼、鐵、銅、黃銅、鉛、鋅、錳、鎂、石、雲母、鋁、機械、煤、麻、棉花、羊毛、皮革、皮貨、漆、空瓶——除敵軍司令部及其他所指定者外，任何人皆不准經營；而這些限制品，除其所指定之若干日商（即三井三菱等六大日籍公司所組織之「中支物資輸出聯合會」）外，一般日商亦不准自由競爭買賣。興亞院成立之後，又加強限制上海對內地之物資流通。除武器、彈藥、火藥及其原料外，對於自由中國（租界亦在內）禁止搬出的物品，已擴大至四十餘種。如汽車及其零件、橡皮底鞋、電筒電池、無線電用蓄電池、電報機器材料以

至水泥紙類，皆在禁止之列。很明顯，敵人這一毒計的目的，是在保持它自身的供應，並且削弱我方支持抗戰的物資，企圖藉此以增長大後方及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困難。

說了敵寇對我的封鎖之後，必須分析它的無恥而毒辣的走私。敵寇的封鎖與走私變管齊下的政策，乍看起來，似乎有點矛盾。既然在海面上，在交界上進行封鎖；既然處處以削弱我方的物資供給為前提，為什麼同時仍把大量仇貨運入內地呢？為什麼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中亦利用香港為吐納口呢？其實，這二者並不矛盾。封鎖的主要目的是在禁止軍用品和一些發展經濟的生產工具之內運，而走私的貨物，則只限於一些與軍事無關與發展生產無關的東西。從此，可以看出敵人的走私與封鎖，不但矛盾，而且具有特殊的作用。作用是什麼呢？第一是以仇貨吸取大量法幣，復用法幣在上海香港金融市場上套取我外匯基金；第二是以仇貨換取我戰地輸出品，如茶、絲、豬鬃、植物油及牛羊皮等，以增強其外匯；第三是藉此以傾銷敵國內一部份未能銷納的貨物，並與我國農產品作不等價之交換；第四是向淪陷區敵後抗日根據地及大後方搶掠它所缺乏的某些物資。如錫礦、棉花及糧食等，都是敵人所珍貴者。第五是利用奸商兼做間諜，以冒牌或無商標的商品，亦給奸商運銷內地，而以報告我軍情為條件；最後一點是排斥列強對華貿易，着着實現其獨占中國市場的野心。在這裏，第一二點最估重要。而這二點，完全是與這個時候敵寇對我的金融攻勢，配合一般的。

敵人走私的路線，甚為遙遠。北自綏遠、包頭、以向寧夏、隴西，沿黃河沿岸，由風陵渡等處以

入陝豫；長江中游則由老河口、鍾祥以向鄂北及沙市，並入川巴；一面由洞庭、鄱陽水道以達湘贛內地；沿海則由寧波、溫州、廈門、潮汕、海陸豐與江西各港進入內地；而廣州灣更是一個重點；從這裏，經廉江、陸川而集中於鬱林，再由鬱林流至廣西各處與筑渝等市。像蜘蛛網一般的走私路線，真是使人吃驚的！從這些漏洞，每年有幾萬萬元的法幣，有幾千萬担的物品（如鎊礦、糧食、蠶絲與棉花等），源源流出去；又有幾千萬担仇貨，從這些間隙，不斷流進來！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局勢來了一個巨變。敵寇在太平洋方面，比以前更爲孤立了。它樹立了更多的敵人，失去了一些重要物資的供給，而戰爭呢？却是綿延地拖長下去。這就使已經深陷泥淖的敵國更感到巨大的威脅。物資問題是擺在敵人面前的冷酷的現實。其次，由於香港之陷落與上海的沉淪，特別是仰光失守以後，滇緬公路的被切斷，敵人對我的封鎖，就握着更有利的條件。我們曉得：自法國崩潰，越南淪入敵手以後，滇緬公路就成爲西南大後方的唯一國際交通線。仰光失守之後，敵人雖不能完全切斷我國對盟邦的交通運輸，但，對我國沿海的全面封鎖，却是可以做到的。再其次，爲了扶植偽鈔在淪陷區中的地位，爲了對付那些拿不到手的法幣，敵人的貨幣戰略，便從套取外匯轉成掠取物資了。根據這些條件與配合它的貨幣戰的政策，在封鎖與走私方面，它就採用一些別的做法了。

當上海尚未成爲孤島的時候，敵寇雖用盡一切辦法進行封鎖，但租界的存在，仍給它以若干的

困難。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敵寇佔領了租界，牠們在上海便暢所欲爲了，封鎖顯然比以前是更爲有力的。三十一年四月，上海敵寇海陸軍當局規定：兵器彈藥等物，除特許者外，禁止一切移動；各種機器，療治用具與汽車汽油以至棉紗、紙張等物，欲運出上海（往長江下游，日本、內蒙、東北及中國中部和華南淪陷區），須有特別許可證；個人可以帶出上海的物品，只有：棉布三碼，棉紗二英兩，人造絲品三碼，香烟一百支，火柴五小盒，食糧或食糖一日本斤，蠟燭六枝，肥皂六塊。敵人這樣的統制限制，完全是在對付物資之內流的。

敵人不但加強並擴大其對我的封鎖，而且在走私方面，亦變更其目標與作用。在太平洋戰爭以前，走私是貨幣戰爭的一種輔助手段；走私是爲貨幣戰爭服務的；太平洋戰爭以後，貨幣戰爭的目標從套取外匯移到掠奪物資，在某種意義上說，它竟成爲走私的一種手段了。因此，以前走私的目的在獲取法幣（搬運土產當然是它的一種任務，但並非主要），以其所得的法幣散入內地。從法幣流動的方向來說，敵人過去走私的目的是在使法幣東流；而現在却改變成爲法幣西流了。以商品的流通傾向來說，敵人過去走私的主要目的是在使某些它不重要的商品向內地流入的，而現在却改變爲運入的少而運出的多。搬運土產，成爲這個時期主要的任務了。

敵人走私的內容，分明是起了變化的。爲了適合這個內容，它的辦法亦就與以前不同了。這就是敵人對於走私的方法，比以前更爲嚴密。在過去，陰陽交界線上走私商人，要能出入淪陷區，必須進

行賄賂，才能登記，才能取得「通行保護」；到後來，敵人已改變這種辦法了。牠們有計劃的主動的組織走私商人，不但登記時不用賄賂，而且一經登記便可取得敵偽的貸金（這些貸金就是敵人劫取得來的法幣）。這不是從利用走私轉化爲組織走私了嗎？

四 從「中日合作」到「自給主義」

在工礦業上，敵寇的一貫政策是拚命的吸取我國資源，但做法上却常常玩着新花樣。在「七七事變」之後，差不多有一年的光陰，敵人只是盡情的從事劫掠。牠們的暴行，比汪達人之洗劫羅馬，還來得更爲澈底。但自一九三八年夏季以後，敵人的態度稍稍改變了。爲了執行其以戰養戰的政策，敵人便致力於「開發」資源的方針之下，花樣仍是不斷在改變着。讓我們來看看敵人在這一方面幹的是什麼勾當吧！

在執行「以戰養戰」政策以前，敵寇對於淪陷區的民族工業，是洗劫，是掠奪。掠奪的方式，在北方各省大都稱爲「軍管理」；在中部各省則稱爲委任經營。但「二者的性質略有不同。「軍管理」的主權操諸軍隊，雖因軍隊不善經營工廠，於佔領後，仍委托日方「會社」代爲經營，但被委任的會社，只握有經營權而已；而「委任經營工廠」，則無論主權經營權，均直接操諸日本會社之手，雖受興亞院各地連絡部法令的約束，但和軍隊沒有什麼關係，顯較前者更容易支配些」（「中國工業」第七期一六頁）。「軍管理」的工廠包括礦業及一般工業，約一百家；至於「委任經營」的工廠，其所

包括的範圍更廣，計有麵粉、樹膠、造紙、繅絲、紡織、造船、機器與金屬製造、水泥、染織等一百六十家。

這種露骨的盡情洗劫，把這個海盜國家的品質，完全暴露出來了。強盜們是得意忘形的，然而事實的邏輯，否定了他們這種忘形的得意。因為洗劫和掠奪，使生產和商運都陷於停頓。淪陷區民衆的反抗情緒，着着提高了；而日寇呢？亦感覺到「殺雞取蛋」的悲哀。即就「軍管理」和「委任經營」的廠礦而論，由於敵人之摧毀，機器的破壞，廠屋的殘敗，工人的離散和敵寇資本的缺乏，亦有「計雖良得」，而「力不從心」之憾。跟着中國抗戰的展開，跟着「以戰養戰」政策之提出，敵寇對於工礦的掠奪，主要改採所謂「中日合作」的方式了。

所謂「中日合作」比較以前的盡情洗劫獨自經營的方式，是更為毒辣，更為高明的。暴力的劫掠是殺雞取蛋的方法，只能增強淪陷區人民對日寇的仇恨；而所謂中日合作則是養雞生蛋待肥而殺的辦法。這種辦法可以引誘一些缺乏抗戰信心的資本家去投資，可以利用中國的資本人力去咀吸中國的資源，以供其侵略中國。這是敵寇以戰養戰最基本的一點。在這裏，我們應該看看敵寇所謂「中日合作」是怎樣做法的？

首先是兩個所謂國策會社——華北開發會社與華中振興會社——之設立（一九三八）。這二個國策會社並不直接經營事業，僅創辦各種分公司，保管分公司的股票，對分公司投資或通融資金，藉收

調整統一之效。計華北開發會社屬下有十八個分公司，華中振興會社有十三個分公司。它們成立以後，中國北部和中部淪陷區中的煤鐵、鹽產、水電、航運及水產等實業，都在敵人的掌握之中了。如果從這些會社的構成內容來看，除了華北隸土會社及華北炭礦販賣會社以外，皆掠奪了我國原有的事業作基礎。單以華中振興會社而論，所謂「現物出資」——即我國被掠奪各業的資材折合現金充當資本的意思——約佔各分公司實收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六十六。敵人所認的「現金資本」大部份是軍用票偽鈔或公司債而已。這一事實，完全顯露了敵人利用中國資材來咀吸中國物資的猙獰面目。「興亞院」成立之後，這二個所謂國策公司又重新定為中日合作。華中振興會社所屬企業，規定中國出資百分之五十一，日本出資百分之四十九；華北開發會社所屬各企業，規定中國出資百分之四十五，日本出資百分之五十五；全國交通機關的資本，則以中國佔百分之五十一，日本佔百分之四十九為基礎。不管百分之五十一也好，不管百分之四十九也好，這些喪失民族天良的漢奸資本只在幫助敵寇的侵略，只能捨得一些日寇的剩飯殘羹而已。因為經營權全部握在日人手中，絕大部份的利益，自然是歸諸敵人的。

在這個時候，敵人不但決定把兩個所謂國策會社改為中日合作，吸收中國的漢奸資本，而且做了一些更具欺騙性的勾當。這就是敵寇對於淪陷區工業的所謂「新政」。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八日，敵派遣軍總司令西尾曾公開聲稱：「將以若干財產交還其合法的原主」。於是：所謂「軍管理」「委任經

營」工廠一律移讓歸還的口號，便在中國北部和中部的淪陷城市高叫起來了。這種歸還，表面上，是將國營省營等公企業，退給偽政府；而私人企業則歸還「正當權利者」。但實際上這完全是一個騙局。因為這個「新政」只限於「軍管理」下的工廠，但軍管理下的工廠，數量不怎麼多；且有一部份已併入「華北開發會社」與「華中振興會社」。就是在這範圍內的工廠，亦並非直接交還原主，而是交給傀儡政權的。須由傀儡政權與原主談判，由原主償還敵寇莫須有的修繕費用後，才能收回。至於那些規模較大生產力較強的工廠，由兩個國策會社所經營或日本私人企業所不願意放棄的，則全不在退還之列。亞勒士（John Ablers）說得好：「西尾的「新政」，實在僅適用於佔領區一些無關重要的華人工業吧了。五月十八日日軍「交還」與北平偽組織的，亦無非是上述一類工廠而已。日人如此做法，實在是解脫一種束縛，而決不是放棄一部資產」。

從「軍管理」與「委任經營」改為「中日合作」，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差別，而實際上，敵寇咀吸淪陷區的物資，是更為毒辣的。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敵閣議通過「國土計劃設定要綱」，提出什麼「適地適產主義」出來。在表面上看，為着充分發揮生產效能，「適地適產」原無可非議，但敵寇的適地適產主義不過是使淪陷區經濟更成為日寇的附庸經濟的一種手段。「國土計劃設定要綱」的序言下說，這一政策的目的是在：「日滿華三者之間，實行適當分業，以實現相互依存，共存共榮之關係」。因此「在工業分野上，日本着重於兵器工業機械工業和精密工業的發展，偽滿是着重於電氣

工業、礦業、一部份機械工業和輕工業的培植；在中國北部是着重於製鹽和礦業的開發，「中國中部」則容忍某限度內輕工業之存在。在農業上，……內蒙需擴充放牧地帶，以企羊毛之增產，在中國北部則先圖日本所不足的棉花之增植。而「中國中部」須以避免與日本農產相競爭之農作物為宜。……因而在農作物增產工作中，其先後次序應為：（一）廣義的軍需作物或一般稱為特需作物者（如羊毛棉花）；（二）有防止輸入意義者；（三）一般之民需作物」。很明白，這是「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具體化。如果這如意算盤能打成功，淪陷區的經濟不是完全成爲日本的附庸嗎？

到了三十年四月，敵人又提出「自給主義」了。所謂「自給主義」是日人在華事業，須由中國榨取資本，而不得依賴日本。於是，許多公司都企圖各種方法吸收土著資本。甚至如華中鐵道公司，亦不願汪逆財政困難，強索二百萬元以去。這就是敵寇「以戰養戰」的更毒辣的做法。以前它要剝削掠奪，還需要投下一點本錢，到現在，竟企圖不用一點本錢，完全用中國的資本，去汲取中國物質了。

五 「勤儉增產」與「三光政策」

對於被佔領區的農村，敵寇一向是盡情的大刮地皮。在北方各省，農民所負擔的租稅，竟達一百二十種之多，新樂某個鄉村全村有二百二十戶，而每天平均對敵繳款之額，竟達二百九十七元六角。至於公路、路溝、碉堡和飛機場的「建設」，又使農民失去其生產手段。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逃亡了，農產減少了。嚴重的糧荒，迫使敵酋岡村大將不得不承認『華北糧食增產爲當前急務』。於是，

「勤儉增產」的口號便提出來了。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一九四一年）竟將「糧食增產」規定爲主要任務，而投向農村的所謂「貸款」，據說總數是偽鈔一千九百八十萬元。很明白，敵人這種辦法，是包含着養雞取蛋俟肥而殺的意思；與它在工礦業中的「開發資源」，其作用與做法是並無二致的。如果要區別兩者間的差異，那只有下面一點。這就是農村中的所謂「勤儉增產」乃在使中國淪陷區替日本提供更多的農產品，企圖從此去實現其「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迷夢而已。

爲了支持其侵略戰爭，敵人不但咀吸淪陷區的物資，不但劫奪淪陷區的糧食農產，而且直接迫使淪陷區的同胞淪爲牛馬奴隸。北方各省極多壯丁，皆被日寇驅策，一部份捕解東北充當苦力；一部份則關在「當地」各礦山工礦中做苦工。這就是日寇「勤儉增產」的一面。據我們所知，從二十八年至三十年，北方五省淪陷區的壯丁，就有四百萬被日寇驅至關外去「勤儉增產」的。

敵寇不但用種種辦法強使淪陷區的同胞「勤儉增產」，而且用種種辦法去攫取人民「勤儉增產」的成果。什麼「配給制度」，什麼「獻金運動」，什麼數不盡說不完的苛捐雜稅，應有盡有的壓在老百姓的肩上。而同時敵寇仍不忘使用其微妙的攻勢。這就是在大小據點中設立合作社；在據點附近各村普遍發展其社員。敵人在淪陷區中所設立的這些合作社，是採取物資的一個重要環節。它一面排斥人民的商業，爲日資的獨佔打開地盤；一面則在於以不等價的交換，騙取老百姓的糧食和軍火原料。爲了排斥人民的商業，敵寇禁止商人販運布疋、火柴、紙張、煤油等物品；爲了吸取人民的農產品，

敵寇以種種辦法引誘老百姓把糧食原料送到合作社換貨。這是敵寇在淪陷區中管制生產與運銷的一個重要工具。這個工具之使用，是在敵寇開始「治安強化」之後。從這一點，亦就可以看出敵寇「以戰養戰」的毒計，是何等深入了！

對於反日運動尙未強化的地區，爲了希望有更多蛋吃，敵人的掠奪方式是以欺騙爲要着。但對於敵後抗日根據地可就不同了。在這些地方，誘騙性質的方法是沒有效用的，因此，它們的攻勢就完全全表露其猙獰面目。

在民國二十九年以前，敵寇對於敵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攻勢，尙帶着一些經濟性的動作，例如貨幣戰爭與物資爭奪戰等是。雖然敵人未嘗放鬆其暴力的摧毀，但，這種強盜式的燒殺掠奪，還是沒有系統沒有計劃的。到了二十九年以後，它們看見我根據地之不斷發展與擴大，看見我敵後抗日地區給與他們的威脅之日益增加，於是攻勢便變本加厲了。除了橫縱切碎一些根據地而外，又進行了嚴密的封鎖。這還不算，最殘酷的是它的無人性的，有計劃的，有步驟的「三光政策」。

所謂「三光」就是燒光、殺光與搶光的縮語。「三光政策」的目的，就是在把抗日地區的鞏固區變爲無人區；把鞏固區的附近亦變爲「治安區」。敵寇出極大的兵力侵入根據地的中心以後，見人就殺，見房就燒。雞犬不留，木石俱毀。如果遇見一點剩下的財物或劫後遺物，那就以各種方法，搬或拉到所謂「治安區」去。的的確確，敵人是做到這樣的。在五台，有一個東西寬五十餘里，南北長

百餘里的地區，經過敵寇之洗劫後，全部四十三個村，三千五百二十戶，一萬五千七百餘人的廣大地區，現在所看到的只是一堆瓦礫和荒蕪叢生的野草而已。這種史無前例的暴行，是大後方的人民所應想不到的。但事實上，敵人却正是這樣在幹着。不但在中國北部的敵後是這樣幹着，而且在華中的戰區亦是這樣在幹着呀！三十一年夏天的浙贛鐵路一帶，就遭受過敵人這樣的暴行。

「三光政策」亦是敵人「以戰養戰」的一種做法。燒光殺光的目的是企圖滅弱我的抗戰力量；而搶光的目的則在於以我的人力物力去補充它的所不足。在這裏，軍事侵略是伴着濃厚的經濟意味的。

六 敵寇經濟攻勢的重點

依據上述的演變看來，敵寇的經濟攻勢，是跟着局勢變化而變化的，抗戰越深入，則敵人的侵略劫掠的辦法，亦就越加刻毒，越加巧妙。上面所述的情況，就是明證。

不過，如果從地域方面來考察，則我們可以看見敵寇的經濟侵略的火力，並不是平衡的，而是有它的重點的。

第一、日寇對於牠所直接控制下的淪陷區，其經濟政策，乃是極力使其殖民地化，使其變為牠自己的獨佔物。在工礦方面，拚命的「開發」，盡快地盡量地從中國劫取得更多的物資，「華北開發會社」與「華中振興會社」，以及牠們下面的若干子公司，就是敵寇咀吸淪陷區的物資，並使淪陷區變成它的獨佔物的機構。其在農村，敵寇設立所謂「愛護村」，盡量抓捕壯丁。據山東新華分社的估

計，截至三十一年年六月止，五年中，華北被敵劫掠之壯丁當在六百萬人以上。對於畜力的掠奪和破壞亦是不可勝紀的。其在物資擔負上，其奇重與複雜的程度，簡直不可想像。負擔對象大體有敵、偽、政（地方偽政權）、村（本村開支的一切）、教（帶有特務性的教門）等等，苛捐雜稅達百餘種之多，負擔項目大致可以歸納爲下列幾種：縣款、包括田賦派款等；村公費，偽幹部薪金及村公所費；村雜支，修築碉堡用費，據點糧秣軍需，區公所的不定期征收糧款等，在這裏，勒索所佔的比重最大，一般佔全負擔一半左右。至於農村生產，除糧食外主要以敵偽所需要的原料爲主。極力實現其所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陰謀毒計。有人在抗戰勝利之後看見敵人在淪陷區的工礦設備而加以讚嘆。這是值得驚惕的！牠在淪陷區的工礦越搞得越好，則中國就越加倒霉！因爲牠們在淪陷區的工礦設備是以日本的需要爲前提的，好的礦砂燃料都送到日本去了，輕工業的控制權亦握在他們手裏，這種設備，這種發展，對中國有什麼好處呢？

第二、敵人對於大後方的經濟攻勢，主要是貨幣戰爭，是封鎖和走私，是不斷的空襲轟炸。這些攻勢是與淪陷區不相同的。貨幣戰爭使法幣的匯率跌落，從而促進法幣的幣值不斷降低。走私是輸出牠所不需要的東西；輸入牠所急需的東西。封鎖則使大後方的出入口受到限制，從而促進大後方物資問題的嚴重。空襲則破壞大後方的生產事業與交通運輸，斷絕大後方的物資之供應。這一切，都是惡毒得很的，但這種破壞的程度，尙未能與淪陷區同日而語。用一句近似的話來說，敵人對於淪陷區的

破壞是直接的，但它們對於大後方的破壞則是「間接的」。因為大後方沒有被它直接統治，所以尙不能使用直接刮掠的辦法。因此，大後方在損失上便沒有像淪陷區一樣慘痛了。

第三、敵寇對於解放區之摧毀，在某些方面來說，是比淪陷區還來得慘痛的。在敵人眼中，解放區是插在他們胸膛中的一把利劍，而同時，解放區與淪陷區又是犬牙交錯着。因此，解放區中接近淪陷區的地區，便時常遭到敵寇的摧毀了；有的時候，處在解放區中心的地區亦常經敵騎突入。在敵寇鐵騎的蹂躪之下，這些抗戰不屈的解放區，經常受到搶光燒光和殺光的三光政策。在這種政策之下，許許多多慘絕人寰的無人區便出現了！敵寇對於淪陷區的經濟攻勢，一般說來，是從殺雞取蛋進到養雞取蛋，而敵寇對於解放區的侵略，却是赤裸裸的殺人放火！從這一點看來，解放區人民之損失，是遠遠地超過淪陷區的。在貨幣戰爭和物資劫掠方面，大後方雖亦受到一些打擊，但解放區因為處在敵後，這些鬥爭亦比大後方來得更為劇烈。以貨幣戰爭而言，大後方只在外匯方面，只在法幣之倒流時，受到影響，而在解放區中，則呈現為法幣與偽幣的直接衝突。以物資問題而言，大後方只在出入口走私或封鎖上受到影響，但在解放區中，則不僅為走私或封鎖的問題，而且是呈現為搶奪市集的問題。鬥爭的激烈程度，是大後方所意想不到的。

由此可見敵寇的經濟破壞的火力，是對準着解放區的！敵寇的這種經濟攻勢，雖則包含了不少的矛盾，雖則遇到了不少的阻力，但在某一限度以內，我

們不能不承認它的「成就」。這就是：第一、牠的確使淪陷區殖民地化了。青島、天津以及太平洋戰爭後的上海等大城市的工業，多少是恢復起來了。在勝利前夜，上海的工廠竟達到數千家之多；而滬、青、津等處的紗錠竟達到四百萬個。這都是敵人在剝削淪陷區的物資與勞動力的明證。第二、對於大後方的打擊，雖然不及淪陷區之利害，但在太平洋戰爭之後，西南國際交通綫被切斷了，物資問題之困迫，是大家所親自感覺到的！第三、解放區的生產事業經常受到敵寇之無情破壞的，這種破壞使解放區人民的生活運動遭遇到極大的困難，使大旱災大水災大蝗災的破壞性更加擴大（在這裏，大水災多半是敵寇決堤造成的）。老百姓說：「沒有敵人，災荒來了還可以撐住；有了敵人，簡直撐不住！」這是多麼慘痛的一句話！在破壞上，在盜取物資，剝削勞動力量上，敵人的經濟攻勢，是不可輕視的。

敵寇的經濟攻勢雖則這麼毒辣，但，這是無補於它的敗亡的。八年的燒殺，十四年的血債，五十年的侵略，終於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洗滌了！中國雖然滿目瘡痍，但是以勝利結束抗戰的；日本帝國主義呢？却在這裏嘗到失敗的滋味！它的經濟攻勢只是加重了它的血債而已！

二 大後方的戰時經濟政策

一 管制與獨占

抗戰八年，大後方的經濟財政政策，可以概括為管制獨占、通貨膨脹與黃金政策三大項。在這裏我們應聲明的是：戰時後方的財經政策，並不完全包括在這裏，但這三項是主要的。如果不著眼於這三項而枝節地去談論其他，就沒法把握戰時後方財經政策的關鍵。因此，我們不得不集中力量來敘評這些問題。

管制政策濫觴於民國二十六年軍委會所頒佈的「戰時農礦工商管理條例」，二十七年經濟部成立之後，這一政策才系統地實行起來。

管制政策所談及的範圍很廣，生產、貿易、運輸、金融以及物價，都包括在其中。在生產方面，包括了鋼鐵、水泥、煤焦及布疋等物；金融方面，集中了商業銀行普通存款百分之二十於國家銀行，限制新銀行的設立並禁止銀行經營商業；出口方面，鎊、錫、絲、茶以及桐油等物，都要結匯，後來且變成統購統銷；運輸方面，管制了商車、輪船與航空；對於物價，則有評價、平價以及限價等辦法；對於糧食，則有徵實、徵購以及徵借等辦法。管制政策的觸角，是像水銀瀉地一般，深入到每一個角落的。

如果從內容來說，管制政策的特點，可分為：限制價格、統購統銷、徵實徵借與專賣政策幾項。

專賣獨占是管制的進一步的發展。管制政策發展下去，必然走上獨占專賣的道路。在下面，我們將依次來研究這些問題。

乙 A 限價政策

先談限價問題吧，限價是在評價與平價失敗後的措施。二十八年初至是年年底，政府採用評價政策；從二十九年春至三十一年年底，政府採用平價政策；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以後的三個月實施限價政策。它的辦法是以三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各地原有之價格為標準；對象是糧食、鹽、食油、棉花、棉紗、布疋、燃料、紙張等物品及運價工資；目的是要做到同一地區、同一時期、同一物品，只有一個價格。因為沒有協調原料與成品的價格，因為沒有協調各地所定的價格，因為沒有計算到市場之遠近與運費之多寡，因為沒有顧及農產品價格季節之變動，更重要的，因為在物資方面沒有增加生產與鼓勵輸入，因為政府所專賣的食糖和屬於公用事業的交通汽車輪船在限價實施之前後一個星期中提高價格，所以限價終於失敗了。在限價時期，物價依然波動，甚且發生有行無市等情形。到了這一年六月間，政府不能不改變辦法，將限價改為議價，但八種民生重要必需品——布疋、糧食、煤炭、火柴、糖類、食鹽、紙煙及食油——與房租、地租、工資、運費，則仍然保持限價的辦法。

在限止一般物價飛漲方面，限價是失敗了的；但對於生產事業之打擊，限價却具有不可輕視的作用。以燃料來說，煤荒是住在後方的人所經常碰到的，煤荒的癥結所在，乃是當局不顧生產成本，任

意核價。價格之調整，經常落在成本之後，補貼制度並沒有補足限價的損失。原來只有嵐炭是限價統購的；到三十四年二月，連煤焦亦一度限價統購了。礦商對付限價統購的辦法是逃避「提煤單的平價供應」，「輾轉尋求黑市出售」；或者在山窮水盡之處境下，縮減生產。以嘉陵江區爲例，三十二年該區煤產每月八萬餘噸，三十三年秋冬每月減至五萬噸；三十四年春初每月產量又減至五萬噸以下。以液體燃料的酒精來說，亦在吃核價不够成本的虧，三十四年四月二日重慶新民報曾經這樣寫道：

「核價與成本相較，二月份每加侖虧本千元以上，若每月生產二萬加侖計，則須折本二千萬元。故減產停業者比比皆是，因此之故，資金雄厚廠家，多以購囤原料以牟利；而製造酒精，低價供銷，反必虧本」。其在運輸方面，商車運費因限價之故，不能補償成本而告停駛；航業亦因煤價高昂而賠累過鉅。以民生公司而論，每月需煤約七千噸，而所得官價煤只有三千噸左右，其餘四千噸均須購之於黑市，故每次長途航行中，往往客貨運費所入，尙不足煤價，其他人工伙食等費均未計算在內，至於修理費用與所需五金器材，更在不斷高漲中。故民生公司一家每月之賠虧達數千萬元（以勝利前夜而言）。政府之補貼不但未能補償損失，而且因政府辦事遲緩，程序繁複，遷延時日，「口惠而實不至」。在這種情形之下，航業之衰落便成爲必然的了。除了上述各項而外，鋼鐵亦是受到統制的。在這裏，核價是一件使人頭痛之事。因爲鋼鐵價格之調整，永遠跟不上原料之上漲，頂多只有百分之四十或百分之四十五。因此，礦商只好縮小生產了。以綏江鐵礦爲例，在戰前和抗戰初期，年產約一萬

四千噸，經政府統制之後，產量銳減，到抗戰末期，年產只有四千噸了。以限價為手段的統制，得到的結果就是如此。

B 統購統銷

更進一步，讓我們來談統購統銷吧！統購統銷窒息了花紗布的生產；亦窒息了桐油及絲茶等的對外貿易。

中國棉花的生產，戰前（二十五年）達到一千四百五十萬担。抗戰初期，後方生產每年在一二百萬担之間，民國三十年驟見跌落，三十年、三十一年兩年間，產量驟降至三十多萬担。棉花減產的原因，是統購的價格太低，統購的資金不足以及統購運輸工具的缺乏。特別是收購價格定得太低，一般農民都不願意種棉，把棉田改作麥田。三十二年的棉價，因生產會議的決議而提高，於是棉產又增加到一百二十萬担左右，三十三年為一百八十萬担左右。但因統購的資金太少，而這太少的資金又不能及時運到棉區，趕快收購。棉農為生活、租稅及債務所迫，不能不以低於管制局所公佈的價格賣給商人，商人原想以低價收進，以高價賣出，但因政府強制收購，給價太低，而收購後又不能如期付清貨款，於是紛紛向外走漏，賣給敵人，三十二年的一百多担棉花，政府收購不到三分之一。紗布方面，自從以花易紗，以紗易布的統制方法實施以後，紗廠布廠底原料全歸政府供給，出品亦全歸政府收用，工廠負責繳紗繳布；政府負責給予工繳和合法利潤，在各地物價不斷飛漲的情況之下，工廠所支

出的工繳費用亦隨着增高，但政府所核定的工繳費用，則不能隨時充分調整。初期紗布交換的標準沒有後來規定得那樣嚴格，布廠可得一部份餘紗以作彌補，三十三年初，政府提高紗布的交流標準，而其所配給的紗，往往欠圈短碼，布廠不但不能不得到餘紗，並且必須賠紗。工繳方面，不但不能與實際支出之工繳相符，且因政府不能隨時付清，以致各廠所有的存紗已全歸政府所收購，而貨價卜之八九尚拖欠無着，各紗廠的經濟能力因而大大減弱，除了偷工減料之外，只有停工關門了。以大型紗廠之紗錠而言，後方共有二十三萬錠，花紗統制局管制下的紗錠，只有十九萬八千錠，實際開工的只有十六七萬錠，因為原料缺乏，經常奉命減工——從百分之三十至五十不等；土布業更形慘淡，三十一年重慶的織戶有一千一百餘戶，機台六千九百六十三台，三十三年下期減至四百五十六戶，機台減至二千四百餘台。成都及璧山等地的土布業亦一同陷入困境！到了勝利前夜，「不聞機杼聲，但聞人嘆息」的悲劇，是沉重地在各地表演起來了！

統購統銷的另一個成績，是窒息了出口貿易。當局的統購，是拚命壓低價格的。以桐油為例，十二年每担的官價比市價差一千一百元；以蠶絲為例，秋絲每担官價比市價，二十七年差三百元，二十八年差一千八百元，二十九年差二千零五十元，三十年差八千八百元。豬鬃及茶葉的核價情況，亦大致如此。統購的時候，壓價還不算，還要拖延付款。據三十四年九月七日商務日報的報導，「絲二萬担需二百億，豬鬃三萬担需九十億，而復興公司之資金只有十億元」，當然不能盡量的購，當然不

能立即付現，當然要把貨價拖延了。這就是統而不購，購而不給錢的好戲！其在統購方面，他們的成績，乃是『供不應時，喪失信用，弄得盟邦都講閒話』。勝利前夜重慶市商會等四團體的說帖，這樣的寫着：

『查我國借款條約中，指定以實物償還者，一為美之桐油借款，指定以桐油償還；一為蘇聯借款，指定以茶葉償還。桐油以運繳稍煩，遂久未運交美國；茶葉以辦理不良，積欠蘇聯過鉅，因而避難求易，以李代桃，轉而統制豬鬃蠶絲。自三十二年統購統銷以來，計每年用以償付蘇聯之豬鬃，只四千担，蠶絲只五六百担。所謂還債之範圍，僅僅如此，而復興公司售與美國之豬鬃每年二萬担，收入美鈔現金，存放美國；又三十三年，將號稱用以償債之蠶絲，照官價加百分之五，轉售於泰記、茂恆、和記等國內商人，凡此二者，豈可謂為償債之用？』

統購統銷的內容與其所標榜的表面，完全是不同的。債，沒有償清什麼；貨，亦沒有易得什麼，只有在公私不分的官僚資本的壟斷之下，打擊了農村副業和出口貿易而已。經營出口貿易的商人，就是在這裏弄得無所措手足的。『三十一二兩年，怡和洋行迭以每絲一磅顯出一百二十六先令之價（每絲一担，合美金三千二百元）向復興公司洽購不得，迭次轉商四川絲業公司求購，該公司格於統購統銷，不敢承售，……三十三年復興公司將所購外銷絲二千担，授權與泰記、茂恆、春記及寶元渝六家推銷，蘇大使館與泰記商購二百担，每絲一磅，議定價格美金二十二元（每絲一英担合美金二千九百

二十六元），草約已成，復興公司函令制止，隨即由復興公司將此批授權推銷之蠶絲一千二百二十五担，以半價售與印度政府。英美方面，遂至向隅。……三年以來，生產者不得售絲於友邦，友邦不得買絲於我國，國際市場中斷，純由統購統銷之結果」（三十四年七月重慶市商會等四團體說帖），而同時，在西南國際運輸仍被封鎖，後方依賴中印空運的當兒，從中國出發的飛機，沒有裝運桐油生絲，沒有裝運豬鬃茶葉，爲了增加重量，却裝滿了昆明的石頭，沙子和河水！這種怪現象，難道不是統購統銷的結果麼？商品銷不出去，生產自然衰落。「桐油全國產量，約一百五十餘萬担，戰時後方生產尚應產七八十萬担，自被統購統銷以來，幾等於零」；「蠶絲全國約十萬担，戰時後方應產二三萬担，自被統購以來，年產不過二萬餘担」，蠶農都把桑樹砍掉當柴燒了。以破壞出口摧殘生產而言，統購統銷的作用不是一目了然麼？

統購統銷是窒息生產和貿易的；從財政的觀點上來看，亦沒有什麼好處。統購購得便宜，統銷銷得昂貴，當然可以從中取得收入，但是，生產窒息，貿易衰落之後，這筆收入就會成爲竭澤而漁了，何況還有貼補一項的支出呢？谷春帆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是不錯的。他說：

「以辦統購則不免要官定過低之限價，因而阻礙生產，助長黑市。以辦統銷又不免要酌收較高之售價，以謀財政上之利益。貼補之款項，又將因財政困難而不能如期發給。限價過低，又慮貼補過多不堪負擔。貼補減少又不能提高限價，因而失去平價之效。在平價與財政的夾縫中，

政府懲前毖後，沒有出路，而生產日以萎縮，供給日以減少，物價日以高漲，人民日以痛苦，政府負擔日以加重。俗話說：「頂了石臼做戲，吃力不討好」。統購統銷與限價貼補，正是此類。

C 徵實徵借

徵實徵借始於民國三十年下半年。這是以是年六月間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的決定為根據的。其辦法是以是年（三十年）度田賦正附稅額每元折徵稻穀二市斗為準，產麥區得徵等價小麥；產雜糧區得徵等價雜糧。三十年度（三十年七月至三十一年六月，以下年度同此），計徵實稻穀二千四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十二石；三十一年度提高徵實標準，即依三十年度省縣田賦正附稅額每元折徵稻穀四市斗，或小麥二市斗八市升為原則，是年共徵得三千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九十一市石，三十二年徵實標準與三十一年同，計配額為穀麥三千五百五十八萬市石。三十三年度徵實配額原定九千五百餘萬石，但因湘桂潰敗，祇收六千餘萬石。糧食徵購辦法，遠在田賦徵實以前，即已實行。二十七年四月軍事委員會公布「各戰區糧食管理辦法大綱」以後，各戰區均設有軍糧局或糧食管理處之機構，以辦理糧食徵購供給事宜；二十九年七月行政院公佈「各級糧食管理機構組織綱要」後，中央成立全國糧食管理局，各省先後設置省糧食管理局，各縣設立縣糧食管理委員會，以辦理糧食徵購事宜。三十年田賦徵實、徵購辦法規定當隨糧帶購，其標準與田賦徵實相同，計這一年度穀麥配額為三千零五十七萬四

千七百七十一市石；三十一年度爲三千一百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七市石。三十二年四川先改徵購爲徵借，不搭付現金，完全付給糧食券。陝、粵、桂、康、閩、甘六省隨之；滇、黔、綏三省則部份改爲徵借；安徽則將全部徵購改爲捐獻。故三十二年三千二百一十八萬市石之徵購額，已大部份改爲徵借了。三十三年一律改徵購爲徵借，廢除糧食庫券，祇在糧票內載明代作憑證。借糧不給利息，自第五年起分五年平均償還或抵納當年新賦。到了此時，徵購就完全被徵借所代替了。

徵實並不限於糧食——稻和麥，棉田亦是徵實的。三十二年棉賦徵實已達二百餘萬市斤，三十三年徵棉除陝豫鄂外，又核及川湘，配額爲八百八十三萬市斤。三十三年國民黨的十二中全會所通過的「加強管制物價方案緊要措施案」，提出「擴大徵實的數量及範圍，以充實政府掌握之物資」。在這種辦法之下，麵粉、棉紗、食糖都實行徵實了。但在這裏，還應提出來區分的是徵實包括了專賣徵實與統稅徵實二種。食糖徵實是屬於前者；麵粉與棉紗的徵實則屬於後者。據有關方面的表示，這二者之區別如下：「（一）統稅徵實係向製造商徵收，專賣徵實係向銷售商徵收；（二）統稅徵實不負供應之責，專賣徵實則須負責統籌供應；（三）統稅徵實僅達百分之十五，專賣徵實則達百分之三十」（三十三年六月九日重慶商務日報）。

徵實政策在本質上，是管制政策之發展。徵實使當局握住更多的物資。糧食之徵實，除了軍糧公糧之外，政府支配了糧食市場；棉花棉紗之徵實，使政府控制了紡紗與織布工業和紗布市場；食糖和

麵粉的徵實，其作用亦在此。所謂「以量控價」，那是以徵實政策為主要條件的。因此，在本質上，我們對於徵實政策之批評，必須與管制政策聯系起來看。但除此之外，還有幾點不得不指出來的。

第一、田賦與食糖的徵實，並沒有執行公平合理的原則。現行土地陳報的地畝與等級多不實在。「有如：田多糧少應補編升科的，而一般大戶多隱瞞不報；徵用土地（如修築鐵路公路等等）應減免賦稅的，而一般辦理陳報人員仍舊計算，叫被徵的糧戶照舊繳納；又如張姓地主應列入甲等的，竟有因人事關係而以之列入乙等，李姓地主應列入乙等的，因勢力薄弱倒反而列入甲等」。在這種情形之下，「有糧出糧，糧多多出」的原則是沒法實行的。就假定實地實糧的話，以此時實行的稅率而論，地主的負擔亦不多。據三十三年六月十三日重慶商務日報所載，在長壽，收一千五百老石（即四千五百新石）穀子的地主，祇繳田賦一百五十新石，佔其收入百分之三強，除此之外，沒有什麼負擔。反之中小農民的負擔，遠在其收入百分之四以上；而工商業所擔負的獻金、所得稅、利得稅及營業稅，稅率竟佔資本額百分之三十。以大地主的負擔來與中小農的比較，大地主是便宜的；以正當工商業去與囤積居奇的大資本比較，則後者幾乎沒有一點負擔。這都是未執行公平合理的原則的緣故。

第二、當局對於擴大徵實，其着重點只放在稽徵，只放在掌握物資上，並沒有為培養稅源着想，沒有發展生產，沒有培養稅源，則片面的或過重的課稅，便會成為竭澤而漁了。但不惜事實却正正如此。蔗土在完納田賦之後，還要徵糖精百分之三十（即等於征蔗百分之六十），如製白糖，還要加

徵百分之十五，據四川內江製糖公會的代表所述，蔗農總負擔竟達百分之一百二十三。這是何等的沉重！同時，紡織麵粉等業，除了徵百分之十五的統稅徵實之外，還要在利潤上再徵百分之十五。九的直接稅。這對於這些工業的流動資金與生產規模的擴大，無疑要給與極大的打擊的。照這樣弄下去，物資是掌握了，但生產事業却在困難之下掙扎！

第三、在抗戰時期，徵實政策之實行，並不應片面地加以反對，問題是在於要做到對公家有利而又能照顧到人民。因此，負擔與辦法手續都是必須注意的。在上面，我們已經檢討了負擔的問題，現在必須說一說「辦法和手續」。過去納賦用貨幣，人民攜帶輕便，現在改用實物，人民就必須負擔運費，而糧管處的一些不肖份子，就藉此勒索，如果沒有「甜頭」、「應酬」，則故意留難，甚至有等待幾天而完納不得者。旅費、經費以及莫名其妙的「小包」，都是在不良的政治之下，徵實政策必然的副產物。而同時，因為徵實徵購（徵借）都是通過保甲制度，進行攤派的，縣長、區長及保甲長等，便利用徵實徵購之分攤，從中取利。上級要一担，下級便加到三担。人民的血液是稀薄到像水一般，但政府實際得不到三分之一。在徵購的時候，小農所得庫券多被大戶所扣留，客氣一點的就以賤價收買。於是大戶又在這裏撈一筆橫財，而小農就更加貧困了。

因為這些原因，戰時的徵實徵購（徵借）政策，在一方面雖則使政府掌握一些物資，但同時，却加重了貧富的分化，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了。

D 專賣制度

專賣制度的提案是在民國三十年國民黨八中全會中通過的。財政部根據這個決議，決定就食鹽、捲烟、火柴、茶葉、糖、酒等六類，改辦專賣，但實際見諸實行的，祇有食糖、捲烟、火柴與食鹽等四項。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食糖由專賣改為徵實；到了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專賣制度完全廢除，食鹽、捲烟與火柴改徵統稅——鹽稅由鹽務機關徵收，捲烟火柴的統稅，則由稅務署徵收。

專賣制度只實行了三年，抗戰勝利前夜，它早就成為陳跡了，但爲了總結經驗教訓，現在再把它拿來分析一下，還是有意義的。

照當局的說法，實行專賣的目的，「不僅爲增裕國庫稅收，同時還須注意到如何增加生產」；其次，「專賣政策僅爲管制，而非佔有人民之生產物」（見三十三年七月二日重慶中央日報特訊）。現在，我們就以增加國庫收入、增加生產和是否佔有人民生產物三點來討論吧。

關於第一點，糖、菸及火柴三種專賣之專賣收入，計三十一年度爲四萬萬八千七百萬元，三十二年度爲十七萬萬四千七百萬元。三十三年約在十八萬萬元上下。這筆收入，我們並不藐視它的作用。三十一年度的專賣收入佔財政總支出的百分之一·三；三十二年則佔百分之四·五，但是，單從財政的觀點看來，難道不專賣就沒有辦法增加收入嗎？不辦專賣而提高消費稅（當然轉嫁到人民身上），反可省設一批機關，反可節省一批專賣經費。不是更加合算嗎？

第二、或者人們認爲專賣是在實施社會政策吧！但事實又是否定的。因爲專賣利益不是基於一般中間商人的商業利益之轉化，而爲課稅與商人利益的額外疊增，這就是說，當專賣局從生產者購入的時候，價格是定得低的；當專賣局向銷售商配銷的時候，價格是提得高的。在一方面，它損害了生產者的利益；在另一方面，它又以專賣價格的高漲，去加重人民的負擔。它不但沒有一點社會政策的氣味，反而在惡化人民生活，在打擊人民生產事業。這難道不是佔有人民的生產物麼？

還有一點，中國的官僚機構，是腐爛不堪的，管制政策便利於他們之「上下其手」；專賣制度更便利於他們的舞弊營私了。重慶的某些專賣局竟有「轉賣局」的雅號，因爲一專賣，商品就顯得越缺乏，但在黑市世界，則專賣之物，可以充分的買到，這不是轉賣而何？重慶是陪都，尙且如此，其他地方，更不用說了。其次，專賣機關不但在買入時價格定得低，而且拖壓對生產的欠款。例如火柴業，在專賣事業管理局辦理結束之後一個多月，尙拖欠各火柴廠之尾款二千餘萬元。鹽商方面當局之拖欠積款，更是平常之事。在這種情形之下，生產者的困難，就因爲專賣制度而增加了，那裏談到增加生產？

中國的國情與高度資本主義國家是不相同的。專賣制度之實行，完全是囫圇吞棗，不合客觀的辦法，在財政方面，收入並不怎麼多，而從社會政策和生產物價各方看來，顯然是得不償失的。就是因爲得不償失，所以當局不得不於三十四年二月將專賣完全停止了。

總而言之，管制和獨佔，並沒有為戰時的財政經濟打開一條出路，並沒有解決物價問題和物資問題，它的最顯著的成就，只在加強官僚資本對於社會經濟的侵蝕而已。

二 通貨膨脹

前節所述的統購統銷、專賣制度和徵實徵借，都是富有財政意義的。在表面上看來，這些設施或者可說是為了措置物價問題。當局就是這麼說的，但事實上，財政的意義是超過措置物價問題的意義的。對於出口商品的統購統銷是爲了取得外匯；對於花紗布的統購統銷是爲了取得額外利潤（據中國機器棉紡業同業公會籌備會三十三年十二月所發表的文件，後方十二個被管制的紗廠，每年被管制局所取去的淨益，共一百七十一萬萬四千元左右），對於鹽、糖、捲烟之專賣是爲了取得獨占性的專賣利益；而徵實徵借則在於取得大量物資去解決軍糧、公糧和布疋等物，藉以減少政府對這方面的開支。因此，戰時的管制與獨占是應該從財政的觀點去把握。

當然，這些項目只不過是財政收入的一部份，除了徵實和專賣利益等項外，還有租稅。抗戰期間。政府在大後方整理了不少的間接稅；舉辦了許多種的直接稅。以間接稅言之，政府在關稅方面，調整了進出口稅，擴大轉口稅，增加從價課稅範圍；在統稅方面，擴大課徵範圍，改爲從價徵稅，後來又實行統稅徵實；在鹽稅方面，曾經改定鹽稅稅制，規定產銷兩稅不得併徵，一度改爲專賣之後，

復回頭改爲統稅。以直接稅言之，政府創辦非常時期過分利得稅，舉辦遺產稅，創辦戰時消費稅與擴充所得稅的徵收範圍。這種辦法，的確使政府在貨幣名目上，年有增加，但在預算中所佔的百分比，却是很可憐的。例如民國二十九年的租稅收入，僅有五萬萬元，不及該年度總支出百分之九；三十年的租稅收入只佔是年總支出四分之一弱；三十二年國稅之收入只有八十二萬萬元，只佔全歲出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就是把租稅專賣徵實以及統購等項加在一起，亦沒法解決戰時財政問題的。欲明瞭此中情形，只有看看抗戰八年財政支出的演變吧。

戰時中國的歷年收支，官方諱莫如深，就是與實際開支相差得很遠的預算，亦是沒有公佈的。據有關方面的統計，民國二十六年度（即抗戰開始的一年）預算總額爲一十五萬一千一百萬元；二十七年下半年預算（因會計年度改制）爲九萬零三百萬元；但實際支出爲十三萬萬元；二十八年預算爲一十八萬九千一百萬元，但實際預算爲二十七萬萬元，二十九年度增至四十五萬九千一百萬元，此後即急速的飛躍，即作數學級數的比例增加，三十年躍至一百零七萬三千二百萬元；三十一年度躍至二百九十三萬萬元；三十二年的預算爲三百六十二萬三千六百萬元，而實際支出爲七百萬元；三十三年度，支出之增加，尤爲猛烈，計是年度原來預算爲七百五十餘萬萬元，但全年實際支出竟達三千五百萬萬元之鉅，較之戰爭開始那一年，已超過二百多倍。三十四年的預算上半年定爲三千九百萬萬元，但此數只能維持四個月而已，自一月份至十月份止，普通軍務類的實際支出約一千六百萬萬

元，軍事行政費和緊急命令撥支六千萬萬元，合計在七千萬萬元以上。全年實際支出當在二萬億元以上。這真是一個龐大的天文學的數字！

財政支出這樣的膨脹，政府拿什麼方法去應付呢？

增加租稅是一種辦法，這個辦法，我們在前面已經看見了，無論如何，無論間接稅怎樣整理，無論直接稅怎樣創立，租稅是沒法應付戰時財政的支出的。在這八年中，租稅的收入最多只佔總支出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其餘百分之七十五，則完全沒有着落。縱然自民國三十一年以後，大部份軍火由租借法案獲得，無須付款；縱然三十年以後，士兵的口糧都由田賦徵實徵借得來，直接撥由各戰區自行分配，一直沒列入財政預算之內，但百分之七十五的虧空，並不會因為軍火與糧食之不用購買而有所減少。

爲了應付這些虧空，舉募外債是另一種辦法。借債可分爲內債與外債。八年所發行的內債，幾達二十種。『民國二十六年發行的，有救國公債，京贛鐵路公債，開濟廣東省港河江工程美金公債，整理廣東金融公債四種；二十七年發行的計有國防公債、金公債及賑濟公債三種；二十八、二十九及三十年，則各年度均發行軍需公債與建設公債二種；三十年度並發行同盟勝利公債及美金公債一億萬元』。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及三十三年度均各發行同盟勝利公債。外債方面，則有英美蘇的借款二十餘次。外債主要是用之於購軍火及物資的；與支出有關的應推內債。內債總額約達一百七十萬萬元左

右。這個數量尙不及三十三年度一個月的支出之一半。其比重之微小，實在是得太可憐了。但是，這一百七十萬萬元的極大部份，是沒有公開發行的。這就是說，除了二十六年的救國公債與二十九年的建設金公債軍需公債直接向民間購募外，其餘都是以「總預約券」的方式，向國家銀行抵押，再由國家銀行放款政府。在實質上，這不是發行公債，而是變相的通貨膨脹。由此可見。舉債在戰時財政所佔的地位，是並不怎樣重要的。

在戰時財政中佔着重要地位的是通貨膨脹。儘管在抗戰初起時，財政當局聲明中國決不走通貨膨脹的道路，而實際當局所採的政策，却是向着這條道路邁進的。第一、租稅與舉債，遠不足以應付財政的支出；而對於富豪的大戶，對於禍國殃民的官僚資本，又沒有使其負擔戰費，因而只有乞靈於印發鈔票；第二、在舉債方面，如上面所說，除了救國公債與建設金公債及軍需公債之外，其餘都是變相的通貨膨脹；第三、在租稅方面，並不施行累進的稅率，富豪巨室的負擔是比一般人民的負擔來得減少的。就以直接稅而論，在本質上，它亦是與西歐不相同的。西歐的所得稅是一種對人稅，而中國戰時的所得稅，則為一種對工商組織的收益稅。這種辦法，不獨未能課及一般貧國難財者的過份利得稅，反而阻礙了後方正當工商業的發展，使它們在「虛盈實稅」的襲擊之下，走上停工關門的道路。於是物資的供給便告減少了，物資的供應缺乏的結果，使囤積者更加拚命，使物價更加上漲，而物價的飛漲，則是在增加政府的支出的。抗戰八年，年年都感覺到預算不夠，都感覺到下半年的物價

超過上半年的幾倍。爲了應付這種不足，只好在增發鈔票上想辦法。第四、通貨膨脹的道路是沒有底止的。越膨脹，就越感到不足。通貨膨脹促進物價的上騰，而物價上騰又促進通貨的更漲。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西南聯大伍啓元等五教授，對這個問題會作一個概括的看法，他們說：

「過去通貨數量增加的速度，已有逐年激增的傾向，後來每年增發約爲上年度的一倍餘。今年由於整軍的需要，財政支出沒法縮減，同時，由於豫、桂、贛諸省重要區域的淪陷，財政收入自又較前減少，在富裕階級仍未負担其應負之戰費的情形下，財政虧缺更形擴大，結果遂使通貨數量的增加率跳到一個新的階段」。

摒棄了「有錢出錢，錢多多出」的原則，排斥了提高生產增加物資的政策，其結果，只有飲鴆止渴地乞靈於通貨膨脹。抗戰八年，中國的發行總額究竟有多少，官方一向亦沒有發表，據某方的估計，如以戰前民國二十五年的發行額爲標準，則歷年膨脹的數字如下：

二十五年	一〇〇	三十年	一、三〇〇
二十六年	一三三	三十一一年	二、〇〇〇
二十七年	二〇〇	三十二年	六、〇〇〇
二十八年	三〇〇	三十三年	一六、〇〇〇
二十九年	六五〇	三十四年（上期）	一〇〇、〇〇〇

三十四年上半年的法幣發行額，竟為戰前的一千倍。從各方面的事實看來，這還是一個很節約的估計，但以這個節約的估計而言，已够使人驚訝不置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戰敗的德國，是算做通貨膨脹的國家，但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二〇年六年間，其膨脹量亦不過只有二十倍而已，中國却在戰爭的第八年，就膨脹了一千倍。這怎樣得了呢？中國事事落後，大概祇有通貨膨脹一件事，沒有遜色吧！

通貨膨脹是政府對一般固定收者，工廠裏的工人和職員、士兵、公教人員等等的——一種強制借款。通貨膨脹促進物價的飛躍，而這些固定收入的人民，其工資或薪俸，却沒有比例着物價之上漲而增加，於是他們就越來越貧了。就是職業工人和中小獨立生產者，亦無一不在通貨膨脹之打擊下掙扎。因為職業工人的收入是不能比例着生活費之上漲而提高；而獨立生產者却在官僚資本和獨佔的囤戶之下吃了買賣賤之虧。通貨膨脹只好了大官僚資本——大銀行家和大囤戶，因為這些人掌握有物資，越膨脹，就越增加了他們所握有的貨幣量；而在資金方面，他們又有辦法可以使牠變成外匯或黃金，這麼一來，不但可以保存價值，而且可以擴大其資力了。通貨膨脹使大後方的社會經濟，起了極大的波動，使有錢的更加富裕，使貧苦的更加貧苦，使物價的飛躍更加急速；使國家的財政更加破產。當局對於這個問題，是如何措理呢？

三 黃金（外匯）政策

一 黃金的買賣

爲了吸收法幣，政府於三十二年廢止金禁，實施黃金政策。

我國自民國十九年起，就禁止黃金出口，但國內的自由買賣，還沒有受到限制。抗戰爆發之後，政府陸續頒佈法令，禁止人民買賣黃金，並規定價格由政府集中收購。從二十六年九月的「金類兌換法幣辦法」起至二十九年的「查獲金類充獎辦法」止，金禁的體系乃告完成。抗戰越深入，通貨就越加膨脹，幣值就越加跌落，而物價亦就在這種情況之下飛漲起來了。爲了收縮通貨與「平抑物價」，黃金政策便在三十二年秋間開始了。

黃金政策的實施是通過黃金現貨與黃金存款二個途徑的。

自三十二年六月宣佈黃金解禁之後，中央銀行即委託中國農民銀行及中國國貨銀行出售黃金。三十三年四月以前賣的是中國自己的存金；這一年四月以後賣的是美國黃金現貨。從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三月底，出售國內原存黃金的總額共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六兩；三十三年四月售出美國黃金一萬七千四百八十二兩，其後逐漸提增，三十三年十月達到最高峯，計這個月出售之數達十八萬七千零八十八

兩，以後即逐漸衰微。這是由於是年十月三日以後，期貨迄未兌現，期貨成爲無定期貨，使顧客轉向「存款」，三十四年五月份尤爲冷淡，財政當局宣佈自五月二十八日起期貨暫停。

黃金存款自三十三年八月間開辦，四聯總處在提倡儲蓄吸收游資的名義下川中、中、交、農四行及郵信二局舉辦黃金存款。舉辦之初，門庭冷落，第一個月（三十三年八月）只有三百六十九兩，與期貨之聲勢，相形見絀，因此，當局特將期貨加二成鄉鎮儲券，使存款便於推行，但存款之風行還在於期貨變成無期以後。因爲期貨無期而存款定期半年，反見有利，於是門庭若市。三十三年十一月份增至十萬五千一百五十六兩；三十四年三月達到四十七萬七千八百零一兩。四月份爲二十五萬餘兩，五月份爲二十餘萬兩，六月二十五日黃金存款亦宣告停止了。

截至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止，售出黃金現貨爲一百十四萬兩，存款一百六十二萬兩，收回法幣約爲六百零一億九千七百零三萬元，但據六月下旬財政部發言人所稱，經過黃金政策收回之法幣達八百餘億元。

黃金政策所用的黃金，是從那裏來的呢？中國在美原存有五十餘萬兩，這是開始使用黃金政策的底子，但，單靠這一筆黃金，還是無濟於事的。三十三年中美成立五億美金的借款，政府特提出二億美金買入黃金五百七十萬兩，連同原存之數，合計有六百餘萬兩。這就是黃金政策的本錢。

從技術的觀點看來；黃金政策是頗爲高明的；因爲它是一筆好買賣。中國政府以美幣三十五元一

盎斯的價格購進（美國當時黑市為七十美元），按法幣官價計算，每盎斯只值法幣七百元，每兩只值法幣八千餘元。但政府最初出賣黃金的官價却在一萬至一萬四千元之間。其後又提高至二萬元（三十四年一月至三月二十八日）三萬五千元（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至六月七日）及五萬元（六月八日至二十三日），出入之間相差至鉅。政府拋出二百七十六萬兩黃金，每兩至少可賺二千元，最高可賺四萬二千元。黃金政策實在是一筆好買賣，但若從這一政策的任務來說，能不能說它盡了應有的作用呢？讓我們敘述了外匯的運用之後一並來回答這個問題吧！

二 外匯的運用

抗戰初年，曾經執行着一種以維持上海香港的外匯匯率為任務的政策。爲了這一政策，匯豐銀行從廿七年八月起便協助中國穩定上海黑市匯價；我國的國家銀行則建立建立小規模的平準基金爲維持黑市之用；二十八年三月又向英國借款五百萬鎊成立一千萬鎊匯率兌平準基金。這一政策的實際上的作用，不外替敵僞維持其金融命脈，並博得英美商人對上海的「匯市堅定」的喝彩而已。對於中國，不但沒益而且有害！這是大家都感覺到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隨着滬港之淪陷，以維持淪陷區的黑市外匯爲目的的這個政策，自然歸於廢除，從這個時候起一直到勝利後政府頒佈外匯新比率（三十五年二月底）的時候止，在這個時期，

當局對於外匯，是沒有什麼政策的。三十三年間，因為美國歸還華美軍的墊款（這一年年底歸還該年十月以前墊款二億一千萬元；十月以後每月撥還二千五百萬元），並且因為美國駐軍軍費由我國墊借，增加發行三十萬萬元（約增十分之一）之故，不少人提議實施外匯政策，使外匯成為黃金政策的翼輔，但終沒有實現。

政府在抗戰後期繼續維持二十元法幣折合一個美金的官價外匯。在出售外匯時，國家銀行的確是以二十元的比率換算的，但能請得這種官價外匯的人，除在政治上有特殊條件者和一部份留學生以外，幾乎可說沒有。反之，在收購方面，却是沒法依據這一比率的。對於美國派到中國的教會、學校團體，和慈善機關所需的經費與工作人員的薪俸是使用一種匯價；對於美國在華的外交機關與軍事機關的經費及工作人員的薪俸，中美政府間曾經進行劃算，又是一種匯價；還有僑匯亦是一種匯價。以勝利前夜（三十四年七月間）的外匯市場而論，除官價外，共有四種不同的匯率，黑市美鈔大票三百元；教會學校聯合基金的美匯掛牌一千二百五十元；中美政府間的劃算一美元合法幣四百元；僑匯一美金合法幣五百元。外匯之有種種價格（黑市除外），誠有其不得已之處，如果鐵定地依照二元元的官價，一定會使外交官、傳教師、外籍教育新聞工作工人和本國的華僑家屬沒法生活下去。但問題是在於外籍人員的僑匯規定得較高而僑匯規定得過低，五百元的結價（原來只有四十元到三十四年春才改訂），實在沒法解決僑胞家屬的困難。

抗戰後期的外匯政策的確與初期不同，初期的外匯政策是在於運用從英美借來的平準基金去維持上海黑市；而後期的外匯政策，則祇在表面上維持二十元的官價，但實際上，這個比率只在出售時可以應用，而在收購時差不多完全不能應用。說它沒有政策亦是可以的。現在讓我們來品評戰時大後方的黃金政策和外匯政策的價值吧！

三 黃金政策的評價

黃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於吸收法幣回籠。我們在檢討黃金政策的得失時，應從這一點着眼。伍啓元先生說得好：

『當作收縮通貨的一種工具說，黃金政策不是完全沒有效果，當然，如果政府能够採取強迫富裕階級負擔戰費的辦法去停止通貨膨脹，能够把抗戰將士用血汗換來的黃金珍惜地加以保全，而不輕易拿到市場上拋售，則遠較運用黃金為正當而合理。但在目前政府財政政策沒有改變的條件下，運用黃金亦不失為一種收縮通貨的辦法。』（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重慶世界日報）。

這是對的，黃金政策是沒辦法中的一種辦法。但這辦法如要使其有效，還不應孤立地去措置它。可惜當局恰恰孤立地去措置這個問題。通貨是暴跳地在膨脹着；生產是急速地在衰落着；財政的支出是龐大地在虧空着。黃金政策施行了二三年，雖然吸回法幣八百萬餘元，但辛辛苦苦搞了二三年的

這一成績，只抵上三十四年春開二三個月的法幣發行額而已。有人估計：依三十三年下半年及三十四年最初四個月的鈔票發行情形來看，每月平均吸收回籠的法幣數量與每月平均增發的法幣量比較，約為一與三之比。在時間的發展上來說，三十三年六月以後的十個月吸收回籠的法幣誠然不少，但越到後來，法幣的發行額越加擴大，吸收回籠的法幣量亦就相對地顯得減少了。

就假定黃金政策每月能收回相當的通貨吧，但收回法幣並不等於收縮通貨。因為購買黃金的不是些購囤以保存價值的人民，而大部份係一些以運往淪陷區出售為目的的商人。三十三年下半年黃金政策之所以突然生效，大後方市價之所以遠離官價而上騰的原因，乃是淪陷區的金價超過大後方的價格。如果黃金運往淪陷區係用去購買物資，則出售黃金之結果，物資來流，倒亦是一件好事，但事實上，運往淪陷區的黃金只用在換回敵偽公私手上的法幣及淪陷區人民窖藏的法幣，結果出售黃金不但不能產生收縮通貨的作用，而且增加了大後方的法幣數量。黃金雖然不是全部流往淪陷區，但假定流入淪陷區的僅佔半數，那就大大地抵銷吸收法幣的作用了。

黃金政策在本質上是以一種投機代替另一種投機，就是說，用金融投機去代替商品投機。年來游資泛濫後方，物價之飛漲，它是重要因素之一。黃金政策的目的。就在於吸住一部份原來從事於商品投機的游資。故黃金所吸住的游資越多，則相對地從事於追逐商品的游資就比例地越被削弱了。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黃金政策分明是在鼓勵投機的。只有黑市高過官價，才能吸引游資傾向到黃金這方面

來，如果單單靠小百姓買一兩半兩着重於保存價值，則黃金政策將會無聲無息地沉滯不前了。購買黃金之狂熱，泰半多在黑市高漲之時，就是明證。

黃金政策是不是代替了商品投機呢？三十三年下半年，黃金之售出，與月俱增，在這個時候，物價恰恰呈現沉滯。有人就認為這是黃金政策之功，這是不合事實的。三十三年下半年物價之跌，是因爲湘桂軍事潰敗，人心惶惶，大家不敢囤積貨物，故捨商品而就黃金，但自敵人退出獨山之後，西南戰局穩定，物貨又回漲起來。在這個時候，黃金依然在出售着，而物價却一漲再漲，無有止境。這證明黃金政策並沒有削弱游資對於商品之逐追，爲什麼如此？主要的原因是通貨膨脹得太利害了，黃金所吸住的法幣，只佔通貨總量的一部份，它並沒有把極大部份的游資吸住，正是因爲如此，所以本來可以牽制物價的黃金，儘管它的上漲率落後於商品（在勝利前夜之三十四年五月，黃金官價爲戰前之三百五十倍，黑市爲八百倍，但物價已漲二千餘倍），但因通貨脹得太兇，幣值跌得太快，一部游資追逐黃金之結局，又進一步的襯出法幣之下跌，法幣下跌了，物價就跟着提高。在客觀上，就呈現金價與物價一齊上漲，因而有人認爲金價是促進物價上漲的因素！

黃金政策不但沒有平抑物價的作用，反而成爲少數官僚資本發財的工具。伍啓元先生說得好：

「黃金政策在本質上就是一種便利富裕階級的政策，但過去在施行上更用種種方法去便利有較大財力的人，例如過去中農國貨黃金必須按四百兩整塊才能購貨的辦法，又如目前五兩以下的

黃金存款存戶到期不兌現的法，都是便利大戶和忽略小戶的明顯例證。」（三十四年五月廿四日世界日報。）

但，特殊人物之便利還不止此。黃金政策握在他們手裏；金融機構亦在他們手裏，要提高官價之前，他們利用其特殊有利條件，當然可以大量購入。三十四年三月間的黃金舞弊案乃是疏忽的一次。在這種情形之下，不但談不到吸收法幣回籠，而且使國家損失多量的黃金，使官僚資本漲得更胖了。

關於外匯，我們雖然指出二十元的官價在實際上並沒有作用，在這裏，我們應當進一步來談談維持這種官價的缺點：（一）以三十四年六月份的情形言，平均美金黑市每元值法幣一千四百一十元，依二十元的法價售出，就等於把國庫的外匯白送與購買人，而這些能以官價購得外匯的，都是有權有勢的人物，他們請得外匯在外國作經濟活動。有些人則自抗戰後即舉家住在美國。這種情形，真不知如何說好！（二）中央銀行低價出售外匯的政策，只緩和了市場上對外匯的要求，對於吸收法幣回籠和平抑物價，並沒有發生一點作用。就以外匯市場本身而言，因為請得外匯的只限於一些特殊人物，經營進出口貿易的人，都感到走頭無路，只得求諸黑市，這麼一來，外匯亦就成爲投機的對象了。這種投機，只便利於某些大戶巨室之翻雲覆雨，法幣回籠的作用是無從談起的。如果從這一點來說，外匯的運用又在黃金政策之下了。

黃金和外匯，並沒有發揮收縮通貨的作用，大後方的人民銳敏地都感覺到法幣在作惡性的膨脹。

通貨膨脹、金融投機和商品投機是密切地交織在一起的！

三 解放區的財政經濟政策

一 基本方針

在苦鬥的八年中，陝甘寧邊區與敵後解放區的財政經濟政策，是與大後方所執行的一套，完全不同的。一如前章所述，大後方的財政經濟政策的基本路向，是通貨膨脹與投機取巧，反之，新民主主義的財經政策以下列幾項爲其基本的方針：

第一是自力更生，發展生產。解放區所具有的經濟基礎，是極其貧弱的；再加以敵人的不斷掃蕩與頑固派的封鎖攻擊，依靠外面的接濟，分明是不可能之事。在這種條件之下而欲堅持抗戰，那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身上！陝甘寧邊區從一九三九年起，便在自力更生的原則之下，開展生產運動了。其他各個解放區亦莫不如此。糧食不夠，就設法增產糧食；工業日用品缺乏，就設法產生這些缺乏的日用品。如陝甘寧邊區，在以前，布疋、洋火、肥皂、鋼鐵、紙張及藥品等物，都是不能自給的。經過幾年的奮鬥，就逐漸走向自給的道路了。

第二是照顧全局，互助合作。因爲政治上的任務是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故在經濟政策方面，

必須照顧各抗日階級的利益。三十年陝甘寧邊區所頒佈的施政綱領，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三十三年中共的「爲抗戰六週年紀念宣言」中，很明確的提出：「實行一個調節各階級的經濟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經濟政策」。照顧了農民，同時照顧了地主；照顧了工人，同時照顧了廠家。但，問題還不僅如此。「邊區的經濟，分爲民營公營兩大方面。民營經濟就是一切私人的農工商業；公營經濟，就是政府、軍隊與機關學校所經營的農工商業。這二方面的作用與關係：民營經濟是爲了解決邊區一百四十萬人民的生活，同時以租稅的形式援助政府與軍隊，支持抗戰建國的神聖事業。公營經濟是爲了解決數萬黨政軍的生活費與事業的主要部份，以便減少取之於民，休養民力，便於將來緊急需要時的取給。在這裏適用的原則就是「公私兼顧」或「軍民兼顧」」（毛澤東同志：「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

第三是「農業第一，工業第二」。這並不是不重視工業，並不是不進行工業建設，但，從客觀所具備的條件看來，各個解放區都是農業生產佔優勢的地方。在對比上，農業既然佔優勢，我們自不能不以更多的力量去措置它，而且，要發展工業，必須以興旺的農業爲前提。沒有原料，是談不上工業的；而談到原料，就須聯系到農業。紡織和造紙，不就是明顯的例子麼？再從工業品的銷路來說，沒有提高農業生產，則工業品的市場就沒法打開。因此，「農業第一，工業第二」的原則，是萬分實際

的。

第四是以解決經濟問題作爲解決財政問題的前提。沒有發達的社會經濟，就沒有堅實的財政基礎。這是一個極其平凡的道理，可惜的是：這個平凡的道理一向是被人破壞的。別的不說，抗戰期間的大後方財政，正在演着竭澤而漁的悲劇。新民主主義財政的特點，就是在於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爲人民服務，替人民解決生產上的問題，然後只用百分之十的力量去向人民要東西。在人民的困難解決之後去進行財政工作，自然會得到人民心悅誠服的擁護了。

這是解放區的經濟財政政策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實實在在是與大後方的一套完全不同的。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各項具體設施吧。

二 土地政策與農業政策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前提之下，土地政策的內容是減租而不是沒收地主的土地。其實，在抗戰以前，陝甘寧邊區早就停止土地的沒收了。二十六年二月中共致國民黨三中全会的電文中提出四項保證，其第四項就是「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是年四月當時的蘇維埃政府（即以後的邊區政府）就宣佈「在沒有分配土地的統一戰線區域，地主豪紳的土地，停止沒收」；至於業已分配土地的區域，除「保證一切取得土地的農民之私有土地制」外，同時

公佈：「地主豪紳回來，可在原區鄉分配他以和農民一樣多的土地和房屋」。

陝甘寧邊區的綏德、鄜縣、慶陽等地，是沒有分配過土地的。在這些地方所執行的政策是二五減租；敵後各解放區亦是如此。若地租原為農民收穫量之一半，那末在減租百分之二五後，租額恰當於土地收穫總量的千分之三七五。這是國民政府曾明令公佈的。不過，這種規定並不能一般適用，因為地有好地壞地之別；而耕種則有「粗耕」「細耕」之分。有的地主只坐收地租；有的地主則除土地外又供給佃戶以耕畜、農具、種籽、肥料以至房屋等，要一律實行千分之三七五的規定，是十分困難的，因此，解放區一般是按戰前租額減去百分之二五，減租之後農民必須向地主繳租。減租與交租是兼顧主佃雙方利益的。只有實行減租，才能提高農民的生產情緒與生產能力；只有「使農民在取得減租利益之後，發展農業生產，能够以一部份交給地主作地租，因而便於團結地主和我們一同抗戰。」（「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

根據各解放區的經驗，地主與佃戶間關於減租的鬥爭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政府及民衆團體的領導機關，利用行政方式，發動減租運動。此時地主的態度是防禦的是抗拒的。有的被迫減輕租息；有的則陽奉陰違。農民則畏首畏尾；有的竟在地主威脅欺騙之下，約定「明減暗不減」，偷偷地又把已經減掉的租息如數送還。到了第二個階段，人民已經自覺起來鬥爭了，此時的鬥爭主要的已經不是依靠「自上而下的發動」而是廣泛的深入的「自下而上的」起來了。於是一部份農民開始

不交租不還債；有的把贖地換約運動變成無償收地及廢除債務的運動了。地主則轉向非法的隱蔽的鬥爭，一面表示熱烈擁護無產階級利益，或者自動賑災濟貧；或者把女兒嫁給佃戶；另一方面却急劇的勾結敵人，進行種種的暗害破壞工作。這是一個危殆的關頭！在第一個階段中民主政府的工作是發動農民起來；第二個階段的工作是在於盡量使農民不要走得太快，並防患某些地主之暗害破壞。進一步（第三階段）提出了地主須減租減息，佃戶須繳租交息；提出了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權及締結與解除契約之自由，鞏固農民已得利益並和緩地主農民間緊張的局勢。這麼一來，主佃間的鬥爭亦由非法而轉入合法，由祕密的轉入公開的，帶危害性的鬥爭亦告停止，但鬥爭亦就因暴露而表面化。在表面上看來地主在反攻了。他們控告佃戶不交租，控告債戶不還債，其實這正是地主與佃戶的關係在抗日民主政治的秩序下步入正軌的表現！

除了陝甘甯邊區外，各解放區的減租工作，如從地區說來，在抗戰勝利前夜，大約有三分之二是實行了這一政策的。抗戰勝利以後，解放區更加擴大，減租減息又在這些新解放的地區中實行起來！減租（土地政策）是發展農業生產的最主要的工作，除此之外還有幾項工作是必須同時進行的，這就是我們現在所欲談的農業政策。

第一減息還債。減息和減租一樣，具有壓迫貨幣資本、壓迫游資轉入生產事業之作用。但利息率究竟以多少為適當，却是一個很難規定的問題。在減租的第二三階段中，各解放區所發生的問題，已

不是減息，而是減息之後，部份農民不還債的問題，舊債的糾紛如何措理以及農民如何獲得借貸的問題。措理的大要是：（一）在減息之後，債戶必須依約還息還債；（二）凡舊的債務業已正式清結者，應不再翻案；仍在糾紛中的債務，則依改良貧苦人民生活、調節各抗日階層利益的精神去調解；（三）政府大量舉辦低利借貸，減少農民借貸的困難。

第二是開闢荒地。荒地開得越多則糧食的生產越可增加。荒地除老戶拋熟墾新所開者外，主要依靠招集移民。以陝甘甯邊區而言，由於移民政策的成功，邊區增加了八九千個勞動力（卅二年），其中多數是河南等地逃來的難民。在民主政府的扶助之下，移民一年便可翻身，勞動英雄陳長安與馮雲鵬都是一二年前移入的。其他的地區，亦年年致力於開荒。三十四年的膠東魯中魯南的人民開荒幾達二十萬畝。就是例證。

第三是調劑勞動力。這裏包括了獎勵移民、勞動互助、動員婦女、動員二流子、着重優抗、生產給假及軍隊幫助等辦法。關於獎勵移民是在自願的原則下，自計劃的宣傳並組織一定量的勞動力移向有荒地的縣份，政府給予農具貸款，並免徵公糧三年，發動老戶幫助新戶，如借糧、借熟地、借密洞，或吸取最貧苦的移民安夥種；對外地移民則經過與外地有關係的老戶去號召，各縣區介紹至有荒地的地區去安插，並在糧食、工具、密洞方面給與幫助。關於勞動互助，提倡以個體經濟為基礎並以自願為原則的勞動合作政策。這就是變工隊與扎工隊的組織。這種方式還不是蘇聯式的集體農場，而

是建立在私有財產上的集體勞動。根據延安念莊變工隊的統計，一個勞動力如不變工，只能種一·一·六垧地，打六·四五石糧；如果變工，則可種一七·九垧地，打一〇·四五石糧。變工比不變工可增加一半多的生產量。在發展生產與使分散的個體經濟組織起來走向合作化的運動中，民主政府使用了表揚勞動英雄，表揚模範工作者，提倡革命競賽，實行按戶計劃的方法。陝甘寧邊區的農業勞動力在三十二年就有百分之二十四至百分之七十參加變工隊的。其他各解放區約有百分之二十參加了變工互助。關於婦女，主要是使她們參加各種輔助的農動農事，如種菜、播種、鋤草、喂牲、送飯、挑水及收割等工作。婦女紡織運動的開展，更是轟轟烈烈的。婦紡解決了紡紗問題的一大半。爲了動員婦女參加生產，民主政府以宣傳教育及強制的辦法，使她們放腳並禁止幼女包足。關於二流子之改造，使他們從消極的寄生蟲變爲積極的生產者，增加了勞動力消滅了壞人壞事。陝甘寧邊區在三十二年就改造了四千五百多個二流子轉入生產並且在此中產生出勞動英雄劉生海。其他各解放區亦在這方面有可喜的成績。關於優抗工作，主要是組織代耕隊，去替那些缺乏勞動力的抗日軍人家屬耕種；在這裏，只要是抗日軍人家屬，那是不分我軍友軍的。關於生產放假，是准許某些家境貧寒的機縣人員，每年回家二次，每次若干天，從事家庭生產；中小學的師生，亦得於農忙時回家幫助生產。軍隊方面，則在農忙時，一律就近替農民耕種、鋤草或收割若干天而不受任何報酬，吃自己的飯。這不僅是調劑勞動力而且密切了軍民的關係。

第四是不違農時，即在農忙時停止一切無關農業的開會與動員，藉以節省人力畜力，使其全部用於農業生產上。上面所述的生產放假與部隊幫助，都是與此有關的。

第五是放發農貸。解放區的農貸是與大後方不同的。大後方的農貸，多掌握在地主豪紳手中，他們從農民銀行的辦事處或金庫領得資金，或通過合作社借得資金之後，又以高利借給農民。故大後方農貸的放發量不但不能表示農民在借貸上減輕了困難，反而在實際上增強了農村高利貸的勢力。解放區的農貸則是直接放給農民的，因為農會及合作社都是他們自己的組織，而放發的對象與數額又都經過大家的民主決定，所以農貸一點一滴都入於農民的手，都流到農業生產中去。三十三年蘇中、蘇北、皖中、淮北、太岳、太行、冀魯豫、晉冀魯豫、魯中、豫鄂湘贛皖、膠東、魯南、渤海墾利縣、晉西北十四個地區共放農貸二億二千餘萬元的貨幣及十五萬一千六百大石與三十萬斤的糧食。這個數目並不算大，但其對於農民的實際影響却是不小的。

第六是修理水利和植林。對於水利之修理，民主政府是不遺餘力的。各個解放區就是在敵寇掃蕩不息的時候，依然按照計劃進行工作。晉冀魯豫、晉冀魯豫、蘇北和蘇中等地，無不如此，蘇北的宋公堤（宋乃德所領導築成的）是在敵偽和反動派的破壞之下築成的，它的產生充滿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水利的開闢消除了水患，增加了田地，對於農業增產是有極大作用的！

此外如改良種籽及推廣植棉，亦是戰時民主政府對於提高農產的政策的要項，改良種籽可以增加

農產的收穫；推廣植棉則解決了各地的衣着問題。

新民主主義的土地政策與農業政策的重點是在於使貧苦的農民減弱封建束縛，是在於提高他們的生產能力與生產情緒，是在於使他們從貧農上昇爲中農，從中農上昇爲富農。延安的解放日報曾提出吳滿有的方向就是邊區農民的方向，就是指此而言的。解放區的農民正在走着吳滿有的道路；然而大後方和收復區的農民却在走着少數人上昇爲地主富農而大多數人淪爲貧農僱農的悲慘的道路！

三 工業政策與勞動政策

解放區的工業是比較幼稚的。輕工業佔着極大的優勢；煤和鐵都是舊式的生產；手搖機和古舊的木織機是散處在每一個村落的，這些地方的工業政策完全是適合當地的條件的。

除了從敵軍手中奪取過來的軍火以外，爲了抗戰，不能不設法生產一些武器和彈藥，爲了供給各地部隊和機關的需要，不能不設法一些工業日用品，故在抗戰時期，解放區的公營工業是很有成績的。鐵廠、工具修理廠、紡織廠、造紙廠、製藥廠以及化學工廠等等，公營工業佔着主要的地位，但這並不是說解放區只有公營工業而沒有私人工業。正相反，解放區的民主政府是竭力鼓勵私人資本的。民國三十年陝甘寧邊區所頒佈的施政綱領中，其第十一條是這樣寫着：

「發展工業生產與商業流通，獎勵私人企業，保護私有財產，歡迎外地投資，實行自由貿易」

易，反對壟斷統制，同時發展人民的合作事業，扶助手工業的發展」。

陝甘寧邊區的工業政策，的確是這樣做的。正是因為民主政府保護私有財產和獎勵私人企業，所以有不少地主和商人都把資金轉來興辦工業。慶陽的慶興紡織廠是地主劉憲庭所辦的；延安的萬合工廠是商人李國榮和地主姬伯雄合辦的。米脂的民生紙廠是地主艾斌卿所辦的；于洲的萬合工廠是由安吉銘、霍鍾文、霍鍾裕、王少山及趙家珍等變賣一部份土地投資入股的。其在山東，莊曉光之建立織布廠亦是一個例子。地主資本之轉向工業是中國國民經濟一個重大的標誌。這一點證明民主政策是維護私人企業的，是保護私有財產的。

一面發展公營事業；一面發展私人企業，這是經濟民主的一個要點。回頭看看大後方和收復區吧，那兒只有獨占管制，那兒只有官僚資本在活動，所謂國家資本不外是它的擋箭牌吧了。

就以私人企業而論，大後方所執行的辦法是支持大資本（特別是大官僚資本）去吞併中小資本的，工貨的放發就是明證。在這裏，與官僚資本有關係的大企業就會借得多，領得快，而中小工業則問津無路，就是弄到一點，亦是小得可憐拖得可憐的，反之，解放區的工業政策扶助較大的工廠，更扶助規模較小的工廠；扶助機器生產的工廠，亦扶助手工生產的作坊和個人。婦紡的發展與合作社的組織就明白證明了這項政策的措施。照顧大企業更照顧中小企業和手工生產，乃是經濟民主的另一特點。

經濟民主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特點，這就是勞資雙方的兼顧。一方面要增加工人的工資並改良工人

的待遇；另一方面要提高勞動的積極性的和勞動紀律。要使工人生活的改善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以內，庶資本家有利可圖，整個生產的順利開展才能得着保障。只強調發展生產而不願改善工人的生活。乃是剝削者的主張。這種主張不但違犯抗戰建國的利益，且亦違犯資本主義本身的利益。他們不願意知道：不改良工人生活，工人就沒有精力與時間積極參加抗戰，就不會有足夠的體力和精力從事生產和提高勞動效率。試問一個骨瘦如柴奄奄待斃的工人，還能談到工作效率和積極性嗎？在另一方面，只注意改良工人生活，無限制的改良工人生活而不鼓勵工人的勞動積極性與紀律，不顧公私企業的經營能否維持，亦是有害的錯誤的。這種主張可以使解放區公私企業因勞資關係的惡劣，工人工資的過高，勞動紀律的過分鬆懈而陷於停頓或遲滯。這是違犯民族利益的，亦是違犯工人階級自己永久利益的。因為這樣會使勞資雙方兩敗俱傷，會使解放區的鞏固與堅持，因生產的縮減與停頓而成爲不可能！

關於工作時間問題，根據陝甘寧邊區的施政綱領是十小時制，但以各解放區的生活條件來估計，除礦工外，工作時間一般是不能低於十小時的，否則以這樣的環境和技術落後的工業，斷難繼續發展或維持下去。

關於工資問題，在物價不斷飛漲的情況之下，爲了保持工人的實際工資在一定的水準上，爲了避免物價對於勞資關係和工人生活的影響，一些解放區多舉行半實物工資制。如果和戰前比較，各解放

區的工資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至於最低工資，因各地生活程度和物價漲率之不同，極難有硬性的規定，但一般規定每一個熟練工人的工資，除本人生活消費之外，要保證維持一人到一個半人的生活。

關於失業問題的措理，基本上依靠幫助工人就業，發展生產以擴大勞動僱傭，低利或免利貸款以推助工人組織合作社，同時動員他們參加抗日部隊。

解放區的工業勞動政策是貫穿着新民主主義的，牠照顧了工人又照顧了資本家；牠照顧了公營工業又照顧了私人企業；牠照顧了中小工業亦照顧了大型工業。在這裏，當然不是沒有重心的，

四 商業與金融政策

解放區的商業政策可用八個字來概括，這就是一對外管理，對內自由。

爲什麼要對外管理呢？因爲各個解放區都是與淪陷區犬牙交錯的。敵僞不斷地設法從解放區掠取物資；或者設法傾銷其不需要的物品於解放區的市場；但在大多數的場合之下對我解放區進行封鎖。這是我們在前面已敘述過的。爲了對付敵寇的盜取物資，爲了擊破敵寇的嚴密封鎖，爲了制止一些有害的物品之進入，進一步爲了使貿易能適應於解放區的抗戰和建設的需要，沒有管理是不能完成這些任務的。對外管理不是壟斷，因爲這是以全解放區的利益，是以公私商業的利益爲前提的，對外管理

更不是一割據」(如某些別有居心的人所說)因爲這是以打擊敵人，是以爭取抗戰之勝利爲目的。

爲什麼對內要自由呢？在長期的抗戰中，在敵寇的殘酷的破壞之下，解放區的物資是十分困難的。對於物資問題之措置，基本上要從提高生產着手，但鼓勵貿易，鼓勵商賈從外地運入物資，乃是不可少的。換言之，只有實行自由貿易才能刺激人民去生產，才能刺激商賈運入物資。這種政策是完全與官僚資本壟斷下的大後方正相反的。

自由貿易並不是自由到連囤積居奇亦不管，解放區對於囤積操縱是絕不留情的。在這兒，沒有官僚資本，沒有壟斷操縱，並且因爲民主政府的切實措置，所以解放區的物價，除了敵人的經濟攻勢在瘋狂進行的時候外，波動是不很大的。

對於商業的另一個貢獻，乃是合作社的廣泛發動與組織。運銷和消費合作社減少了商人的中間剝削，增加了生產者的利潤，同時又減輕了消費者的負擔，這對於社會購買力和發展商業都有極大的作用。

解放區的金融政策主要是以對敵作貨幣戰爲任務的。敵寇在各佔領區利用其所劫持的各省銀行的鈔票，不斷地擾亂我金融市場；同時又大量吸取我區的法幣以套買我國外匯。對於敵僞所發行的鈔票(聯銀票或新省票)，解放區民主政府根本採取禁用的政策，但對「七七」事變以前發行的舊鈔(如舊冀鈔)，則仍繼續允許它和邊幣按市價兌換，可是敵人沒有多久便停止使用各省省鈔，企圖將這些

舊鈔傾瀉入解放區，企圖使解放區的人民替敵人充當金融上的苦力。解放區抗日民主政府的對付辦法是借商人作運夫，把這些鈔票運輸到敵區去，換取貨物回來，而在解放區內則把這些省鈔貶值兌換，差不多保持着比敵區低二成的行市。晉冀察邊區曾用這種辦法在三四個月內肅清了幾千萬元的舊冀鈔和察鈔，粉粹了敵人的陰謀毒計。

爲了保護法幣，爲了使解放區的法幣不至被敵人所套取，大部份的解放區發行邊幣或抗幣（抗日貨幣）。這些邊幣或抗幣是以法幣作基礎的，邊幣與法幣之間，規定一種兌換比率。嚴禁奸商私運法幣現銀出境，但人民有正當理由，需要攜帶法幣（或雜鈔）出境者，隨時可以持邊幣到銀行換取法幣（或雜鈔）；人民有願儲藏法幣者，聽之，但不得投入流通界，致被敵僞吸收。這種金融政策打擊了敵人吸收法幣套買我國外匯擾亂我國金融的陰謀！

解放區的金融政策不但充滿着戰鬥性而且充分地爲人民服務爲生產服務。邊幣（或抗幣）的發行額決不會超過市場的需要，在空間上保持着適當的平衡，不使在某部份地區上造成局部的膨脹，而對於合作社在金融方面的作用又極力的予以發揮。農貸工貸等等，都是經過合作社的，它絕不會被奸商和富豪所利用。這麼一來，生產受到利益了，人民受到利益了。

五 財政政策

第一件事是廢除舊日的苛捐雜稅。但在一定的時期中保持了舊稅中某些比較合理的稅收。例如，田賦是有極大缺點的：稅率不是按土地的生產量來釐定，沒有免徵點，亦沒有累進率，沒有正確的地畝（錢糧）冊子，所謂「黑地」「空糧」及地畝與田賦間各種驚人的偏差，到處存在着。不過在統一累進稅還未實行以前，它在舊稅中還算是比較合理而可靠的一宗收入，故各解放區仍未完全把它廢除。烟酒稅和印花稅亦然。

第二是統籌統支，減少並消滅無計劃的、頻繁的、零碎的徵發和濫支。在支出上，先行量出爲入，然後量入爲出。因爲各解放區大都是農業社會，政府對人民的最主要的徵收是糧秣，而糧秣每年只徵收一次，故在量出爲入之後，在一個會計年度內，必須力求量入爲出。

第三是社會生產，貿易和金融是財政稅收的基礎，故財政建設首先應致力於發展生產，繁榮貿易和調節金融，亦就是說，要充實國庫，如果不照顧到整個國民經濟之發展，那是沒法持久的。前面所說的「以解決經濟問題作爲解決財政問題的前提」，就是這個意思。解放區民主政府的措施實實在在是這樣辦的。他們不但替人民解決經濟問題，不但盡量改善人民生活，而且輔之以機關部隊及學校的生產自給。以陝甘寧邊區而言，經過三十二年生產運動大開展之後，人民生活改善了，但陝甘寧邊區的財政支出，經過稅收（公糧、公草、貿易稅、鹽稅及公鹽代金、貨物稅）取之於人民者不及半數，

其餘都由機關學校部隊生產自給來解決，人民所負擔的公糧是逐年減輕的。邊區三十三年公糧由二十萬石減為十六萬石，就是明證！

第四是在稅收上，要照顧到貧苦羣衆的生活，同時要照顧到統一戰線的環境，因而「實行合理的稅收制度，居民中除極貧者應予免稅外，均須按照財產等第或所得多寡，實施程度不同的累進稅制，使大多數人民均能負擔抗日經費」（陝甘甯邊區施政綱領第十三條）。在晉冀察邊區從二十九年秋季起即開始以糧秣款三種形式徵收統一累進稅。統一累進稅實行後，除調劑出入口貿易保護邊區經濟的出入口稅和帶有財產登記性質的田契稅外，其他捐稅一律廢除，田賦亦停徵。

農業累進稅以土地爲計算單位，將財產與收入合計，各種不同質量和生產力的土地，以其平均可能的收穫爲標準，折成標準畝。自耕地以一個標準畝算一畝，稱爲一個「富力」；出租地（地主之地）以一個半標準畝算一畝（即一個「富力」），因地租不能超過百分之三七五（即八分之三）；佃耕地（佃農）以二個標準畝算一畝（即一「富力」）。假定一標準畝產八斗穀，並假定每富力應納稅一分，則自耕農若收穀八斗者納稅一分；地主若收谷（假定地租是三七五）四斗五升（即三斗加一·五斗）穀者納稅一分；佃農若收穀（八減三）乘二（即一〇斗）穀者納稅一分。地主在表面上納稅率較高，但因他不開支任何種籽、農具、牲口、肥料等費用，是純收入。

工商業累進稅是把資金和收入分算，三十年晉冀察邊區的分算辦法是：資金以二百元爲一富力；

收入以四〇元爲一富力（假定每年利潤率爲百分之二十），將資金及收入折算成納稅分數後按同一累進稅計算。

爲使赤貧的人民免負擔，特規定免徵點，收入、財產在免徵點以下者，免納統一累進稅，免徵點定爲一個半富力，這樣人民中有百分之八十要負擔政府的財政。地主以一畝半折一畝，又規定一畝半爲免徵點，則地主的免徵點爲二·二五畝，如是則老弱孤寡的地主及貧富出租土地者大半可以免徵了。工人免納所得稅；投資於工業、合作社及水利建設（如修渠、鑿井）等方面的資本，免納累進稅，工業與合作社只納所得稅不納資本稅。

第五是在支出上，解放區的經費極少用在行政費上。三十三年陝甘甯邊區的財政支出，行政費僅佔百分之十八；軍費佔百分之四十五（這是因爲國民政府停發八路軍軍餉之故），經濟建設經費，如農貸、耕牛貸款、青苗貸款、植棉貸款、運輸貸款等佔百分之十六；文教經費及社會福利事業，如衛生、保育、救濟等佔百分之十六，地方補助費佔百分之五。由此可見邊區政府的財政，大部份是用在抗戰和人民福利事業上。談到稅收機關的開支，只佔百分之四（三十二年）；公糧在徵收、保管、運輸的過程中，損失比例爲百分之一，而大後方的公糧，由貪污浪費而遭損失的比例竟達百分之六七十。這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財政政策的要點。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則我們可以說，解放區的收入是取

之有道，他的支出是用之得當的。人民出一百元，政府實際可得到九十六元；人民出一百元在抗戰建國事業上就可得到一百元的效果。這難道是大後方的官僚機構所能比擬的嗎？

x

x

x

就是因爲這些政策的正確，就是因爲這些政策在切實執行，所以，不斷被敵僞掃蕩，不斷受反動派攻擊破壞的解放區，在千難萬難中，逐步地展開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圖畫了！

第四章 戰時經濟的鳥瞰

一 烽火下的錦繡河山

研究戰時中國經濟的輪廓，可以從時間的發展上去着眼，亦可以從地區的不平衡狀況去着眼。用前一個方法，可以把「七七」以後的日子，劃成幾個時期，這是我們在第二章所敘述的。這一種從過程從運動從發展的研究法，可以使人對於八年的戰時經濟動態，有一個概括的史的觀念。但，注重在過程的發展的研究法，只能使人得到一個走馬燈式的敘述，只能使人知道某一時期的經濟現象如何，某一時期的經濟問題是以什麼佔重要，至於全國各地呈現什麼狀態，中國的錦繡河山，在日寇鐵騎的踐踏之下，變成了什麼樣子，那就非前章那種研究法所能回答的了。縱然在敘述的時候，對於某些問題亦嘗略略提到一點，但，這分明是不够的。因此，在過程的研究之後，我們必須進而研究戰時中國經濟，在地區上，是什麼一個姿態。

如果回溯到「九一八」瀋陽北大營的砲火，那麼，中國的領土，暫時可以分成二個區域。在一方面，是敵寇鐵蹄下的淪陷區的殖民地經濟；另一方面，是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自由中

國」的國民經濟。前一個範疇，包括了東北四省、和中國北部、中部、南部各淪陷區和陸沉了的孤島；後一個範疇，則包含了大後方和邊區解放區。這一個地區是對立的，是截然不同的。前一個區域，從戰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境況，淪入完全殖民地化的火坑之中，後一個區域，則是包含了大後方及解放區。在大後方，仍保留戰前那種社會性質，但解放區則已萌茁新民主主義的嫩芽。

二 鐵蹄下的殖民地經濟

淪陷區的經濟，當然與自由中國的經濟有別，但，淪陷區的本身，亦各不相同。有的地方，如東北四省，其殖民地化的程度就深一點；有的地方，如中國中部和南部，其殖民地化的程度，就沒有東北那末利害。其所以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最主要的有二：

第一是歷史條件。在戰前日資越有勢力，和日寇侵入較早的地方，殖民地化的程度當然深一點。東北四省在「九一八」以前，「滿鐵」在實際上已經成爲掌握黑水白山的經濟命脈的主宰了；日票已經成爲東北四省最有力的通貨了。再加以十四年的搜刮剝削，東北的人民自然過着更慘痛的奴隸生活。反之戰前日寇在中國中部和南部的經濟力量，遠不如英美，淪陷的時間又比較晚些，所以殖民地化的程度自然會差一點了。

第二是地理的條件。這個條件是不能與前一個條件分開的。敵寇在東北的勢力之所以雄厚，其原

因之一，是東北與朝鮮毗連。所以，日寇早就把它作為砧上肉，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了。一部近百年史，不是清清楚楚把這筆賬記上了嗎？因為地理上接近了，所以，它的勢力就更易侵入些。反之中國南部是接近香港的，戰前外資的力量，在這裏佔優勢的不是日本而是英國，所以，敵人縱然佔了香港，而廣東的淪陷區的殖民地化的程度仍沒有東北與中國北部那末深。

因為淪陷區殖民地化的程度不同，所以，我們必須把東北和關內淪陷區分開來研究。

一 「滿洲國」

東北淪陷了十四年。十四年中，敵寇在這塊土地上施行了毫不留情的掠奪。雄壯的黑水白山，竟成爲淪陷區中殖民地化最深的地方！

在農村裏，日本強盜在事實上已成爲封建領主。極大部份的土地，都已直接握在日寇手中。直接掌握東北四省的土地是「滿洲殖產會社」。該會社是由「滿洲殖產株式會社」改組而成的。三井、三菱與住友等財閥。皆是它的主要股東。該社計劃自一九三七年起分四期向東北移民一百萬人，五百萬戶，每期五年，第一期十萬戶；第二期二十萬戶；第三期三十萬戶；第四期四十萬戶。截至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止共計移人二十四萬人。移民的對象爲偽「三江省」地帶，小興安嶺南麓、齊齊哈爾北松花江上流、黑河環環、濱綏線、「京圖線」及拉濱線、大鄭、洮索線及遼河一帶，計一千萬町（合一千

六百萬畝或一萬六千萬畝)。這個面積佔東北可耕地面積三分之一以上。從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敵會進行過六次移民，差不多強佔民田十八萬畝。「滿拓」成立之後，就有了那個二十年計劃。這個計劃雖未完全成功，但它對東北農村的打擊仍是很大的。例如嫩江省全省耕地面積是八、五六八、七六九畝，其中，「滿拓」及「開拓」所佔的地皮是三、八二五、一五二畝，佔總面積百分之四十四點六。移入的份子多是退伍軍人，他們是長於殺掠的。他們到了「目的地」之後，便武力的強佔農民的房屋與土地。除了移民之外敵寇還用「法律上」的霸佔，浪人小谷節夫和熊谷貫所組織的「昭和農業會社」就是例證。在這種情形之下，有的農民武裝起來反抗：有的則含着眼淚離開了他們親愛的土地。

失去了土地的農民，除了參加義勇軍之外，有些只好替敵寇的「拓殖會社」做僱工，或者到城市去賣勞動力。那些尚未離開土地的，則在捐稅高利貸和農產統制之下，流出他們的稀薄的血液。別的捐稅暫且不說，就是敵人移民的經費亦是由偽滿「支出」的。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三日通過的「開拓」經費三千五百七十餘萬元，那不是從東北同胞身上刮下來的嗎？吮吸農民的血液以滋養其從農民搶奪得來的土地，這是再毒辣亦沒有的了。高利貸方面，敵人組織了金融合作社。這個組織是遍於各縣的。這種貸款的利率，實際至少高至二三十分。因為它是以抵押「地照」賤賣青苗和地主富農的轉借為內容的，最嚴重的是糧食管制——即「糧穀出荷」。所謂「糧穀出荷」就是以官定價格按照指定

數量將食糧售與日寇控制下的偽政府。例如農民每耕地一垧（十畝），預計可產糧一噸，敵偽之統制機構即按照此預計之產量（並非實際產量），勒令「出荷」七八百公斤，留下二三百公斤作為農民的食用。吉林（以敵偽劃分的省區為標準）來說，該省年種大豆七十五陌（每陌合二千平方米），預計可產八十五萬噸，出荷數竟達七十萬噸；水稻年種七十八萬陌，麥產量約為一百七十萬噸，出荷數為一百萬噸，另種高粱、苞米、穀子共一百七十八萬陌，產量約為二百二十萬噸，出荷數則為一百一十萬噸。但「出荷」時限異常促迫，稍遲必罰。一般說來，農民不待收割完畢，即須自備車馬伙食，將所指定之出荷量，星夜悉數送往指定的交易場。這些場所，有遠至七八十里者，冬令積雪，常凍餒至死；如果收穫量不足指定之出荷量，更須自購或借貸補足。收穫者兇悍無情，大秤收進；農民必須額外多攜糧食，以備補足，稍事分辯，必立遭鞭撻。「出荷」所付之官價，與市價相差很遠。以大豆為例，農民「出荷」一百公斤，僅得款十七元，但市價得賣得二百元；而且農民出荷所得之款，必須儲蓄百分之二；餘款由敵偽配給棉布。通常出荷大豆百公斤，配布四丈，每丈付款四元，合十六元，加以所徵儲金百分之二，農民已分文不名，四丈棉布僅足縫單衣三襲；若所需得多，則須向黑市求購，黑市棉布每尺三十五元。這樣算一下，出荷百公斤大豆之農民，所獲代價之全數還不足購半尺布。除這種出荷之外，農民尚須忍受敵偽隨時頒行的「報恩出荷」和陸續不斷的苛捐雜稅和非法攤派。在這種剝削之下，夫婦或父子共用一條褲（此褲僅供出外操作者穿着）的事情，便成為必然的了。

多年中敵偽鼓勵農民種稻，然同時禁中國人民吃米、偷售私食，均被列爲「國事犯」，所有大米悉供敵國軍民食用，僞滿一些大漢奸亦分享到少許。一般人民則厲行配給制度，所配者爲高粱、棒子麵、豆餅麵等，每人月給八公斤。這是城市方面的情形；其在農村，卽此亦不可得。農人經常食物爲藜菜土豆。這樣的剝削壓榨，使農民沒法以種地維持生活，而軍事上的強迫勞役，更損害農時和生產。故在十四年中的敵偽統治之下的東北耕地，面積雖增加百分之三十，而其生產力則反低百分之三十。

按僞組織的法令，二十歲至二十三歲之人民，均有應徵「國兵」的義務；不合國兵標準者，則服勞役（服勞役的年齡自十七歲至五十六歲），勞役的種類有二，卽「勤勞奉侍隊」和普通勞工。普通勞工又分爲三種，卽「緊急供出勞工」；「行政供出勞工」和「軍需供出勞工」，而對僞組織之中下級職員，則有所謂「官吏挺身隊」。「國兵」待遇尙優；勞工則備受虐待，而從事國防的作業的，常於工程完了之後，慘遭殺害。三十三年全東北共做勞工一百二十萬人；三十四年上半年則達三百萬，病死虐死者平均爲百分之二十。

十四年中，經過這種剝削與壓榨，東北人民的一點稀薄的血，亦幾乎被敵僞咀吸光了。到了蘇聯紅軍解放東北的時候，東北人民這種出人意料之外的窮苦情境，才大白於世界。

這一切，不是證明日本強盜事實上已成爲東北的封建領主麼？不是證明東北的農民已經淪爲它的

農奴麼？

工礦方面，敵佔滿洲以來，境內已設多數股份公司，掠奪民營各種經濟事業。此等公司的最後股本，是來自偽滿政府（實即關東軍司令部），南滿鐵路（敵寇的半官事業）與日本政府，尚有一部份股本是來自敵國各財閥。從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在未引起關東軍軍閥之嚴格軍事統制的限度內，對「滿」投資的增加，極為顯著。就是「七七」事變之後半年，關東軍進行嚴格的軍事統制以後，這種趨勢並未有所削弱，不過，重心從「滿鐵」移轉給「滿洲重工業會社」吧了。

「滿洲重工業會社」成立於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這個會社是暴發戶鮎川義介的機關。鮎川是與關東軍接近的。滿鐵與關東軍激烈衝突的結果，關東軍便以全力支持鮎川。附屬於「滿鐵」的工礦山，都轉移給這個會社了。就是「滿鐵」以外的重大產業，以及各主要煤礦（撫順除外）等，和一些新創辦的事業，如飛機汽車之製造廠等，亦委交鮎川經營。計該會社所經營的部門有鋼鐵、輕金屬、煤礦及飛機汽車的製造，昭和十三年分設滿洲礦山，滿洲飛機製造及東邊道開發會社等子會社，到昭和十五年，實收資本共達七萬萬餘日圓，子公司達十個，對於其他會社的投資亦屬不少，如本溪湖之煤鐵公司就是一例。事實上，鮎川的「滿洲重工業會社」已成爲統治東北的主要力量了。

除了鮎川義介之外。日本國內的財閥自「七七」事變後在東北的投資亦很積極。太倉財閥擴大「本溪湖煤鐵公司」、「日清製油廠」、「鴨綠江製紙廠」、「共榮麵業公司」的資本，增設「本溪湖

特殊鋼公司」、「本溪湖洋灰廠」，並投資於「滿洲林業公司」與「奉天兵工廠」。三井財閥則擴大「三泰油房」、「滿日亞麻紡織廠」、「東洋棉花公司」與「王子製紙廠」的資本，組織「滿洲煙草公司」、「滿洲小野田洋灰廠」、「日滿製粉廠」、「日滿木漿公司」、「滿洲豚毛工業公司」與「熱河礦山公司」等。至於直接間接的投資則有「日滿鋼材工業公司」、「奉天製作所」、「滿洲合成燃料公司」、「滿洲汽車公司」、「滿洲拓殖公司」、「鮮滿拓殖公司」及「奉天兵工廠」等。三菱財閥則擴大日光玻璃廠的規模並創設「滿洲機器會社」、「滿洲光學工業會社」、「滿洲Pulp工業會社」及「康德吉租會社」，直接間接的投資，有則「滿洲曹達公司」、「國華橡皮工業廠」、「滿洲拓殖公司」、「滿洲汽油公司」及「滿洲火災海上保險公司」等。住友財閥則創立「滿洲住友金屬工業所」、「滿洲通信機公司」，投資方面主要有「滿洲航空公司」與「滿洲拓殖公司」。淺野財閥則創立「大同洋灰廠」、「滿洲淺野石板公司」、「滿洲石棉公司」、「瑋春砂金公司」等。安田財閥則設立「滿洲興業公司」、「滿洲製麻公司」及「康德不動產公司」。儘管關東軍與財閥之間，有一點不協調，但軍閥畢竟是保障財閥的利益。

敵寇財閥的經濟據點，是星羅棋布地遍於東北四省。在這十四年中，華人所經營的廠礦，是完全被敵人攫去了。以煤礦為例，東北規模較大的九個礦——鶴岡、本溪湖、奶子山、裕東、八道壕、西安、金溝、北票及復州灣，不是華商商股，便是省資。「九一八」事變以後，完全被敵人佔領了。敵

寇的殖民地化中國的政策，是不許中國的民族資本存在的。

在這十四年中，敵寇的確在東北掠奪了不少物資。表面上，人們所看到的是敵人的投資開發，與年俱增；舊廠的改造和新廠的創設，日新月異，但這種開發，完全是一種盜取掠奪。全東北的鐵礦，被開發的有四十七座，一九四四年被咀吸的生鐵達三百九十八萬噸；全東北的煤礦，被開發的有一千一百一十九座，一九四四年被咀吸的煤產達二千六百六十二萬六千七百零四噸。此外，銅的產量每年達一千七百五十萬噸，鎂六十六萬餘噸；火粘土十五萬噸。敵寇之這樣開發物資，完全是爲了配合敵國經濟之需要的。例如東北每年鋼產最少達一百八十五萬噸，但軋鋼量每年不過六十萬噸，其餘三分之二的鋼量，均運往日本國去。同時，木粕每年產量約爲十四萬噸，但這宗木粕並不用於東北而係運往日本，以供其人造絲及造紙工業之用的。東北一切產業的所有權、控制權，完全握在敵人手中；東北一切物資的開發，完全是爲了日本，爲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的需要。單從這一點，東北經濟的殖民地性質，難道不明白麼？

除此之外，偽滿中央銀行是敵人掠奪東北人民的金融機器；它所發行的大量偽鈔，騙換了東北人民不少的物質；它們密佈在每一縣份的金融合作社，則爲加強高利貸商業資本深入農村的武器。至於這十四年中的捐稅，則是露骨地對東北各界人民劫奪的，它的支出則在於鞏固它在東北的統治和加緊它對東北人民的剝削。在這裏，不知灑了多少血淚，不知包含了多少辛酸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的八月，蘇聯紅軍和華北的抗戰部隊進入東北，結束了十四年日寇在東北的統治，清算了這一筆深沉的舊賬！東北新生了，它將從日本強盜的鐵蹄下翻身，它將從殖民地經濟中解放出來！

二 關內淪陷區

關內淪陷區是指『中國北部』中部與南部那些在敵人鐵蹄下的地區而言。由於歷史條件與地理環境之不同，這些地區的狀況亦是不一致的。例如中國北部淪陷區中敵寇的經濟勢力，比較其在中部南部者為強。因為抗戰以前，敵人侵略華北的經濟據點，已經發展到驚人的程度了；而在地理上，這塊地方又是與東北和朝鮮相近的。這些條件，便利於敵寇在「七七」侵華以後的掠奪，但這絕不能說，中國北部，中部以至南部各淪陷區的經濟性質有什麼基本上的差異。在本質上，牠們是一樣的；牠們同樣從半殖民地淪為日本強盜的殖民地。

關內淪陷區殖民地化最主要的一點，是日本強盜在經濟上佔着絕對優勢。這種優勢表現在：

(一) 敵寇以掠奪的方式，迅速使土地集中在它的手裏。敵寇所到之處，不論在中國北部也好，中部、南部也好，農民的土地多被霸佔。兵營、食房、碉堡、飛機場、封鎖線以及新建築的鐵路和公路，都是從民間奪取地基的。而爲了加強淪陷區的統治和減輕國內及朝鮮等地的糧食等等，敵人便積

極實行移民。七七事變前，在華敵僑人數，只有八萬六千餘人，七七事變後，便大事增加，截至一九四一年秋，就增加到六十七萬餘人。其中以中國北部為最多，中部次之，南部又次之。這些移民所耕種的田園，所居住的房屋，都是從農民手裏奪去的。這種現象，在山東一省，來得最利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台灣與朝鮮的移民，移入山東的已達十五萬。同時，日寇又計劃把偽滿全部敵僑移往中國北部而把朝鮮敵僑移住偽滿，且已有大批敵僑進關了。其在中國中部敵寇移民的惡劇亦不斷在上演，江南淪陷之後，敵人便在真茹、大場、吳淞、楊思橋、閔行與龍華等處，武力強佔民田，分配給日韓移民。除了移民之外，敵寇又以暴力幫助財閥在淪陷區的會社，進行土地的掠取。例如「中日實業公司」經過偽政權之手，沒收了過去由段琪瑞等出資經營的軍糧茶堤兩個大農場（共五萬六千萬畝），並計劃侵佔冀東、津浦路沿線滄州一帶，山東黃河下游一帶及山西河南等處民田，合計二百萬餘町，即三千四百餘萬華畝。北平的偽中央農事試驗場，曾在德縣與唐山強佔了不少民田；「鐘淵紡織株式會社」以六百萬元的資金，利用永定河的水源，強佔南苑一帶民田，開闢一個大規模的農場；「冀東種殖公司」所組織的「東洋民生農場」，其所霸佔的民田亦達幾萬畝。一九四〇年日偽合辦的墾殖公司成立後，又圈定冀省沿海新田一萬頃，冀東沿海地區七萬頃。在這些被侵佔的地區上，農民與地主是被驅逐的，敵人所執行的是「近代的殖民地的開發方法」。能够殘留在這些土地上面耕作的農民，實質上乃是敵寇的墾殖會社的農奴而已。在某些地方，敵人爲了誘騙一部份地主充當牠的工具起

見，亂開一些空頭支票。例如在晉西淪陷區敵人規定：「地主與佃戶，每年租票仍照二十五年以前辦法清理，不得藉端減少或扣除，或還地不耕事情」；苛嵐被佔時，敵人亦維持舊的主佃關係，即：對半分，四六分，和三條腿（佃戶得三分之一地主三分之二）。在其他一些淪陷區，敵人亦常採用這種辦法。總而言之，敵人在淪陷區中所造成的土地關係是以土地集中在它的手裏為內容的；它的經營方法是「前資本主義的開發方法」與「近代的殖民地開發方法」兼施並用的，它的根本目的是在使淪陷區成為牠的附庸，不但供給它以糧食、羊毛和棉花，而且供給它以巨量的勞動力。在這種情形之下，淪陷區的農村是急速地向着殖民地的发展方向發展了。

（二）敵寇不但強佔淪陷區人民的土地，而且在「徵發」與依價「收購」的辦法之下，掠奪農民勞動的結果。所謂「徵發」，就是在華敵軍給養困難時「就地取糧」的辦法。所有在華日寇官兵所需食米、菜蔬、肉類、雞蛋、香烟、馬乾等等完全恣意向淪陷區人民「徵發」。至於「收購」，係就日寇所需，隨時透過華北的「食糧公社」和華中華南的華商總會和各種「物資販賣組合」，以低價搜刮棉花、小麥、大豆、雜穀、茶籽等產品和皮革、蠶絲等物資。這種辦法，使那些尚保存土地的農民喪失他們的大部分收穫。使一些中小地主亦喪失他們的一部份收入了。

（三）敵寇對於淪陷區的民族工業，却掠不遺餘力，它的二個獨佔的「國策會社」，完全是以劫掠為前提的。在這裏，我們無妨給它算一筆賬——「上海」、「日華」、「東洋」、「和豐」與「鐘

淵」幾個紡績株式會社，瓜分了淪陷區中六十多個華商紡織廠；「日清」、「日本」、「日東」等九個製粉會社，已瓜分了淪陷區中五十多家華商麵粉廠；「三井」與「盤城」、「小野田」、「淺野」幾個水泥會社，已瓜分了淪陷區中的華商洋灰廠；「三井」、「三菱」、「佳友」、「安田」已瓜分了淪陷區中的鐵道；三菱一口吞下了「鴻昌」、「合興」、「老公茂」與「大中華」四個造船廠，「日清航船會社」則搶奪了招商局大半的船隻。這只是幾個顯著的例子而已。在搶劫與摧殘的情況下，敵寇便建立起它在淪陷區中工業獨占的局面來。

敵寇在淪陷區中的產業獨占，是以「華北開發會社」與「華中振興會社」為主體。「華北開發會社」成立（一九三八年十月）之初，僅有附屬公司五個單位，嗣又增設「龍烟鐵礦」、「華北鹽業」、「華北礬土礦業」等公司，二十九年又合併興中公司及其附屬會社，規模愈大。該公司資本五萬萬四千九百萬元，實收二萬萬五千六百四十七萬五千元。該公司的附屬公司共達十七單位，伸及鐵、煤、鹽、棉花、電力與交通各方面。這就是說，華北的煤、鐵、鹽、電力與交通是完全握在敵人手裏的。其在中國中部，敵寇以「華中振興公司」為統制這些地區一切經濟事業的大本營。二十八年仍為整頓時期，二十九年便開始正式活動了。實收資本，則三十年達一萬萬五千餘萬元，其附屬的公司共十三個單位，伸入到煤、鐵、鹽、蠶絲、水產、水電、煤氣與交通各方面。在中國中部，敵寇雖因器材與資金的關係，沒法像在中國北部一般，進行「普通開發」，而不得不退一步採用「重點開發」的計劃，

但實際上，長江流域淪陷區的經濟命脈，是完全執在敵人手裏的。就是那些規模較小未被敵人奪去的工廠，在敵偽的統制政策之下，原料與市場，皆大受限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他們向海外添購機器購買原料，也不能如願以償，日本對於內地原料，沒有一樣不實行分配制度的。分配的比率不是大量輸日，就是供給在華日廠，他們所能分配得到的只是殘餘而已」（「中國工業」第七期）。

不管敵寇營業的情形如何，不管敵寇咀吸物資的「成就」之好壞，淪陷區工礦業的命脈之握在它的手裏，是一件明顯的事情。敵寇在淪陷區工礦業所佔的絕對優勢，不是這些地區殖民地化的另一證明麼？

（四）除了直接的搶劫掠奪之外，敵人還通過漢奸政府的統制機構去掌握物資。以華中為例，它的統制機構計有：偽物資統制審議委員會、偽全國商業統制會及偽物資調查委員會。偽物資統制審議委員會隸屬於偽行政院，秉承敵寇意旨，負責統制物資之審核及與敵方聯絡，為偽商統會的審定機關；偽全國商業統制會亦隸偽行政院並受偽物統審會的監督，其任務是搜括物資供給敵寇；至於偽物資調查委員會則為一調查統計的機關，即以調查上海所藏物資供敵人抉擇為任務。在這裏，偽商業統制總會的規模與權力最大，它包括了核心組織，下層組織及武漢分會三大系統。所謂核心組織尚包括偽方組織及敵偽合組二個系統。偽方組織包括什麼監督官辦事處與收買棉紗布辦事處等等；敵偽合組的機構有油糧專業委員會，麵粉專業委員會，糖業專業委員會及棉業專業委員會；所謂下層組織有屬

於偽方的各地區同業公司聯合會，有敵方的各業聯合會，在這些機構中，漢奸只在表面上佔一定地位，實際大權完全操在副主任委員的日本人手中，特別是那些直接控制物資的機構，更是如此。敵人看中了各地同業公會之重要；故拚命在各地成立各業同業公會，進而組織各業同業聯合會，最後集中於全國商業統制總會。重要的商品同業公會聯合會在華中共成立了二十四個，即火柴同業聯合會（統屬了火柴、捲烟、火藥及皂燭等業），化學工業同業公會（統屬了化學工業、化工原料、製藥業、顏料業、脂油業及雜貨業等），皮革同業聯合會（統屬了原皮，製革及皮革製）品等業毛紡業，同業聯合會（統屬了原毛業、毛紡織廠及絨線呢絨號業），百貨業同業聯合會，皂燭業同業公會，金屬業同業聯合會（統屬了機器業、鋼鐵業、金屬絲線業、非鐵金屬業，冶鑄業、打鐵業、醫療機械業及五金製造業等），玻璃同業聯合會（統屬玻璃廠業及玻璃號業），酒精業同業聯合會，麻業同業聯合會，絲綢業同業聯合會（包括繭行、絲廠、絲織廠、絲號及綢緞號業），菸業同業聯合會，棉花業同業聯合會，棉製品業同業聯合會，電器業同業聯合會，煤業同業聯合會，橡膠業同業公會，此外尚有各地區的茶業、食油、蛋業、畜產、糖業、雜糧及麵粉等同業聯合會。敵偽這種組織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它把製造的工廠和運銷的行號，完全控制在手中，敵人是何等週密地在進行搜括啊！

偽商業統制總會及其下面的機構，完全是敵寇搶劫物資的工具，例如三十二年敵寇爲了要劫取上海的海紗布，乃由汪逆公佈「收買棉紗棉布實施綱要」。並將執行權交給敵人所主持的偽商統總會，以

二十支藍鳳紗每包一萬元，龍頭細布每疋三百七十五元的價格，強行收購。收購所得的紗布，絕大部份是運到日本去的，配給只寫在紙上，這種公開的盜取，是把中國人民的財產，當成敵人自己的囊中物了。

(五)金融方面，敵寇在淪陷區裏，大大小小，設立了二十幾家銀行。比較重要的有四家。這便是偽蒙疆銀行（二十六年成立），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廿七年成立），偽華興商業銀行（廿八年成立），和偽中央儲備銀行（三十年成立）。這四家都是享有發行權的，不過偽華興銀行自偽中央儲備銀行成立之後，便放棄此權。此外，在張家口除偽蒙疆銀行之外，尚有偽察南實業銀行；在歸綏設有偽蒙古聯盟實業銀行；在大同設有偽晉北實業銀行；在天津，敵人將舊時河北省銀行改為偽河北省農民銀行，在通州有偽冀東銀行；在蘇州有偽江蘇地方銀行，偽蘇民銀行與偽江南產業銀行；在蚌埠設有偽商業銀行與偽「友民」銀行；在開封有偽河南實業銀行；在濟南有偽蘇興銀行；在廈門有偽勸業銀行及華南信託公司；在漢口設有偽中江銀行等。這二十餘家銀行就是敵寇的二十餘家咀吸淪陷區同胞的血液的機器；這些機器是與敵寇二個什麼國策公司轄下的二十餘個子公司配合的。那幾個能發偽鈔的就以紙幣騙取同胞們的財物人力；那些沒有發行權的亦盡了為敵寇作會計的作用，把注敵寇工商機關的金融。

敵寇畢竟是把淪陷區當作獨佔物的，因此，林立的金融機關仍不是它的嫡子，它的主要的「流通

工具」乃是日鈔與軍用票，特別是中國南部與中國北部軍用票的力量大，它們是壓倒漢奸的偽鈔的。這些日鈔與軍用票，完全是沒有準備的廢紙。用廢紙來剝削中國人民的血汗財物，是敵寇以戰養戰的毒計之一着，同時又是敵寇殖民地化淪陷區的一個重要內容。因為帝國主義使殖民地底貨幣成爲它的附庸，是殖民地經營中不可少的步驟。只有在殖民地貨幣同化於宗主國之後，主屬國之間的貿易以及政治經濟上的投資，才可能圓滿開發。當然，日本強盜在淪陷區中所幹的勾當，是談不到什麼「文明經商」的，它所幹的，只是公開的掠奪，公開的搶劫，公開的用廢紙來騙取財物，所謂把淪陷區的貨幣成爲它的附庸，只是一種點綴而已。數百年前，美洲與非洲的劫掠的慘劇，再度在神州「上演」了。

(六)除了「徵發」、「收購」等辦法之外，敵人還加徵什麼所得稅及各種貨物稅、消費特稅、通行稅等等。如在廣州，有所謂臨時地稅、糖類專稅、烟草專稅、紙類專稅、臘味專稅、營業稅、屠宰稅、筵席捐、香燭捐、紙寶捐、烟酒牌照稅、油類稅、顏料稅、皮稅、紗綢稅、物資搬運稅及轉口稅的征收。更惡劣的是：鴉片館、賭館及妓窩，遍於淪陷區的每一角落。鴉片是公然督種抽捐，並勒收着「售吸稅」；賭館妓寮則由包商當作企業來經營。敵僞是用勇盜女娼的辦法去維持其鎮壓淪陷區民衆的開支的！

這就是過去八年，華北華中以至華南在敵寇鐵蹄下的殖民地經濟，在程度上，或許這些地方的殖民地化沒有東北之甚，但較諸「七七」以前，當然是大大不同了。半殖民地當然不是安樂窩，但中國

人民的經濟活動，仍有某種程度之伸展的餘地。在日本強盜的鐵蹄之下，一切都沒從談起了，「工業日本，農業中國」，中國的民族工業固然不容許存在；中國的農業亦何嘗能舒展得開？據敵昭和十八年版之「北支年鑑」及「滿鐵北支年鑑」公佈的數目，河北、山西、山東及蘇北一部：小麥、小米等十種作物的耕種面積，一九四一年較戰前減少百分之十六，共三百五十萬公頃，約五千二百餘萬畝。在敵佔領區中，土地荒蕪已成普通現象。華北淪區有些地方，荒地竟佔全村耕地面積二五%，山東臨城三個老「愛護村」荒地面積佔全耕地的一半；在冀南，農村荒地之佔全耕地的一半的，更爲普遍。荒地擴大使農產減少；地質變劣亦使農產減少。地質之變壞，是由於勞力缺乏與敵之擾亂破壞，水地變成旱地，兩季變爲一季，上等地變爲中下等。龐白土與小西漲兩村各等土地的產量，一九四二年時，水地中的上等和中等下降百分之六十，下等地下降百分之五十；旱地中，上等地下降百分之二十八，中等地下降百分之四十，下等地全部荒蕪。又據太谷和順一帶調查，一九四二年水地每畝產量比一九四〇年降低六〇%，比戰前降低八〇%，旱地降低三〇%至六〇%。以綿產而言，華北各省棉田面積，在一九四〇年時僅及戰前二二%，收穫額則爲二〇%，華中之江浙兩省一九四〇年之棉產僅及戰前四七%。耕地縮小，產量減低，而敵寇的剝削掠奪又與日俱增，人民的生活當然日益惡化了。山東臨城在一九四二——四三年，不少新老愛護村有百分之八十的富裕中農，吃糠過活；廣東潮汕旱災的時候，淪陷區的潮安一帶，居民竟至把馬糞中一些尙未消化的黃豆當作食品。讀者們，這是什麼一

個世界呢？以淪陷區的一般情況而論，各社會階層的經濟發展有一個總傾向——都在下降，都沉入破產的深淵。「地主的收入（利息、地租及商業等）比戰前減少少的比例，比那一階層都大；富農在土地經營上所受的打擊摧毀比較厲害，下降程度亦不亞於地主；中農經不起破壞，破壞之後不容易恢復，他們是經常受敵人打擊掠奪的，特別是人力負擔最重；貧農經濟上所受摧毀與中農同，他們受了打擊恢復生產更不容易，離鄉外出者較多；僱農實際工資降低（太谷調查低四倍），生活最苦，無法顧家，由於農村僱傭者總量減少，有不少改為短工，生活更加漂浮無定」。由此可見，淪陷區的農村是嚴重地在破產着！淪陷區的人民是怎樣地在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了。

終於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日本強盜請降了。大好河山，又歸我有，祈望了八年的淪區同胞，又重新親見天日了，可惜在敵寇的無情抉削之後，又遇到一些特殊人物的掠奪，收復區的經濟不但未見改善，反而有水深火熱之勢。這是很可痛心的！

三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後方

西南係指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及湘西各省區而言，西北係指陝西、甘肅和寧夏等省而言。西南同西北雖同為大後方，但它們的經濟狀況，並不完全一致，所以，在敘述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分開來說：

西南各省的社會經濟，在抗戰以前，是頗為冷落的。它們的冷落，表現在現代產業的缺乏；表現在手工業佔着絕對優勢。國民政府工廠檢查處於民國廿四年根據修正工廠法第一條，對各省市進行調查統計，計合於工廠法之工廠為六千三百四十四家，在這裏，廣東、廣西、四川、貴州四省並未算入，而有數字的湖南，只有三十九家，雲南只有十六家，合共五十五家，佔總數百分之〇·八二，在這個時候，四川、貴州並不能說連一家工廠也沒有。以四川言之，據四川省政府所出版之「四川省概況」，二十五至二十六年間，資本在一萬以上的工廠，全省只有四十八家，其中超過二萬元的只有二十二家。但以設備而言，多係舊法的手工業生產。嚴格說來，他們只能說是手工業工場而已。如馳名國內的「內江之糖、富順之鹽、成都之錦、夾江之紙、隆昌的夏布」，那一項不是手工業生產呢？貴州的情形，比四川更為落後。因此，我們可以說：戰前西南的新式工業，真是「寥若晨星」了。

整個的中國產業是落後的，西南各省自然不能例外，但相對言之，西南各省是比東南落後的，因為東海沿海還有幾個工業據點。在貧弱的中國裏，偏在的狀況，不平衡發展的狀況，是分明存在着。抗戰的洪流把這種偏在的情況衝破了。

衝破這種偏在的重要契機是沿海工廠的內遷。內遷的工作，是從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以後開始的。經過了綿長的旅途，經歷了無數的艱辛，直到二十九年，遂完成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工業大移動，除公營國營的廠礦不計外，內遷的工廠共計四百四十八家，機料七萬九百餘噸，技工一萬二千餘

人，以各地遷移的廠礦而論，上海遷出的民營工廠一百四十六家，機料一萬四千六百餘噸，技工二千五百餘名；蘇州、無錫、常州一帶之工廠，絕大部份，沒有遷移；南京、九江、蕪湖，僅少數遷移成功，濟南、開封各遷出一家，鄭州及許昌等地遷出的亦屬少數，廣州方面的廠礦，大半資敵；惟武漢附近之拆遷，比較澈底，計該地共遷出一百六十餘家；省營各廠遷出六千餘噸。此次內遷運動，若按廠礦性質分類，機械工業約佔遷入總數百分之四〇·四；紡織業佔百分之三一·六五；化學工業佔百分之二·五；電器工業佔百分之六·四七；飲食品工業佔百分之四·九一；鋼鐵業佔百分之〇·二四；礦業佔百分之〇·七八；文化教育工業佔百分之八·二六；其他佔百分之三·九七。比較起來，機械、紡織及化學三項的比重，佔得較大。至於遷往省別，以四川為最多，計佔內遷總數百分之五四·六七；湖南次之，佔二九·二一；陝西佔五·九〇；廣西佔五·一一；其他各省佔五·一一。若以內遷器材而言，於七萬噸中，四川即佔四萬五千噸；湖南陝西各佔一萬噸，廣西佔三千噸。從廠數與器材的分佈上，我們可以看出在這三年半的時間中，岑寂的內地是驟然熱鬧起來的，工業的遷移，打破了過去那種偏在的狀況。

在這個時期，除戰區工廠內遷外，後方新設的工廠，為數亦夥。據有關機關所發表的統計，自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大後方新設立的工廠，約有三千七百家；資本總額為二十萬萬元；工人共約二十四萬人；動力為十四萬匹馬力。此項數字已與二十三年間上海工廠的情形不相上下了。如果進一步來分

析，在這三千七百餘廠中，開工在二十七年以前者不過五百九十家，約佔全數百分之十五；在二十七年開工者有二百四十家；二十八年為四百六十六家；二十九年為五百八十九家；三十年為八百四十三家，合共二千一百三十八家，約佔工廠全數百分之六十。若以省別而論，要以四川的增長為最速。二十七年以前，全省工廠不過二百四十家，但至三十一年年底，即增至一千六百餘家，五年中較原數增加七倍以上；其次為湖南，二十七年前只有工廠九十餘家，五年中增加四倍；再次為陝西，二十七年工廠數為七十餘家，三十一年年底共增加四倍強，雲南貴州等省，大體亦如此。

若把內遷與新建的廠礦一齊計算起來，廠數方面，四川最多，約佔全數百分之四十四；湖南次之，佔百分之一三·三四；陝西佔百分之一〇·二四；廣西佔百分之七·七七；雲南佔百分之二·八二；貴州佔百分之二·九八；甘肅佔百分之三·六九。資本方面，仍以四川為首，佔總數百分之五八；雲南佔百分之一〇·八；廣西佔百分之七·八九；陝西佔百分之五·四三；浙江佔百分之四·七一；湖南佔百分之三·九一；甘肅佔百分之三·一九；貴州佔百分之三·三八。無論從廠數來看亦好，從資本的分佈來看亦好，西南的民營工業在全國的比重上是佔着較大的比重的。

不但民營工業的情形如此，公營工業的情形亦是如此。據某機關的統計，在公營資本中，四川佔百分之三六·六八；雲南一〇·三；廣西六·八三；浙江四·五八；甘肅二·七七；陝西二·二五；貴州二·〇三；湖南一·四七。民營工業和公營工業都把重點放在西南。在過去，這些地方只有樸素

的原野，只可聞到休閒的牧歌，現在已經疏疏落落地點綴着烟窗，已經若隱若現地可以聽見馬達的節奏了！

在金融方面，抗戰以前，西南各省的銀行是很少的。貴州在昔本身沒有省銀行，外省銀行亦僅二三家。抗戰之後，四行與其他商業銀行，挾其雄厚的資本，深入內地遷移總行或創設分行。在這個期間，新設或由錢莊擴大的銀行，亦屬不少。而各地縣銀行之普設，尤為值得注意之事。以四川一省而言，縣銀行就達六十五家（三十一年），為全國之冠。金融事業之發達，如果在正常狀態之下，那是大有功於工礦與農產的。可惜的是闖入後方的金融業，在實質上只發揮商業資本的侵蝕作用。所以金融事業的畸形發展；只是意味着產業資本的困迫而已。

交通方面，在種種困難的局面之下，擴充了內河一些航線——如沅江線、嘉陵江線及金沙江線等；完成了一些公路——川黔、川陝、川湘、川滇、川康等公路，都已開車，有名的滇緬公路和史迪威公路亦是在抗戰以後動用數十萬民工造成的。戰時的交通建設顯然是落在客觀需要之後，但較諸戰前，分明是開展了。

西南的經濟建設，相當地改變了過去偏在的現象。這一成績，是工程師、廠家與職工努力的結晶。實在是值得讚揚的。可是，我們却不能忘記大後方產業的弱點。以煤產來說，綜合川康、滇黔、湘贛與陝甘豫四個區域中二十四個煤礦，每年的最高產量為二百餘萬噸。這個產量，不及開灤煤礦局

一年產量之半數；比焦作之中福公司的年產只多一倍。這些數字。很明白的告訴我們：西南大後方的經濟建設雖有相當的進展，但進展仍是有限的。特別是民國三十三年秋天湘桂戰事的潰敗，打擊更大。計中南區的工廠共有九七七家，佔後方工廠百分之二七·八三，而此時獲得疏散貸款的工廠，僅有七十多家（桂林三十八家，衡陽二十八家，祁陽、柳州兩處一十二家，其他一家）。運輸之器材，大部份滯留於金城江，少數至獨山都勻或貴陽，且有停在柳州宜山各站沒法西移的。據重慶商務日報所載，湘桂工廠內遷器材到達金城江者四千多噸，到獨山者七百七十五噸，到都勻者七十一噸，到貴陽者僅九十二噸，敵人衝至獨山時，所有運到金城江、獨山及都勻的器材，有的燒完了，有的被敵人搬去了。各廠不但拋盡器材、廠房和原料，即週轉現金和借款亦在途中消耗殆盡了。到達後方之後，受戰時生產局資助而復工的，僅有三十二廠，其中十七廠分組為衡聯工廠及中南聯合工廠，前者包括新中工程公司華成電器廠等七單位，後者包括其中機器廠六河溝機器廠等十個單位。雖則這樣補救，但西南工業的元氣是大受損害了。

以日用品的產量的比重來說，據農本局的估計（三十年），大後方全部棉紗生產量，全年可達四十一萬餘包，其中機紗約佔十分之四，土紗約佔十分之六。棉布的生產中機製成份所佔的比例更低，總量共一千二百八十萬疋左右，動力織機所產，僅佔百分之三。染織廠所產佔百分之四。佔壓倒多數的百分之九十三，差不多都是零星作坊織戶所產。這些作坊或者具有資本主義性的手工場工業經

營，但家庭小工業或獨立生產的作坊，爲數亦是不少的。這不是說，大後方的日用品，有極大部份是前資本主義的作坊或家庭手工業所產生的麼？就是以現代化的工業來說，在技術上，在勞動者與雇主的關係上，顯然是資本主義式的了。

從經濟性質來說，大後方的農村，仍舊被封建的生產關係所統治着，更正確的說，大後方的封建剝削，不但未曾在抗戰時期有所減輕，反而在這八年中加重起來了。以川、康、滇、黔、陝、甘、甯、青、新九省而論，約有農民七千五百萬人，其中佃農佔百分之三十九；半自耕農佔百分之二十二；僱農佔百分之五，自耕農佔百分之三十四，在這裏，沒有耕地或耕地不必須向人佃租全部或一部土地的農民，要佔全體農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一。就耕地來說，除新疆外，其他八省共有三億個作物畝（一畝地一年中有一次收成的算一個作物畝，一年有二三次收成的算二三個作物畝），其中亦有百分之六十二，即一億八千五百萬個作物畝，都要支付地租。在抗戰八年中，這種情形，未嘗有所改善，反而更加增強。據農林部生產促進會的調查，地主所佔農地的百分比，在四川從民國二十六年之百分之六十九，增加至民國三十年的百分之七十；在西康，從民廿六年的百分之六十七增加至民三十年的百分之七十二。因爲官僚資本和商業資本的活躍，後方各省的肥沃的和交通便利的地區，都成爲被追逐的對象了。『當民國二十八年時，永登縣屬尙無不在地主，即皋蘭縣屬亦僅七戶，故其勢力甚小，但自渥惠渠開鑿以來，至去年（民三十一年）爲時僅三年，宣買者流鑒於該地水利之興修，生

產力之增加，於是……或高價收買，或持勢佔有，土地集中，在在皆是。據調查所得，達家川一帶已有百分之四十轉移於不在地主手中；其次為張家河灣、大溝崗子、夾灘堡等地，距離蘭州市較遠，但亦有百分之二十落於不在地主之手，而此等不在地主，多係官宦、縉紳、鉅商、大賈、大發國難財者」（見「人與地」第三卷第七八期中，魏寶珪：「涅惠渠灌溉區之扶植自耕農」）。

抗戰八年中，後方的土地特別一些肥沃的土地，是更加集中在地主手中了，地主對於佃農，儘量從各方面加租。據農促會的調查，四川田租正額，水田從民二十六年的二二·二市斗加至民三十年的二三·八市斗；平原旱地從民二十六年的一五·四市斗加至民三十年的一五·七市斗；山坡旱地從民二十六年的九·七市斗加至民三十年的一〇·三市斗。民國三十年以後，因為田賦改徵實物，地主企圖轉嫁，加租之風，一發而不可復止。加租之方法不外三種：第一是直接增加租額，但這比較困難，且易起糾紛，故大多以換佃的方式實行；第二是不再議讓，戰前在歛收時，地主對於租額，可予議讓一部份，如今不問豐歉，全不減讓了；第三是增加押租，四川有些地方——如重慶附近，在三十一年初已增至戰前的二百倍至四百倍；戰前該地每石田押金很少超過一錠銀子（合法幣十四元）的，到民三十四年初竟達三千元至五千元了。所增加的押租是無息的，實際上就是加租。第四是把錢租改變為實物租。據農促會的調查，截至民三十年，所有川、康、黔、陝四省，都已有十分之七是實物地租；雲南收取實物地租的有十分之八；甘肅亦有十分之六。幣值跌，穀價貴，把錢租改為物租，顯然

是地主對農民的一種新的剝削方法。除此之外，地主富豪，還通過高利貸去咀吸農民的血液。後方各省農民，幾乎有一半是負債的；利息之高，有的地方竟高到「大二分」；有的地方則採取「貸款收實物」的方式，這就是：借的是錢；還的是實物。閩粵兩省風行這種方式，如果折合法幣，則其利率有高至百分之四干的，無論從形式來看也好，從內容來看也好，抗戰八年中，大後方的農村經濟是更加倒退了，土地比以前更加集中；剝削比以前更加嚴重；這不是倒退是什麼呢？

有人以為農產漲價，農民的收入必定比以前增加；他們的生活必定比以前改善，這完全是胡說。民二十九年以後農產物誠然日貴，但得利的乃是地主而不是農民，因為田地上所出產的東西，大部份是以地租或還債的方式被地主攫去的。農產品漲價的結果，農民不但得不到好處，反而得到損害，因為他們出賣農產是在新穀登場價格較跌的時候，而他們購入糧食，却是在青黃不接穀價飛漲的時候。賣賤買貴，難道農民有什麼好處呢？

大後方的經濟，不但充滿了落後性，而且充滿了依賴性。在蓬蓬勃勃的遷建運動中，或許有人否認這一點吧？是的，在戰前，中國的一切工業用品幾乎全仰給於外國；從一顆螺絲釘到一架機器，都是如此，抗戰的時候，海口被封鎖了，到太平洋戰爭以後，西南的國際運輸線亦被切斷了。外國商品壓力之減除，使中國的民族工業得着一個發展的機會；而二十七年以後的遷建運動，正是獨立的中國工業的成長底表現，怎能說大後方有依賴性呢？對於這個問題，我認為有二點可以拿來作為反駁的證

據：

第一是在大後方新成立的工業中，在技術上，在器材原料上，還未能獨立。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某些正在擴大或籌備的廠礦，就大感恐慌，其中有一些工廠，就不得不因此而停止籌設；某些過去不能自製的商品，此時雖能自製，但其主要的材料是依靠外國的，外國的來源斷絕，這些商品便無法再行製造了。

第二是戰爭需要軍火，這是很明顯的。一個獨立的國家必須能夠供給自己所需要的軍火。中國是怎麼樣的呢？一向生產落後，不能造大砲，不能造飛機。這些不能製造的東西之乞憐於外國，那是沒辦法的，但實際上，除了飛機、大砲、汽車、坦克之外，連普通的軍火，都要依靠盟友來供給，甚至於士兵背上的軍氈，亦不肯讓「工合」定貨，而必須遠涉重洋去定購。我們並不是不能製造，而是因為打起算盤之後覺得不合算。外國貨是價廉物美的。於是許多兵工廠便停工睡覺了，直到納爾遜來華之後，才把這個方針扭轉過來，中國必須製造那些能够自己製造的東西。這不是買辦路線在作祟嗎？這不是依賴性的表現嗎？

在金融上，抗戰初期的外匯投機，是買辦性的活動；民國三十二年黃金政策實施以後，黃金美鈔的瘋狂的投機。亦是充分地呈現大後方的買辦性的活動的。美鈔的香俏，證明大後方的財政金融不能一刻離開美國；黃金政策在本質上，亦顯示了金元王國在中國大後方的霸權。因為大後方的黃金政

策，是以美國的借款爲基礎的。沒有美國的借款，就不可能有什麼黃金政策，沒有黃金政策，就不可能有這個瘋狂的黃金投機。這難道不明白麼？

從上述各方面看來，除了內遷和新建一些工廠之外，除了迅速地在各地設立一些金融機關之外，我們實在看不出抗戰時期的大後方與戰前有什麼不同。同是統治着前資本主義的生產；同是浸潤着買辦路線的依賴性。三千多家工廠和幾百家新式銀行的建立，並沒有改變大後方的經濟性質，反而是把戰前沿海沿江一帶的情況伸入內地，把內地的落後性與依賴性顯得更清，染得更濃吧了！

四 正在萌芽的新民主主義經濟

從前面二章看來，抗戰時期的中國經濟，似乎只有黑暗的方面：淪陷區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沉淪爲日本強盜的殖民地經濟的；而大後方各省的封建剝削。則在這個時期中，變本加厲的在發揮其最後的「光芒」。在這裏，或許有人要問：難道戰時的中國經濟只有倒退的麼？我們的回答是一個否定——戰時的中國經濟誠然遭受着不少的摧毀與破壞，倒退黑暗的因素誠然在這個時候，更加猖獗，但積極的，光明的因素正在新生着，這就是陝甘寧邊區與敵後廣大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陝甘寧邊區雖則在地區上與西北大後方毗連，但在經濟性質上，却是與大後方各省迥不相同的。他們間的差異，不僅在於頑固派和磨擦專家之用武力，施行包圍與封鎖，而且在於兩者間，執行的財

政經濟政策在本質上是完全迥異的。前者實施減租減息，削弱封建剝削，發展農工生產，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後者則發展了官僚資本，增強了封建剝削，窒息生產，惡化民生。陝甘寧邊區經濟不能與大後方的經濟混爲一談，而是敵後廣大解放區的中心。因爲敵後解放區所推行的減租減息和生產運動，都是從陝甘寧邊區推廣出去的。但爲敘述之方便起見，我們不妨分開來說說，這就是先敘述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然後才來看看敵後各解放區的概況。

甲 陝甘寧邊區

陝甘甯邊區原來是一個貧瘠荒涼的黃土高原，如果要用幾句簡單的話去形容它的話，則「氣候寒冷，雨量稀薄，災旱時至，童山濯濯」十六個字是頗爲適當的。但在這裏，問題還不僅僅在於自然條件之貧乏，而且在於社會經濟包藏了深刻的矛盾。在革命以前，陝北一帶的土地是集中在少數大地主的手中的，佃農一年所能獲得的一點農產物，大部份又被地租和高利貸和苛捐雜稅所吞併。在這種情形之下，造成了這些地方的貧苦和愚昧。

民國二十四年以後。陝北大部份的農民取消了地土上的封建關係，到了二十六年才停止這種辦法，但在民主政權保護之下，已分配的土地不再重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是被確定下來的。邊區一半地區之經過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剝削，乃是一個重大的特點。這個特點，不特爲大後方所無，亦爲敵

後解放區所無。至於保存地主所有權的地區，則經過減租減息之後，封建束縛亦削弱了。「這樣合起來，整個邊區就破壞了封建剝削關係的一大半」了。

在這個基礎之上，陝甘甯邊區又發展了合作社的運動，使個體勞動移轉到集體勞動，使農民的生产力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農民的生产合作社是以個體經濟為基礎（不破壞個體的私有財產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在陝北，叫做變工隊，由於這種組織，大大節省了農民的人力、畜力和工具，提高了勞動生产率並改善農民的生產關係。以一九四三年的經驗而論，「一般的變工扎工勞動是二人可抵三人，模範的變工扎工勞動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生產成果亦不是歸公而是歸私的，這就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

經過了土地革命和減租減息，整個邊區破壞了封建剝削關係的一大半，這是第一個革命；在一九四三年，又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勞動力組織起來，提高了勞動效率，這是第二個革命。陝甘甯邊區的農村生產，就是以這二個革命作為大前提的。除此之外，移民政策，農貸政策，獎勵政策以及按戶計劃競賽運動等等，都是很切實地在進行着。在這種情形之下，這片過去貧瘠荒涼的地區，就必然完全改觀了。

使人最容易認識的是陝甘甯邊區的農業生產不斷地在發展。二十六年的耕地面積為八百六十餘萬畝，二十九年增至一千一百十餘萬畝，三十二年擴大為一千三百餘萬畝；植棉面積，從二十九年的一

五、一七七畝，擴展至三十二年的一五〇、二八七畝。耕地擴大，收成跟着增加，三十二年的糧食總量達一百八十四萬石（每石三百斤）；二十九年以前，邊區還要從洛川及河東買糧；從二十九年以後情形漸漸變了，此後不但不要從外邊買糧，且有部份餘糧向榆林一帶輸出。一部份人口從外地移來，牲畜亦增加了，並不感到糧缺，邊區糧食已能自給了。棉花方面。三十二年的淨收量可達一百七十萬至二百萬斤，足供邊區需要的一半以上。衣食問題是逐漸解決了，並且走上了豐衣足食的境地。

在這裏，我們還要進一步去看看這種收穫的內容。在淪陷區或大後方，可以有豐收的年成，但豐收的成果並不放在直接生產者的家中；如果收成不好，則小農（甚至中農）的土地就會急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了。陝甘甯邊區的情形却不是這樣，這兒的土地大部份是屬於農民的；屬於地主的田地，則經過減租，因此，土地沒有集中的現象，而收成亦大部份屬於直接生產者。農民既能掌握自己努力的果實，則其生產興趣與生產能力，必然跟着提高了，這兒農村成份以中農壓倒的優勢，就是例證。茲以延安柳某鄉為例：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雇農	一四戶	一戶
貧農	四八戶	一五戶
中農	四四戶	九四戶
	一三·〇%	〇·八%
	四四·四%	一二·〇%
	四〇·七%	七五·二%

富農	二戶	一·九%	一五戶	一·二%
合計	一〇八戶	一〇〇%	一二五戶	一〇〇%

表中二十五年的老戶，最低的一層已上升為中農，卅一年的雇農貧農，多半是外來的移民難民。這種情形，不但說明了陝甘甯邊區農村的成份與別處不同——別處的農村人口，佔最多的是貧農和雇農，而且說明了陝甘甯邊區農村的發展過程具有為他處所無的特色。因為這兒農村階層的變化，其所走的道路是：大多數的雇農升為貧農；大多數的貧農升為中農；而大多數的中農則上升為富農了。三十二年春，邊區政府提出：「吳滿有的方向就是邊區農業發展的方向」。這就是說，邊區此時農村經濟的基礎是中農，而其發展的方向則為新的富農路線（吳滿有的方向）。論性質，這種新的富農是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經濟，但他們的發展，對於邊區經濟是有積極意義的。這些新的富農，不僅改善了自已全家的生活，而且幫助別人。改善全村全鄉的生活，不但發展了私人經濟，而且保證了政府抗戰的需要。因此，吳滿有式的富農經濟乃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一個組成部份，而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這種成份是不斷地在發展着。如延安的申長林、關中的李學義、安塞的楊朝臣等，都是沿着吳滿有的道路從中農貧農甚至雇農發展起來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村中，農民分化的過程，是小部份人上升為中農富農，而大部份人則下降為貧農和城市無產者。

邊區農村經濟的發展，不但呈現在大多數農民的收入之增加，而且呈現在他們的負擔之減少，人

民負擔減少的最重要原因，是部隊機關學校之「大家動手，生產自給」。部隊方面，三十二年開荒三十萬六千畝，幾達人民開荒總數三分之一，有的部隊竟做到全部自給。機關學校的生產成績，亦是值得重視的。三十二年邊區全年的總支出中，有百分之六十四是由自己生產解決的。部隊機關學校的自給的百分比越高，則人民的負擔就越減輕了。三十三年度的財政收入取之於民的只佔全部財政收入總數百分之三十一。這一年的公糧，只收十六萬石，比三十二年少了二萬石；比三十一年少了四萬石。人民平均每畝地出公糧一升零九勺。如果與大後方相較，那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例如陝西田賦徵實每畝達二斗六升，比邊區人民負擔重二十多倍。實行農業統一累進稅之後，農民的負擔更合理了。據延安川口區試行農業統稅的調查，三十二年該區稅額佔總收入百分之二十；而三十一年佔百分之二十五；三十年為百分之三十五。由此可見人民的負擔是逐年減低的，一面是收穫增加。另一面是負擔減少。邊區人民的生活之改善，是必然的了。

奮鬥了九年的邊區經濟，已經展開了一幅「糧食滿園，瓜菜滿地，騾馬成羣，豬羊滿圈」的圖畫了。豐衣足食的境界是達到了的，這種豐足的情形當然不能與大後方的某些暴發戶等量齊觀。邊區的豐衣足食是指絕大多數的人民與部隊機關學校的工作人員而言的，但大後方的暴發戶，則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犧牲，以大多數人的幸福去換取他們少數人的窮奢極侈的生活，這是我們在這裏不可不辨別的啊！

工業方面，邊區原來是很落後的。工廠工業完全沒有；民間只有一些小手工作坊和鹽池炭窯；農村家庭紡織業亦因為外來紗布的大量湧入而銷聲匿跡。一切日用品都是仰給外間輸入的。一九三八年邊區民主政府開始注意自給工業的建設，創辦難民紡織工廠、振華造紙廠、興華製革廠、被服工廠、農具工廠和八路軍製藥廠。一九三九年因為頑固派的軍事封鎖、工業品之輸入受到限制，中共中央提出「自己動手」，「自力更生」的號召；邊區政府於是年五一節舉行工業展覽會以資激勵，又先後設立新華化學廠和光華製藥廠，並在延安十里鋪開始探採厚層煤礦。一九四〇年黨中央提出半自給政策和「集中領導，分散經營」方針。黨、政、軍、民、學各界，都紛紛設廠，為邊區主要工業必需品之自給而奮鬥；一九四一年黨中央提出半自給過渡到全自給的政策，工業建設，更有進展。黨中央直屬機關學校新辦之大小工廠即有二十七處之多。一九四二年建設廳確定「鞏固現有公營工廠、發展農村手工業」的方針。到了一九四三年邊區的經濟，不但在農業方面做到足食，而且在工業方面接近豐衣的境界了。

現在把邊區工業的概況述之於下：

第一是紡織業。一九四三年邊區的公營紡織廠有二十三家。可產大疋布三二、九六八疋，全邊區每年的需布量是四萬至五萬疋（民用在外），相差是不多了。如果與七年前相比，則一九四三為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二七四·六二；如以難民工廠為例，則增加了百分之七千二百七十。邊區紡織業之發

展，完全實事求是的做法的成果，因為採取了保護土布政策並提倡民間婦紡。據不完全的統計，一九四三年邊區的紡婦人數達到十三萬三千四百五十七人；紡車十二萬架；共紡紗八十三萬五千七百餘斤，保證了各廠的原料之供給，

第二是造紙工業，一九四三年邊區的公營造紙廠有十一個，池子七十七個，本年產紙五百六十七萬一千四百令，與一九四〇年相較，增加百分之五五二·二了。

第三、化學工業方面，邊區在一九四三年有二個肥皂廠、二個鐵廠、八個工具修理廠和農具修理廠、三個陶瓷廠、一個石油廠、一個火柴廠、一個製藥廠、二個皮革廠。肥皂廠的產量，一九四三年為四十八萬三千條，超過原來計劃百分之一三〇·五。火柴是邊區新興的事業，磷的問題解決後，亦達到自給的境地了。

此外，邊區公營工業還有二個鐵廠，八個工具修理廠和農具修理廠，一個石油廠，十二個被服工廠，七個木工廠。煤業方面，有煤井一百個；鹽業方面有蠟子二千六百九十二個。榨油業和其他一些小作坊還沒有計算在內。這些企業都是在戰時的邊區經濟，起着重大的作用的。

與公營工業相伴發展的，是各種生產合作社——由手工業者合作，或由合作社投資設立的生產事業與私營的手工廠以及家庭手工紡織業。公營工業對於私營工廠及家庭手工業不是互相牽制而是互相幫助的。紡織合作社由一九三九年創立，是年只有二家，到了一九四三年發展到三十七家；私營工廠

由一九三八年的五家（年產布一、二六〇疋），發展至一九四二年的五〇家（年產布一萬二千疋）。這就證明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之下，公營私營和合作經濟是攜手前進的。

幾年苦鬥的結果，使一個毫無工業基礎的地區，變成一個走上半自給的地區了。布疋能自給（以一九四三年之產量為標準）三分之一以上；紙張能自給一半；石油、肥皂不但能自給，而且還有餘力接濟鄰近地區和前方需要；工業農業所需要的工具，大都能够自造。火柴有了，玻璃有了，鋼鐵亦有了。這些部門的生產量，當然不能與機器工業的大宗生產比較，但我們應拿歷史和具體的條件去把握它，才能看出這個成績之偉大。

陵甘甯邊區的工業之所以能在困難的條件之中發展起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是起着極大的作用的。這個政策的特點第一是公私兼顧，公私兩利。公私兼顧的原則是在公營與私營的企業間貫徹着；公私兩利的原則則在合作事業中貫徹着。第二是獎助政策。在這裏，除了舉辦工廠培養熟練工人作為發展工業的倡導之外，政府對工業作投資借款或免稅的幫助。至於生產展覽會與工業展覽會之獎勵發明創造和品質優良的產品，其推動作用亦是極大的。第三是趙占魁運動的展開。這是一種以新的勞動態度對待革命工廠的羣衆自覺性運動。一九四二年開始在職工中醞釀發生，而一九四三年就普及到邊區所有的工廠了。職工們自動擬定新的個人生產計劃，節省原料、愛護工具、遵守勞動紀律、超過生產定額。由於這個運動的展開，大批勞動英雄出現了，工業生產的質量大大提高了。

陝甘甯邊區的農工業生產之發展，又推動了商業的發展。抗戰後期延安市面的繁榮是以前所夢想不到的；一些交通據點，過去只有稀稀落落的幾戶人家，此時亦發展成爲鬧市了。在這兒，以邊幣計算的物價雖則頗高，但換算成爲法幣之後，物價是比大後方便宜的，而且人民都是有財產有收穫的，物價貴，他們並不怕，因爲他們都是有農產品或手工業品可以出售的。買入貴，賣出亦同樣的貴，這不是對消了嗎？正是因爲如此，所以在生產運動的巨潮之下，人民的生活便一天比一天改善了！

乙 敵後解放區

截至抗戰勝利前夜，中國的解放區（包括陝甘寧邊區在內）共有十九個；人口將達一萬萬，其地域，北起內蒙、南至海南島，包括了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陝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福建等省。在這些省份中，有些是大部份，有些是小部份，而除陝甘寧邊區以外，其他的解放區，都是處在敵後的。前一節，已經報導陝甘寧邊區的情形了；現在讓我們來談談敵後解放區的經濟建設概況吧。

敵後解放區是從游擊區發展起來的。它們都是敵後抗戰軍民的鮮血所培養出來的美麗之花。這些地區不但與敵僞統治下的淪陷區，形成一種犬牙交錯的形勢，而且都是處在敵僞的包圍之中的。雖則它們可以經過晉西北解放區而與延安交通，但必須經過敵人的封鎖線，這就可以證明敵後解放區處境

的艱難了。因為這些解放區是在敵人後方長大起來，是刺在敵人胸膛的一把利劍，所以敵人對於這些地區的屠殺摧毀便無微不至了。

以晉西北為例，從抗戰爆發到一九四〇年，因為敵人的破壞，農業方面，人的勞動力比戰前減少三分之一；牛減少十分之六；騾驢減少十分之八九；羊減少十分之六；豬減少十分之八以上；土地荒蕪了，耕地面積僅當戰前百分之八十四；山地產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總產量只有戰前的百分之三；工業方面，民間紡織業，臨縣原有改良機二百多架，土機二千多架，完全停頓了。民主政權成立以後，敵人即不斷進行掃蕩。一九四二是最殘酷的一年，什麼「鐵壁合圍」，什麼「梳篦隊形」等戰術，敵人都拿出來用了，除此之外，還有殘酷的「三光政策」和陰謀欺騙的「強化治安」，打通公路，設立據點，向內地區蠶食推進。

其在晉冀察，敵人自一九三八年起便開始了對我的進攻。從「八路圍攻」、「單刀直入」、「碉堡政策」、一直到三光政策，企圖毀滅我人力、物力、財力，以製造「無人區」。一九三九年七月淫雨為災，敵人在冀中決破了四處河堤，萬里洪波，造成邊區數十年來未有的大災，被毀良田不下十萬頃，被沖糧食不下六十萬石，淹沒的村莊一萬多（冀中佔六七五二村），人畜死亡，不可勝紀，災民三百餘萬人！這是水災，而敵人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則是不斷製造火災的。一九四二年一年中，全邊區的無辜同胞之被慘殺、毒打、被捕、姦淫者，人數當在十萬人以上。在民主政權成立以

前，這個區域原是貧苦不堪的，阜平的窮人甚至於連吃樹葉亦不可得（樹是地主的），再經過敵人這種兵火的洗劫，那是成爲什麼樣的狀況呢？讀者們，試想想吧！

其在山東，自一九三七年除夕在徂徠山起義以後，抗日軍民即不斷與敵人短兵相接地在苦鬥，解放區就是在戰士們的火花與血花之中一天比一天擴大起來的。敵人對於這個新的山東，一樣地進行分割和掃蕩。在一九四二——四三年間，山東敵偽據點增至二千五百個以上，封鎖溝達八千四百多里，公路一萬三千多里。敵人抽出一萬以上的兵力，經常對山東各戰略分區實行空前的掃蕩，計一九四二年大掃蕩十九次，小掃蕩七十九次；一九四三年中，千人以上的掃蕩五十次，是年九月下旬又開始那種以二萬五千兵力爲主體的三個月輪迴掃蕩。在敵軍之外，還有頑軍的磨擦，這種情況，當可想見山東解放區是處在什麼境地之中了。

其在華中，從一九四一年起，敵寇便大規模的向我進攻，針對着蘇南蘇中，實行其所謂清剿與掃蕩，並開始在各大市鎮建築據點，而在蘇南清鄉區，小村鎮亦建築起據點來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敵寇進攻，更加瘋狂。「清鄉」與「掃蕩」，普遍於整個華中敵後，平均每半個月各地區有一次掃蕩，最頻繁的竟至一星期一次，配合着掃蕩與清鄉，敵在我解放區週圍的據點增至二千五百處以上，我各戰略軍區各軍分區之間，均爲敵人之公路所隔截。

從這幾個例子，我們很可以看見敵後解放區是完全處在戰爭的狀況之中的。在這種戰爭的狀況

中，在敵人這種不斷的摧毀之下，舊的一點貧乏的經濟基礎，蕩然無存了；要進行恢復生產，其困難的狀況，更爲大後方所不可及，但解放區的軍民，在毛澤東同志的方向之下，終於突破種種困難了。這就是減租減息的實行；這就是生產合作之開展，這就是手工業的扶助與工人創造性之提高。

減租減息的工作，是廣泛地在解放區推行着，截至抗戰勝利前夕，實行這一工作的區域，最少佔全解放區的一大半。這就是說，在解放區的一萬萬人口中，實行減租減息的起碼有五千萬人。茲以晉察冀邊區爲例，「一般的租率已減少了原租額的三分之一」。在減租減息後農民所得的實際利益，僅據一九四〇年六月四個專區不完全的統計，減息數已達三十二萬六百餘元，只二、五兩專區減租額即達一萬二千二百九十餘石」。以後推行此政策日益普遍而深入，糾正那種對伴種地不減租或減租後租額仍超過千分之三七五等現象。「其次，在深入的減租減息中，依據國民政府民法債權編所定的清理債物原則，又掀起清理舊債和抽地換契」運動，即「未死」之抵押地，得按年利一分訂立新約，將土地抽回。結果使許多抗戰前被高利貸者巧取豪奪的土地部份地被農民抽回來了。據一、二、三、五四個專區不完全之統計，到一九四〇年六月已抽回土地六萬四千九百餘畝」。在實行減租中，地主常以奪回佃地或假借各種名義如假當、假賣、收回「自耕」，以及改定租爲伴種等以抵抗減租，造成明減暗不減，特別是從一九四三年以後，許多地主強調未定契約或契約期滿（大部份是一九四〇年所訂的三年至五年的租佃契約），不願佃戶生活，曲解政府法令，大量收回土地，甚至用牧地的威脅強迫加

租，或轉移負担到佃戶身上。因此，當地政府乃從事於適當保障佃戶的土地使用權，實行該邊區參政會議通過的租佃條例，尊重業佃雙方契約，但在抗戰時期出租人收回土地致承租人無法生活時，應減收一部或暫時不收，並鼓勵訂立較長期的租約。同時，又經過民主動員的方式說服地主調劑一部份土地（多餘的自耕地、或無力耕種的土地），租給無地或土地不足的農民。在捐稅方面，晉冀察邊區廢除了過去三十餘種苛雜，實行公平合理的負担，抗戰初第二、三年執行「合理負担」及「救國公糧」，貧苦人民一般負担都很輕；一九四一年以後停徵田賦，廢免一切捐稅，實行一年徵收一次的正規稅則，與有免徵點及累進最高率的統一累進稅，而這種統一累進稅率亦逐年在減少中。如一九四一年統累稅每分爲一·五市斗，一九四四年減少至〇·八五市斗。

對於地主，則在減租減息之後，保證繳租繳息，並在不大大影響農民生活，不大使農民失去土地使用權之情況下，地主有自由處理其土地（如出典、出賣及收回自耕等）之權，和締結契約之自由。對於地主之照顧，並不只於這些，如在負担方面，負担賦稅之人已達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使過去集中在地主身上的負担大大減輕；又如抗戰後幣價跌落，影響地主貨幣地租之收入，民主政府乃動員農民自動將錢租變爲半錢租半糧租。這都是主佃雙方並顧的說明。

減租減息運動是在各個解放區廣泛推行的。如山東解放區，減租運動是在一九四一年以後開展的；晉綏解放區在一九四〇年抗日政權成立之後即推進這一工作；華中各個解放區，亦先後勵行這一

政策。這對於農村生產之提高，是有極大的作用的。

不過，減租減息只減弱封建的剝削關係，如果要發展農業生產力，還有待於勞動的互助組織。這就是變工、扎工等組織和生產競賽的運動。這些工作，正是各個解放區所努力進行的。以晉冀察解放區為例，據一九四二年十七個縣不完全的統計，做了農戶計劃的共四萬五千六百九十七戶；截止一九四三年十月，北岳區羣衆方面組織撥工、變工、包工共二萬七千組，參加之男女勞動力在二十萬人以上，佔全區所有勞動力百分之二十。有的村子如曹格莊，男勞動力全部參加撥工組，女勞動力參加互助的達百分之九十三，半勞動力組織起來的亦有百分之九十。勞動率有的提高一倍，一般都提高百分之三十左右。按戶計劃亦在各地進行了。勞動力的組織，克服了種種的困難，使開荒、修灘等工作，獲得極大的成果；而在農業的生產競賽中，產生了許多勞動英雄。

在解放區中，生產是與戰爭打成一片的。在晉冀察解放區，撥工組是與游擊組統一起來。白天耕地，夜裏練習埋地雷。爲了使第一線（最靠近敵據點的）的村莊安心工作，各地都在發動村聯防制，普設崗哨，若發現敵情，就互相接應。由於撥工組和游擊戰之配合得好，最近前線之村莊，亦都能晝夜搶耕搶種了。

其在工業方面，各個解放區大都祇能以手工業爲基礎。紡織、造紙以及化學等業，都是以手工生產爲主的。正是因爲能動員各地的手工業者，所以工業生產的發展，亦就成爲一種民衆運動了。以晉

西北而論，在一九四四年間，全邊區的紡車達到五萬架，紡婦六萬人，土機九千多台，快機一千三百多台，工人四萬二千七百人，年可產布五十餘萬疋，如上毛布，能達到全晉西北軍民衣着的自給。其他如造紙業在一九四一年達到戰前十分之九；四二年已超過戰前產量。礦業、油房、粉房等亦大有發展。公家所經營的修械、製鐵、紡織、化學、火柴、工具、印刷、製藥等業，在一九四〇年以後，更有長足的進步，其在晉東南，太行區所出產的肥皂香煙等，不但足夠供本區之消費而有餘，且有部份出口，棉織品可自給一部份，毛織品且可在敵佔領區銷售。在工業生產中，工人們亦是把勞動與戰鬥的任務統一起來。那些忠勇的工人游擊隊，固不用說了，就是在業的工友，亦大多是白天做工，夜裏站崗的。敵人來了，還要把機器埋在地下，自己拿槍參加戰爭；敵人退了，回來又要掘出機器在一二星期後，就恢復原來的生產。這種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八年苦戰中，不斷地在敵後解放區中發生着，他們不斷地用自己的血汗，在歷史上，寫下了燦爛奪目的一頁！

一般說來，敵後解放區所佔的城市較少，鄉村佔着較大的優勢，故在論述解放區的時候，我們應着重農村中的生產關係，特別是土地關係。現在以晉冀察邊區的變化為例。在這裏，土地關係的變化是循着與戰前相反的方向——由集中走向分散——而進行的。從典當方面來看，當出土地者多屬地主與富農，而當入土地者則主要為中農貧農；從土地的買賣關係來看，賣地者多為地主富農（特別是地主），而買入土地者多為貧農中農甚至僱農和工人。這種土地關係的變化，再加上敵人對我經濟的反

覆破壞，就引起了農村階級的巨大變化，茲以晉冀察的北岳區（鞏固區）四十五個村莊的調查為例。第一、地主經濟在逐漸削弱和下降中。地主在戰前（一九三七年）佔總戶數二·四二%，到一九四二年下降為一·九一%；土地佔有從戰前的一六·四三%，降到一九四二年的一〇·一七%。第二、富農的戶數，從戰前的八·四五%，降到一九四一年的七·七八%，但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則回復到七·八八%。土地佔有從戰前的二一·九三%，降到一九四一年的一九·一五%，但到一九四二年又回漲到一九·五六%。富農經濟之所以一度下降，除了敵人的掠奪破壞之外，還因為他們往往出租一部份土地且兼營高利貸，在減租減息的運動下，他們的經濟自然不免要受到削弱。但是減租減息是有助於農村資本主義之發展的，因之，富農經濟在下降之下又回漲了。在這裏，不少地主是會不斷轉變為富農經營的形式的；中富亦可以不斷轉變為富農經營，但因敵人的摧毀，故最後這個因素，未能盡量發揮，中農沒有大量轉變為富農。第三、中農戶數從一九三七年的三五·四二%上升到一九四三年的四二·三一%，土地佔有從一九三七年的四一·六九%上升到一九四二年的四九·一四%。中農經濟是發展得最快的。第四、貧農僱農戶數合計，在戰前幾佔全農村總戶數的一半（僱農七·〇六%，貧農四〇·四七%，合計為四七·五三%），到一九四二年即減為四〇·九五%（僱農減至三·二三%，貧農減至三七·七二%），土地佔有從一九·一〇，增至二〇·一二%。戶數減少而土地佔有增加，證明農村中最困苦的一層，是開始在改善了。

地主的經濟力量相對地逐漸減低，貧農僱農則相對地逐漸改善，而中富則不斷向富農推進，新的富農正在各地產生着。這就是敵後解放區農村經濟的對比的變化。這種變化是與敵寇鐵蹄下的淪陷區不同的；亦是與大後方的農村經濟大異其趣的。在淪陷區，除了當漢奸的地主之外，農村各階層都趨於沒落；在大後方中，土地是不斷集中在地主的手裏，只有少數的富農上升為地主，只有少數的中農上升為富農，但大多數的中小地主、富農以及中農，則不斷地在分化的過程中被排擠下來。如果能把握住這一點，就則敵後解放區的社會經濟的特點就可以明瞭地看出來了。

敵後解放區原來的一般經濟基礎，是十分薄弱的，再加上敵人的摧殘與長期的戰爭環境，人民生活自然十分艱辛（如在阜平的窮人，連吃樹葉的權利亦沒有，因為樹是地主的），但抗日的民主政權經過幾年的努力，減租減息，生產運動以及精兵簡政等政策推行的結果，人民的生活的確是比以前改善了。這種改善的初步（如阜平的窮人初步的生活改善是有權利採樹葉吃樹葉），或許為後方的人們所低視，但在解放區的人民看來，那是分明比以前改善的。到了後來，連貧農僱農亦做到獲得耕地及增加耕地（由於當入、買入、「調劑」、租入、開荒或修灘）了。這不是中國經濟的奇跡麼？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是在處境困難的解放區脫穎而出了，它不但把解放區與淪陷區和大後方區別出來，而且用事實告訴我們；今後的中國必須朝着這個方向走！

第五章 戰後的經濟危機

一 勝利後局勢的變化

中國這一次的民族解放戰爭，堅持了八年一個月零三天。日本強盜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請降的。從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九五）到此時，恰恰半個世紀；從敵人發動「九一八」事變算起亦有十四年。這五十年的國恥，這十四年的苦難與辛酸，現在都雪復了，這是現代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的一件大事！

隨着勝利而來的是中國的政治經濟環境，起了巨大的變化。在抗戰的八年中，恰如前面所述：日本帝國主義獨占了整個東亞；它把東北、華北以及華南的一些地方，當作它的獨占的殖民地；它封鎖了西南西北大後方，它殘酷地掃蕩了敵後的解放區；同時，它又奪取英美在中國所掠得的特殊權益。這種情形，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以後，便急劇地巨大地起着變化了！

變化在那裏呢？

第一件事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垮台。日本帝國主義是從明治維新以後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的。雖然

它的資本主義化不徹底，雖然它的封建勢力仍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但經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三次戰爭之後，由於對外的殘暴侵略，由於對內的無情剝削，這個三井三菱的王國亦走上獨占資本的舞台了。在國際貿易中，在對於中國與南洋各地的投資中，年復一年的進展，就是在這次戰爭之前，它已經快要逼迫美國壓倒英國了。英美與日本的這種矛盾，促成中國對日的抗戰（當然不是主要的因素，而且在抗戰初期，英美在各方面——從外交的拉攏到物資的供給，都會給與日本以優容），更進而爆發了太平洋戰爭。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帝國主義是佔着優勢的。英的香港和南洋屬地都丟了；美國的非律賓以及英美在華的共同據點——上海，亦都丟了。可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以後，日本強盜在遠東的兇焰就消沉下去。儘管英美一些將軍們紳士們設法在保存這個東方法西斯的侵略機構作爲對付蘇聯的工具，但日本強盜的經濟力量却不能不遭受削弱，起碼它在國外所積集的贓品，它在國外的經濟侵略機構，都已當作勝利品而被接收了，以麥克阿瑟元帥爲代表的美國獨占資本，對於日本極盡優容的能事。在麥帥的保護之下，日本保存了它的生產機構，迅速地恢復了它的工業生產和出口貿易，這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恢復是極其有利的，但由於台灣與朝鮮之回歸中國與獨立，日本在戰後幾年在國際貿易經濟舞台上，在遠東的經濟活動上，或許不會像過去那樣的利害。它自甲午戰爭以來從中國所取得的特權，被勾銷之後，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就失去它過去的地位了。

第二、由於日本強盜的投降，由於抗戰的勝利結束，大後方的封鎖便告停止了。中國的沿海交通，是在抗戰初期被日寇所封鎖的。但那時還有滇緬公路、滇越鐵路以及作為華南吐納口的香港。滇越鐵路是在法國潰敗敵人進入越南時被切斷的；太平洋戰爭以後，滇緬公路和香港亦告淪陷。大後方就處在完全被封鎖的狀況中了。中印空運是極其有限的；中印公路使用的時間尤為短促。這樣的封鎖，使大後方發生了物資問題，使大後方的物價更迅速的飛漲。日本投降，封鎖取銷，交通運輸雖不能及時恢復，但形勢分明是大大不同的。外邊的商品可能運入後方；後方商品的來源可能增加，這猝然的一擊，使許許多多圍戶大吃一驚，措手不及，因而形成了勝利來臨時的大混亂。

第三、抗戰時期，中國經濟分成淪陷區的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大後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及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經濟三個領域。日本投降之後，「樹倒猢猻散」，南京的偽組織亦同時一敗塗地了。敵偽的崩潰，淪陷區一部份與大後方合一；一部份被敵後的抗戰軍民所克復而成為解放區。由於淪陷區的收復，大後方的地盤伸展了。法幣的印刷能力和流通地區擴大了；官僚資本和囤積居奇的力暈和活動地域亦迅速地增強了。因為收復區與大後方，同樣統治着半封建的剝削關係，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距離亦只是五十步與百步間的差異而已。所以，淪陷區一經收復，大後方的那一套便完全搬到「下江」來，更因為接收工作的弊端百出和二百對一的偽幣與法幣的兌換關係，江浙一帶的工商業及中小人家，就破產得更快了。至於收復區農村中的封建剝削，並未會因為收復而有所改善。地主對農

民的高度地租和高利盤剝削依然繼續下去。政府表面上是明令停止徵收田賦一年，事實上却是要補收過去八年，並且要採購「餘糧」，從老百姓的手裏搶奪一碗稀得像水一般的稀飯。饑餓、自殺、死亡和動亂便是勝利後收復區中一般的現象。反之，解放區由於軍民的努力，過去被敵人所隔斷的地區現在打成一片了，地域的面積亦大大的擴大了。在解放區裏，減租減息是澈底實行的；漢奸地主的土地是澈底沒收的；過去八年的加租加息以及種種不合理轉嫁給農民的苛重負擔是廣泛地進行清算的。由於這種辦法，農民就部份地取得土地，解放區的農村就開始走上耕者有其田的道路了。進行土地改革的解放區是截然與收復區和大後方不同的。一個是削弱了封建關係及部份取消了封建關係的地方；一個是保持封建剝削並且發揚封建關係的地方，而封建關係的削弱（或消滅）與否，乃是中國工業化成的前提。故按其性質而言，中國在抗戰勝利後存在着二個不同的經濟領域——一方面是向着土地改革，向着改善民生和工業化的大道大踏步前進；一方面則是向着投機，向着加重封建剝削和殖民地化的泥坑一步一步深陷下去的！

第四、日本帝國主義垮台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力量被排出去了，代之而起的是黃金王國的獨占資本。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美國在上海的經濟權益曾經受到損失，但它在大後方的財政經濟力量却是與日俱增的。從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三十一年，中美借款八次，共七萬四千七百八十萬美元；太平洋戰爭以後，除了金融財政上的借款以外，還有租借法案中的物資；一九四三年的中美借款

一次就有五萬萬美元之鉅。而租借法案所供應的物資，截至戰爭結束，約為六億餘萬美元。越到抗戰後期，中國的財政經濟越是依靠美國，軍火依靠美國，藥品依靠美國，黃金依靠美國，甚至布疋棉花亦要依靠美國。政治軍事有美國顧問，財政經濟亦有美國顧問。戰時生產局是美國盟友替中國設立的；戰時運輸局亦是美國盟友替中國設立的。縱然一九四二年國慶前夕英美通知取銷領事裁判權；縱然一九四三年中英中美分別簽訂新約，放棄在華駐兵權，租界及使館區特權，軍艦自由駛入權，領事裁判權，通商口岸特權，沿海貿易及內河航行權，外籍引水權與海關雇用客卿權等等；但通商口岸設廠權與採礦權並沒有提到，而關於財產部份的某些有利於單方權利，還在法律上給了一些保障。沒有相當的經濟條件，則形式上的平等乃是實際上的不平等。這是中英中美新約使人不得不担心的地方！抗戰勝利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工廠和礦山被中國政府接收回來了，但它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則被美國的獨占資本所佔去。

日本投降，太平洋交通恢復之後，美國的商品更是像潮水一般向中國市場傾瀉。除了軍火不算外，美國的麥子，美國的棉花，美國的汽車，美國的奶粉香烟、糖果以及玻璃提包玻璃雨衣等等，應有盡有的充滿了整個中國的市場。在以前，美國對華的經濟活動，主要是出入口貿易，金融機構只是以輔翅進出口貿易及政治借款為任務的。產業上的投資，像上海的電力公司，那是鳳毛麟角不可多見的。這是美國與英日不同的地方，因為英日是致力於直接在華投資的。紡織和煤鐵就是例子。抗戰勝

利之後，美國對於在華直接投資，積極起來了，著名的「威斯汀好斯」(Westing house)電氣廠，已與中國政府簽訂合同，在華設立大規模的工廠，環球生產公司、美孚、德士古三大石油公司已向中國政府建議共同經營石油工業，而環球生產公司已獲得在中國西北探測與採掘油床的權利，雀巢牌煉乳牛奶粉廠及其他一些水泥廠、輪船製造廠及化學工業等製造廠等，亦都準備在中國設廠(見三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新聞報)。還有三名重要商人與中國有關當局商討在華創辦紡織事業；農業方面，美國政府派遣農業代表團來華，商討兩國農業合作；電力方面。聞名的YVA在薩凡奇博士的指導之下，正在進行籌備；交通方面，剩餘軍人陳納德將軍與中國一些官僚資本家組織一個「中美企業開發公司」，專門以飛機運輸美貨，「行總」將向美租借二十萬噸船舶，組織一運輸機構，定名為「水上運輸大隊(C·W·T)藉以壓倒中國的航業，直接在中國開辦工廠，經營運輸和農業，乃是美國獨占資本在華經濟力量的新發展，這種天羅地網的幹法。中國經濟怎能不急速的動搖起來呢？中國的民族工業怎能不急劇地崩潰起來呢？

美國獨占資本對華經濟侵略之猛進，必然引起其他國家之矛盾。作為世界兩大政治體系的首席代表——美蘇在遠東的矛盾，那是大家都看得很明白的，但美蘇間的矛盾，政治形勢和軍略形勢的矛盾是超過經濟上的矛盾的。這並非說美蘇在華沒有經濟矛盾(蘇聯要求中蘇在東北經濟合作就遭受了美國的激烈的抨擊)，而是說，美蘇在遠東，在中國的政治矛盾，嚴重地超過了經濟矛盾。試想想吧，

還有什麼比直接干涉內政，以武力支持統治者以鎮壓民主力量更嚴重的呢？美國獨占資本在華的力量之發展，不但引起了它對蘇聯的矛盾，而且加強了英美在華的矛盾，英國在對華貿易的地位中，自「九一八」以後便跌至第三位；現在日本垮台了，英國在中國市場上減少了一個勁敵，但無論如何，美國在華力量的增長，顯然是一種沉重的壓力。最近倫敦中英商會在中英商務合作的口號之下，致力於鼓勵工業家交換訪問，就是英國對抗美國在華發展其力量的表現。事實上，英國在戰後的對華貿易，是日見增進的。據英國新聞處倫敦（三十五年）五月十日電：「英出口至遠東之貿易正邁進中，其數已令人滿意；運往中國之物品亦有加增，但多運港滬兩地」。港滬是英國對華的經濟據點，它的商品攻勢，當然從這二處着手。由於英國之致力於擴展遠東貿易，是很可以看出英美在華利益的衝突的。

第五、日本請降，八年的抗戰，勝利地結束了；但中國國內的和平建設，並未跟抗戰的勝利而來臨。因為中國的法西斯派在它存在的一天，總不忘懷於摧殘民主與堅持一黨專政；而同時，國際上代表獨占資本的反動派，在希特拉、慕索里尼死亡之後，竟承繼法西斯的衣鉢。補充希特拉慕索里尼的崗位，瘋狂地進行其摧殘民主勢力及鎮壓民族解放運動的反動政策。中國人民在廣大的解放區的成就，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中國的反動派在國際反動勢力的支持與援助之下，就瘋狂地開展內戰了。一九四五年十月至十二月間，從綏察一直到海南島，大規模的內戰是在進行着。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的停戰協定，政治協商會議以後的五項協議與整軍方案及東北停戰協定，雖然先後簽訂，但墨跡未

乾，中國的法西斯派就把它們一手撕破了。東北打得稀爛之後，接着又是關內的大打，九個省份完全被戰火所燃燒了。

以內戰代替外戰，是勝利以後一個極其嚴重的變化。這些醉心以武力統一全國的人們，對於抗戰是消極的，是旁觀的；而對於內戰則極其熱心，極其英勇。因此，內戰的破壞性並不會比敵寇的三光政策來得輕鬆。人民被屠殺，廬舍被焚燬，農田變成砲彈的目標了。它不但給與那些浴着新民主主義的陽光的舊解放區和剛剛打退日本強盜及偽軍的新解放區以摧毀，而且沉重地給與大後方和收復區以極大的打擊。以田賦為例，當局曾經宣佈豁免收復區三十四平度的田賦，但事實上，各省仍在迫繳軍糧，有的地方則豁免一年（三十四年）而追補以前七年；有的地方則索性把八年的舊賦一齊索還，重慶商務日報會登載下面一項消息：

「晉省汾南各縣，各種攤派仍繼續進行，一向安靖之安邑，亦受其影響。縣長及國民兵團等隊尤為橫暴，任意搶掠，渠等目前之意圖，厥為追索八年糧賦，現拒絕交納者已有一人付之劍刀！」

用劍刀來迫繳田賦，這是什麼一個景象！上海文匯報更沉痛的說：「目前內戰還在準備階段（其實許多地方已打起來了），老百姓已經感覺到負擔太重而大喊吃不消。河南一個省要負擔一百萬正規軍（游擊及雜牌在外）和五六萬匹馬的糧草；蘇北一個角落，亦要負擔六七十萬人的駐軍。這如何能

行？今年全國糧荒，湘、粵、贛、鄂以及其他各省，真可說得上餓殍遍地，然而不管你餓死多少人，軍糧還是得繳納，而爲了徵集軍糧，鄉保甲長又可上下其手，大舞其弊。在這種情形之下，民衆如何能够無限期地忍受下去。現在有許多地方的民衆，忍耐已經超限度了。農民暴動甚至在江南素稱文弱的地帶，亦成了司空見慣之事。這就證明當前的社會危機，又是如何嚴重』（三十五年五月十四日該報社論）。

內戰迫使人民吐出一點活命的糧食去充當軍糧；內戰驅迫年富力強的壯丁去充當砲灰，減少農村的勞動力；內戰獨佔了汽車輪船甚至木船的噸位，障礙了復員工作和商品運輸；內戰增加了國家的支持，加速了財政的破產。內戰給與投機份子以活動的機會，使物價和金價不斷的上漲。內戰破壞了農村和城市的生產機關，更進一步的降低人民的購買力和縮小中國的國內市場。這一切，說明：抗戰勝利之後，中國經濟爲什麼這樣的疲弊？爲什麼這樣的凋零？

以上所說，都是一些抗戰勝利後發生變化的條件；有沒有一些條件是從戰時保留下來的呢？我認爲有的。戰時經濟至少有三個條件是在勝利以後仍然發生作用的。

（一）惡性通貨膨脹在急速的增加。八年抗戰，財政支出，一年比一年的增加，但收入並沒有跟着增加，每年赤字平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這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赤字，是依靠印刷鈔票來補充的。據官方報告，截至抗戰勝利時止，法幣總額爲六千餘億元，較抗戰前增發了四百多倍，但實際並不止此

數。抗戰勝利以後，爲了內戰，支出更形增加，而稅收更縮小，政府的支出極大部份要靠法幣來維持，據上海文匯報的材料，政府每月發行的通貨數字竟達二千億元之鉅，中國的惡性通貨膨脹，在勝利以後不但沒有減弱，而且作更進一步的發展。

(二) 官僚資本在美國獨占資本扶助之下，更急速的發展起來。在戰時，大後方的獨占統制政策，使官僚資本得着順適的條件；勝利之後，美國獨占資本的大規模侵入，又給與它以順適的條件。因爲官僚資本是有買辦性的；大官僚是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買辦。故外國獨占資本在中國的發展必定引起官僚資本的發展。長江、揚子及阜中等企業公司不是一些例子麼？同時，官僚們操縱國家政權，利用國家資本以壟斷工業，所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蠶絲公司」、「中國石油公司」以及「中國漁業公司」，都是勝利後他們做出來的好文章。這樣的操縱壟斷，民族工業的奄奄一息難道是偶然的麼？

(三) 生產事業的繼續衰落。在戰時，生產事業特別是民族工業是衰落的，那時形成民族工業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原料缺乏，成本太貴，租稅的負擔太重，和官僚資本的壓迫沒法抵抗。這些因素，在勝利後依然繼續下來。勝利來臨之後，物價更漲，成本更貴；租稅負擔，並未減輕；官僚資本的活動，比以前更甚，而內戰與美國獨占資本的威脅，則爲戰時所沒有的。因此，後方的工廠在勝利來臨時關門了；收復區的廠礦，大部份沒有開工。在勝利初時，大家在搶買政府拍賣的敵僞工廠，到了半年之後，那些買得工廠的人，倒反覺得工廠是累贅了！特別是美國貨大量入口和美國資本大舉入侵的

時候，許許多多已經開工的廠都宣告關門了，這不是使人們担心的麼？

這就是中國抗戰勝利以後所引起的變化。這些變化處處給與中國經濟以巨大的影響，使中國經濟更急速的波動起來，在這裏，我們還應記取的是：

第一、這些因素的作用，並不是一致的。牠們彼此之間可以互相對抗，互相對消。例如戰爭（抗戰）封鎖之廢除，本是有利於發展工商業的，但內戰却否定了這些作用；日本垮台了，民族工業應該是可以抬頭的，但美國的獨占資本又否定了這個可能；通貨膨脹使物價會不斷上漲，但外國商品的巨量輸入，對於某些物品又沖淡這種作用，我們應從聯系的觀點去把握這種關係。

第二、這些因素所發生的作用並不平衡，我們應抓住重點。在這裏，美國獨占資本的侵略，內戰的蔓延和官僚資本的壟斷操縱是比較重要的。而三者之中，法西斯好戰派所掀起的內戰，尤其重要。爲了內戰，法西斯好戰派和買辦官僚，不惜以中華民族的財政經濟的命脈，拱手送給美國獨占資本，爲了內戰，政治就更加獨裁，更加腐敗，官僚資本就獲得更可以發展的條件了！

二 跌價的恐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這一天，是中國結束戰時經濟而步入「平時」經濟的標誌。日本強盜請降的消息廣播出來後，整個世界在歡欣雀躍；中國各個區域的經濟，亦同時起了極大的騷動。這種騷動

是可從物價和金價的急轉直看出來的。

在勝利前夜，各地物價都在飛漲。此時歐戰雖已結束，但國外物資的大量來華，尚非短期所能實現，日寇敗象雖著，但遠東戰局的澈底解決似尚有所待，加上各省農村亢旱，所以物價不斷飛漲，據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所編製的「重慶二十二種基要商品躉售物價指數」，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指數（以一九三七年一月至六月為一〇〇），食物類為一五二、〇四〇；纖維類為三七六、一〇〇；燃料類為四二九、四〇〇；金屬類為二九一、一〇〇；木料為二四〇、一〇〇；雜項類為一〇二、六一〇；總指數為一七六、五六〇，躉售物價指數是未能完全表示物價的實況的，但從這些簡單的數字，就可看見當時物價的氣焰了。

日本的投降，突然地改變了市場對於物價繼漲的預期。一般商品的市價急速地傾跌了，重慶二十二種基要商品躉售物價的總指數，八月十日為一七六、五六〇；八月三十一日為一四三、七〇〇；九月十五日為一二〇、〇〇〇；九月三十日跌至一〇五、四五〇。從八月十日至九月底約跌百分之四十。各種商品中，以金屬類最甚，約跌百分之六十九；跌得較少一點的為燃料，僅跌了百分之十八。昆明的行市，比重慶跌得更兇，該地棉紗價格最高時，每古曾達八萬元，日本投降前夕，每古約五萬元，到了九月十日便跌至一萬元左右，一個月間竟跌百分之八十；同時，布疋跌為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百貨跌落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五；土雜跌落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米價約跌百分之五十。不僅重

慶昆明如此；西安、成都、蘭州以至貴陽各地亦未嘗不如此。這是長期漲價的一個反動。

勝利後各種商品跌價的程度是不一致的。大概戰時漲得最利害的商品，在勝利來臨時亦跌得比較多。依商品來源分類，戰時上漲最烈者為外國商品，稍次為外省產品，而以本省產品之上漲為較緩。渝市的國外產品八月五日的指數（以民國二十六年一月至六月為一〇〇）為七六一、六〇〇；九月份為四三九、九〇〇；十月份跌至四〇〇、八二〇；外省產品八月五日為六六八、〇〇〇；九月份為四二七、五〇〇；十月份為四六一、九六〇；本省產品八月五日為一九七、二三〇；九月份為一三六、七二〇；十月份為一三九、六三〇。如果以商品加工的程度分類，則以製成品上漲最速，半製品和原料品則遠為落後。渝市的製成品市價指數，八月五日為八八一、二二〇；九月份為五三〇、九〇〇；十月份為五一四、四三〇；半製品八月五日為二九七、七一〇；九月份為一九七、一三〇；十月份為二〇七、六八〇；原料品八月五日之指數為一七六、八三〇；九月份為一二二、八六〇；十月份為一二一、七七〇。製成品外省產品和外國產品之所以下跌較速，是因為這些商品都屬於非必需品，其需要彈性較大。戰爭結束，來源當可增暢，故握有此類商品之囤戶，相率向市場拋售。

至於收復區物價在勝利後的動向，則稍異於後方，八月十一日後收復區物價曾一度狂跌，但為時甚暫。如上海物價在八月下旬即開始回漲，較中旬高出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九月下旬偽中儲券的兌換率（二百對一）正式公佈之後，上海以法幣計算的物價更加猛漲。除東北及台灣外，收復區各城市物

價回漲之速，大概與上海差不多。

與商品之狂跌同時，各地金融亦在勝利後起了極大的波動。這從黃金、外匯、及銀根三者的變化可以看出。

關於黃金，自八月一日（一九四五）六行局開始兌付七月以前到期黃金期條與存單後，因市場供給增加，這個月七日市價即跌進十七萬（官價）以內。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金市頓起動搖。投機者紛紛忍痛拋出，金價更趨下跌。渝市八月十日的金價為十六萬，至九月十日竟跌至四萬八千元。昆明的金價，從八月十日的十八萬元跌至九月十日的四萬元。一個月間重慶金市跌了百分之七十；昆明跌了百分之七十八。美鈔方面，亦與黃金一齊下跌。重慶的美鈔八月十日為二千二百元，九月十日瀉至八百二十元；昆明美鈔，八月十日為二千一百元，九月十日跌至六百五十元左右。計在日本請降後一個月間，重慶美鈔跌了百分之六十；昆明跌了三分之二。

因為年來後方之銀行及商號，都在做商品及金鈔，商品金鈔跌價了，銀行和商號便不得不一齊下水。「八半」比期拖過之後，重慶每日行莊之交換額在四五十億之間，差額常達十億左右。銀根越緊則拆息越高，因之，黑市日拆，每日竟漲到四元五角之譜。其他城市，亦未嘗不如是。昆明各行莊在「八比」頭寸不足者，竟有十七家之多。就是例證。

商品和金鈔的急激波動，給與銀行、錢莊、商業和工業以嚴重的打擊。抗戰八年，中國後方的商

品之生產、交換，以至貨幣和信用的轉運，是在物價繼續飛漲的局面下進行的。物價之不斷上漲對於一切經濟事業並不有利，但因為一切都在看漲，工商金融的經營比較有把握，此時忽然來了一個冷不及防的急速下跌，無論商業金融和工業，都是吃不消的！

先說商業吧，物價暴跌，過去以高價進貨的商家自然虧折；消費者在物價繼跌時意存觀望，商品銷路自然沉滯；而同時，在囤積居奇的氣氛中，商團不僅不用自己的資金，而且使用着從別人借來的資金。到期債息必需歸還，但資金却凍結在跌價的商品之中，商家之陷入苦境是沒可避免的了。勝利後重慶市商會致政府的呈文中說得很哀婉：「一般物價，除食品外，大都畸形下跌，……於是工商各業大都淪於整個停業狀態，各業面臨新的危機，既受貨物慘跌的損失，復感資本凍結之苦悶。而且利息負擔，營業費用，有增無已，坐食山空，血本日蹙！」因此，勝利後重慶倒閉的商號，較著者有永昶、瑞隆等十餘家；涪陵有同昌合等十餘家，萬縣有六七十家，南充有六十餘家，內江有二百餘家，貴陽有六七十家，此外，昆明、西安、成都、三台、閬中、永川等地，倒閉的商號亦不在少數。

至於金融，在戰時，物價和金鈔不斷飛騰的情況下，銀行和錢莊若僅從事於正當業務，恐怕連開支亦不敷，故絕大多數的行莊，都致力於金鈔和商品的投機。勝利來臨，物價和金鈔都暴落了。這就使各行莊的資產打了一個極大的折扣。牠們對於貨幣和商號的放款，一時不能收回；牠們直接投放在商品和金融的資金，亦因凍結而不能收回；但對存戶的提存却必須應付，同業間則都自顧不暇，無力

互助，故勝利後的整個金融業，都處於危險萬分的情況中，以重慶一地而言，此時被中央銀行停止交換或停閉的行莊，計有同豐銀行（九月一日），華僑興業銀行和義亨錢莊（九月四日），安康銀行（十月三日）和豐銀行（十二月十一日）以及大夏銀行（十二月十七日）等七家。外埠銀錢業倒閉的有瀘縣宏文銀行、自貢友信銀行，內江全興錢莊，西安裕誠、天德福銀號等等。

工業方面，因為銷路驟停和物價驟跌，廠家要吃虧二方面的虧。物價跌得太快，而他們手中的原料等等，則是在物價高漲的時候購入的。這就使廠家大虧其本了。而同時政府又停止定貨（戰時生產局的定貨），那就只好減工或停工了。大後方較大的工廠，如中國興業、資渝、資蜀、渝鑫、順昌、恆順以及中國製鋼等鋼鐵廠，洪發利、張瑞生、晉豐、利人、川大實業、新中、鴻發興等機器廠；裕華、沙市、中紡等紡織廠，都在這個時候，停止一二個部門的生產，或大規模的解雇工友了。規模較小的工廠或作坊，其慘敗之狀，更不必說。重慶的土布業，六月份以前，月產土布四萬疋，九月份即減至九千餘疋，全部或部份停工的達三分之二。據十一月七日中央社訊，渝區原有產業工廠七百二十三家，此時停工者達二百〇一家。其在貴州，原有大小工廠一千五百單位，此時停工關門者，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資委會昆明辦事處所屬廠礦十四單位，及有關國際貿易成品之四工廠，亦奉命緊縮；西安完全停工的煤礦有恆通等十八家。這種慘狀是抗戰初期遷建的時候所夢想不及的。是年十一月一日後方工業界對當時緊急情勢曾發表沉痛的宣言，他們說：

「經多方呼籲，政府始有五十億元緊急工貸之貸放，惟其核定數額，大抵均不足兩月餘來一切支出之半數，其餘各方拚湊，高利貸借，方可勉強應付，……目前情形，在生產效率上已極度降低，僅及戰前百分之三十，……機器鋼鐵業自勝利後大抵不獲再接定貨；紡織業花紗原由政府供給，現因棉花來源斷絕，勢將停業。煤礦業缺乏流動資金，化工及其他機製日用品銷路，以收復區與後方價格之懸殊，亦曾停頓，各業對於營業前途，實已均瀕絕境！」

看看各地廠礦停工關門的情形，我們可以相信工業界的呼籲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在戰時，當局的管制和獨占的政策已經使牠們無所措手足了，現在氣候突然轉變，這一個長期害病的病夫，如何能支持得住呢？

這個時期（勝利後二個多月）中國經濟的急劇波動的基本成因，我們在前一節已經指出了。這就是日本投降，抗戰結束，中國在基本亦已脫離閉關經濟狀態，又開始回復到戰前的開放經濟。大後方的封鎖狀態取消了，大後方與收復區合一了。這麼一來，膨脹了的法幣因為地域之擴大就會在一定時期中減輕其推動物價上漲的刺激力；而一向缺乏的物資則因為封鎖之解除而呈現出一種可能增加供給的傾向。於是，物價便不期然的跌落了。這是根據前面所敘述的基本條件的看法，如果更進一步來考察，則下列幾點仍是值得注視的：

第一、戰時囤積居奇之風，橫掃整個後方，銀行直接間接都從事囤積貨物；黃金政策實行以後，

銀行商號又多了一條投機的道路。這些投機者的資金，極大部份是拉借得來的。戰事突然結束，銀行存戶爭相提款，債權人追迫債務人還款，但此絕大部份的債務者，却把資金凍給在商品或金鈔上；欲向銀行再行借款是不可能的。爲了清償債務，商人和囤戶不能不減價拋出商品；銀行和金融投機者不能不忍痛拋出黃金和美鈔，故銀根緊迫，是促成商品和黃金美鈔下跌的一個因素。

第二、法幣與偽幣的比率定得比較高，在京滬一帶是一與二百之比。這個比率在短期內勉強地提高了法幣在收復區的購買力，相對地壓低了收復區的一般物價。所以，收復區的物價低而大後方的物價高，因之，大後方的法幣大量流至淪陷區，物資則由收復區流入大後方，雖則在這二個月，收復區的物資還未能迅速輸入後方，但影響是不能說沒有的。

第三、因爲環境突然起了變化，因爲封鎖突然解除，因爲收復區與大後方的合一，商人們都改變過去的心理，都以爲物價必定會繼續下跌，都以爲法幣可能在「下江」吃香，因而拋貨物，抓法幣，便成爲一時的風尚了。至於一般消費者，則因爲抗戰結束，許多人打算回去，許多人打算轉移地區，以前打算購置的東西就不再購置了。不但不購置新東西，而且把家裏的東西，拿出來擺地攤，增加市場上商品的供給。這種樣子，商人拋貨，一般人家亦在拋貨，供給驟然增加，物價是沒法不跌的。

第四、如果人民並不怎樣貧困，如果社會購買力並不那麼衰落，則物價下跌，正是人民補充物品的良機。有供有求，相去不遠，則市況或許不會呈現這種慘狀。無如八年以來，大後方的財政經濟政

策不是執行有錢出錢錢多多出的原則，而是執行着「無錢者既出力而又出錢，有錢者既不出錢而又賺錢」的政策，因之，人民的血液便一天一天的稀薄了。大家都在貧困，誰都買不起便宜東西，市面上祇有供而沒有求。祇有供而沒有求，物價自然更急速地跌落下來了。

這些因素，促使物價在百尺竿頭，突然下跌，但物價下跌的結果，又加強這些因素的作用。這是物價驟跌的影響的問題。現在，讓我們看看物價驟跌的影響吧！

或許有人認為物價和金鈔的暴跌可以減少富裕階級的收入吧！但我以為這個問題是不能抽象地去措理的。沒有魄力的小投機家，或者會吃到貨物和金鈔跌落的虧，至於那些佔有特殊地位的人們，正大大不同。他們可以坐飛機把法幣運到收復區，放手大發其「復員財」，放手地去「接收」或「徵用」敵偽的財產。這真是錦上添花；有辦法的到底總有辦法，那裏會吃到物價下跌的虧呢？反之，那些出賣勞力的勞動者，正是水深火熱的。在戰時，後方各地工礦，雖困苦不堪，但生產還可拖下去，工人的失業，還不至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物價驟跌，銷路停滯的結果，工廠多半停工減工，工人多半成爲停工減工的犧牲品了。物價貴時，職工還有工可做，還可把生活勉強支持下去。到了這個時候，大家失業了。物價雖跌，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他們從那裏取得法幣來購買這些便宜的物品呢？何況日用品並不跌價？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次經濟恐慌的第一個影響是：富者更富而貧者更貧了！

這次的戰後恐慌，一如人們所希望的一樣，許多「底子」不好和效率不高的企業，都在「物競天

奪」的原則之下，被淘汰了。債務的追迫，銀根的緊迫，使他們不能不垮台；而人們的有意的援助大企業，犧牲小企業的做法，在美妙的「調整」的口號之下，發生不少作用。一些沒有倒下去的中等企業，爲了存在和發展，不得不進行增資和改組，但增資和改組的內容，無非是乞靈於有力的人物。資本集中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了。

還有一個特點，這就是大後方的廠礦的被否定。戰時東南廠礦之向西南遷移，改正了近百年中國工業分佈的偏在，可是，這一次的經濟危機却無情地把這個趨勢打破了。當然，摒棄西南後方工業的做法，早在這次危機發生之前便存在着。以打算盤的眼光，寧可把自己的工廠放在一邊作自然的消耗，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不過，如果沒有這樣的危機來掃蕩，則國營工業縱然被人一脚踢開，但民營工業仍可支持下去，然而經濟危機却像一陣颶風，把這些民營工廠的殘骸吹得乾乾淨淨了。否定中國工業分佈的偏在性的遷建運動，又被這個危機所否定了。

這就是勝利來臨後的經濟恐慌。有不少人認爲這是不足爲奇的一回事，因爲這種恐慌曾見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之歐洲各國，又見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英美諸國。但這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人家的戰後恐慌，還有他們的工廠、礦山和農場；人家的戰後恐慌，毛病是在於東西太多，沒法銷納，而中國呢？我們的戰後恐慌是什麼呢？除了從美國運入的黃金和滿天飛的法幣之外。還有什麼呢？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這種危機，難道可以看成資本主義國家的戰後恐慌嗎？

三 殖民地化的危機

勝利後物價的下跌，到了這一年的十月初便達到最低點。據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所編製的重慶十二種主要商品躉售物價指數，日寇投降前夕較戰前上漲一七七〇倍弱，到了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便降至一〇二四倍，較八月十日下午跌百分之四二·七，但從此以後，又重新回漲了。十月份的總指數爲一一八、四一七；十一月份爲一三五、〇八五，大後方其他城市，亦有同樣的情形。成都的物價，在是年十一月上旬，比日本投降時漲了一倍或二倍，十一月中旬，漲勢更猛。昆明「自九月下半月銀根回寬之後，物價又復回昇，直至十月二十日棉花上升約百分之三十；布疋約升百分之八十，棉紗升百分之六十」。其在收復區，上海的物價從九月下旬僞中儲券的兌換率正式公佈後，以法幣計算的物價更節節猛漲。據中國經濟研究會的統計，十一月份的一般物價指數較九月間上漲四倍半以上。南京十一月上旬物價指數，爲戰前一、五六八·九四倍，爲勝利後一月之三·七七倍；北平物價十月下旬較十月初高漲四五倍以上，廣州的物價十一月半較勝利前漲七八倍。由此可見，十月以後的物價，一反勝利初期時的趨向。各地在進行着激烈的競賽，收復區影響了大後方，大後方又推動了收復區。互相推動，互相反射，物價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循環飛漲了。

十二月和一九四六年的一月，各地物價比較平穩，但這種平穩只持續了二個月左右，到了春節前

後，各地物價又走上一個新的險惡的階段了。據中國經濟學會的統計，一九四六年一月份上海躉售物價總指數（一九三六年爲一〇〇）爲一九一、四二八·三（而一九四五年九月只有三四、六七〇）；二月份跳至三二七、六六九·三。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所製的上海二十三種基要商品躉售物價總指數（以一九三七年一月至六月爲一〇〇）較爲低一點，二月份祇有一八六、〇九五；但到三月份則跳至二七五、九〇〇。三月份比二月份高漲百分之四八·三，重慶方面，一月份之總指數爲一三三、七一，二月份爲一四一、七五〇；三月份漲至一四七、八〇〇。四五二個月，漲得更快。這種飛漲，就是從官方所公佈的工人生活費指數。亦可看得出來。據上海市政府的統計，上海工人生活費指數一九四六年一月份爲一九三六年之一千二百七〇倍，二月份爲二千〇六十三倍；三月份爲二千七百五十五倍；五月份竟突增至四千零九十六倍。這種漲法，實在是駭人聽聞的！

物價暴漲的原因，我們在分析「勝利後局勢的變化」時，已經指出來了。最主要的一項，是內戰的蔓延。一九四五年雙十節協定簽訂後不久，好戰派就在各地放起烽火來；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的停戰協定，雖然在關內把戰爭停下來，但中國法西斯派却又在美國的支持之下，在接收「主權」和「恢復交通」的口實之下，進行關外及關內的大規模的內戰。內戰刺激了投機，增加了消耗，擴大了財政的支出，更飛躍地提高了法幣的發行額。在這種情形之下，物價如何不飛漲起來呢？

內戰的破壞與由內戰所促進的惡性通貨膨脹，乃是物價暴漲的根本原因，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

因素是不能輕視的。這些因素是：

第一、幣制的措置不善。當局對於偽幣，有些地方拖了幾個月仍未釐定比率；有些地方則在不照顧人民的利益之主觀做法之下，盲目地決定一種不合理的比率。天津北平是前一方面例子（到三十四年十一月間才決定比率）；上海南京則是後一方面的例子。平津的偽幣比率拖延不決，使人民紛紛以偽幣換取物資，以避免損失，這是促使物價上漲的。京滬一帶，則因偽幣的比率規定得太低（二比一），商人們在把貨價換成法幣，暗中提高物價，這種提高是必然的。因為按照二比一的比率，三十四年九月份上海物價水準只合戰前三百五十倍左右；而此時重慶的物價則為戰前的一千二百二十六倍。大後方的物價既不再下降，則上海的物價必須較九月份水準增漲四倍左右，然後才能與大後方的水準相接近。故上海物價在九月以後之上漲，是帶有調整的。這是「二比一」的比率所引伸出來的必然的結論。

第二、接收工作的腐敗，使收復區的物資遭受極大的損失。事實告訴我們：所謂接收，就是搶奪、敷衍和揩油。甲部說這個工廠屬於它；乙部則說這個工廠屬於牠。有的時候，一個工廠不僅二個部在爭執，甚至有二個部或三個部局在爭執。紗廠要棉紗，但是手執鎗桿的武裝人們，却說這是軍需品，不但把布封存，甚且把紗封存。上海在演出這幕悲「喜」劇；天津和其他一些城市亦在演出同樣使人搖頭悲「喜」劇。爭執之外，怎樣接收呢？辦法是很簡單的，第一件事是打開保險箱；第二件

事是打開大前門；第三件事是開着後門不管。這麼一來，許多接收的東西便不翼而飛了，許多生產機關便被破壞了。李燭塵先生曾舉了一個例子：「一家鐵廠，正在開爐，接收人員一到，馬上勒令停止一切，於是一爐鐵就冷在爐子裏，化鐵爐亦就沒法再開了」。無知與貪污，不知損害了民族國家的若干財產！物資損失了，生產停頓了，市場上商品的供應便沒法不減少了。像這樣，物價怎能不回漲呢？

第三、勝利剛剛來臨時，市場上上人的心理都看跌，由「存貨」不「存錢」的心理，轉變為「存錢不存貨」，因之，投機活動比較削弱一點，這不能不說是物價跌落的一個因素（當然，這個因素是有其客觀的根據的）。接着，內戰日益蔓延，通貨日形膨脹，三十五年度二萬五千億元的預算公佈後，人心更加不安，於是投機活動又回到抗戰時期的狀態，大家又再受到「存貨不存錢」的心理所支配了。不但如此，勝利以後，隨着淪陷區的收復，投機活動的中心地區已從昆明重慶轉移到上海天津等沿海大城市了。上海天津等市場的經濟力量和投機經驗，是大後方重慶昆明等地所不能比擬的。而且大後方的投機家，鑑於上海等地的子金之高漲和投機市場的活躍，又不斷把資金順流東下。據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上海聯合晚報所載：「重慶每天都有十億以上的籌碼向上海流去，偶然最低的數量亦不下六億元」。到此時，上海的游資總量，竟增加至六百億元左右。這六百億的游資就每天在這個「十里洋場」上，進進出出，興波作浪。上海已恢復其為全國的經濟中心了，上海市情在巨量的游資

鼓動之下，自然會把牠的影響推廣到全國去了。

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就使物價瘋狂地飛漲起來，遠遠地邁越抗戰末期的水準而前進了！

這個時期物價暴漲的特點，可以歸納如下：

(一) 收復區的物價比大後方漲得更快。如上面所引，(據中央銀行經濟研究室的統計)，重慶的物價總指數，三十五年一月份爲一三三、七一二；二月份爲一四一、七五〇；三月份只漲至一四七、八〇〇而已；但上海的物價總指數，二月份爲一八六、〇九五，三月份則漲至二七五、九〇〇，三月份比二月份增加百分之四十八·三。四五月間，上海物價更漲得使人可怕，米從二萬九千元竟迫近八萬大關；而重慶的小米才二萬七千餘元。

(二) 以物品種類而言，影響生活費用的米糧和建築材料等上漲較速，而出口品的價格則停滯不前。上海米價從一月下旬不足一萬元漲至五月間的六萬餘元，差不多漲了六倍餘。反之，出口品的價格則沒有多大的提高，當一般物價漲到比戰前高三千倍的時候，出口品的價格只漲千餘倍，這是因爲國外市場的價格低，中國的出口品價格高，因而銷不出去的原故。

(三) 外國貨的價格與本國貨的價格作剪刀形的發展。外國商品的成本本來低，再加以不合理的外匯比率(二千二百左右)的關係，外國貨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力量就更大了。美國製成的棉紗，每磅只需成本一角七分美金(合法幣三百七十四元)，而我國廠商所製成的棉紗，每磅至少需美金五角以

上，（合法幣一千一百餘元）。從美國運到上海的水泥，每包市價祇需四千五百元，而本國水泥廠所製的水泥，每包成本就要八千餘元，如果把利潤算進去，則每包的市價便非一萬餘元不可。法幣越膨脹，成本越增加，中國國貨在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就更薄弱了。

勝利初臨時，中國各地展開物價跌落之危機；現在（卅四年十月以後特別是卅五年春節以後，）物價却不斷回漲，卅四年冬物價的回漲，已遠遠地超過勝利初臨時跌落的水準了。卅五年春節以後的狀況更像一匹無韁的野馬。這種情形是與勝利初臨時正相反的，這是不是意味着危機已渡過了？我們認為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這個時期物價之回漲是財政更破產，通貨更膨脹，游資更活躍，工農生產更加破產，物資供應更加減少的結果。美國貨的大量進口，雖能在一時補充某些物資的缺乏，但大多數的美貨不是有利於中國的生產，而是在打擊中國的民族工業的，故美國貨在中國市場之活躍，刻劃出中國殖民地化的危機，這是今後中國經濟一個嚴重的問題。

爲了明白美貨傾銷的嚴重性，讓我們看看進出口的情形吧，縱然出口品的價格並沒有提高，但到了外國市場比較着外國貨的時候，就顯得高了。查中國出口，一向以生絲、茶葉、豬鬃及桐油爲大宗。但上海生絲價格在三百五十萬元左右，而在美國僅二百五十萬元（三十五年五六月間情形，下同此），即使出口稅全免，亦要虧損不貲；茶葉在滬價格約二十萬元，但國外市價只有十二三萬元，桐油及豬鬃亦比外國高而沒法運銷出去。因此，出口貿易便呈現衰落了。三十五年前八個月的出口值

爲一五九、三五六、八六一、〇〇〇元，而同期的入口值則爲七五一、七八六、二六八、〇〇〇元。兩相比較，出口值只佔入口值的百分之二十二。在這個時期，國際善後救濟總署的物資進口約值一萬九千四百萬美元（截至三十五年六月底），如依法定匯率換算，共值法幣三九一、八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如果把這個數量與入口值合併計算，則出口值只佔入口總值的百分之十四上下而已。民國二十六年，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作急劇侵略的時候，出口值尙佔進口值的百分之八十四。當然，日本強盜當時嘗作無恥的走私，這一筆走私貨是沒有記在海關的賬簿上面的。就是把這筆賬算進去，出口值還可佔入口值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但勝利後的入口值竟這樣地凌壓了出口。這不是說明勝利後的經濟危機，比抗戰前夜還來得可怕嗎？

其實，問題並不僅僅是美國商品的傾銷，而且還有美國資本對華的直接投資。這一點，我們在後面將有詳細的敘述，此地不擬重複。在商品傾銷之外，加上直接工業經營，在工商經營之外，還加上航空與水運的控制，這麼一來，叫中國的民族工業如何能生存下去呢？在抗戰前夜，我們感覺到日本帝國主義（除了武力侵略之外）的經濟攻勢之可畏；現在我們感覺到美國商品和美國資本的可怕了。在美國商品的打擊之下，中國民族工業中最先倒臺的是化學工業，除兼營化妝品的化學廠以外，大多數化學工業已在死亡線上；接着便是電氣工業，上海各電氣工廠，此時都已在風雨飄搖之中；再其次，水泥業和織造業亦起了動搖。在這裏，還能勉強支持得住的只有紗廠與橡膠廠。不過，這個

時期，美貨來華還只是很小的一部份（屬於救濟總署的一部份），將來大量進貨，所有的民族工業的生存，那就更要成問題了。

剛才說這個時期中國能支持得住的生產部門只有紗廠與橡膠廠，這是對美國尚未巨量輸入棉紗和人造橡皮而言的，並不是說，這二種工業在這個時期沒有受到壓迫。以紗廠而言，這個時期的民營紗廠就在官僚化的國家資本的壓迫之下呻吟掙扎。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的飛黃騰達是以許多中小紗廠之衰亡為代價的，其他部門亦大致如此，官僚資本在勝利以後有很大的發展。在戰時的大後方，官僚資本多發展其封建性的機能（前資本主義式的囤積居奇）；抗戰勝利以後，海上的封鎖消失了。美國資本和美國商品像巨潮一樣滾進來，進口貿易的利益超過一切。於是，官僚資本就大大地發展其買辦性的機能了。三十五年六月三日上海聯合晚報就有這樣的一段描寫：

『在國內市場衰落，利潤較低的場合，官僚資本竟和買辦資本勾結，運用政治上的特權，制定不合理的匯率，趁着國內物價高於國外物價的時機，和人民爭取商業利潤，例如紡製十六支到二十支粗紗，國棉儘可採用，而官僚資本集團偏要輸入美棉；紡錠國內可以自製，而偏向美國輸入五十萬枚。因為輸入貿易有利，便計劃組織大規模的貿易公司，運用政治上的特權，壟斷貿易，使民營的進出口業陷入了絕境。』

官僚資本就是高級的買辦資本（當然它同時帶着封建性）因為殖民地的官僚，就是帝國主義者的

政治買辦。官僚資本是密切地和買辦資本結合在一起的。所以說「官僚資本竟和買辦資本勾結」是不大受當的。但這一段話中所列舉的事實却很實在。上海的三個貿易公司——「長江」、「揚子」以及「阜中」，壟斷了對外的貿易，每一個公司都代理了幾十家以至百餘家美國的工廠，使人側目而視。因爲某大官僚資本家有巨量的美國汽車，所以禁止汽車進口；因爲中國紡建公司獨占了中國紗業，所以四聯總處的工貸中，不許有紡織業的放款，反之，那個與民生沒有關係的烟草業，却可以容易地領到工貸了。民國三十三年在重慶所訂的中英中美新約中，剛剛把內河航行權收回，到了上海不久，碰到實際要發展航業的時候，却來一個新的四口通商——南京、蕪湖、九江、漢口，讓外國商輪通行無阻！這是矛盾而不可思議的，但這種矛盾不可思議的現象，却一幕一幕地發生在勝利後的中國了！

除了美貨傾銷和買辦官僚的爲虎作倀以外，促使民族工業破產的原因，還有成本和市場的問題。

由於惡性通貨膨脹和糧價飛騰，中國工業的成本不斷增高，但另一方面，產品的價格並未比例地上昇，以國產白報紙爲例：每令成本，三十四年十月份爲四、五七二元，三十五年三月份竟漲至二六、〇〇〇元，成本漲四五倍而紙價沒有變動。橡膠品以三十五年一月份與五月份比較，製造費漲八倍，經常費漲五倍半，原料費漲一倍半，而廠盤貨價僅漲百分之三十五。成本漲而貨價不能比例上漲，乃是一個明顯的矛盾。成本之提高，主要是由於通貨的惡性膨脹，不合理的統制政策的殘餘和竭澤而漁的租稅政策所造成。通貨膨脹促使糧價飛漲（當然天災亦是主要原因），促使工廠的比重提高，促

使利息上昇，亦促使生產工具漲價，「拿毛織品呢絨成本來說，戰前原料佔百分之八〇，廠繳開支佔百分之二〇；現在則原料佔百分之二五，廠繳開支佔百分之七五。皮革的成本過去牛皮佔百分之五〇，化學原料佔百分之二〇，工資百分之二〇，現在則牛皮佔百分之四〇，化學原料百分之二〇，工資百分之三〇，利息在百分之一〇以上。橡膠廠戰前原料佔成本百分之七〇，工資百分之三〇，現在則原料佔百分之一五，工資開支佔百分之八五」（三十五年六月廿五日大公報）。在通貨膨脹和糧價飛漲之下，工資是沒法使其不高的，在貨幣數量上，在工資的「底薪」上，上海工人的工資的確比以前提高，但工人所得的實質工資，是並未改善的。貨幣工資提高的責任要由政府通貨膨脹和囤戶的操縱糧價去負。至於利息之高昂，那是通貨膨脹必然的產物。它對於工業，尤其一般生產週期較長的工業，如機器生產週期從三月到半年，照二角的拆息，四個月利息就要超過本金。手帕織造的過程七十九天，六十支紗每件二九〇萬元，織成手帕，單單利息就要二二五萬元，如果一個有資金五千萬元的綢廠，其流通資金亦為五千萬元，照一角六分拆息計，每月利息要八百萬元。假定每月出鹽綉四百疋，每疋利息須二萬元，而市價不過二十五萬元。這樣沉重的利息，工業怎能不感到困難呢？中國的工廠，一般說來，機器都是陳舊不堪的，就是維持原有規模，亦要補充新工具，但因法幣貶值，戰前幾百元可買一隻錠子，這個時候一隻錠子竟漲到二十萬元了，這不是驚人的奇聞嗎？談到統制政策，在大後方已經「解除」，但在收復區的上海，統制政策的殘餘，還不斷地使廠家窒息。以燃料為例，

各廠所需之煤，若由各廠由產地自運，每噸五萬元便可，但燃料管理委員會的操縱之下，每噸規定官價爲十五萬元。這本來就比自運貴了三倍了，但是一般廠家還沒法以十五萬元的官價買得煤炭，因爲請得配給有如登天之難，而工廠的需要又亟迫切，結果只好向黑市購進，黑市市價平均在廿八萬上下，這比官價要貴十餘萬元，比自運價格要貴二十萬元，廠家這二十萬元的負擔，完全是燃料管制所賜與的。談到捐稅，亦會使人搖頭。工商業所負擔的捐稅，計有營業稅、印花稅、統稅、盈利所得稅、過份利得稅、租賃所得稅、財產出賣稅，除此之外，還有一種什麼牌照稅。所有這些繁複的捐稅，把工業壓得喘不出氣來！工業團體曾數次呈請財部要求營業稅照戰前辦法，按資本數額徵收，財部批駁的理由是：『製造業營業稅並非不能以營業額計算者』，這個理由，真是「文不對題」。人家要求的是：這樣計算是體卹工業或絞殺工業，而不是製造業的營業稅是否以營業額計算。捐稅當然能以營業額來計算。這是初中學生亦可明白的。在這種糊塗昏聩的做法之下，中國工業的成本又怎能不增高呢？成本高了，怎能與美國的價廉物美的商品競爭呢？

由於內戰、通貨膨脹、美貨傾銷、官僚資本的操縱壟斷等因素所造成的經濟危機，不但使廠家受不了，而且使工人活不了。在這裏，工人最吃不消的是物價高漲生活困難和廠家的關門減工迫使工人失業。因爲物價漲得太快，工人的生活沒法支持下去，所以工潮便不斷發生了。據上海市當局所公佈的工人生活指數，三十五年一月是戰前的一〇六五倍，工潮是二十三件；二月是一八四五倍，工潮是

三百九十七件；三月是二七五四倍，五月份是四〇九五倍，因之，工潮就發展到此起彼伏的僵持局面了。工潮的主要目的是在增加工資改善待遇，有不少人認爲工潮的勃發和工資的提高是民族工業危機的主要因素，這是不合事實的。民族工業的危機，一如上面所提，主要是由於內戰、通貨膨脹、美貨傾銷和官僚資本的壓迫；工潮的爆發是這些因素綜合發展的結果，而不是民族工業危機的基本原因。三十五年六月一日當谷正綱先生以社會部長的資格在向上海工業界代表申述「下絕大決心，將整飭勞動紀律」，以「保障工商發展」的時候，有一位萬象織造廠的經理蔡若民先生却以激昂的語調說：

「聽到谷部長今天訓話，覺得偏於理論而不切實際，可說是與民衆隔離得太遠。目前上海工商業的危機，勞資糾紛不過是原因之一，其實即使工人不要工資、不吃飯，中國的工廠亦是要關門的」。（六月二日大公報）

這位蔡先生是實際體驗到民族工業危機的真正原因的，他很客觀地把工資問題給與以適當的評價了。實際上，工人的貨幣工資雖然不少，他們的底薪雖比戰前高，但生活比前寬裕的則很少，「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實際的生活費用要高出生活指數；另一方面，大多數工人都有家庭負擔。父母妻子，一家四五口全靠一人做工餬口的，是很普通的現象。或者是丈夫失業，妻子當女工，每家有二個生產者，是很少的。除了應付四五個人吃用外，八年困苦生活後，衣著均需添補，有的長期失業，積蓄吃光，負債累累，還有意外的醫藥費，子女的教育費，都須從工資開銷，然而十萬元的數目，亦不過近一二

月才得到，這有限的錢，絕不能補償八年的窮困。」（三十五年五月二日上海大公報）

在業的工人，工資雖不足，但生活仍可拖下去；失業的工人，就沒法可想了。抗戰勝利以後，大後方的工廠大量關門，失業工人急劇增加，成都失業工人有三萬餘人；重慶五萬五千餘人；昆明西安的情形，亦大致如此。其在上海，據三十四年失業工人救濟委員會登記的數目，約十二萬人，但實際數目，恐要達到五十萬人。後來因工廠相繼開工，失業數目逐漸減少，但四月間仍有四五萬人在十字街頭徘徊着！美貨開展攻勢之後，工業衰落，工廠關門，失業的惡魔，正在張牙舞爪向着工人撲來！

工潮的爆發和失業人數的增加，是民族工業危機的深刻表現，同時，也是中國經濟殖民地化的深刻表現。如果不從根本上着想，却一味依靠政治力量，來禁止工人的呼籲（如三十五年五月底谷正綱吳國楨所宣佈的「不准工人怠工罷工條例」），這種做法，不但不能解救民族工業的危機，反而更加加深了中國的社會矛盾，更加降低社會購買力，更加縮小了工商業的市場！

四 殘破的農村經濟

經過八年的抗戰，中國的農村經濟走到了疲弊不堪的地步了。在受過敵人洗劫的區域，勞動力和牲口都大量的死亡，因而影響到戰後農業生產的恢復。以湖南一省而言，僅僅耕牛一項，就損失了六十四萬二千餘頭；勞動力的損失則達到二百二十五萬人，其他農具、種籽及房屋的損失，則更難以計

算。以河南而言，「農民生產的本錢——牲畜，被拉去的很多；農具在歷次戰役中亦多散失，種籽缺乏，田地荒蕪着」（三十五年五月廿五日大公報）。這是在敵人鐵蹄下的淪陷區的例子，就是未經淪陷的地方，亦因為兵役、軍糧、勞役和捐稅的苛勒，農村元氣，大受損傷。陳野軍君在大公報上曾有這樣的描寫：「譬如說在差役方面，兩隻牛抬一輛鐵輪的大車，拉着軍麥、木材、柴草、笨重的鐵軌以及官老爺的眷屬小姐太太，和他們的行裝大籠小箱，不論春夏秋冬，不分黑夜白日，由南向北，由東向西拚命的拉，拉，一幫車都是幾十輛甚或一百輛以上，半個月以至一個月都不能回家一次。在這長期的差役中，人畜的糧草差不多還要自備，可憐窮苦的農民又那有大宗的錢來供長期的出差費用呢？因此，飢寒疾病，慘狀百出，人畜死了，大車丟了」。爲了對付敵人的機械化部隊，硬要使平地變成高山，道路變成溝渠，但「壯年人抽壯丁去了，剩下小腳婦女和發育不足的孩子們來頂工，隨便來一個芝麻大的官放一聲屁，碌碌婦孺，如奉聖旨一樣就拚命的挖，但結果一經檢查，這樣不須要挖，趕快就填，填了再挖，挖了又填，他們像神話中的二郎神一樣。日夜做着翻山倒海的工作，爲此生病死亡和孕婦小產的悲劇亦不知演了多少！」（三十五年五月廿五日大公報）其在甘肅，戰前田賦全省總額每年名爲三十一萬石，實際徵收則在十二萬石左右，戰時壯丁出徵，生產減少，而田賦軍糧，却增至二百萬石以上，勉力輸將，已苦不堪負荷，何況還有繁重的差徭，苛細的供應呢？既淪陷的農村，受了敵人的洗劫；未淪陷的農村，則在黑暗政治的剝勒之下，已經走上山窮水盡的絕境。在

這種情形之下，勝利雖然到來，農業生產怎能及時恢復呢？

勝利後的中國農村，展開了一幅慘不忍觀的饑餓圖。讓我們列舉三十五年三四月間，報章上所披露的一些例子吧！

(一) 向被黨棍貪官視爲肥缺的廣州，三月間米價一漲便直趨十萬，每日餓死者達數十人。在三月廿一日至廿九日內便餓死了九百數十人之多。粵西羅定等地，且發生吃人慘事。

(二) 潮汕一帶遭受數十年來罕見的大旱災，沿海各地海水倒流，河塘龜裂，耕種宣告絕望，米價會一度漲至每石十二萬元，鄉民紛摘野菜鮮葉充饑，汕頭、潮安、澄海、潮陽、揭陽等縣，餓死者日有所聞。一個有四百人的鄉村，十日內餓死一百二十一人，棄嬰隨處可見，十斤米就可買得一小孩！

(三) 廣西全省九十九縣中，受災者佔三分之二，永淳、興安、靈川、百壽、永福、平樂、陽朔、融縣、榴江、遷江、忻城、河池、雒容、來賓、橫縣、賓陽、都安、田東等縣受災最重。三十四年全年糧食產量較三十三年減少一半，靈川、百壽等十八縣即減產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五公担。因爲天久不雨，有的地方從三十四年冬季就一直旱到三十五年四月。因之，耕牛渴死，雞犬絕跡，鄉民咸入山採蕨根、葛頭、土茯苓、剪刀菜、棕樹頭等物以延殘喘。近村山間採完之後，須遠赴深山，竭十日之力，始能獲得少許。桂北福塘村原有百七十人，現存者不及一半，全家死

絕者七戶；少壯死而老弱僅存者十戶。永福縣三月份（三十五年）飢民只有數百人，而到了四月份，飢民就增至一萬六千多人。

（四）湖南在兵災以後，又繼續遭受着旱災、火災、水災、蟲災、疫災及匪災。南起湘粵交界之宜章，北自湘鄂接壤之臨湘，西沿湘桂邊境，東連湘贛之瀏陽，都是一片瓦礫，荒蕪遍地。零陵、會同、南縣、永豐、衡山等地人民，自去年（三十四年）年底起，即已採食草根樹皮充飢，草根樹皮吃完之後，只好吃「神仙土」。每天因飢餓而死者。常在二百人以上。衡山的大堡鄉三千多人，聚集街頭哭泣；栗木鄉一千一百多人，請求政府發護照逃荒。永豐縣的德田鄉，佃農鄧承柱一家八人因絕糧舉家自殺！

（五）河南各地，樹皮草根及野菜，均被搶食；加以黃泛區十餘縣，土地被狂流冲刷，無數村落被淹沒，無數人民流離失所；豫南方面又經長期拉鋸戰，信陽、羅山一帶富庶區域，人烟絕跡，狼狐遍地，蓬蒿有長至直徑二寸粗者！

（六）甘肅去年（三十四年）因受旱、雹、潦、霜、諸災，全省收成不及豐年三分之一。目前甘省境內災民，除了全災區及半災區的壯丁將近三十萬人逃亡異地外，仍有一百八十八萬餘老弱婦孺，已經淪為飢餓的俘虜。他們有的投河自縊，有的舉家輕生，有的還在掘草根。吃草、剝樹皮，爭畜食，苟延殘喘的等待死亡！

(七) 陝西渭南入春以來，即遭亢旱，又受風乾，連日西風狂吼，黃沙滿天，樹木爲折，棉籽乾死，麥子發現黃丹，油菜到處生蟲！四月下旬狂風刮得更利害，農事更受損失！

(八) 四川亦因天久不雨，川南的廢符、筠連、宜賓一帶；川北的彭山、中江、射洪、三台、樂至、羅江、資中一帶；川東的渠縣一帶，萬里無雲，赤地千里。川北小春中，大麥損失十分之九；小麥損失十分之六。其他如油菜等物，均損失極大。春耕無望，夏耕亦成問題！

好嚴重的災荒啊！死神的魔掌已沉重地壓在廣大農民的頭上了！據聯合國救濟總署的統計，若救濟災區工作不加緊進行，則中國人民之死於飢饉者將達三千萬人。有統計的災區達十九省，各省災民之人數約計爲：湖南五百萬人；河南四百萬人；江西二百萬人；山東二百五十萬人；浙江、福建、山西及廣東各一百五十萬人；安徽、東北、廣西各一百萬人，其他各省未詳。現僅四百萬人獲得極小量的救濟！這是聯總幾個月前的報告。時光飛也似的逝去了，政府當局對於救災工作，如何應付呢？

中國政府當局的辦法，是百分之百地依靠聯合國糧委會來救濟。據英國駐東南亞特別專員吉勒恩勛爵的報告：聯合糧委會估計一九四六年四月至六月一季中，東南亞可產糧二八五、〇〇〇噸；其中五〇、九〇〇噸交聯總轉中國，同時並規定：該區糧產如超過此數，第一個一萬五千噸亦應交聯總轉中國，但後發現該項估計過高，該區產量不過二十萬噸左右，僅合原來估計數之百分之七十，因而分配中國之數量，亦不得不減去百分之三十，而成爲三五、六三〇噸，加上補交第一季糧食九、六八

七噸，合共四五、三一七噸（見三十五年六月七日大公報）。以前不算，單以這一季而論，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七噸只合九百餘萬担，就算是一千萬担吧，分明是不足以供應偌大的災區的。例如湖南一省每年消費量爲一萬萬一千五百萬担，三十四年僅產穀六千七百萬担，另收穫各種可資補助民食之雜糧約二千七百萬担，事實上缺糧二千萬担，若按人口分配食糧，尙有五百三十萬人無糧可食，而撥到的善後救濟物資，僅勉強解決五十萬人之糧荒，尙有四百八十萬人坐而待斃！這就是說，救濟的糧食只解決了十分之一的飢荒！又如甘肅，除了三十萬壯丁逃亡異鄉之外，尙有一百八十八萬八千餘人，嗷嗷待哺，每個災民每月需糧以三斗計算，總共需糧三百九十六萬石，以最低的糧價每石一萬元折合現金，計需糧款三百九十六萬萬餘元，除已發放過二萬萬四千萬元的急賑外，尙須一百六十倍的賑款！由此可見：聯總的救濟與需要實在相差很遠！

聯總的救濟本來是不够的，更不幸的是，還有許多因素不斷地從災民口中挖出食糧來！或者使用偷偷摸摸的辦法，進行侵吞；或者提出國家糧政的大帽子，明目張胆的對人民進行苛剝。偷偷摸摸的辦法可用溫州集雲鎮劣紳黃克臣的幹法作代表。據三十五年六月十日大公報所載，該黃某領到救濟粉後，僅以少量配發災民，從中剋扣，冒領歸私，將侵吞之麥粉轉售某麵坊，獲取厚利。黃某除了從中剋扣之外，還倚勢向災民苛勒。有集雲鎮四保征屬災民蔡永林領到麥粉後，翌日卽有張巖興來對該災戶威脅，迫其出麵五斤送黃。經揭發後，黃乃大張筵席，請客說項。這種偷偷的剋扣辦法，是太普通

了，普通到引不起人注意的！不過，這是小鬼的幹法，如果比起那些用國家糧政的大帽子的人來，那是不能比擬的。

爲了要打內戰，當局除了把聯總所接濟的糧食，供應軍需之外，更不顧人民死活，急如星火的催迫軍糧。以江西爲例，這兒的人民在吃樹皮、吃草根、吃觀音土，上吊逃亡的日有所聞，但當局却無動於中的徵勒下去。那一位盡忠於專制制度而又不忍「困人民」的田糧處長程懋型先生，迫得沒有辦法，終於投江自盡了，但這種悲劇，真像針沉大海，連一點反應亦沒有。大公報上有一位徐光炎先生這樣寫着：

「江西已經不是有餘糧的省份了，却也還要加緊徵購餘糧，是第一種矛盾。江西需要救濟是事實，救濟總署的麵粉正一批一批往江西運進，而江西的米却一船一船的往外運出，是第二種矛盾。救濟麵粉能够補償輸出的糧食嗎？不！第一、麵粉的數量抵不上出口的米；第二、麵粉如果發給平民，亦許對糧荒可以算一個對策，但除極少數以外，都係賣給商家，它們變成了有米吃的富人們的餅乾、雞蛋糕、小籠包……一類的點心了」（三十五、五、廿九）。

重重的矛盾，充滿在救濟災荒中，江西是這樣的狀況，其他各省又何嘗沒有這種狀況？看看靠近首都的江陰、金壇和宜興的狀況吧。在江陰，爲了催繳軍糧，縣政府派了武裝警察下鄉催繳；在金壇，去年（三十四年）已經徵出四萬萬担的軍糧，（每畝十斤），今年小麥剛剛上場，每畝又要迫繳十

四斤至二十三斤（見六月十二日大公報）；在宜興，勝利到來後九個月，亦徵了二次軍糧。第一次的數目是三萬石，每石價四四百元。按規定是向「餘糧戶」「勸告」，而實際上却是攤派；同時，按規定糧價從去年（三十四年）十月份起到今年三月份分三次發清，但米價飛漲，一下子從四千多元漲到三萬二千（宜興三月份市價），而在徵糧的價格中，又要扣去警察所、區公所所捐，到人民手裏時，一石米的代價是三千五百元！在市價三萬二千元的時候拿到這三千五百元，真使人哭笑不得！第二次徵糧一萬石，定價三萬元，而市價已跳到五萬元。分派和發清糧價的方法仍然「如法泡製」。浙江諸暨一個小小的泌湖鄉，從三十四年十月到三十五年五月，八個月中，供應米糧三十三萬三千七百斤，是年五月間又繼續催繳「軍公款米」，警察挨戶催逼，一天不繳清，警察就多住一天，每日由保內供給贖宿魚肉烟酒。其在湖南，桃花江「徵購餘糧」的內容就是「買糧食不給錢」（見三十五年五月廿八日聯合晚報）。其在河南，救濟沒有見到效果，而巨額的軍糧、柴草、捐稅却立即兌現，刻不容緩的從人民身上剝下來。其在甘肅，皋蘭縣三十四年被災面積佔十分之九，收成比例不及十分之三，待救災民逾十萬人，然趕修蘭甯公路一項，即徵工四千餘人，於農忙之際工作二月餘，農民損失不下一億六千萬，從三十四年秋至次年四月，該縣負擔軍馬補給差價已逾三千八百餘萬。是春災歉，仍須攤徵二百匹軍馬的補給差價，月計六百八十餘萬元。此外部隊過境，就地徵發，按保攤派，動輒數十萬，擾累之重，為害尤烈（見三十五年五月八日大公報）！在人民救死還來不及的時候，當局却依

然搜括下去，實在不能不使人問問『誰在製造饑饉』？

三十四年九月三日國民政府會頒佈：「凡曾陷敵各省區，豁免本年度田賦一年，後方各省區，豁免本年度田賦一年；後方各省區，豁免明年年度一年」。沒有幾天，徵實又被恢復了；有的地方，豁免一年而補徵七年。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徐堪宣佈自七月一日起恢復田賦徵實；原定「豁免田賦一年辦法，今改分三期，分期豁免，每年免徵三分之一」。每年「免徵三分之一」！說得多麼漂亮，祇要把這一年田賦額定得比去年的加重，再減徵三分之一，不是政府既有減徵之美名，而又得十足徵收之實嗎？戰前每畝連同各種附稅在內，大約在一元四角左右，合之當時米價，亦不過徵到每畝一斗五升至二斗而已，現在連帶徵公糧積穀等在內，每畝增至六斗以上，江蘇竟增至九斗五升，江蘇省臨參會某議員在六月初的大會上曾大聲疾呼，指出：

「此次田賦徵實，以昔日繳納一元者實徵四斗，同時並徵借三斗，再加地方公糧三成，計須繳納食米九斗二升，農民實不勝負担」（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文匯報）。

根據抗戰時期的經驗，農民的實際負擔，並不止此，因為除了縣政府及鄉鎮公所附加之外，上糧時又有種種留難，幾十里外挑去二三天上不了，行賄才能上糧，糧穀都叫農民用風車扇去雜質，但上糧後，當事者又把雜質加進去，抗戰是爲了民族的生存，農民當然沒有怨言，而現在徵實是爲了打內戰，農民實在是不勝負担的，在兵災之後，又繼之以水、旱、風蟲等災；在水、旱、風蟲等災以後，

又來了這一套催繳軍糧和田賦徵實。這種竭澤而漁的辦法，只有加速農村經濟的崩潰而已。

在統治者這種政策之下，大後方和收復區的農村經濟，有着下列三個新的特點：

第一是荒地的增加。由於抗戰時期敵人的破壞與勝利後內戰的蔓延，收復區和大後方的農村牲畜的損失，沒法補償；由於歷年壯丁的不斷徵調和逃亡，大後方和收復區的農村勞動力的損失，達到不可想像的地步。如果從抗戰初期算起，由於拉丁和勞役，農村勞動力的損失，恐不在二千萬人以下。災旱的威脅，亦是不可忽視的，如剛才所說，甘肅一省在勝利以後逃荒的壯丁就有三十萬人，這就是一個例子。因為缺乏勞動力和牲畜，所以耕地便可怕地增加起來。現在尙缺乏總括性的統計，只能列舉一些例子：江西一省因缺乏耕牛及種籽而致荒蕪的農田，達三四百萬畝；贛西及贛南五十哩至一百哩間，渺無人烟之地，觸目皆是（三十五年五月廿六日滬大公報）。湖北南部的蒲圻，全縣荒廢農田約佔四分之一以上，六十里的一塊原野，渺無人烟！豫南的信陽、羅山及潢川一帶，據「行總」賑救歸來的人員談，常常開半日汽車，而沒有看見農田的，公路兩旁只有長着蒿草的荒地。安徽的旌德縣，全縣農田共有十八萬畝，在歷年壯丁徵調之後，留在農村的年青耕農不及五千人；弄得有十三萬畝因缺乏人力而荒廢了！舒城河鄉全鄉耕地共三千七百四十九石，而荒地竟達一千零二十一石，荒田佔該鄉總田地三分之一（卅五年四月卅日大公報）。其在湖南，岳陽一縣的荒地，即達六萬餘畝（卅五年六月六日新聞報）。安徽、湖南和湖北、江西，是中國出稻較多的地方，這地方，現在都荒廢起

來了。這不是農村經濟危機的深刻化的表現嗎？

第二是田賤糧貴。由於農村負擔繁重，由於田賦的再事徵實，地主雖則竭力把負擔轉嫁給佃農，但，如果你不是一個大地主，如果你沒有權勢沒有地位，則仍不免要吃到徵實徵購的大虧。以湖南爲例，瀘湖的沅江，良田每畝約收穀五石，每畝賦率平均爲六角，亦有高至九角者，依三十三年徵實每正附一元，「徵一購四」計（即每元徵穀四市斗，購一石六斗）賦率六角之田，每畝須徵購一石二斗；賦率九角之田，每畝須一石八斗。地方的修堤、教育、差役等費，亦在田畝上分攤，每畝有竟攤到一石以上者。兩者合計，每畝「糧款」將近三石，是則攤派田賦，就要佔到總收穫量百分之六十了。田賦既然加重，天災常來襲擊，而糧價却不斷地上騰，因而產生出「田賤糧貴」的新現象來！在瀘湖，往年一畝田值十餘担穀子，三十五年上半年，化六七石穀子即可買到。一般人民均以爲與其有錢買田，不如放穀息爲合算：因爲如化七十石穀買田十畝，一畝產穀五石，十畝五十石，地租如以對半分計算，則地主可得二十五石，但除了納糧、修堤與地方攤派之後，地主最多只能得到十餘石，反之，如以此七十石穀放穀息，現在借出一石，秋收還穀二石，轉瞬數月，七十石就可變成一百四十石。利息豈不更大？此就湖田而言，若山田區域，情形亦復相類。長沙鄉間，戰前一担租（每年收穀兩石）之售價，約二十石穀以上，在三十五年上半年，只需五六石穀即可買田一畝；邵陽五斗穀田（每年出穀五斗），在民國三十年值穀十石，現僅花三萬元可以買到，以穀計不過二石而已。田價的跌落，不

僅是湖南的現象，就是在江浙一帶，亦有同種的趨勢。在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田價跌落並不表示封建剝削之衰落，無寧是表示前資本主義的高利貸資本的活躍。因為佃農的負擔絕對談不到改善，反之，田賦徵實的繁重担子，不知壓死了多少自耕農（中小農和富農）；而高利貸商業資本的兇焰，又不知吞噬了多少借債度日的農民！

第三是高利貸在變本加厲的支解農民。由於租稅繁重，由於物價暴騰，由於各種各樣的人禍和人禍所造成的天災，廣大的民衆都沉淪在破產的深淵中，他們所有的一點糧食，都被什麼軍糧和田賦徵實徵購所搶去，欲苟延殘喘，只有飲鴆止渴地乞靈於高利貸！高利貸並不是一件新鮮的東西。它是支解平民的老主顧。沉重的地租和殘酷的高利貸是地主對付農民的一對利劍。不過，經過八年抗戰以後的農村，高利貸是比以前來得更殘酷了。以素稱富庶的江南而言，勝利以後，亦深刻地呻吟着高利貸的支解平民。以吳江爲例，每借「賣青米」二萬元，秋收就要還米一石。依當前每石米五六萬元計算，在二個半月內，二萬元就可變成五六萬。利息爲百分之二千五至三千。如果「借米」，則現在夏間一石，秋間還一二石，但借的是壞米，還的是好米；如果借款，那就要同「賣青米」一樣，也是利厚三倍。如果借麵粉，夏間借一袋，秋間還米一石，市價每袋麵粉一萬八千元而米五六萬元，利息是比「賣青米」還來得殘酷的。這一位報導這項情形的記者嘆道：「農人，尤其是佃農，秋收的半數，姑置勿論；除了業主的租穀，每斤以十八兩加四，超越法定度量衡制的特號秤以外，再加上他們的剝

削，簡直被牠們支解得體無完膚了』（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日新聞報）。

荒地增加不僅表示牲畜的缺乏，而且表示農民就是要忍受剝削，亦沒法忍受下去；田賤糧貴，則表示着統治者爲了進行內戰的田賦徵實的政策，引起地主商人對牠的異議，同時更表示着農村的封建剝削不僅沒有減輕，反而在高利貸的形式之下，更進一步吸盡農民最後的一滴血！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村經濟是急劇地在破產了！貧農「逃荒」將會更快的增加；中農小農將會以更不利的價格去出賣其僅有的土地；社會財富將會以更迅速的步武集中在有錢有勢的大地主大官僚的手裏！

棄田逃荒是農民活不下去的一種表現；挺而走險則是他們活不下去的另一種表現。當然農民的行動，並不完全是這樣的，但勝利以後各地蜂起的騷動，大多是缺乏自覺性的行爲。以浙江爲例，該省的南部和東部，在勝利後就在農民騷動的氣氛中。打開三十五年四五月間的報紙一看，自麗水、青田、泰順、平陽、瑞安、以迄溫州，那一天沒有這一類的新聞。城裏在鬧鼠疫，田裏在鬧蝗蟲，農民餓慌了，到處有打米店的風潮發生。盜匪如毛：一是散兵；二是海盜；三是毛匪；四是浪裏飛；五是綁匪；六是大刀會。這六種匪患，姿態是不相同的，但來源却完全一致，這就是「餓慌了」三個字。一個參加米騷動而被捕的農民說：「我們的肚裏沒有一粒米，請你們剖開肚皮看看吧」（三十五年五月十四日文匯報）！這種悲劇不僅見之於浙江；亦且演之於魚米之鄉的湖南。聯合晚報有這麼一段消息：

「據大堡來人稱，目前有一裝運軍米之船，停泊該地時，突有數十人擁至船上搶米，押運士

兵開鎗放射，當場擊斃三人，後經發現其彈穿腹部者，有草屑隨血流出，乃剖視之，腹內全爲青草，並無米粒』（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該報）！

到了人民的肚子裏裝滿着青草、樹皮或觀音土的時候，到了人民願意剖開肚子來證實他饑餓的時候，騷動怎能避免呢？農村經濟怎能持續下去呢？

五 瀕於破產的財政

經濟是財政的前提。如果工商金融都陷於崩潰，健全的財政是沒從談起的。在戰前，中國沒有健全的財政；在戰時，中國亦沒有健全的財政。抗戰勝利了，中國的財政不但沒有好轉，而且支絀得更加利害。

工業崩潰，農村殘破——這種情形，已經命定了中國財政的危機了，除此之外，當局的政策，更又處處在加重這種危機的嚴重性：第一是政治軍事與經濟財政互相矛盾着；第二是經濟與財政又互相矛盾着。

經過八年的抗戰，農村殘破了，民生凋蔽了，輕重工業正急待吾人去整理、去建立。要做到這一點，最基本的條件是政治上的安定，是國內各民主黨派的和平團結。可惜的是，勝利以後的一年，乃是陸續內戰的一年。三十五年一二月間，雖然有停戰協定，雖然有政協五項決議，雖然有整軍方案的

簽訂，但人們却利用這些協定作爲欺騙人民、和欺騙友邦的工具。一面在會議；一面在調兵。軍隊調動完畢之後，「協定」便束之高閣。東北打起來了，沒有多久，關內又是烽烟遍地。好戰份子爲了內戰，不惜進一步的摧殘農村，逼迫那些在吃草根、樹皮和觀音土的農民拿出軍糧來；不惜破壞水道、鐵路，停止貨運，把揚子江的輪船和北寧、津浦及隴海等鐵道的車輛，用之於運軍火和部隊；不惜破壞工業製造品的販賣市場和原料的供給。一面損壞了財源，一面却又在增加財政的支出，使國家財政急速地陷於破產。上海有一家半官性的報紙曾經沉痛的寫着：「預算不能平衡的癥結所在，是財政上緊急命令撥款的漫無限制」。所謂「緊急命令撥款的漫無限制」，乃是戰費無限增加的另一種措辭。在抗戰時期，因爲物價的飛漲，緊急命令的撥款數字是逐年增加的。三十二年佔歲出總額百分之二十；三十三年度佔百分之四十七；三十四年度上半年佔百分之六十一。抗戰勝利後，因爲內戰的發展，軍費的支出急形增加。三十五年度的軍費支出佔總歲出的百分之七三·五，約一萬五千億元；但實際上，前半年政府的總支出已達一萬九千餘億元了。這種情形，證明軍費的支出是超過原來的比率的。內戰越擴大，則國民經濟的損失和財政的負擔，亦就跟着加重。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政治和軍事的路線，是在破壞國民經濟的，是在破壞國家財政的！

同時，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亦存在着着尖銳的矛盾。爲了內戰，當局只知道伸手向人民要捐稅，要糧食。百分之百的精力是被用去從人民身上刮脂膏，吸血肉。根本是談不到有一絲一毫的精神

去爲農村和工業解決困難。你看，人們不是在大饑荒的當兒荷槍實彈去追勒那些餓得走不動的農民，徵實徵借一萬萬一千餘萬市担嗎？你看，人們不是在民族工業走頭無路的時候，還要把種種的負擔壓在工業家的頭上嗎？從收入方面來看，誠然是很賣力氣，可是，從國民經濟上來看，那就大成問題了。國民經濟如果不發展，農工生產事業如果不繁榮，試問稅收從何處增加起來呢？當前的做法正是竭澤而漁，正是摧毀國民經濟的一種自殺的辦法。

在這二個前提之下，勝利後的中國財政，是空前的嚴重的。通貨膨脹引起了物價飛騰；物價飛騰則引起支出的劇增。抗戰八年，每年的支出總爲上一年的三四倍；每年的實際支出總爲預算的二三倍。但若與抗戰以後的財政相比擬，那是小巫見大巫的。從二十六年算至三十四年年底，政府在這九年中，共用去二、九三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民國三十五年的預算爲二萬五千餘億元，與三十四年的實際支出相近。可是，抗戰勝利後的物價是戰時所不可企及；內戰的規模與軍費更爲抗戰時期所不可企及。三十四年前十個月的實支爲九千億元；但十一及十二兩個月的支出竟躍至一萬七千億元。三十五年一月至五月的支出爲三千億，六月增至四千億；七月增至五千億元。照物價的漲度，九月實不能保持五千億的限度。如此下去，三十五年一年的總支出至少要六萬億元（爲預算額之二倍餘）了。這個數額超過過去九年總支出的百分之四十強。你看，這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這樣巨量的支出，是絕對沒法保持平衡的。三十五年上半年共支出一萬九千億元，而收入只佔一

小半而已。在這裏，往年稅收以關稅、鹽稅及直接稅爲重要稅源，三十五年則以貨物稅爲最多。計六個月約爲一千二百億元。此外，關稅爲一千一百餘億元，鹽稅爲九百億元，直接稅約爲六七百億元。半年的稅收，共達三千八百餘億元。再加上「中紡」、「台糖」及「燃料管理委員會」的盈利一千三百億元和標賣物資二千五百億元，總共七千六百餘億元。半年收支相抵，赤字竟達一萬一千餘萬元之巨。這就是說，收入只佔支出的百分之四十；而缺額則佔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差額在支出總數中所佔的比重，表面上雖比抗戰時期稍爲少一點（戰時赤字一般佔總支出百分之七十左右；三十四年爲百分之八十四），可是，我們如果進一步去看看收入的內容，那就可以看出赤字之相對減少，乃是由於標賣物資和國營事業的收入。按敵僞物資的總價值，幾達三萬億；剩餘物資以美元計算亦達二萬四千萬元；其他如供應物資及租借物資，亦都有大量的東西可以標賣。國營事業中的「中紡」及「台糖」每月亦各有一二百億元之盈餘，這都是戰時所沒有的。三十五年上半年的虧缺在總支出中所佔的比重之相對減低，完全是得力於這二項。不過，物資的標賣不是永久的；國營事業的盈餘則以民營工業爲犧牲。虧空的相對數之降低，絕不是國民經濟恢復的反映啊！

縱然拚命地提高國營事業的獨占作用，縱然目前發了幾筆洋財——即五種可以標賣的物資（敵僞物資、租借物資、救濟物資、剩餘物資和賠償物資），可是百分之六十的支出還是沒有着落的。面對這種情形，當局似乎只能走下面二條路：第一條是增發鈔票；第二條是向沙姆大叔借款。

中國的通貨膨脹，除了匈牙利以外，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最出色的了。官方所宣佈的數字，一般說來，可靠性是不大高的。就以官方所宣佈者而言，截至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時期為止，法幣發行額達六千餘億元，爲「七七」事變前的四百三十餘倍。三十四年後四個月的發行額爲四千餘億元。這是說，三十四年下半年（九至十二）四個月的發行額佔過去七年半發行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三十五年上半年的增發額據有關方面的材料爲一、〇八〇、六〇五、四三六、五一八元，這個數字比過去八年的總發行額（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的發行額爲一、〇三一、九三一、九一五、四八三元）還多五百餘億元，爲過去八年總發行額的百分之二百一十四。實際上，法幣在抗戰勝利後的發行數字，恐不止此。照官方所述的，三十四年十二月底的一、〇三一、九三一、九一五、四八三元，加上三十五年上半年所增發的一、〇八〇、六〇五、四三六、五一八元，共有二、一一二、五三七、三五二、〇〇一元。照這個數字推算起來，法幣在這個時期的數量，僅爲「七七」事變時的一千五百餘倍。但法幣的幣值之跌落，却不僅僅一千五百餘倍，（當然有其他原因可以使幣值下跌）。這不是反證惡性通貨膨脹的法幣，在抗戰勝利後一年，並不只發出二萬一千餘億元嗎？

向美借款，乃是當局認爲最美滿的一個辦法。沙姆大叔爲了控制中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的確亦願意在這一方面下功夫，軍火的接濟，物資的供應以至一定量的借款，早就在進行了。但問題乃是在於更大量的財政「援助」。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在中國內戰沒有結束以前，美國迫於國際形

勢和中國人民的反對，要大量地對好戰份子作公開的財政支持，恐怕是不能輕率進行的吧！但好戰份子所希求的正是在內戰中的財政援助。這是一個矛盾！這個矛盾，將使中國「內戰財政」的美滿，打了一個折扣！

如果內戰擴大下去，中國的財政很顯然要更加惡化下去。三十五年八月十九日的改變中美匯率乃是以支持內戰爲出發點的，同時，却又是財政危機的反映。一下子把法幣的幣值降低了百分之四十。物價馬上飛漲起來。不但舶來品漲價，就是國產的工業品和日用必需品亦飛漲起來。職工和公教人員的薪水工資，無形中打了一個六折。這不是一個災難麼？表面上說是受惠的工商業，實際亦何嘗有什麼好處？試問在物價暴跳，銷路緊縮的情況下，販賣商有什麼好處？試問在物價暴漲成本增加的情況下，出口商有什麼好處？試問在幣值日跌，捐稅日增和關稅失去其保護作用的情況下，民族工業又有什麼出路？何況外匯放長又增加了他們向外輸入機器及重要原料時的負擔？在民不聊生和工業破產的情況下，好戰份子的內戰財政是設法避免破產的。當然，外匯放長可以使政府在對進口商出賣外匯時，在標賣租借物資、救濟物資、剩餘物資以至敵偽物資時，較前多取得一些法幣，可是，在物資暴跳下，回籠的法幣是萬萬趕不上浩大的開支啊！

內戰擴大，促使政府支出益形增加；支出之不斷增加，則必然變本加厲的從事於通貨膨脹。三十五年上半年的內戰還不兇，七月八月以後，從局部變爲全面了，九個省份的人民又在砲火中掙扎！在

這裏，財政的支出，必然是更加浩大的。所謂「七月份財政呈現好轉」，所謂「本年三月份以後，法幣的發行額就逐漸減少，到了七月發行額便沒有增加」，乃是自相矛盾和當面撒謊的說法。在邏輯上，既然三月份以後逐漸減少，則七月份亦應跟着減少才對，可是人們說的乃是「七月份的發行沒有增加」，沒有增加乃是「保持原狀之謂」，乃是沒有減少之謂。一面說七月份財政為抗戰勝利以後最好的月份；一面又說七月份的發行額並沒有減少。這不是邏輯上的矛盾嗎？事實上，法幣的發行是與日俱增的。三十五年一月至五月的支出，平均為三千億，六月以後增至四千億。支出增加，法幣必跟着增發。國民黨中宣部長彭學沛宣佈七月份財政好轉是得力於二百億敵偽物資的標賣，和二百億「中紡」及「台糖」的盈餘。這四百億收入，充其量，只佔支出的十分之一而已。欲以這四百億的收入來解決百千億的支出，不是明明白白在當面撒謊麼？如果不再發通貨，怎能供應每月四千億的開支呢？照當前的物價和內戰的規模，下半年的發行額極可能為六月底的一倍以上。那就是說，三十五年年底的法幣發行額可能達到四萬億以上！抗戰初起時，中國的法幣是以億為單位；抗戰勝利以後，中國的法幣竟以萬億為單位。這就是中國財政的「進步」！這就是好戰份子送給中國人民的禮物！

天文學的發行數字，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中國的財政是陷入破產的深淵之中了！

六 三種危機的結合

在勝利後，大後方和收復區的經濟，就是由工業危機、農村饑荒和財政破產三個因素交織而成的。這三種危機並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互相推動，互相影響的。財政破壞的結果，使通貨更加膨脹，物價更加飛騰。在這種情形之下，工業的成本就更加增高，中國國貨就更加沒力與美貨競爭，就更加失去其輸出能力了。農村危機的發展，不但縮小了工業品的市場，而且枯竭了財政的稅源（當然，竭澤而漁乃是人們的拿手好戲，如田賦之徵實徵借，但竭澤總有一個限度，過了這一限度，那是很危險的）。民族工業的崩潰，則不但減少農村原料的需要，而且增加了城市的失業人口，使中國經濟更加成爲外國獨占資本的附庸，使統稅、營業稅、利得稅以至出口稅更加減少，使財政危機更加嚴重起來！抗戰勝利以後的收復區及大後方經濟，就是由這三種危機構成的！

如果進一步來研究，則工業、農村及財政的三種危機又是以政治危機——內戰，爲主要的契機！爲了內戰，好戰份子和買辦官僚，不惜把農村生產和民族工業作爲充當砲火的犧牲品；爲了內戰，必定增加軍費的支出，必定使已經惡性膨脹的通貨更加惡化；爲了內戰，必定更加瘋狂的逼迫那些吃草根、樹皮和觀音土的農民拿出事實上並不存在的「餘糧」來；爲了內戰，必定更緊緊的把持政權，官官相衛，便利官僚資本的壟斷操縱；爲了內戰，必定更進一步地乞靈於沙姆大叔的軍火、糧食和美金，必定更進一步的走着買辦路線，變本加厲地爲美國的獨占資本的商品傾銷和直接在華投資服務。一如上面所述的，從開放內河航行權，奉送引水權和稅務司一直到陳納德將軍的「飛貨公司」的創設，

都是內戰路線引伸下來的必然結論！

由此可見：內戰蔓延下去，中國的經濟危機就更加嚴重，而中國經濟危機發展下去的道路，就是中國殖民地化的道路。這條道路是陰沉而悲慘的！但是，這並不是中華民族命定的道路；在解放區，國民經濟正以嶄新的姿態在發展着。它的方向是完全和大後方及收復區不相同的。讓我們把眼光射向這些農民翻了身的地區吧！

第六章 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

一 奔騰澎湃的土地改革

勝利後的解放區，以推行土地改革爲主要的工作。這和大後方及收復區明確地對照着，如前章所述，在勝利後的大後方及解放區，人們在表面上頒佈二五減租，而實際上，廣大的農民都受着二五加租和苛捐雜稅的剝削。反之，解放區的農民則在抗戰時期進行了二五減租；而在抗戰勝利之後，又把土地改革推進了一步，合理地，廣泛地跨過了二五減租的界限。因此，在敘述勝利後解放區土地改革的時候，不能不回頭把抗戰時期的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則，提出來談一下。

抗戰時期的土地問題，除了存在着「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足無立錫」的現象之外，還存在着「中國的土地是屬於日寇抑屬於中國人民」的問題。就是爲了這一點，就是爲了團結地主以抗日，所以，在這個時期，我們才退一步實行減租減息，緩和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相當地改善農民的生活。可是，減租減息並不能解決土地問題，並不能取消那些高壓在農民頭上的封建剝削，並不能徹底的提高農民的生產情緒和生產能力。由於這個道理，解放區各地農民，在抗戰八年中，曾經三次起來要求土地。

但爲了抗日，爲了團結地主，中共和各地民主政府均用極大的努力，進行解釋說服，使初步的土地改革並沒有超過減租減息的限度。

日本投降以後，局勢顯然不同了。以前所謂「中國土地屬於日寇抑或屬於中國人民」的問題，已經不復存在。解放區的人民，奔騰澎湃地起來清算漢奸和惡霸，肅奸和反惡霸的運動開展的結果，接着就觸到土地問題來。他們要求土地，他們要求取消一切封建剝削。面對着這種局勢，我們是沒法和不應該阻止這種羣衆的正當要求的，現在的問題，是在於根據客觀環境，如何去實現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如何去實現「和平建國綱領」（「政協」決議）中「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爲了發展農業生產，爲了使三萬萬二千萬農民能從中世紀的封建剝削解放出來，必須突破減租減息的界綫；必須設法實行耕者有其田，但「耕者有其田」，並不是無條件地沒收一般地主的土地之謂。現在各解放區民主政府對於土地問題的措理，大約可分爲下列幾項：

第一、對於敵僞大漢奸的土地，對於過去魚肉鄉曲的惡霸從人民所竊佔的土地，對於滿清時代搶奪民田賜給功狗의所謂「皇糧莊頭地」（或稱「掛地」），對於漏掛的「掛地」和非法地主以多報少的「漏稅地」（或稱「黑地」）等，都予以沒收而分配給無地的農民。如東北的嫩江省全省耕地總面積爲八、五六八、六七九垧，而日寇的移民組織「開拓團」及東北漢奸所組織的「滿拓團」，共佔去三、八二五、一五二垧，佔總面積百分之四四·六，如綏寧省（牡丹江）的寧安縣中，敵僞佔有土地

六萬七千四百零七垧，這些土地都由民主政府一律無代價的分配給農民了。甯安縣的敵偽佔有地是於三十五年三月底全部分配完畢的，得地的農民十一萬二千零一人，平均每人分得土地六畝六分；蘇皖邊區的七分區（包括泗縣、泗宿、泗陽、邳陽等縣），沒收漢奸的土地共有七萬畝；又如山西之甯武縣，該縣於三十五年七月解放後，民主政府即接受人民要求，將大漢奸南桂馨、趙庭英及楊道一之土地一萬餘畝，房院二千五百餘間，全部沒收，並無代價分配給貧苦農民耕種與居住，其他各處，亦有相同的成績。「掛地」與「黑地」在熱河較多，如承德縣下板村城共有土地六千二百一十畝，「掛地」就有四千一百多畝，佔六分之四以上。現在這些「掛地」和「黑地」都分配給農民了。根據承德、隆化、圍場、溁平、平泉、豐寧等六縣的不完全統計，三十五年五月間，農民已從大漢奸及惡霸的手中，獲得了八萬五千畝的土地。解放區民主政府以沒收敵偽、大漢奸及一些惡霸的土地的辦法，部份地開始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第二是退租算賬。這是與減租減息聯系的，是從減租減息發展下來的。以當前的情況而言，沒收土地只是行之於敵偽、漢奸及一些惡霸，至於一般地主，則仍進行減租減息。如在蘇皖邊區，減租的情況是這樣：原來對半分租的，現改為地主三五，佃戶六五；原為四六分租的，現改為地主三，佃戶七；原為三七分租的，現改為地主二五，佃戶七五；還有一種辦法是按照民國二十六年的實交租額減收，地主不能超過正產的收穫百分之三十五。主佃商定減租之後，要重訂新約，此後，佃戶必須依約

還租，地主亦不能無故抽地退佃。

減租是減低農民交給地主的正租，而退租算賬則是解除正租以外的剝削，這亦是從清算敵偽漢奸的運動發展下來的。備受凌虐的人民，在解放之後，對於敵偽漢奸，當然要起來清算；他們在懲奸訴苦之後，對於敵偽時代加在他們身上的無理負擔，當然要加以清算。這就是算賬的由來。一些不明白事實的人誤會這種算賬；有一些別具居心的人物，則加油加醋，製造謠言，藉以達到動搖解放區人心的目的。這都是抵不住事實之回駁的。難道敵偽漢奸不該廓清麼？難道作惡爲非的惡霸不該懲辦麼？難道敵偽時代的無理負擔不該平反麼？一個真正反對敵偽的人，一個維護民衆利益的人，必然會表示支持，同情而不會加以反對的。

因爲算賬的對象是正額以外的剝削，而各地的額外剝削的名目和程度都不統一，所以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茲以淮安的石塘區鵝錢鄉爲例，地主對於農民的額外剝削達二十餘種之多，即：「虛田實租」、「押板金」、「大斗大斛」、「戰時加租」、「收租酒」、「小租」、「嘗新」、「無償勞動」、「代出僞費」、「年禮節禮」、「預借麥」、「租艸」、「看稻費」、「挑溝挖污」、「進出倉費」、「種子費」、「租雞租鴨」、「補領酒」、「過攬費」及「修車費」。在算賬中，農民是採取寬大政策的，同時，民主政府又執行「照顧主佃雙方生活」的原則，將近二十種額外剝削，只算：預借麥、僞費、修車費、加租及修溝挖污五筆，其餘一概免算。其中僞費一項，是在敵偽統治時期，地主

利用其地位和勢力，把漢奸政府所攤給他們的負擔，叫佃戶替他們代出。佃戶如果不佃種土地，當然就負擔不到；而僞費的種類是繁複得很多的，以淮安縣下河鎮爲例，該處佃戶替地主所納的僞費，竟有四十七種之多。在算賬中，經過民主政府的仲裁，僞費由主佃雙方六四分攤。從這些事實，可以見得：算賬是在平反，是在講道理。

算賬以後，地主應該還給佃戶的就必須償還，應該退給佃戶的（如在敵僞時代所加的租），就必須退還，而經過高利盤剝從農民手中奪得的財產亦必須算還給農民。在這裏，我們必須把減息和清算方式談一談。（一）關於減息，在民主政府成立以前所借的債，按二分起息，如果利息已超過本錢，就得停利還本；如利息已兩倍於本錢，就本利都停，以後利息不能超過月利二分，至於以高利盤剝吞沒負債人的田地房屋的，則根據具體情形，有的地方（如蘇北）可以無條件收回一部或全部，有的地方（如熱河）則經過減息的辦法，由農民抽贖回來。（二）算賬之後，並不是要地主馬上把全部應還的數一齊付還，一般多分成二部份：一部份是馬上交付的；一部份是分期交付的。交付時，通常是用貨幣，如地主缺乏貨幣就用糧食或田地抵算。以蘇皖邊區爲例，該區第六分區，（包括淮陰、漣水、沐陽、宿北、灌雲等九縣三十二個村的調查，農民由算賬而索回的土地。達四十三萬三千畝左右；寶應城區，農民由算賬而索回之地亦有四千七百一十八畝。除此之外，農民用他在算賬中所得的貨幣，抽贖或購買土地者，爲數亦不少。晉綏二分區的偏關西溝村有二十家農民，就在算賬之後，購得土地

二百四十畝；蘇北的濱海縣四區六個鄉，全體佃戶八百八十家，在減租退租以後，共買進田地五百五十餘畝，典進田地一百餘畝；該縣的九區團蕩鄉，一百四十七個佃戶中，有七十二戶在算賬後買進田地一百三十六畝九分；典進田地一百六十三畝九分。從這幾個例子可以看出算賬退租又是部份地使農民得到土地的辦法。

第三是獻地。獻地是開明地主自動的義舉，絕對不是強迫的。在解放區，由於民主運動的深入，由於生產運動的展開，由於人民對於勞動觀念和「寄生」觀念的轉變，許多開明士紳都感到要發展農村經濟，實有賴於土地改革之擴展，因而紛紛自動起來獻地，把田地送給原來耕作的佃戶。單以三十五年七月一個月的材料而言，獻地就有下列數起：蘇皖邊區政府的民政廳長陳蔭南獻地一千一百三十五畝；臨參議員鄒魯山獻地一百三十畝，淮陰縣長萬立譽獻地二十畝，縣委宣傳幹事余學陽獻地六十畝；縣倉庫負責人高慈航獻地一百畝；射陽縣縣委組織部長陳寧烈獻出三百五十畝，該縣海河區小尖村地主路百祐獻田一百畝；新坍區地主徐以達獻地一千一百餘畝；冀東的滦河二區地主尹樹堂自動將掛地五百畝原完全獻出；察哈爾省高等法院院長阮慕韓與其叔父阮葆忱自動將田地三千三百餘畝，獻交貧苦農民耕種。在中共的黨員和開明地主的倡導之下，解放區將有很多地主，受到感動而追隨獻地的。在獻地的時候，民主政府和農民大眾，十分關心獻地者的家庭生活，故經常勸其保留一部份田地。地主的自動獻地乃是農民獲得土地的另一辦法。這種辦法表示解放區的人民，更臻於親密團結，

共同致力於發展經濟。

以上三種辦法，是勝利後解放區逐漸實現耕者有其田的途徑，但是，經過沒收漢奸和惡霸的土地，經過算賬而索回，抽贖或買入的土地，和經過開明地主自動獻佃戶的土地，在全國的農地上看來，畢竟只是一部份而已。要在全解放區以至全國範圍之內，實現耕者有其田，可能採用下面一種辦法，這就是：限制地主土地的最高量（這個最高量，當視各地的具體情形而定），超過這個限度以外的田地，則由民主政府發行土地公債徵購之。

根據解放區在抗戰勝利以後施行的辦法，土地改革，固然已經突破減租減息的範圍，但絕不是沒收一般地主的土地，絕不是置地主的生存於不顧。對於地主，解放區的民主政府仍是採取保護和照顧的態度，看事實吧！

在算賬的時候，民主政府和農會十分照顧小地主，特別是依靠幾畝田地以維持生活的孤兒寡婦。對於不合理的剝削，清算之後，打了折扣或者根本就沒有交付。對於一時拿不出來的地主，亦給與以分期交付的方便。這是我們在上面已經述及的。

雖然經過清算，但地主並未失去其維持生活的條件，地主所保留的土地，比中農還多得多。根據蘇北最近的統計，淮海區在減租肅奸清算之後，全區現有地主一萬一千零五十二戶，共有土地一百三十四萬二千九百五十畝，平均每戶田地一百二十一畝；如以每戶八口計，則地主每人平均有十五畝，

等於中農每人所有土地之五倍；晉魯豫太行區在清算後的統計，地主每人平均有地十三畝七分；中農每人只有三畝一分；貧農每人只有二畝一分。地主平均每人所有之地，等於中農的四倍，貧農的六倍。其他各解放區，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多於中農的四倍至五倍。有不少材料，證明解放區的農民，爲了照顧地主在土地改革後必需的生活，竟忍受很大的損失！

因爲地主仍保留着比中農還多四五倍的土地，而且又生活在大家改變了勞動觀念的環境之中，所以，他們有不少是改變作風，自己參加生產而成爲富農的。還有一些眼光較遠能力較強的地主，則出賣田地而把資金轉向工商業，如陝甘寧邊區的劉憲庭投資開辦慶興紡織廠、姬伯雄創辦萬合毛織廠、艾斌卿創辦紙廠、安志銘及霍少韓合辦毛織廠，山東的莊曉光投資創辦織布廠，晉綏區河曲的地主張承業、于洪樹等出賣田地，經營販運業。土地改革絕不切斷地主的生路，反而是引導他們參加生產，放棄以前的寄生生活！這難道不是地主的光明道路麼？

二 積極扶助工商業

解放區民主政府在抗戰勝利後對於城市的工商業，採取什麼政策呢？

(一) 對於接收的工廠，迅速使其復工。張家口是解放區中比較大的城市，這兒的許多工廠，技術人員都是日本人，管理人員更不必說了。八路軍解放了張家口之後，不到二三天就重行開工。這裏

並沒有特別秘密。這就是實事求是依靠工人。如該市下花園電力公司，在八路軍進城之後，立即派人召集全廠工人談話，工人都很感動，大家自動的保證「二三天內，一定開工」，果然，他們的語言兌現了。其在東北，安東的「安東造紙廠」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方為人民自衛軍接收，十三日就正式復工。民主聯軍對於接收工廠的辦法是：首先成立工廠管理委員會——有勞資雙方參加，而以工人管理工廠為原則。安東造紙廠的工廠管理委員會有三方面參加，即工廠行政人員、技師與職工。就是行政人員亦儘量任用職工，該廠的紙料科長、祕書、工務科長都是由工人提拔的。這是與國民黨在收復區所幹大不相同的。在收復區，我們看見的是重重的封條，是好幾方面的爭奪財產，是前門封條後門偷運物資，是機器破壞原料不翼而飛，是生產長期停頓，物資作莫名其妙的耗費。在這裏，工人都失業了，那裏談到迅速開工，那裏談到提拔工人幹部起來管理行政呢？

(二)對於工商各業，不但廢除統制，而且減輕他們的負擔。在敵偽統治時代，許多商品都由敵偽統制。商人沒有交易的自由，許多重要的利益比較大的商品，都由敵人專賣，而且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又加以漢奸辦事人員的明敲暗擄，弄得工商業都喘不過氣來，在民主政府之下，這一切都取消了。單單這一點，對於市面繁榮的幫助就已很大了，而為了工商業的發展，民主政府在稅則上又儘量的改善，如蘇皖邊區政府在三十四年冬試辦營業稅，至次年夏間，又進行修改。「凡以勞動所得為主之手工業，免徵營業稅，以扶持自營自製者之發展；開徵經營進出口貿易者之營業稅，以免營業稅之

偏徵坐商而不及行商的現象；將免徵點每月營業額自二千元（邊幣，每元等於法幣三十元，下同）提高為四千元以照顧小商人。在稅率方面，按營業額徵收者自百分之五提高至百分之八；按資本額徵收者自百分之十提高至百分之十五。這與大後方及收復區所行的辦法（即所謂減半徵收後按營業額課百分之十五，按資本額課百分之二十）比較，尚輕四分之一至一倍。在這種情形之下，解放區的工商業自然會發展起來了。

（三）民主政府不僅在消極上減輕工商業的負擔，而且從積極上去推動工商業的發展。這就是推動私人投資於工商業——特別是工業（例如實業界張珍等在承德創設永興實業公司），這就是不斷增加工商業貸款，使缺乏資金的廠號獲得資金（例如山東博山解放後，北海銀行以二百四十六萬餘元低利貸款給三十三個密廠，二百三十九家小作坊，幫助復業），這就是鼓勵商人成立私營的銀行或銀號，藉以活潑市面上的金融（例如邯鄲於三十五年五月成立民營瑞華銀行）；這就是迅速恢復解放區內的鐵路、公路及水路的運輸，藉使各地的貨物能大暢其流。在這裏，民主政府是以扶助中小工商業為主要任務的。如在烟台，從解放至次年三月，政府以月息一分的低利放出一千零二十多萬元，對象是小手工業者、小販、小店鋪、碼頭工人、漁夫、紡花婦等。這些人得到貸款的有九千四百三十九戶之多，又以月息一分五的利率貸放了一萬四千五百多萬元，給紡織廠、油坊、合作社、漁業、粗細雜貨等一百六十三戶，這亦是以中小工商業為對象的，二項共一萬五千六百萬元。若以法幣換算（十

五倍）則爲二十三億四千萬。這並不是不顧大工商業的利益，有名的烟台張裕釀酒公司，淪陷時被敵人沒收；解放後政府立即無條件發還，政府並且收購其成品隨時付現，代運出口銷售。而收購時價格並非由政府規定的。

（四）關於工資——工資的標準，按各地情形，以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的原則來訂定，譬如農村雇農的工資是：除了本人的生活之外，能再養一個人到一個半人爲標準。其在城市，工資具體的規定，各地當然不同。山東淄博煤礦的工資，在解放後，定爲每人每日平均九斤半細糧；工資直接發給工人，取消過去的什麼勞務科、善後科、報募科；採礦時間改爲八小時，增加各種衛生設備，炭井內設探火器，並砌石牆防水患，用升降車送開水，這都是在勞資雙方同意之下決定的。其實，工人在解決工資問題時，並不是一味要求提高而不顧廠方的利潤的。讓我舉一個生動的例子吧：

「山東博山在解放後，爐廠工人成立工會要求增加工資，通過伙夫每罐容十斤硫磺）工資一百二十元（邊幣，下同），匠人工資一百元，練習生除吃穿外每年工資三百元至五百元。工人郭分倫深思熟慮之結果，認爲要求太高，經過多次的醞釀說服與討論，一致同意將伙夫工資降低至每罐七十五元，匠人每罐七十元，並選出郭等六人爲代表和十七個廠主談判，經數次研討，廠方仍覺得太高，工人乃一再讓步，最後確定伙夫出一罐硫磺工資六十五元，匠人六十元，平均每人每天可買八斤至十斤小米。製出硫磺一罐，可值二千二百五十元，其中原料化費和工資支出約一

千四百卅元，廠主仍可得八百十八元紅利，所以，廠主亦就很滿意的答允了」（三十五年五月三日解放日報）。

由此可見：解放區的工資問題是在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的原則之下，採取民主評判的方式以求解決的。在這裏，工人們之照顧大局一再讓步的精神尤其值得我們欽佩！這些事實，把那些造謠中傷，說解放區工人佔領工廠，工資吞去全部利潤的誣蔑，打得粉碎了。在解放區，公營工廠中的工人是參加管理工廠的，但並不是沒有廠方行政人員；私營工廠中的工人，亦是參加管理工廠的，但它並沒有取消廠方的私有權。解放區的勞資關係的確是改良了許多的，有不少工廠改成合作經營，資方以生產手段與資金入股，工人以勞力入股，按股分紅，民主選舉合作社管委會，博山恆順成黨主王寶合這麼說：

「成立合作社後，我既省了心，而工人却又幹得滿好。還是以前沒有的事情。」

只有解決了這些基本問題，工人工作情緒才能提高，生產效率才能不斷的高漲，解放區的確是這麼做的。

三 社會關係在變化

由於上面所述的一些措施，解放區的社會經濟正大大地在變動着。這些變動是可以從下面幾個特

點看得出來：

第一、經過減租算賬之後，解放區各地的農村關係，就迅速地起了變化。在過去，農村中的人口是大多赤貧而少數人富裕的，是大多數農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惡化的，現在却呈現另一種現象，這就是大多數的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改善了。以蘇皖邊區的高郵界首區龍華鄉為例，這個鄉的變化如下：

村別	佃貧農戶數	生活顯著上升的	生活改善者	生活未上升者
二	五二	五	四四	五
四	四二	五	三二	五
五	五八	一〇	四三	六
六	八一	二八	四八	五
總計	二三六	四八	一六七	二一

在這裏，由佃貧農上升為自耕貧農者二十四家；由貧農上升為中農者十五家；由佃中農上升為自耕中農者四家；由中農上升為富農者一家，由富農得到發展者二家。如以土地關係的狀況而言，其中買田十畝以上者九家（最多卅二畝者一家）買田五畝以上者九家，買田五畝以下者六家，典田十畝以上者七家（最多十六畝一家），典田五畝以上者九家，典田五畝以下者八家。在這種情形之下，自耕農的比重就大大提高了。在減租前，自耕田與佃田的比例是二三九五比一〇三一；減租之後，自耕田

增加至六四一六，而佃田減少至四六一畝了（見三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華中版新華日報）。減租算賬使許多貧農獲得土地，這不獨在蘇皖區如此，其他各解放區亦未嘗不如此。以晉綏邊區而言，貧苦農民在減租後爭相買地，偏關西溝村有二十餘家即買地二百四十餘畝（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延安解放日報），就是另一個例證。

第二、在這種變化中，中農的發展最為明顯。以山東為例，民國廿六年中農階層在總戶中所佔的比重如下：

地區	總戶數	中農戶數	百分比	附註
濱海	二四九一	七一七	二八	莒南十一村調查
膠東	四〇〇	一七六	四四	棲牟邊三村調查
渤海	三四六	一八一	五二	高苑六村調查
合計	三三三七	一〇七四	三三	

經過減租減息之後，中農階層大大地增加了。根據同上地區的統計，其變化如下：

地區	總戶數	中農戶數	百分比
濱海	二九四六	一四五七	四九
膠東	四四四	一一〇三	四六

渤海	三七五	二一三	五六
合計	三七六五	一八七三	四九

中農的戶數從一〇七四增至一八七三；中農在總戶數所佔的比重，從百分之三三增至百分之四九（材料轉錄自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新華日報）。如果從中農所經營的土地面積來看，更可看出這個傾向。根據山東莒南、臨沂二十個村的統計（材料來源全上）：

戰前	各階層使用地總數	中農使用地數	%
減租後	七二、七二〇・〇四	二九、七二九・一四	四二
	六九、六七九・八六	三八、一三〇・〇〇	五四

中農所使用的土地，佔了全部農村土地的一半以上。這可看出解放區在減租算賬以後是很有利於中農之發展的。中農之增加，並不是由於富農之減少而是貧農在減租算賬後改善其地位之結果。例如蘇皖邊區中的高寶馬塘鄉，原來佃貧農六十九戶中，三分之一變成自耕的中農，其餘三分之二，亦安穩地渡過災荒；原來佃中農一百五十九戶全部得田變為自耕的中農了（見卅五年六月一日華中版新華日報）。前面所述的農民大多數改善其生活亦可以證明。

第三、解放區中的貧農大多數上升為中農了，那末富農呢？關於這個階層，我們在論述戰時解放區經濟時曾經提到。在陝甘寧邊區，因為那兒是經過土地革命，而減租減息又比別的地區來得更早，

所以，富農的發展較爲明顯，所以有「吳滿有的方向就是農民的方向」的口號。吳滿有是新富農的典型，吳滿有的方向就是新富農的方向。在其他解放區，抗戰勝利後所發展的，還不是富農而是中農，但是，富農並不是完全沒有發展的。在減息的時候，雖然要損及富農過去所放的高利貸；但在減租的時候，分明是對富農有利的。還有不少中農經過減租算賬之後上升爲富農的。據山東莒南十一個村的統計，一百七十一戶中農在減租後增加了土地一千六百五十一畝，其中十二戶上升爲富農（見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華中版新華日報）。故大體上，解放區的富農亦是在發展的。中農的發展既爲這個階段的中心，則中農發展下去的結果不是富農發展嗎？就是以解放區現階段而言，富農經濟是欣欣向榮的。富農們紛紛在增僱長工，擴大生產。崑崙三區三十五年上半年增加長工一百七十餘人（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就是一個例子。

第四、至於地主，在減租算賬時當然不能保持過去對農民那樣的封建剝削，但他們並不是沒有出路的，並不是失去其生存條件的。據前節所述，一般說來，地主還保留着多於中農四倍至五倍的土地。只要遵照民主政府減租的法令，他們仍可收租，但在新的環境之中，他們有不少人是在進行轉變了。前面所舉的姬伯雄及劉憲庭等，就是好例。百餘年來，中國的地主總是死不放開其收租之手，現在解放區的地主，却自動地在獻地，而且自覺地走向工商業了，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前所未聞的奇蹟。

第五、其在城市，工人的工資增加了，工人的社會地位提高了，這是我們剛才已經提過的。現在應該提一提的是解放後的張家口、烟台、焦作、長治等城市，大量的黃包車夫在改行。過去專門以拉客爲生的黃包車夫，現在轉業了，有的從事運輸，有的從事其他生產（如手工業），大量黃包車夫的存在，是農村破產和工業凋零的表現。農村破產了，大量過剩人口跑到城市，但城市的工廠却在衰落，却沒法吸收這一批大量的過剩人口，他們只好拉車度日。這是百餘年來中國經濟一個嚴重的問題。解放區的黃包車夫改行，分明是一個創舉。它不但證明城市的工業和運輸發展，而且證明農村因土地的初步改革而減少其過剩人口了。

解放區的社會階層中，除了黃包車夫轉業外，還有二種人亦是轉向了的。這是乞丐和妓女。在歷史較長的老解放區，乞丐與妓女是沒有了的；在歷史較短的新解放區，乞丐逐漸減少了，妓女亦逐漸減少了。以張家口爲例，剛解放時娼妓達一千二百人，明暗妓館七八十家，到了三十五年七月間，妓館僅餘十七家，妓女一〇二名（見三十五年七月十六日重慶新華日報）。從大後方和收復區跑進去參觀的記者和進去從事救濟工作的「聯總」和「行總」的人員，是可以娓娓地告訴你這些消息的。他們多半認爲這是奇蹟，其實，大家都能找到正當的職業，大家都能從事生產，誰願意去當乞丐，誰願意去當妓女呢？這並不是奇蹟！

四 農村和工商業的繁榮

由於封建剝削的不斷被削弱，由於廣大人民的生產條件之改善與生活狀況的改良，解放區人民的生產情緒和生產能力都大大提高；社會購買力和市場亦跟着不斷地擴大起來了。

在農村，因為減租減息，農民對於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了。以陝北為例，鄭縣減租後提高了羣衆生產情緒，「管來成原計劃種三畝麻，以後增了五畝；李洪福原不計劃種棉花，後來亦種了五畝」（三十五年五月卅日解放日報）。其在晉綏，「減租之後，貧農爭相買地，富農紛紛增僱長工，擴大生產，崞嵐三區今年加增長工一百七十餘人。羣衆對耕地施肥更加注意。河曲城關二百二十八戶在半月內就集糞二萬車，五花城村去年買油餅三萬斤去肥田，今年就增加至八萬斤。羣衆今年生產較往年提前半個月多。種棉、紡織、修水渠、運輸、亦較往年熱烈」。『據不完全統計，晉綏二十餘縣，今年棉田四十五萬畝，比上年增加一倍』（三十五年五月十三及十五日解放日報）。過去農民生產的成果是被地主拿去的；現在的農民都是爲自己生產（在農民得土地的場合），起碼他們的生產成果大部保留在自己手中（減租後還租的場合），這麼一來，積極性怎能不提高起來呢？

在城市，工礦業的產量亦激增了。以山東的淄博礦區為例，新沙煤礦公司每日產量由二百六十五噸增至六百三十噸；淄川煤礦公司由一百二十噸增至四百噸；新博煤礦公司由一百廿六噸增至二百

噸；西河煤礦公司由一百五十噸增至三百噸。這是因爲工人在提高工資，採用八小時制，改善設備和取消一些中飽的剝削制度之後，大大地提高其工作效率的結果。平均這些礦山每人每工由〇·三一噸增至〇·五五噸。產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一（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解放日報）了。其在察哈爾，宣化煤礦的工人人數較敵僞統治時增加了一倍，由八九四人增至一、七三〇名；而產量則增加兩倍以上，每日由二〇八噸，增加至六五七噸（見三十四年十二月廿五日新華日報）。以紡織業來說，僅僅三十四年一年之內，山東解放區的濱海區，紡車從十萬輛增加到二十萬輛；織機從一萬二千架增加到一萬六千架；魯中區增加的速率大致相仿，有些只有一百戶居民的村莊竟有一百數十輛紡車，或七八十張布機。三十四年冬天全山東五個解放區已經有一百萬輛紡車和十五萬張布機。解放區的工礦基礎，雖然菲薄，但這種增長的速率是很可觀的。如果回頭去看一看大後方和收復區的工廠停工關門的現象，則解放區的工礦情況，更覺是難能可貴了！

城市的商業亦不斷地在發展着。敵僞統治時期那種蕭條凋蔽的現象完全不見了。過去倒閉的商號都紛紛復業，新開張的店鋪則如雨後春筍。以烟台爲例，敵僞統治時期僅有商號三千二百十二家，解放後四五個月，就增到五千七百四十二家。其在龍口，過去商號只有三百家，現在已增至四百二十家。張家口的商行增至二千六百七十餘家，三十五年春又有四十八家新開張。宣化的商行和攤販比敵僞統治時期激增了六倍。蔚縣的新合營鎮，在淪陷時期由於敵僞的壓榨，只剩六十六家商號，而且門

可羅雀，趕集的人，寥寥無幾，解放後幾個月，該鎮商號已增至一百六七十家，趕集人數亦增加至一萬四五千人了。安陽水冶鎮剛解放時，僅有商店作坊四百六十九家，解放後五個月，就發展至一千九百零四家，增加到四倍以上。南通金沙鎮戰前有商店四百九十餘家，淪陷時只剩下百五十三家，解放後幾個月，不僅倒閉的商店完全復業，而且比戰前增加了三十餘家。解放區商業的發展，一面是由於廣大民衆的生活改善與購買力提高；一面則由於民主政府廢除敵偽種種統制，實行貿易自由，廢除種種苛捐雜稅，實行合理稅收和放發貸款，解決部份商家資金的困難。這種情形又是與大後方及收復區完全不同的。

由於生產發展，由於物資供應的增加，更由於各地民主政府致力於穩定金融貨幣，因之，物價便處在一種相當平穩的狀況之中了。威海衛是在卅四年八月十六日解放的。如以八月份的物價爲基期，則三十五年三月份的指數僅爲一百二十二，漲得極其有限。以烟台來說，以三十四年九月份的平均價格和三十五年三月份比較，各種主要生活必需品，雖互有漲跌，而波動極微。如玉米麵每斤由七元二角跌至四元六角五；細布每疋由二千七百三十元跌至二千六百四十四元；花生油每斤由九元漲至十一元四角六；豬肉每斤由十五元跌至十四元。三十五年三月份的金價每兩一萬零六百八十三元，七個月只漲了百分之五。這種情形，是大後方與收復區所夢想不到的。其在張家口，日用品亦比大後方便宜得多。例如一件潔白布的襯衫只賣一千九邊幣（每邊幣合法幣二元）。墨水二百元一瓶；牛奶三十

元一杯；點心十元一個。雞蛋一百元六個」（見三十五年六月十日羣衆週刊）。大後方和收復區的物價，在勝利後瘋狂地飛漲，而解放區的物價雖然上漲，但漲得很和緩，甚且有些東西在下跌。一方面的物價在狂漲；一方面的物價則保持相當的穩定。兩種物價的傾向。表現了二種社會經濟性質和前途！

這種相當穩定的物價是由於上面所述的一些因素所構成的。這就是說：如果沒有減租減息，如果沒有改善農民和工人的生活，如果沒有提高農民工人的生活生產情緒和生產能力，如果沒有積極擴大生產提高生產，如果沒有先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去爲人民解決經濟問題，然後才用百分之十的力量去同人民要稅收的政策，那末，解放區的物價，是沒法達到這樣穩定的。解放區的民主政府積極地措置這些問題，而大後方和收復區則是走着反背的道路的。二條不同的道路，必然得着二種不同的結果！

要使中國經濟能够免於崩潰，要使中國不變爲印度第二和菲律賓第二，那只有走解放區所走的道路，那只有走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道路。這是沒有什麼疑義的了！

第七章 現代中國經濟的結構與各種社會力量

一 列強在華的經濟力量

一 英國在華坐第一把交椅的時候

在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法則支配之下，列強在華的經濟力量，無論在那一個時期，都呈現着起伏軒輊的狀況。

在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成立以前，歐美各國雖然已與中國通商，但那時通商範圍只限於廣州一隅；南京條約成立以後，情形便急形轉變。鴉片戰爭的發生和南京條約底成立，是因為當時英國底資本主義已經十分發達，充滿於國內的剩餘商品，非到國外找求發洩的地方不可，所以首先侵略中國，強迫中國訂立不平等條約；所以，在南京條約訂立以後的七十年間（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的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佔着絕對優勢。一八六五年英人所設立的「香港廣州澳門輪船公司」乃是外國人在中國設立輪船公司的開始。接着，英人又於一八六七年設立「中國航業公司」（俗稱太古公司）；於一八七七年設立「印度中國航業公司」（俗稱怡和公司）。金融方面，英商麥加利銀行於一

八五七年首先設立分行於上海，匯豐銀行（先為各國資本合辦，後歸英商獨辦）亦設分行於上海，為外國銀行在華設立的先鋒。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有香港作對華貿易底根據地，有基礎最穩固的銀行和輪航公司以扶助貿易的進行，所以它在中國對外貿易上，在南京條約以後的七十餘年間，總是坐著第一把交椅。

二 日本乘列強無暇東顧的機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局面起着變化了。日本帝國主義乘列強無暇東顧的機會，對於中國的掠奪與擄取，拚命地幹起來。日本對華的侵略，早在甲午戰爭之後就開始。馬關條約是強迫中國准許外國在華設廠的枷鎖。這是日本幹出來的「好事」！在訂立馬關條約的同年，日本帝國主義者就打算在楊樹浦設立東華公司，後來調查的結果，覺得在華設廠不如在日設廠之有利，因而就把原計劃擱置；到一九〇二年三井洋行才收買華商大純紗廠，改組為上海紡織第一廠。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華擁有紗廠的開始。一九〇八年與中國資本家合辦九成紗廠；一九一一年又設立「內外棉會社第三廠」，從此便奠定日本在華的紡織業中的基礎了。煤礦方面，日本於一九〇七年在遼寧所設的撫順煤礦公司，則是外資在重工業投資的開始。金融方面，正金銀行之在中國境內設立分行，亦是甲午戰爭以後之事。從這些情況看來，日本帝國主義是的確確早在甲午戰爭以後就伸其食指於中國的。不過，它在那個時候的力量還有限，它還沒法與英法諸國爭衡。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帝國主義就乘機在中國大

大發展其勢力，把過去英國在華所佔的優勢盡情地摧毀了。在歐戰之前，日商紗廠底錠數，只有九萬五千餘枚，比英商在華錠數少七萬二千零三十枚；歐戰後，日本的勢力大為增加。一九二五年日商在華紗錠數增至一百三十三萬二千三百零四枚，而英商紗錠只有二十萬五千三百二十枚。英商紗錠只占日商紗錠的百分之一五·四。其在煤業，一九二九年日本的投資額為二千七百五十萬元，而英國只有二千二百萬元，英資亦落在日資之後。其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一九一三年中國對英及香港的貿易為四〇二、〇二二、一一七關平兩；對日貿易為一八四、八九〇、八四八關平兩，到了一九三〇年，中國對英國及香港的貿易為五四七、三一五、〇四八關平兩，中國對日的貿易則達到五四三、七二〇、一〇九關平兩。在這裏，對香港的貿易並不能完全算是英國的，所以英國在中國國際貿易中所佔的優勢，是被打倒了的。其在金融，截至一九二五年前後，外商在華所開銀行共計六十三家，其中日本佔了四十二家，這四十二家銀行絕大部份是在歐戰以後開設的。從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帝國主義在歐戰期間如何伸展其勢力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資本在華的發展，亦非常迅速，據雷納氏的統計，列強在華投資的消長（截至一九三一年），其趨勢如下（單位百萬美元）：

年期	一九〇二	一九一四	一九三一
國別			
投資額			
%			
投資額			
%			
投資額			
%			

英國	二六〇・三	三三・〇	六〇七・六	三七・七	一、一八九・二	三六・七
日本	一・〇	〇・一	二一九・六	一三・六	一、一三六・九	三五・一
美國	一九・七	二・五	四九・三	三・一	一九六・八	六・一

根據雷納的統計，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在華投資，將與英國分庭抗禮。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在華投資更加躍進。截至「七七」事變之前一年，日寇在東北投資，增加十一萬二千餘元；英法美等國原在東北七萬萬日元的投資，只好陸續撤回。白山黑水間的經濟命脈完全被敵寇所獨占了。其在關內，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亦大為增強。據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天津益世報的估計，日寇在這個時期的新投資，在華北達三萬三千三百萬元，在華南達三萬九千三百萬元，合計起來，從一九三一年至「七七」事變以前一年之間，日本帝國主義在關內新增的投資為二十二萬二千六百萬元，把這個數額與雷納氏的統計合在一起，那末，日寇在華投資的總數，是超過英國的了。（英國在「七七」事變前夜的對華投資額，據英國海軍大將（C. V. Usborne）的估計，只有二萬四千四百萬鎊，而「財政與商業」雜誌則估計為三萬萬鎊，如折中作二萬萬六千萬鎊計，約值美金十三萬萬元，比一九三一年只多一萬一千餘萬元而已）。但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的投資，有一半是投放於東北的，中國本部，還是英國佔優勢。美國遠東經濟調查團的報告，亦證明這一點。這個報告謂一九三五年列強在中國本部投資，英國十萬萬美元，日本五萬萬美元，美國二萬萬美元（實際上不止此數，在雷納氏統計之

後，美國對華投資，僅就棉麥借款五千萬美元，航空公司三千萬美元，公路建設借款一千五百萬美元，航空製造廠借款四百萬美元四項而言，差不多增加一萬萬美元，若與雷納氏之數字合計，則美國對華借款為二萬萬九千餘萬美元。這種情形，到了「七七」事變以後，就完全起着變化了。

三 日本打破了原來均勢

「七七」事變以後，日本資本在武力的保護之下，急速的發展着。據袁慶炎先生的統計（見經濟週報第一卷第一期），「七七」以前，日本對華投資的總額為三、一三五、七五〇、〇〇〇日圓（其中總公司在日本、朝鮮、台灣者二、七九一、七七四、〇〇〇圓；總公司在中國者為三四四、九七六、〇〇〇圓）；「七七」以後的投資額為四、八二四、六八二、〇〇〇圓（其中總公司在日本朝鮮台灣者四、一二五、六一八、〇〇〇圓，總公司在中國者為六九九、〇六四、〇〇〇圓），「七七」事變後的八年，日本在華投資較諸事變以前數十年的投資額，竟超過百分之三十五左右。這種突進的情況，分明是武力侵略的結果。

在日本強盜投降的八年間，它不但摧毀了東南沿海的中國民族資本與經濟據點，而且亦推翻了英國資本在中國本部佔着優勢的局面，並使美國的投資沒法在淪陷區中存在。英國在華投資比較集中於鐵路、航運、開礦與紡織。七七事變以後，英國所投資的這些部門，無一不受敵人的摧殘，以鐵路來說，英國對華的鐵路借款，計有北甯、京滬、滬杭甬、廣九、淞滬、平漢、津浦及道清等線，這些鐵

路不是毀壞，就是被敵人佔去了。以礦業來說，英國的幾個據點，如焦作及開灤等等，不是被日寇搶去，就是被它支配。以紡織業來說，上海幾家英商紗廠，都挨了日寇的砲火的摧燬。至於美國，它對華的事業投資，輸出入貿易與「公益文化事業」最佔主要，但是，文化公益事業因日寇之轟炸而大受打擊了；貿易事業亦因日寇之封鎖而落在日寇之後了。據海關年刊，二十六年日本對華進口祇有一萬五千餘萬元，佔入口總量百分之十五強，到二十九年竟增至四萬四千六百餘萬元，佔入口總量百分之廿三左右；美國在二十六年對華的進口為一萬八千八百餘萬元，佔入口總量百分之二十左右，為是年進口之首位，二十九年雖增至四萬三千五百餘萬元，百分比增至二十一強，但已居日本之下風了。英國的情況，更形衰落。二十六年英對華人口就有一萬一千一百餘萬元，佔百分之十一強，至二十九年跌至八千餘萬元，百分比降至三·九了。這一年，敵人對華入口，比美國多一千一百餘萬元，比英國多三萬六千餘萬元。金融方面，敵人除了大量發行軍用票外，又設立多數偽銀行，大量發行偽鈔。在華北、從二十八年三月起，敵寇便開始管理外匯，正金銀行就在這個時候，從匯豐銀行手裏奪去支配外匯的權力，至於「正金」之攪得關稅存款保管權，則早已是二十七年五月間之事。在華中，敵寇對於金融之支配力雖沒有在華北那麼大，但它對於英美的壓力是與日俱增的。

這是太平洋戰爭以前，敵寇在淪陷區中排斥英美的經濟力量的大概。在這個時期，儘管日寇的手段多麼毒辣，但在表面上，總不能不承認英美的經濟權益之存在，特別在上海，當它仍保持其孤島地

位的時候，英美在那兒的金融與工商的力量，仍爲日寇的障礙物，可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強盜又在太平洋上捲起海嘯來！上海公共租界被佔領；香港不久告淪陷。從此以後，敵人對於英美的權益，不復採取脅迫或敷衍的態度，而是直接了當的採用佔領與沒收的辦法了。

太平洋戰爭之後，敵軍即進入上海租界，拘捕英美僑民，平津等地亦復如此。對於英美在華的產業商行與銀行，則在「管理」的名義之下，進行實質上的沒收。日寇侵華初期，對於華北的一百餘家工廠，亦曾施行過什麼「軍管理」，它對於英美在華企業的管理，就是這種軍管理的延長。上海的英美荷比的銀行，就是處在敵寇的管理之下的。到了一九四二年三月廿八日，敵寇又宣佈將英美等國在滬七十五家重要企業，置於敵寇委任的日籍監督的管理之下營業。各該企業的財務、用品的銷售與分配，都受各該日籍監督的支配。就這樣，敵寇使英美在滬的重要企業爲它的侵略戰爭服務了。

日本強盜除了用暴力奪取英美的實際權益之外，並且發動漢奸汪精衛政府在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江甯條約百年紀念的那一天，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驅逐英美在中國的勢力」。這麼一來，在敵寇指揮刀所能及的地區，英美的權益都被日寇搶去了；英美在淪陷區的經濟特權與經濟力量，被日寇一筆勾銷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在淪陷區中，把最近半個世紀英美日在華資本的均勢，摧毀得乾乾淨淨了。

可是，在解放區和大後方，日本強盜從馬關條約以來所加諸中國人民身上的桎梏，却被我們取

消；這與英美在淪陷區中的經濟力量與特權，被日寇所摧毀的情景，形成一個對照的局面。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了！它從「九一八」以來在東北的特權，它從「七七」以來在關內淪陷區的特權，又完全被否定了。列強在華的經濟力量，到這裏，起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展開了一個嶄新的局面！

四 美國代替了日本

敵後解放區是沒有什麼外國的特權的，這與大後方的情形大不相同。英美在抗戰時期，雖因它們原來在大後方的經濟勢力沒有像它們在東南沿海那末雄厚。但「底子」總是有的。如果從財政關係來說，中美的關係是明顯地比以前更增進了。從二十六年八月至三十一年一月，中英借款十二次，總數共一萬一千八百五十萬英鎊；從二十七年十二月至抗戰結束為止，中美借款九次，總數為十二萬四千七百八十萬美金。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美國對華使用租借法案。如果截至抗戰勝利時候為止，則租借法案的價值為六萬三千餘萬美金。故抗戰期間，美國對華的借款及物資援華總額，約達十八九億美元之巨。這證明中美的財政經濟關係是比以前更為密切的。如看看戰時生產局與戰時運輸局的設立，如果看看中央政府不但依靠美國借給軍火，而且依靠美國借給黃金和布疋的事實，就更可瞭然了。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英中美分別簽新約；廢除辛丑條約所規定的英美在華特權。如果照這二個新約的內容來說，從這一天起，英美就放棄其在華的駐兵權、租界及使館區特權、軍艦自由駛

入權、領事裁判權、通商口岸特權、沿海貿易及內河航行權、外籍引水權與海關雇用客卿權等。如果單從條約的條文看來，這些特權的廢除，都是中國人民所希望所爭取的。可惜的是：經濟方面的通商口岸設廠權與採礦權等，都未提到，而關於財產部分的某些有利於單方的權利，還在法律上給與一些保障。抗戰勝利以後，這些缺憾越來越顯得巨大，顯得更為驚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却一幕一幕的表演出來！在軍事方面，人們支出了中國的領土權，給與美國以陸軍的基地讓美國軍隊駐在中國；支出了中國的領空權，給與美國以空軍的基地，讓美國飛機自由「巡邏」全中國；支出了中國的領海權，給與美國以海軍的基地（如青島、秦皇島等），讓美國海軍自由自在的游往中國領海；支出了中國的軍權，以軍隊美國化代替「軍隊國家化」，放在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支配之下。在政治方面，人們支出了中國的政權，堅決要把中國內政問題的最後決定權奉送美國。在經濟方面，第一、在三十五年六月初本擬簽字的中美商約，其內容是對美不加關稅，澈底放棄保護政策。後來雖因各界之反對而延期簽字，但是，保護民族工業的藩籬，是沒有什麼保障的。第二、人們頒佈了新公司法，使美國的「中國貿易法令」在中國發生効力，使外國獨佔資本與買辦資本在中國境內壟斷中國的經濟；第三、人們支出了內河航行權，准許外國商輪駛泊南京、蕪湖、九江、漢口四埠，經過各界的反對後，始將四口通商改爲二口通航，但海關尚未取消外輪可航行沿海的命令，而太古怡和兩公司所發表的宣言，仍充分顯示出侵犯我國航行權的企圖。第四是奉送海關客卿雇用權。三十五年六月間，江海關稅務司丁貴

堂辭職之後，當局却改派英人白禮查繼任。第五是支出中國的漁權，接受麥克阿瑟的決定，讓日本船在中國沿海捕魚，在抗戰勝利之後，在中國則身為五強之一的當兒，人們却在廉價拍賣中國的主權。從陸上到海上，從天上到地下，從軍事到經濟，從現在到將來。應有盡有的包括在裏面了。日本廿一條的第五條，要求掌握中國的政治、財政、軍警的大權，直接把中國變成殖民地，那時袁世凱還有所顧忌；當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漢奸政府的時候，日本在中國淪陷區的特權，亦不見得比這多了什麼，可是，人們現在却悍然的把這一切贈送美國了。中英中美新約所已廢除的駐兵權、內河航行權與海關客卿雇用權等等，都由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政府主動地奉送了！

抗戰勝利以後，列強在華的勢力，起了巨大的變化。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勢力雖一摧毀；但美國獨占資本與帝國主義份子在中國所獲得的，却比日本帝國主義曾經在中國獲得的不知多了多少倍！就是因為這是一筆大交易，所以美國的獨占資本，樂意於把大量的軍火和資金送給「中國」。從抗戰勝利到三十五年六月底的十一個月中，美國在租借法案中所撥給中國政府的物資，約為美金十萬萬元左右。這個數目比太平洋戰爭以後至抗戰結束時期所借給的數額還來得多。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棉花貸款三千三百萬元；還有什麼剩餘物資八萬二千五百萬美元。這一切，都是為着鞏固其在華的特權，都是為着使中國變成新的菲律賓而支出的投資的。如果看看滿天飛的美國軍用機，看看佈滿華北東北以至華中的美國軍隊，看看佔住青島和秦皇島等處的美國海軍，看看那些排山倒海充滿中國口岸的美國

商品，看看那些在技術合作的名義下侵入中國公私工業的投資，就可以瞭解這並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橫在我們面前的鐵一般的事實！

抗戰的勝利，並未取消列強在華的特權，只是用美國的獨占資本代替了日本帝國主義而已。

二 土地關係與地主經濟

一 土地所有權的變動

中國的土地關係，在鴉片戰爭以後，仍和過去閉關時代一樣，可以耕種的土地，絕大部份握在地主手中。土地集中的情形，根據陳翰笙先生的「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中所列舉的統計：河北保定十村一五六五農家中，地主富農佔農家總戶數百分之一一·七，但耕地竟佔百分之四一·三，反之，戶數佔百分之六十五·二的貧農僱農，其耕地只有百分之二五·九；浙江平湖的地主，人口只佔百分之三，而耕地却佔百分之八十；江蘇無錫二十村一〇三五農家中，地主富農以百分之一〇·三的人口，佔有耕地百分之六五，而百分之六八·九的貧農僱農，只有耕地百分之一四·二；廣東百分之七十四以上的貧苦農家，只佔耕地百分之十九，而百分之六的地主富農，却佔有耕地百分之六十六。如果以全國而論，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四的地主，竟擁有全國一半的土地，而佔有全國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及僱農，則只佔有百分之十七的耕地，此外，佔戶數百分之六的富農，耕地佔百分之十八；佔戶

數百分之二十的中農，耕地佔百分之十五（見「中國土地問題和商業高利貸」第六十五頁）。這是抗戰以前土地集中的情形。這種情形，在抗戰時期，不但未曾削弱，反而是劇烈地在發展着。

據農產促進委員會的調查，中國農村土地的兼併，在抗戰時期，比較戰前，更爲劇烈。以四川爲例，自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年短短的五年間，四川地主所佔農田的百分比，從百分之六九增至百分之七十；西康從百分之六九增至百分之七三。在這裏，地權的移轉且包含着新的因素。這就是：由於日寇的進攻，由於歐戰的爆發，由於通貨的不斷膨脹與官僚資本之不斷擴大，游資日益增長。這一股像狂流一樣的游資，除了在市場上競購物資從事商品投機之外，並且參加到競購田地這方面來。因爲幣值之跌與糧價之不斷上騰，購買田地是一件十分有利的生意。在另一方面，在物價暴漲的條件下，一般小農，爲了交納賦稅，爲了還債付息，爲了維持生活，不得不飲鴆止渴地出賣土地。一方面，存在着想要購買土地的游資；一方面，又存在着瀕於破產而不得不出賣土地的農民，這麼一來，土地集中就更加急速了。

第三戰區經濟委員會出版的「東南經濟」（三十年四月號），對於土地兼併的情形，亦曾述及，「擁有大量土地或特產的地主，烽火中的暴發戶，以及一部份不惜利用地痞流氓作走私和囤積居奇的非法買賣發國難財的喪心病狂者，他們在國難中對法幣懷疑，很聰明的想到購置田地是最穩當的，大家不約而同的紛紛購買田地。從後方到前方，從東南到西北，瀰漫了暴發戶爭購田地的氛圍。後方的

農村固不必舉例，凡關心報章的俯拾即是，就是前方的洞庭湖西岸的南縣及華容，買田都很起勁，甚至有連經手交易採取佣金的人，亦有成爲財主的，由此可以證明地權變動的激增了。在抗戰以前，兼併土地的主要是土著地主及軍閥官僚，抗戰的時候，又增加了一些「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投機份子了。官僚商業資本的活躍，是抗戰時期地權轉移一個重要的因素。

抗戰時期的淪陷區，土地亦呈現集中的趨勢。不過，淪陷區的土地集中方式與大後方是不同的，在大後方，土地是集中在發國難財的暴發戶手裏；在淪陷區則集中在日本強盜和大漢奸的手裏。在大後方，土地集中的方式是通過穀價與地價上漲的途徑；在淪陷區，敵僞之集中土地則採取武力侵佔或強迫收買。敵人所強佔的民田，除了用於建築公路、封鎖溝、飛機場、兵營及倉庫之外，並且分配給日韓移民，建立日本的「新村」。如「中日實業公司」經過僞政府之手，沒收了過去由段祺瑞等出資經營的軍糧城茶提兩個大農場（共三千五百町步，合五萬六千華畝），該公司又設計侵佔以下地區，計：冀東三十萬町，津浦鐵路沿滄州一帶四萬町，山東省黃河下游八十萬町，其他山西、河南等省約一百萬町，合計二百萬町，即三千四百餘萬華畝。北平的僞「中央農事試驗場」在德縣和唐山等地「收買」了不少民田；僞新民會在南口所設立的農場亦是賤價迫買的。在這裏，有些土地原是屬於地主的，更大部份的土地則是屬於農民的。不過，這種情形，在日寇投降之後便成爲「陳迹」了。

日本投降之後，由於通貨的惡性膨脹，由於交通運輸的設法改善，由於物價依舊不斷飛漲，由於

農業生產成本的有增沒減，更由於軍糧之層出不窮和徵實徵購的恢復與增加，大後方和收復區的廣大農民，甚至中小地主，都急激地破產了。破產是土地兼併的契機，三十五年七月廿六日上海大公報的社評說得好：『據本報湖南電訊，青苗貸款九千元一石，或貸穀一石償還二石半不等。托饑荒與賑災的福，有錢有勢的土豪劣紳，正在大興土木，大買田地，那房屋是以枯骨做棟樑的，那田是以眼淚灌溉的，貧富由此懸殊，社會焉得不動亂，民心焉得不趨險？』

只有在解放區，地權的變動才走着另一條途徑。陝甘甯邊區有一半地區是經過土地革命的。經過土地革命的地區，封建剝削完全被粉碎了。未經土地革命的地區，則經過減租減息減弱了封建的剝削。敵後的解放區都是實行減租減息的。減租減息之後，農民的生產能力與情緒都大大提高了，土地關係與階級關係亦大大地起了變化。土地關係由集中走向分散；農村中的階級，則是大多數的雇農貧農上升為貧農中農，大多數的貧農中農上升為中農富農。以晉冀察邊區為例，實行土地改革以後出當土地的多為地主富農；出賣土地的亦多屬地主與富農（特別是地主），而當入或買入土地的則多為中農貧農。戰前這些地區土地飛速向地主集中的情況，已經停止了。相反的，土地是從地主及部份（舊的）富農手中，逐漸向着缺乏土地的貧農中農及新起的富農分散了。本書第四章中曾舉該邊區的北岳區底四十五個村莊的調查作例，在這裏，地主在廿六年佔總戶數二·四二%，到三十一年下降為一·九一%，土地佔有從二十六年的一六·四三%，降至三十一年的一〇·一七%；驃馬從二十六年的一八·

九%，降至三十一年之六·六四%，其他牲口亦同樣減少。反之，中農在農村戶口中所佔比重，從二十六年之三五·四二%上升至三十一年之四四·三一%，土地佔有從四一·六九%上升至四九·一四%，畜力方面，騾馬佔五二·一六%，牛力佔七九·一四%，驢力佔六一·八八%。僱農貧農的戶數從二十七年的四七·五三%（其中僱農佔七·〇六%，貧農四〇·四七%）減至三十一年之四〇·九五%（其中僱農減至三·二三%，貧農減至三七·七二%）但土地佔有則從一九·一%增至二〇·一二%，地主在土地佔有的比重中逐漸減低，而中農則逐漸提高。這是地權從集中轉到分散的表現。

抗戰勝利以後，解放區又把土地改革推進一步。經過沒收敵寇漢奸所佔的土地，經過沒收過去之所謂「掛地」和「黑地」，經過算賬，經過地主自動獻地，解放區的一部份農民是得到了土地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地主在土地佔有中所佔的比重是明顯地急速地，更加降低的，有不少地主變成富農了。

中國現代的土地關係，存在着二個不同的趨勢：一個是土地趨向於集中，集中於官僚、地主、商人的手裏；一個是土地趨向於分散，分散於從事生產的貧農中農以至雇農的手裏。這二個趨勢，呈現着二種不同的經濟體系，呈現着二個不同的政治勢力。一切的鬥爭是從這裏引導出來的！

二 地價和地租

集中在地主手中的土地，是地主剝削農民的武器。地主利用農民之沒有土地，以苛刻的條件，迫

使其耕種極端細小的土地。在抗戰以前，就以政府的統計而論，安徽分租額，無論田的等級如何，都佔產量百分之七十以上，四川福建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四川穀租亦佔全產額百分之六十以上），陝西在百分之五十五左右，錢租以陝西、四川、福建、雲南及吉林等省爲高，竟有超過地價百分之二〇的。抗戰時期，地主多以田賦徵實及糧價高漲爲藉口，從事加租。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重慶國民公報曾有這樣一段記載：

「川東一帶，往年繳租十石，現則改爲十一石，並另加包穀若干，麥租若干。若係沖田，無水旱之虞者，多換掉早日之押租金爲實物，如往年十石穀之押租金爲五千元，今則多改爲穀子四石或五石」。

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大公報載：

「隆昌最近二三年來，地主藉口糧價增加，紛紛加租至七八成；成都一帶則加至九成，甚至有全數繳給地主，而僅以田墜及附近山地出產給予佃農者」。

綜合三十三年各地報導材料，抗戰時期大後方各地地租一度增加。四川已平均增加至耕田正產物總額的十分之八；雲南、西康、貴州、陝西增加至十分之六；綏中、甯夏、甘肅、青海等地租額原來甚低，亦竟增至十分之四五（見三十五年八月九日上海大公報）。

勝利以後，人們在頒發「二五減租」的告示，但實際上，農民不但受不到減租的恩惠，反而受到

了加租的「德政」。三十五年八月九日的上海大公報有一則南昌通訊是這樣寫着的：

「際茲各地高唱『二五減租』聲中，江西的佃農不僅不能享受減租的待遇，反而要繳十二成的租穀。如贛東各縣地主，有田一畝，如十足年歲，可收穫稻穀四石，否則二石或三石而已；但佃農於租約上須註明：『無論水旱之災，每年實交焦租穀二石四斗，不得短少升合』」。

川東的地主，對於「減租」的辦法，除了虛增產量以增加租額（即將佃約租穀額提高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二十五）外，還有另一種方法，這就是另寫存穀契紙。『提高租額固是一方面的辦法，但只怕政府要用佃契徵稅配賦。在一般靈通的地主便採用「半租半存」的辦法，即十石租穀，在租約上寫了五石租穀，另一張上年存穀五石。如此從表面上看來依產量收租，儘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在法律上說尚未超出百分之三七五租額。如果遇有天災，租穀隨便繳納；而五石存穀，是一粒不得減少的。我們掉轉來以事實說，川東近六年的旱災，多數地主將佃戶的收穫全部刮去，還僅足約定租額百分之二三十。如是看來，地主便預收佃戶的百分之五十的租穀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上海「文匯報」之「中國農村」）。

抗戰的時候，大後方的地主在提高地租；抗戰勝利以後，大後方和收復區的地主又在提高地租。所謂「二五減租」，實在是向垂死的農民開玩笑！除了高度地租之外，還有押金。國立社會教育院在四川璧山附郊四鄉區作農村調查：一百廿五戶佃農及半自耕農，每一市畝田每年所付押金，從戰前

的二十七元漲至三十三年的一千三百六十餘元；在巴縣，每畝押金有增至一萬元的。抗戰勝利以後，各處地主又在加押。在川東，種「三石（九市石）糧食的乾灘灘土，就要加押六萬光」。八畝田的一塊土，除了稻穀均分之外，押金從十萬元增加到十五萬元，並且還要送稻草二百斤，每年與老板做義務活路二十天（見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上海文匯報）。這是何等苛刻的事？

除了地租和押金之外，地主對於佃農還有種種的額外剝削。在新四軍解放蘇北以前，淮安一帶地主對農民的額外剝削如下：

（一）「虛田實租」——地主出租的田，多不足數，往往連塘、路、河界及溪岸等都算在內，要佃農照虛畝納糧。普通每石種（六畝六分地）要虛田五分；有的地主指塘為界，塘水漲了仍照原畝收租，塘水退，田界擴大則需加租。

（二）「醬麥」——佃戶每年每畝要孝敬三升到五升麥子給地主做醬。

（三）「預借麥」——不管年成好壞，地主每年要向佃戶「借麥」二斗至四斗，藉口是沒有麥租，但許多地主是從未還過的。

（四）「節禮」——過年過節佃戶要送地主雞、鴨、魚等，不送就不行。

（五）「收租酒」——又名「供飯」。每年地主下鄉看租。佃戶必須辦酒席招待。有的地主甚至帶廚子下鄉，開菜單要佃戶照辦，弄得不好，佃戶還得再辦一席來謝罪。這一帶佃戶每石田每年要花

五斗米在「供飯」上。

(六)「大斗大斛」——地主收租用的斛比普通的大，每石多一斗六升甚至二斗，但佃戶要去借時則祇能用自己的小斛。

(七)「押板金」——這是各地通行的押金，約佔地價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抗戰以後，原由地主負擔的修車費（每年修一次，約需三斗稻子）等都要由佃戶負擔。此外，還有：(一)「代出僞費」，敵僞統治時攤派的僞費非常多，其攤派的方法是按田畝攤，但地主，特別是住在城裏的地主則藉口「城裏亦要出費」，鄉裏的就要讓佃戶出。據調查：淮安下河鎮的佃戶代地主出的僞費達四十七種之多。(二)「支差工」，這就是派工，按田畝攤派，所有的差工都由佃戶負擔。

蘇北在解放前的額外剝削，據不完全的調查，不下二十種。其他各地的額外剝削，大致亦和蘇北差不多。

由此可見，單從正租（地租）去觀察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是不夠的，正租只是其中主要的一部份而已。不過，單以正租和押金而論，已是十分驚人了。因為地租和押金等不斷提高，所以地價亦不斷跟著提高。以陝西的咸陽為例，在民國十八年西北大旱之後，每畝只值二角五分。二十年漲至每畝一元，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逐步升至每畝十元，三十三年秋間每畝值二萬元，當時陝西一般物價是民國

二十六年的五百倍，而地價竟漲了二千倍！川西某縣地價，戰前每畝七十元至一百元，典價是五十元至七十元；三十二年每畝地價竟漲至五千元至九千元，典當地每畝漲至四千元至六千元，比戰前漲了八十多倍。農村耕地之上漲，是以糧價之上漲為前提的，因為地價是地租之資本化。糧價高，地價就必然上騰，而地價之上騰又與地權之轉移結合在一起。投機家看見糧價高，看見地價高，就拚命的爭買；爭買的結果又促使地價之提高，而地價提高之後，又回頭來影響地租。地租與地價，就在糧價飛騰之前提下，互相推動着。

在抗戰的時候，大後方的地價和地租一齊上漲；但淪陷區的地租雖則增加，而地價却並未跟着地租之提高而上漲。這是因為淪陷區中敵偽隨意霸佔土地；社會秩序極度不安之故。抗戰勝利之後，收復區的地價亦未上漲，最主要的原因是田賦的徵實徵借太重，但西南一帶的地價，仍甚活躍。地價走着二個不同的趨向。

只有在解放區，地租和地價才以同一步調在降低。地價既然是地租的資本化，那麼，減租的結果，地價必然跟着下落了；而同時，減租之後，購買土地以收租的利益，遠不及投資於工商業，所以，一般社會資金並不去追求土地（購入土地以自耕的，又當別論）。這是大後方和收復區所沒有的。

中國現代的地租和地價，亦呈現二種不同的趨向：一個是地租與地價一齊在提高。（或者地租高而地價並不高）；一個是地租與地價一齊在降低。前者有利於地主，而後者有利於農民，（在地租高

而地價不高的場合，更深刻地刻劃農民的破產。這二個趨勢是與土地所有權的轉移血肉相關的。

三 沒落的地主經濟

上面我們曾經提到「佔全國農村人口百分之四的地主竟擁有全國一半的土地，而佔有全國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及僱農，則只佔有百分之十七的耕地」。這是從階級等比去顯出中國土地的集中的；在明白了這種對比以後，應該從地主土地的絕對數字去瞭解它的集中。

先說過去的例子吧，湖南的聶雲台一家，擁有土地十餘萬畝；衡陽的趙恆惕一家，新寧的劉坤一家以及洞庭湖畔的多數湖田地主，其所有地產多在一萬畝以上；河南的袁世凱家，竟佔彰德的土地三分之一；合肥的李鴻章一家，其在蕪湖及河南信陽一帶之地，是沒法測量的。一九三〇年春，江蘇民政廳會調查該省五百一十四個大地主，他們每戶佔有土地千畝至六萬畝。抗戰時期，後方的土地集中得更快！聞化先生曾在陝西南部、廣西東部、成都平原及重慶附近，以一個鄉鎮區域範圍作一調查。在這些地區中，地主的人數如下：陝西南部有三百四十三人，廣西東部有二百九十一人，成都平原原有九十四人，重慶附近有一百八十六人，普通每鄉鎮以二千戶計，以成都平原為最高，陝西南部為最低。如以收入量計，則在農作物兩季收穫期後，從各方資料估計，在陝西南部內最大之一地主有田六千三百三十四畝，最低有五十八畝，該地採用分租制，一年兩季，主佃各半；出產有小麥、水稻、

棉花、高粱等，最高一地主每年共可得八千一百市担，最低可得六十七市担。廣西東部內最高一地主有田二千二百三十六畝，最低一百零九畝，該地採用包租制，出產有水稻、小麥、玉米、豌豆等。最高一地主每年共可得一千九百二十五市石，最低八十七市石。成都平原內最高一地主有田四千三百五十七畝，最低有二百三十八畝，每年每畝以租米（成渝二地皆按畝定租）二市石計，則最高可達八千七百十四市石，最低可達四百七十六石。在陪都附近內，最高一地主有田（包括地）三千八百零七畝，最低六百八十四畝，每畝每年收租穀一市石五斗，則最高可達五千七百市石零五斗，最低一千零二十六市石（見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重慶新華日報）。聞化先生所調查的對象，都是屬於一般地主，若從個別的特殊例子來看，則大地主的土地，還不止此。以四川平原而言，地主所佔之地，竟有高至三四十萬畝者；郫縣全縣的土地，幾乎被某人買完；廣安的某地主竟佔有全縣土地之半數。重慶附近，亦有類似的現象。抗戰以來，穀價高漲，日升月異；穀價高，地主的進款跟着增加。據沈宗瀚先生的研究，榮昌上等水田地價，二十八年每畝約一百五十元，這一百五十元的全年利為十二元，而地主從每畝田所得純利為一百六十五元，收入為其成本的六十一倍（見三十年五月二十日大公報）。這是以二十九年每石市價六七十元計算的，以二十九年以後的市價從六七千元逐漸漲至一萬七八千元。若以一萬七八千元來計算，則家有穀租八千石的地主，每年就可得法幣一萬五千元左右了。田賦徵實雖然使地主提供一部份地租給政府，但若與工業比較，那是輕鬆得很多的，何況他們可以把徵

實的負擔轉嫁給佃農呢？地價雖高漲，然使地主在購入土地時多支出一點貨幣，這對於他們亦是無害的。有人描寫地主可以在糧價高漲中起死回生。他說：

『戰前有一百畝的地主，以五千元或七千元典給別人，無一點租收，到三十二年的今日，還用不着拿二畝田出賣，就可抵消債務，餘下的九十八畝多田，又可收租了』。

這是很確實的一個例子，糧價貴亦好，地價貴亦好，大家都感到頭痛，但地主却在這裏，無往而不利，却在這裏長得更肥胖了！

地主在各省，名稱是不一的，有的稱「紳糧」，有的稱「大戶」，有的稱「糧戶」及「主人家」。我們若依照他們居住的地點及「業務」，則可以分爲下列三類：

第一是官紳地主。這種地主，終年居住都市，擁有大量土地。他們都是做官起家的，他們的土地是從人民手里刮削得來的。退職以後，亦多掛個把空頭銜。他們對於自己的田地，從不過問，完全委託管事照料，或者由家中大小，分名執筆，免爲人注意。

第二是商紳地主。這種地主，除了收租以外，還兼作商業經營。他們大半住在縣城或市鎮上。

第三是鄉紳地主。這種地主居住鄉村掌握財產，有一部份有時從事少量土地耕作，但田間操作，多數命佃農代勞。

這種分類，祇有相對的意義而已。事實上，地主，特別是大地主，多半是收租者、官吏、商人及

高利貸四位一體的人物。許多放高利貸的地主，可以變爲地主兼商人；許多的商人地主，可以商人地主兼政客，同時，許多商人政客又可變爲地主。一九三〇年春，江蘇民政廳曾調查該省五一四個大地主，其中三七四個都有主要職業，其餘一四〇個，雖未確知其操何職業，但純粹收地租者，爲數很少。地主越大，則越不是單純收租的人物。在三七四個大地主中，百分之四四·三九爲地位不同的軍政官吏；百分之三四·四九，爲當舖及錢莊老板或放高利貸者；百分之一七·九一爲店主及商人，僅有百分之三·二一爲工廠股東。一般說來官吏地主以東北及西北爲多；商人地主則以山東、河北、湖北及江浙商業較發達之處爲多。不管地主是否兼有其他職業，依照上面所述，他們所兼之業，大半都是屬於前資本主義的剝削的。至於地主投資於工業，那是很少見的。

一般地主平日的的生活，除了有固定職業與參加地方公益及管理田莊外，大多數均消磨在酒食、賭博、坐茶館暨應酬閑談上面。他們對於佃農極盡其剝削的能事，加租加押，無時或已，稍不如意，則退佃隨之；對於自耕農及半自耕農，就是大地主對於中小地主，則拚命的進行兼併；對於地方政治則輾斷把持。因爲許多大地主是軍政官吏，鄉鎮長與中級政治幹部，不是他們的親屬，就是他們的朋友，常常左右地方政治。而地方政府則在他們的經濟權威和社會力量包圍之下，往往逢迎他們。故不少地主利用這種複雜關係，什麼事都佔上風，什麼政令都想逃避，武斷鄉曲，魚肉人民，早就成爲家常便飯了。

地主經濟是以農民的血肉爲泉源的，地主對於農民的盡情剝削，雖然養胖了地主，但這並不意味着地主經濟的繁榮，而是表示它們的沒落。試問農民弄到生活不下去的時候，地主還能安然收租嗎？試問農民到了連田契亦不要的時候，農村經濟還能支持下去嗎？當然，地主們是慣於趁火打劫的。農民的破產，乃是地主兼併土地的契機。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只是推翻了舊王朝，但並未能革除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可是這種形勢，到了今日已經完全不同了。在無產階級的政黨領導之下，中國的農民已經找到了取消封建剝削的道路。抗戰勝利以來，一萬萬四千餘萬人口的解放區，已經把土地改革推進一步，已經突破了減租減息的界線，已經開始有步驟的走上「耕者有其田」的大道了。在大後方與收復區，「二五減租」雖然被人們用作欺騙農民阻止土地改革推向全國的口號，但既然提出來了，這不能不算是統治者的矛盾。大後方及收復區在封建剝削和繁重的軍糧徵實以至苛捐雜稅的剝削之下，已經沉入大破產的深淵。這是地主經濟的一個打擊；而同時，中國的土地改革是母可避免的。大後方和收復區的農民恐怕不會把人們叫出的「二五減租」，看作教條吧，這是地主經濟的一個更嚴重的打擊。地主經濟是在沒落之中了！

地主並不是沒路可走的，要使他們能不被社會所淘汰，那只有放棄封建剝削參加農業生產，或者把資金轉化到工商業去！解放區有不少開明地主，已經提供很好的榜樣了！

三 畸形的資本主義經濟

一 幾種資本型態

這裏所說的資本主義經濟，包括了公營經濟和私人資本兩大類。公營經濟又可分為國家資本及省營企業，但因省營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地位，沒有國家資本那末重要，故略而不談（讀者如要研究這個問題，請參考拙作「中國經濟的道路」）；至於私人資本，則分為買辦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及華僑資本四項。

茲依次述之於下：

二 國家資本

國家資本約可分為三大項，即：國家銀行、國營工業與鐵道。

中國舊來的金融機構，只有山西票號及江浙的錢莊。新式的銀行應以盛宣懷氏於一八九七年在上海所成立的中國通商銀行為嚆矢，但中國通商銀行是商辦的。官辦的銀行則以中國銀行為最早。滿清政府於一九〇五年在北京設立戶部銀行，後改名為大清銀行，至民國時又改名為中國銀行。其次是交通銀行，該行是光緒二年（一九〇六）由郵部奏請設立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是國家銀行中資格比較老的。中國銀行在創設時會吸收商股，民國元年在清償大清銀行時，會將官股償還，但至民國六年

又修改條例，除官股外，並招足商股一千萬元；民國十年更增收商股，當時計已收之資本達一千九百餘萬元，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國民政府特許該行爲國際匯兌銀行，同時加入官股五百萬元，合商股共爲二千五百萬元；民國二十四年又增加官股一千五百萬元，即以二十四年金融公債撥充，合原股爲四千萬元，在這情況下，商股就相對地縮小了。交通銀行亦有一部份的商股。

「中國」和「交通」是從滿清遺下來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後，先後成立了「中央銀行」、「中國農民銀行」、「郵政儲金匯業局」及「中央信託局」四個機構。合「中國」及「交通」，就成爲國家資本的「四行二局」。

中央銀行成立於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一日，設總行於上海。初成立時，資本只有二千萬元，民十九年由國庫撥資，增至一萬萬元，中央銀行雖號稱「中央」，但還沒有「銀行之銀行」的實質。民國二十一年四月，當局實行所謂統一發行與四行專業化，才把中央銀行的地位提高起來，但因爲四聯總處之存在，中央銀行還未能實實在在位於其他四行局之上。

農民銀行是內戰時代的產物。它的前身是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它的任務是在金融上支持圍剿紅軍的軍事行動；設立這個銀行的機關是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資金只有五百萬元，由該司令部發行軍用票撥充之。民國二十四年該行鈔票已流出三省之外，農民騷動亦越出三省的範圍，故當局將

組織擴大，資金擴充至一千萬元，並改名為中國農民銀行。民國三十年又由財政部認股一千二百五十萬元，各省市政府及商人亦有認股的。在國家四行中，農民銀行是歷史最短的一個。

中央信託局是在二十四年由中央銀行撥資建立的。初時資金只有一千萬元，它的行政屬於中央銀行而會計則完全獨立。到三十年，資金已增至五千萬元了。中央信託局雖有信託處、儲蓄處、產物保險處、人壽保險處及農貸處等等十餘部門，但其中最出色的是印製處與運輸處。前者是專門印製鈔票的；後者是專門經營商品運輸的。在抗戰的時候，中信的印製處是國民政府財政的生命脈；抗戰勝利以後，中信在上海、北平接收了十餘個印製廠，生產量更擴展了。

郵政儲匯局創立於十九年，資本以全國郵政收入為担保，總行設於上海；分行設於南京及漢口。對於郵政局原為平行機關；到二十四年乃改隸於郵政總局之下。

這六個金融機關——四行兩局，就是國民政府掌握中國金融的工具。中央信託局在印製鈔票；中央銀行在發行鈔票和買賣黃金；而「中國」、「交通」、「農民」及「郵匯」則在發揮其吸收存款，控制匯兌貿易，控制工業金融與農村金融的作用。

中國的新式工業，還是濫觴於國家資本。所謂軍用工業時期（一八六二——一八七七），就是當時會左等漢奸劊子手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以後，接受外國武器的活動。這個時期所舉辦的主要事業，為製砲局（一八六二）、江南製造總局（一八六五）、馬尾船政局（一八六六）及天津機器製造局（一

八六六）等。一八七八年以後，國營事業雖告遜色，但並非完全停止。甘肅呢絨局（一八七八）、湖北的織布、紡紗、製麻、縲絲四局（一八九三）及各省兵工廠——其中以漢陽兵工廠為著名。自此以後，國營事業更式微了。民國成立以後的十餘年，國營事業之創設，可以說是完全停頓的。直到國民黨在南京成立政府以後，國營工業才又抬頭。在這裏，線索是很多的。軍事委員會的資源委員會舉辦國防或基本工業如煤鐵、機械、電氣及化學等；國府直轄的建設委員會則主辦電氣工業及煤鐵；而行政院的實業部亦擬辦銅鐵、機器、細砂及硫酸銨等廠。抗戰以後，這三個機關合併為經濟部，國營的工礦事業更為擴展了。以資委會而言，它所管轄的廠礦由戰前十六個單位，增加到一〇五個單位。它所涉及的範圍，包括工礦電三類。工業部門包括了冶煉、機械、電工、化工四十個單位；礦業部門包括了採勘、煤、石油、金屬及特種礦產四十二個單位；電業部門包括了二十二個單位，各企業的分廠分礦尚不在內，資本額幾二倍於後方民營事業的總和。除此之外，國營工業還有軍政部兵工署直轄下的數十個兵工廠，航空委員會直轄下的若干飛機事業有關的工廠；軍政部軍需署直轄下的紡織、被服及製革工廠達二十餘個單位；交通部公路總局附屬的各種運輸機關——汽車修理廠、煉油廠、鉀製造廠及酒精廠亦有四十餘個單位。這種場面，是以前所沒有的。

抗戰勝利以後，後方的工礦之門跟着鞭炮之燃放而關閉。國營企業亦是沒法逃避這一運命的。國營工業之倒閉主要不是像民營工廠一般，由於市場的關係，由於資金的不足。因為許多國營工廠的出

品並非靠市場推銷的；資金嗎，亦不成問題。問題的中心乃是主管方面醉心於東北、台灣至以上海天津等處的敵產，自動地把西南的廠礦擱置，讓機器放在那裏作自然的消耗！因此，戰後大後方的國營工廠在勝利後便不得不大打折扣了！

但在另一方面，國營工業在收復區又在擴展着。國營工業之在收復區，不但接收了敵僞的一些重工業，而且打破過去國防最高委員會所通過的第一期經建原則，獨占了紡織蠶絲和製糖業。「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蠶絲公司」和「台灣製糖公司」，就是例證！中國紡建公司先後在上海接收了九十六萬餘紗錠，天津四十餘萬錠，青島三十餘萬錠。合共一百七十萬錠左右，約當全國現存紗錠百分之五十，全部開工每天可能生產廿支紗四千三百件，以之織布，可達十四萬疋。中蠶公司接收敵營中華蠶絲公司原有的六個廠。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則是接受「日糖」、「台灣」、「明治」及鹽水港四個公司的遺產而成立的。中國紡建公司操縱了全國的紗布，它的廿支紗的成本不過六七十萬元，而布價則漲至一百六七十萬元。有人說紡建公司每分鐘可賺錢五十萬元。台糖公司則操縱了國內食糖的供給，把糖價從五六萬元提高到九萬元以上。中蠶公司則操縱了江浙的蠶絲，致力於高價賣種和低價買繭的活動。除此之外，中國石油公司則合併了甘肅油礦局和台灣煉油廠，準備成爲中國石油事業的托辣斯。農林部則設立中國漁業公司，準備壟斷中國沿海的漁業；資源委員會又計劃將「上海機器廠」（即前由敵人經營之大陸機器廠及昌明製鐵廠）、「天津機器廠」（亦爲敵人前所經營的）和

「昆明機器廠」合併成爲「中國機器廠」。勝利財使國營企業擴展得更加利害了！

鐵道方面，據第一次「中國經濟年鑑」所載，國有鐵道計有：北寧（一九四〇開工）、平漢（一八九七）、平綏（一九〇五）、津浦（一九〇八）、膠濟（一八九九）、京滬（一九〇三）及滬杭甬（一九〇七）七線。這些鐵路都附設機廠，如北寧路有皇姑屯、山海關及唐山三機廠，平漢路有長辛店一廠，平綏有南口一廠，津浦有西沽、濟南及浦鎮三廠，膠濟有四方一廠，京滬有吳淞一廠，滬杭甬有閘口一廠。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亦建築了一些鐵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新修竣的鐵路達三四六公里，其中有隴海路數段、杭江路一段、粵漢路一段。一九三六年粵漢路全線通車，浙贛線的南玉段落成，長二一五公里的淮南鐵路亦告落成，隴海路展至寶雞；京蕪線和蘇嘉線亦同時落成。抗戰時期，建築了湘桂線及黔桂線。可惜這些鐵路在敵軍的鐵蹄之下破壞得一乾二淨了；抗戰勝利之後，又因內戰之繼起而沒法恢復！

國家資本不但獨佔了金融、工礦和鐵道，而且亦伸其觸角於貿易。在戰時，重要的出口品，如絲、茶、桐油等是被當局所辦的復興公司和中國茶葉公司所控制的；抗戰勝利時，這二個機關撤消了，更大的貿易獨占却在收復區建立起來。以租借物資和八萬萬五千萬美金的剩餘物資爲基礎的行政院物資供應局，不是一個破壞中美間正常貿易，打擊民族工業，操縱國內市場和支持內戰的機關麼？國營企業是屬於國家的。國家資本當然與官僚資本有別。可是，在官僚政治的環境之下，國家資

本是沒法脫離官僚們的影響的。過去盛宣懷與梁士詒操縱了交通銀行；王克敏等則操縱了中國銀行。民國十七年以後，國家的四行兩局難道還能逃出官僚們的手掌麼？農民銀行、郵政儲匯局和半個交通銀行不是在某大黨棍兄弟二人的支配之下嗎？中國銀行不是在某鉅公的長期掌握之下嗎？中央銀行和中央信託局不是曾經在另一鉅公掌握之下嗎？現在的國營工礦，一般地說來，是沒法離開某系的支配的。官僚們不但把國家的企業和金融機構作爲位置其爪牙的工具，而且把它們作爲挹注自己的企業和供應自己政治活動的經費的泉源。許許多多報不出賬的開銷，其祕密就是在此！如果有一天，能把這些賬公開出來，我相信，必定有許多驚心動魄的事實的！

因爲國營企業都在官僚的支配之下，所以暮氣沉沉的官僚作風，便充滿整個國營事業了。把廠礦作衙門，視辦廠如做官，就是國營事業所以失敗的原因。大家都在嘲笑象鼻山鐵礦的湖北官礦公署；大家都在嘲笑這個公署，「除了督辦之外，有一位處長，兩位會辦，公署之下，共分八股，每股設一主任，股員二人至四人，助理員每股二三人，此外還有監印員二人，承啓官三人，調查員三十人，差遣員八人，衛隊二十人，雜役三十人」，其實，抗戰勝利後的今日，國營企業的組織，較諸民國四年的象鼻山並不好了多少！以中國紡織建設公司而言，單單總公司就有大小職員七百餘人。這完全是個官僚機關，職員們天天在那裏等因奉此，那裏談到生產？滬東某廠紗錠五萬，布機八百，未接收前，日本人只用職員三十七人，其中技術員三十二人，事務員五人；反之接收以後，職員照章規定六十

人，其中技術員減至二十人而事務員則增至四十人。這不是生產機關，這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大衙門。因為是衙門，所以該公司的權力集中於總經理一人，最重要的工務處長和實際負責指揮生產的各廠廠長，均變成總經理的傳聲筒或事務員。廠長們對廠中職員無進退權；對於機件物料無權採購；對於原料棉花無權選擇；對於會計用款無權預算決算，一切的一切，都集中在總經理之手。這麼一來，機構越來越龐大，效率亦就越降低了。該公司一百七十萬錠子，搞了半年多，開工僅僅百分之五六十。三十五年五月二日上海大公報載中紡公司某廠女工說「從前日本人對於紗錠稍有損壞，即加修理，現在則馬馬虎虎，仍勉強的開下去，機器消損得利害，我看紡建公司的錠子，二年後恐怕多要完結的！」因為這樣，所以，該公司的生產率是低得很的。一般生產水準，每個錠子每天生產二十支紗總在一磅上下，而該公司開工七十五萬錠出紗七百件，約合點四磅。這樣的素質只及得上戰時後方的小型紗廠。這種生產效率，把官僚主義的作風，和盤托出了！這樣的機構，這樣的效率，難道不辜負了這麼好的設備麼？

國家資本誠然與官僚資本有別，但是鐵一般的事實，使人不得不認清：官僚們利用國營企業或銀行以肥己；官僚們又在利用國營企業或銀行去壓迫民間資本；官僚們更把官僚作風去腐蝕國營事業！這一切不是證明在官僚政治之下，國家資本的國營，在實際變為官僚們的官營麼？

三 買辦資本與官僚資本

買辦資本是以買辦制度爲前提的。中國的買辦制度或許爲一七〇二年滿清政府所批准的特許商人的變體，但事實上，外國洋行在華早已使用買辦。南京條約承認外人自由貿易，廢止特許商人之後，外人使用買辦之範圍亦隨之而擴張。在地理上，南京條約以前，中外貿易多在廣州澳門等處，故買辦職務，殆爲廣東人所獨占；南京條約以後，各處商埠，相繼開闢，特別是上海，它在對外貿易中的地位，雄飛騰達，買辦職務便從廣東人之手轉移給寧波人了。

帝國主義列強對於買辦的需要是不一樣的。在初期，外商對於買辦的要求，只要它對於某一項商業、某一個商社，負指導與保證的責任；接着，列強除了推銷商品和收買原料以外，還要從事於銀行、礦山及其他各種實業的投資；還要進行於鐵道、郵政、電報及政治借款，這麼一來，買辦的範圍便擴大了。除了商業買辦之外，還有金融買辦，工業買辦和財政上的買辦。

在「原型」的買辦之外，還有中國人所經營的買辦性的銀行和商業。爲了將大量商品推銷到中國內地和從內地吸收原料，需要當地的金融機關替他們經營貸款的匯劃不可。銀行和錢莊就是替列強的洋行服務的；至於中國的商業，無論城市或鄉村，則都是爲帝國主義列強推銷商品的。買辦的「機能」，貫穿了半殖民地中國經濟的每一個脈絡！

買辦資本是依靠帝國主義列強掠奪中國人民的血汗以生存的；買辦階級從帝國主義列強劫掠中國的財富中分割一些剩飯殘羹。他們所獲得的新金或手續費，是以出賣中國物資，是以榨取中國勞動

者，是以促成大量手工業者和一部份民族工業的衰亡為代價的。近百年來的歷史，處處證明買辦階級經常是民族解放運動的障礙，這並不是偶然的！

低級的買辦為帝國主義列強推銷商品和吸取原料；高級的買辦則為帝國主義列強保障投資及其政治上的特權。這就是官僚買辦階級。如果從經濟的範疇來說，這就是大家所深惡痛絕的買辦官僚資本。可是官僚資本的來源並不僅僅這一方面；它還有封建性的另一面。我們將在這裏分析這個問題。

在中國，做官是發財的捷徑。吳景超先生於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的重慶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官僚資本與中國政治」。他根據前漢書把官僚資本分為六種：第一是董賢式，這是用賞賜的方式，把國庫的公款，變為私人的財產的；第二是田紛式，這是利用地位廣收賄賂而致富的；第三是田延年式，這是利用國家財政和運輸機關的勢力，暗吞國家收入，把大部份公帑歸入自己的荷包而暴富的；第四是張湯式，這是利用機要地位，取得政府財經措施消息便於在市面上預囤貨物以發財的；第五是張禹式，這是把從做官的途徑中所得的財富，投資到生產事業以擴大其財富的；第六是杜周式，這亦是從不義之財肥胖起來的。吳先生的這種分析，頗為精細而極致。在這裏，除了張禹這一方式以外，其他都是以貪財受賄和侵吞公款為特徵的，就是張禹之投資於生產，亦是離不開購買田地坐收地租的。這都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活動。

今天中國的官僚資本，不應片面從封建性去把握；亦不應片面地從買辦性去把握。官僚資本是二

重性的；它有封建性；亦有買辦性，而這二重性是互相影響的。有很多官僚是從刮地皮和侵吞公裕起家的。官做得大了，就會逐漸抬頭，去與帝國主義列強打交道，就會負担起爲帝國主義列強保障政治經濟權益的任務。李鴻章張之洞一流人，就是這種典型。反過來，有一些人一起手便是帝國主義列強在華代理人。這種人並不是單純買辦性的，他們可以使他們在經理借款時所扣的回佣，從事於購買地皮向農民作超經濟的剝削。這一類人物亦是不不少的，在我們的眼前，還正有不少人在幹這種勾當。

官僚資本是兩重性的，但這兩重性之發揮，並不是一致的。在抗戰以前，中國的官僚資本多發揮其買辦性。出入口貿易和什麼建設銀行之設立，就是明證。在抗戰的時候，因爲海口被封鎖了，洋貨進口受到限制，所以，它們多致力於囤積居奇，或者收買田地藉以取得高價的穀子。抗戰勝利之後，上海、廣州、青島和天津都收復了，外貨又如潮水一般的流進來，於是官僚資本又回頭發揮其買辦的作用。在這裏，所謂發揮其買辦作用並不是說在這個時期的官僚資本只是專門經營入口貿易而沒有涉及其他。正相反，囤積居奇和投機操縱仍然是它們的好戲。你看，某銀行的揚子公司是專門在代理美國貨的，它代理了數十家美國公司的出品，可是，它的長江公司還不是在經營國內貿易。三十五年夏季的糧食案，這個公司還不是裏面的一個主角？揚子就是長江，長江畢竟就是揚子啊！

中國的大官僚，在各種機遇上，經營了兩種近代的事業——大工業和銀行。中國的軍用工業，主要是由李鴻章張之洞等人所倡導的；中國的私辦工業，亦濫觴於一些大官僚，如聶璐生辦上海恆豐紡

織廠（一八九〇）；李鴻章辦上海倫章紙廠（一八九一）；以及盛宣懷、張季直、熊希齡、黎元洪等之投資於紡紗、榨油、製瓷、採煤等業是。中國的新式銀行則以盛宣懷的中國通商銀行爲嚆矢。北四行的金城、大陸、中南及鹽業是以官僚資本爲主要來源的；活躍在東南一帶的「浙江興業」「浙江實業」以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亦何嘗不是以官僚資本爲後台？官僚資本一面握着具有獨占性的銀行；一面又握有帶有一點集中性的產業。在某些場合之下，他們常常把銀行與產業聯結起來，常常使銀行的勢力伸入到工業的領域去，使工業變成爲銀行的俘虜。就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大官僚資本成爲中國式的獨占資本。不過，因爲中國的工業，在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勢力摧殘之下，沒法發展，因而在官僚資本的活動領域中，投資於工業遠不及投資於商業與投機。因此，我們可以說，大銀行與大商業乃是官僚資本活動的二個主要的形態。

抗戰勝利以後，官僚資本更有長足的發展，其原因約可分爲三點：

第一是劫收敵僞財產。軍閥、官僚和黨棍利用接收的機會，大發洋財。這次清查團所揭發的舞弊案，真是使人插頭的！一個小小的中央分社（武漢）社長（徐怨宇）就犯了掠取三萬萬元的照相機器材，盜取方本仁的財物器俱，侵吞武漢文化會堂幾十萬元和侵佔接收汽車四案。其實徐怨宇乃是貪污案中的小巫，乃是滄海中的一粟。地位越高，力量越大的大亨，如某大將軍等，那個不知道呢？但，誰又敢去「櫻其鋒」？金條、房屋財物、傢俱都應有盡有的入手了，名揚中外的某將軍在上海的房捐，

竟列爲第六位（見三十五年九月上海大美晚報）這不是例子麼？却收使官僚資本急激的脹大起來！

第二是惡性通貨膨脹。膨脹的通貨是官僚資本的養料。官僚資本絕不會停頓在那裏不動，它們有的採取黃金或美鈔的形態；有的採取商品或糧食的形態。通貨越膨脹，物價就越上騰。握有金鈔或商品的官僚資本就跟着脹大了

第三是美國商品之傾銷與美國資本的侵入。作爲高級買辦資本的官僚資本，是與外國的獨占資本結不解緣的。日本投降之後，海上的封鎖取消了；美國的商品和資本就跟着進來，而美國商品的侵入，則促進了官僚資本的活躍。某二鈺公所主辦的「揚子建設公司」、「長江公司」、「阜中公司」和中國進出口貿易公司等，都是在日本投降以後在上海成立的。這些公司的業務之發達，固然是由於他們有大批外匯存在美國，固然是由於他們能利用某國家銀行能更大量的供給外匯，但，美商對他們的特別看待，亦是事實。

第四、勝利之後，國家資本擴展了。「中紡」、「台糖」、「中油」等公司都先後成立。這些企業是屬於國家的，但在官僚政治之下，國家的國營實際上必然成爲官營。官僚資本乃是國家資本的寄生蟲。如果有一天能清查「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的賬，我相信必定有許多使人嘆息的賬目可看的！其次，租借物資和剩餘物資之經手，官僚們又不知發了多少洋財！在實質上，這些物資的經營乃是買辦的國家化；而買辦化是沒法與官僚資本絕緣的。

基於這些原因，官僚資本就在抗戰勝利之後，飛揚騰達起來了。在重慶的時候，大家都在罵官僚資本，其實，那時的官僚資本何能同勝利後的比擬呢？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寫着「發展國家資本」，但是那些自稱爲「信徒」的人物，都致力發展於官僚資本！

現在讓我們把官僚資本在戰時和戰後的破壞作用，列舉出來吧！

第一、在外匯統制的時候，人民是不能隨便把法幣匯到外國去的，可是，某些大官僚，却利用其地位權力，致力於資金逃避。有的利用購買軍火名義，把自己的款項匯出去了；有的使用其在國家銀行的權力，亦把自己的款項匯出去了。當然，他們是以匯價取得外匯的。炙膾人口的在美國的三萬萬美金，絕大部份就是這麼形成的。到了調整外匯匯率的時候，他們的「上下其手」就來得更利害了。某黨棍系的什麼農村文化公司，就是在三十五年二月改變匯率以前，用舊匯率買得一百多萬美金而建立的。

第二、在專賣的時候，香煙採用民製官收的辦法，中小香煙廠都要把製成品交給專賣局，可是某二鉅公所屬的某二大烟草公司，却有大部份的產品，逍遙法外，以黑市價格不斷賣出。

第三、官僚們不但搶奪國家的金融機關（如某鉅公會佔有中央銀行和中央信託局；另一鉅公會長期佔有中國銀行。這二人，都是「以行爲家」著名於世的；此外，某大黨棍則佔有農民銀行和半個交通銀行），而且利用「銀行管制」，伸其勢力於商業銀行。某大黨棍之所以能爲××銀行的董事長，

就是以此爲根據的。許多商業銀行只有乞靈於大官僚，贈送乾股，才能順利地向國家銀行取得資金週轉的便利！反之，以官僚資本爲主體的商業銀行特權是很易取得的。看吧！「中國國貨銀行」不是商業銀行嗎？可是，政府在重慶拋售黃金的時候，它却和國家銀行一樣，有買賣黃金的權利。

第四、官僚們利用其政治地位，使用公家的運輸工具，從事走私。中央信託局運輸科長林世良的被殺，就是事機不密，烹走狗以彈塞輿論的攻擊吧了。勝利以後，這些大亨們何嘗不在利用飛機軍艦幹這勾當！

第五、官僚資本利用其特殊權力，把國家所放發的貸款，劃給他所有關的貿易公司或工廠。三十五年夏間，上海市所發的二億糧貸，長江公司分配得不少。這筆不明不白的貸款，人民在憤慨，而官僚資本却在這裏大吃其甜頭！

第六、官僚資本是外國獨占資本侵入中國的引導和同謀。陳納德的中美實業公司（一九四六）的資本不是有一半屬於官僚資本嗎？官僚資本引導外國資本侵入中國；幫助外國資本在中國取得「合法」地位。這一類的好戲，將來一定會越來越多的。

第七、官僚資本時常使國家的財政經濟政策去服從它的利益。三十五年八月十九日的外匯改變匯率，主要是爲了在出售外匯及標售物資時，取得更多的法幣，藉以支持其進行內戰的財政，可是還有另一個原因。這就是：外匯放長可以使那些握有黃金美鈔和生絲茶葉的官僚資本大亨，多發一筆內戰

財。還有另一件事，就是因為某鉅公的貿易公司存有大批汽車，所以海關便停止汽車進口。國家的財經措施既然以官僚資本為依歸，對於民間資本就可想而知了。

官僚資本是殖民地的半封建社會的產物。在獨裁政治之下，阿諛逢迎，政以賄成，要叫官僚資本不發展是不可能的。故要肅清官僚資本，只有先取政治的民主化！

四 孱弱的民族資本

所謂民族資本，一般是指民族工業資本。中國的民族工業，從李鴻章創立製砲局於上海的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算起，已經有八十四年的歷史了。在這八十餘年中，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幾年（一九一五——一九二二），獲得一點舒展之外，它差不多都在度着艱辛的日子！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的舒展，我們在前面已曾述及了。這個舒展的期間是很短促的，抗戰前夜的工業生產，在表面上似乎有點「好轉」，但實際上，這種「好轉」是虛假的。以當時年產的二千餘噸煤礦來說，日資的撫順佔了七百九十萬噸；英資的開灤佔了五百四十萬噸，即達總數的一半。若把其他外資煤礦計算在內，英資佔百分之二五；日資佔百分之四十左右。以每年四十餘萬噸的生鐵來說，與日資有關係的鐵廠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輸往日本的鐵砂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以每年五十四萬二千餘瓩的發電量來說，外廠佔二十七萬三千餘瓩或百分之五〇·四。半殖民地的中國，重工業之不發達，那是必然的，可是，退一步以比較有成就的輕工業而言，外資亦喧賓奪主的佔了優

勢。在一九三五年全國四百九十五萬餘個紗錠中，日資佔了一百九十四萬；英資佔了二十萬，英日合起來的紗錠，佔總數百分之四十四；是年全國四萬八千餘布機中，日資佔了二萬一千餘台；英資亦佔四千台左右，英日合起來的布機佔總數百分之五十二。外資不但在紡織業中佔了相當大的比重，而且在資本的有機構成上，比華商紗廠來得高，因而生產率就比華商紗廠來得大了。

由於生產上的脆弱，中國的民族工業就產生了依賴性，落後性和投機性（可參閱拙作「中國經濟的道路」），這些特點之形成，是基於下列諸原因而來的：

第一是帝國主義列強所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使中國的關稅不能自主，使民族工業失去關稅堡壘之保護；馬關條約又使外資直接闖入中國腹地，咀牧中國的人力和物資，尖銳地壓倒民族資本；其他如內河航行權則加強外貨對於中國經濟的摧毀力；紙幣的發行權則增長了外國資本對於中國人力物力的咀吸力，而租界、駐軍和領事裁判權之存在，亦都是在發揮其侵略中國的作用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民族工業，怎能站得起來呢？怎能不帶着脆弱性與依賴性呢？

其次，在中國工業資本的原始積壘中，官僚資本佔着極其重要的地位。官僚們倡辦現代工業，同時亦把腐敗的官僚作風帶進現代工業去，他們憑藉其特殊地位，尋求超經濟的利得，於是在生產過程中酷虐的手法，在流通過程中的投機行為，便層出不窮了。官僚資本固然如此，由商人經營的廠礦亦何嘗不如此？亦何嘗不搬運前資本主義的那一套破壞價值法則的辦法到工廠和礦山中去？這麼一來，

中國的現代工業便沒法不染着落後性和投機性了。

還有買辦資本與銀行資本對於民族工業的煎迫。中國的買辦雖則有一些人把積得的資本，自己開設獨立的企業——工廠，但為數並不多，他們的大多數仍在為帝國主義列強推銷商品和採集原料，這都是在打擊民族工業的。銀行資本呢？他們的活動領域，一方面是公債投機，依公債方式向官廳搾取厚利；一方面是地產買賣，把地產作為活動的對象。有一位經營地產的西人斯巴克(N. I. Sparke)說得好：「上海之金融組織基礎，建築在地產房屋之上，正有如南非洲建築在金與金鋼鑽之上，南洋羣島建築在馬口鐵與橡皮之上」。對於工業資金之挹注是少得不可言狀的，一般總在百分之十以內，而這樣的投資，大多又在發揮其高利貸的作用。廠家未嘗因為借到銀行的放款而感到舒適，反而因為借款之故，連自己的產業亦被銀行佔去了。豫豐紗廠之被中國銀行所接管，就是一個例子。像這樣，中國的民族工業怎能不奄奄一息，脆弱得可憐呢？

中國的民族工業本來很脆弱，抗戰期間，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摧毀，就弄得更加脆弱了。淪陷區的工業，都被敵偽所劫持。從京滬搬遷到後方的廠礦，只有三四百家，連新設的計算在內，抗戰期間大後方的廠礦，大大小小，約達三千家。但在規模上，這些在後方建立起來的工廠比較戰前京滬的廠礦，還來得更加脆弱！以紡織業來說，後方各省所有的紗錠，只有二十八萬餘錠。合戰前全國華商紗錠（二百八十五萬枚）的百分之十。但實際開工的還在二十萬枚以內，如「裕華」原有錠子四萬枚、

實際開工的只有一萬一千餘枚；「豫豐」原有四萬五千枚，實際開工的只有一萬五千枚。其餘紗廠，五千枚的已算上乘了，一二千枚的佔了大多數。以煤礦而言，合川康、滇黔、湘贛、陝甘豫四個區域的二十四個煤礦，每年的最高產量為五百餘萬噸（以二十年為標準）。這個數量只佔戰前的四分之一；鐵的產量只有六萬餘噸，佔戰前百分之十五。寥寥這幾個數字，就可把抗戰期間民族工業的脆弱性呈現出來了。

抗戰期間，國際交通線被切斷，外貨的壓力減輕了。這未始不是一個發展的機會，可惜的是當局絕未在自力更生上下一點工夫，反而是「獨占」「統制」，無所不用其極，弄得民族工業沒法拾起頭來；但同時，民族工業本身之太過脆弱，亦是事實。重要的機件和原料之須依靠外國，就是明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後方有若干正在擴大或籌備的廠礦，頓感恐慌，因為他們所需的巨型機器鍋爐等，有的尚在美國未起運；有的正在半途之中；有的雖達緬甸但仍不在國門之外。這些器材不能運入，就影響了後方的工礦建設，這不能不說是民族工業依賴性的反證！

因為民族工業比戰前更加脆弱，所以它的投機性亦就比戰前更加利害。我們雖然不能說全部的民族工業都如此，但是，「拿民族工業作藉口，藉以掩飾自己罪惡」（「鞭」中，林卷好罵沙大千語）的人，實在是不少的。產業資本不控制商業資本，反而向着商業資本轉化，不是投機性的表現是什麼呢？

戰時工業的衰落，是基於下列一些原因：

(一) 管制政策。在中小生產佔優勢而官僚政治滲透到底的中國，管制政策並不能收調整之功，只有障礙生產增加成本的作用而已。例如鋼鐵管理，在收入時，壓低價格，在分配時，請求之廠若不進行疏通，就不容易購得土鐵；煤的管理，亦有類似的情形。其他如紡織業因管制之故，棉紗受到限制，而常常停工減工，煉酒業亦因管制之故，桐油受到限制而不能發展其出產，更具體的說，如久大精鹽公司在自流井有七口鍋，而實際只用三四口，因為水和煤都要受到限制。管制政策使戰時工業加重生產成本，拖延生產時間，降低生產效能。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自殺政策！

(二) 稅制方面，當局放斂了囤積居奇的游資，而把重負壓在工業的身上。統稅、營業稅、印花稅、所得稅、戰時過份利得稅、同盟勝利公債及鄉鎮公益儲蓄等等，應有盡有的不斷徵收。據一般的估計，戰時後方工業若賺百分之二十的利潤，是不足以應付這個重負的；亦就是說，賺到百分之二十的工業，只能維持捐稅的供應而已，要保持通常的利息，還成問題，更不要談擴大生產了。何況，捐稅是一年比一年提高呢？例如民國三十年的生鐵原完稅一元二角八分，至三十一年秋竟增加至九十元；酒糟稅額三十二年比二十八年高一六九倍，幾佔價格的三分之一。就是因為如此，所以，後方的工業團體常常因為捐稅而起來與政府作抗爭。

(三) 戰時財政靠增加發行以維持開支，因而形成惡性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一面提高物價，促

使生產成本增漲；一面又培養了官僚資本，擴大了游資的力量。游資集中於國貨，使物價更加飛漲。在這種情形之下，廠家在出賣成品時，固可多得貨幣，但在購入原料進行第二次生產時，便感到獲得加倍的貨幣不能保持其原有的規模，於是囤積原料的現象就發生。這是矛盾的。不囤積嗎？廠家要吃漲價之虧；多囤貨嗎？生產過程將要受到限制，這個矛盾限制了生產之擴展。

(四)金融方面，亦包含着銀行與產業的矛盾。從商業銀行、銀號、錢莊一直到國家銀行，都把絕大部份的資金於商品投機與金融投機。工礦需要資金，而行莊却對它們實行緊縮。行莊所感到興趣的是可以獲得高度利潤的商囤。這個矛盾，使得民族工業日益困難起來！

這些矛盾，使戰時後方的工業，在遷建後不久（二十九年），便走入沉滯之途。日寇投降，物價驟跌，市面益呆，政府又停止軍需品的訂貨，甚至取消已訂定之合同，於是後方工業更一蹶不振了。政府在工業界一再請願之後，總算對渝市工廠發出五十億元的緊急工貨，惟平均攤派，尚不敷各廠二月之開支；再加以多數內遷工廠員工多作歸計，遣散亦需巨款，所謂緊急工貨，就黯然失色了。週轉越加不靈，而滙貨美貨的威脅，又越來越甚，於是關門便成爲不可避免的了。以重慶爲例，機器工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告停頓，鋼鐵亦沒出路。在戰時曾負盛譽的中國興業公司、渝鑫煉鋼廠、中國製鋼公司等都已成了犧牲品；有相當歷史的三才生煤礦亦解散而併入天府，中小煤礦，停工的更多！酒精工業亦大部宣告停業。

上海及其他收復區，情形亦不見得比大後方好些。除了國營的「中紡」、「中蠶」等機構，接受了規模較大的敵廠而外，「提交敵產處理局標售的工廠共二一三單位，但迄七月底已售去者僅五十四廠，費了半年時間，經過七次的標售，成績異常淒慘，標售所得之款僅五六十億元，經二次標售而未能售出者達五二單位；直至八月，當局才答應將這批無法脫手的工廠，以「優惠條件」售與後方來滬工業家，惟此項工廠設備多不全，定價亦太高，而且債權糾紛迭出，優惠徒屬虛名，迄九月初，移交者僅有五廠」。爲什麼大家不敢勇往爭標，爲什麼大家不敢接受這種「優惠」，這，一面固由於這些廠的設備不週全；一面實由於不景氣籠罩整個中國，辦廠是一件危險的企業！看看第五章所述的情況，我們就可明白勝利以來，中國的民族工業是如何陷入一種啼笑皆非的苦痛之中了。

勝利以來的中國工業，是深深地陷在下列幾種困難之中的：

第一是美貨的侵入。美國的獨占資本利用它們的大量生產，利用其靈活的交通工具（甚至通過走私），利用中國低價的匯率及軍閥官僚的種種效勞，使美國商品大量運入中國市場來。在各方指責之下，當局雖於三十五年八月十九日改變匯率，但這絕未減少美貨之入口，因爲外匯提高之結果，引起一般物價之上漲，促進生產成本之提高，這麼一來，國貨亦跟着貴起來；美貨的入口便無從削弱了。何況人們在租借物資（抗戰結束後達九億美元）之外，再以剩餘物資的方式（八億二千五百萬元），用政府的力量，進行獨占式的買辦勾當呢？這種有組織的裏應外合的大傾銷，中國的民族工業如何能

站得住，如何能站得住？

第二是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的煎迫。國營企業在收復區中因接收敵產而擴展起來，使人矚目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接收了敵人所有在華的紡織廠，掌握了全國一百七十五萬枚的紗錠。上海方面有廿二個棉紡織廠，四個毛紡織廠，四個蘆紡廠，一個絲廠；青島方面有九個廠；天津方面，有七個廠。其他，如中國蠶絲公司、中國煙草公司、中國石油公司等等，都有獨占壟斷的力量。這些國營工業壓倒了民間資本；而把持這些機構的官僚集團及其私有的官僚資本又乘勢的磨折無權無勢的民間資本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民間資本的工業，如何能發展起來呢？

第三是全國人民在八年抗戰之後，本已感到筋疲力盡；勝利以後，又繼續不絕的進行內戰。內戰一面直接摧毀生產機關；一面又加速通貨膨脹之發展，在這種情況之下，社會購買力自然急速地低落下去了。社會購買力下落之結果，市場自然日形縮小，銷路自然日形停滯了。這一點又註定民族工業的可憐的命運！

結合着美貨的傾銷，官僚資本的煎迫和社會購買力的低落幾個因素，中國的民族工業便在抗戰勝利之後，大倒其勝利了，「清明前後」中的林永清是否能堅持下去，是否能在抵抗官僚資本，抵抗苛捐雜稅，抵抗投機操縱之外，再能在內戰和美貨傾銷的包圍中打出一條生路來呢？我欲問問中國的民族資本家來回答這個問題！

八十餘年來，中國的民族工業沒有揚過眉，吐過氣，但這並不說它沒有前途，沒有出路，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廠家們能團結起來，能堅強地爲中國的獨立與民主而奮鬥，我相信中國的民族工業是有光明的前途的！

五 華僑資本

中國的私人資本，除了買辦資本、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之外，還有華僑資本。

華僑資本對中國經濟的最大貢獻，是每年的巨量僑匯相當地減少了我國國際收支的差額。抗戰期間，由於政府管制外匯，而外匯的匯率又常常落在黑市之後，僑民在金融上直接間接對於政府的「供應」是很大的。別的不說，單單依據中國銀行三十四年至次年七月份的僑匯統計，就可證明。該統計表將這一年七個月份爲三個時期：「從三十四年一月至七月爲第一時期，在這時期中的七月十六日前，每美元的匯兌率，折合法幣四十元；但同時國內美金的黑市價格，每元已超過法幣五百元以上，在這個時期的七個月內，共得匯款二二二、七三一、四〇一·七七元。我們姑把僑民在匯率上的損失，爲原數的九倍，則政府在此時期於暗中得進益二、〇〇四、五九一、六二四·九三元。從三十四年八月至次年三月，爲第二個時期，在此期間，每元美金的匯率已增至法幣五百元，但國內黑市已漲至法幣一千至二千元，如果平均作一千五百元計，在這八個月內，共得匯款一七、七八八、八五〇、三三八·二五元，若把僑民在匯率上的損失，爲原數的二倍，則政府在此時期暗中得到進益三五、五

七七、七〇〇、六七六·五〇元，至於三十五年四月至七月四個月內，因本年三月四日起，政府已將外匯開放，美金每元，可折合法幣二千零二十元，在此時期，美金牌市雖與黑市稍有出入，但相差甚微，姑置不論。若僅從三十四年一月至三十五年三月爲止，在這短短十五個月內，僅中國銀行的僑匯數字推算，僑民在匯率上獻給政府的損失，合計已有三七、五八二、二九二、三〇一·四三元。這不過是一個短期間的推測而已，在遙遠的八年抗戰中，海外僑民遭受法幣貶值外匯壓抑的暗中損失，是沒法用數字推測的！而且上面所舉的只是中國銀行的一部份統計而已，其他如由民信局和郵政儲匯局，特別是民信局的撥匯，其數目遠較中國銀行所統計的數字爲大。

華僑資本對於祖國的第二個貢獻是投資於祖國的產業。華僑返國投資工業者以湖州人張振勳在烟台創設的張裕釀酒公司爲最早，其次爲簡照南昆仲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郭楨祥的華祥製糖公司，郭順的永安紡織公司等等。華僑投資是中國國內產業資本的來源之一；即在抗戰極端艱辛期間，華僑之對祖國投資絕未稍輟，陳嘉庚先生的南洋華僑公司之投資設立中南樹膠廠及中藥提煉公司就是例證。可惜的是，政府並未替僑胞解決一點困難，反而常常增加他們的困難，使他們視回國投資爲畏途！

太平洋戰爭以後，海外華僑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摧殘之下，大多數是家破人亡，經濟活動是無從談起的。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之後，又因爲英美以至法國的反動的鎮壓殖民地的屠殺政策之擴展，我國僑胞亦遭池魚之災。如安南之南圻、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處，都在日本投降後繼續流着當地人民的鮮

血；同時，亦流着我國僑胞的鮮血！可是，吃苦耐勞的中國僑胞仍在萬惡的環境中奮鬥下去。在一些比較平靜的地方，已經或多或少的表現出華僑經濟活動已開始恢復了。

華僑資本是有前途的！只要中國能成爲獨立民主和富強的國家；華僑在海外的發展便可十倍百倍於今日；只要中國能成爲獨立民主和富強的國家，海外僑胞之返國投資亦就會十倍百倍於今日，這是可以斷言的。

六 中國資本主義的特點

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是畸形的。官僚資本壓倒了民間資本；國家資本亦在官僚資本的把持之下而成爲「少數人所私」的掠奪機構。就以資本的部門而言，商業資本和投機的游資壓倒了工業資本；銀行資本不但不能扶助生產事業的發展，反而在外國資本的指示之下，盡其高度的買辦作用。畸形的資本主義經濟，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的特點！

若從資本的所有者及其在政治上及經濟上的作用來說，中國的資產階級可分爲大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官僚資本、大買辦、大銀行家、商人及一部帶買辦性的大企業家是屬於大資產階級之範圍中的；民族工業資本家，一般是屬於中等資產階級；華僑資本則有小部份屬於前者；大部份可劃入中等資產階級，至於小資產階級，則在下節論之。

四 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工資勞動者

一 農民的個體經濟

所謂勞動人民，是指農民和手工業者而言的。在這裏，我們應先述農民的個體經濟。

農民並不是一個單純的階級，而是由許多階層構成的。第一是富農，約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他們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他們自有或租進多量土地僱用多數僱工。雖則有不少富農參加耕作，但他們的勞作並不是主要的；同時，還有不少富農出租一些土地，兼有小地主的地位。第二是中農，約佔全國農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中農有適當的土地和勞力，並不出租土地亦不僱用多數僱工；有一些中農租進土地或被僱於人的，但為數並不多。一般說來，中農不剝削別人，在經濟上能够自給；年成豐收時能有些許盈餘；有時亦利用一點僱傭勞動或放一點債。第三是貧農，這是沒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農村羣衆；這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如果與雇農——農村無產階級，一齊合計，則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

在本章第二節論述地主經濟的時候，我們已經把地主所握有的土地量指出來了。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四的地主，擁有全國一半的土地。而佔有全國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及雇農，則只佔百分之十七的耕地。這就是說，全國一半的耕地是被地主用去剝削農民的；而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雇農

則是被地主所剝削的。在談地主經濟的時候，我們的着眼點是土地怎樣集中，是地主怎樣去剝削農民；現在，我們談的是農民的經濟，故着眼點應放在：農民在這種野蠻的封建剝削之下，如何維持其個體經濟了。

富農有他的家務，有他的獨立的經營體系；中富亦有他的家務，亦有他的獨立的經營體系；就是貧農，雖然貧困得很可以，雖然他們的耕地是從地主佃得來的，可是，他們還是獨立生產者。因為耕地雖然屬於地主，但是他們的家務並不是屬於地主的；他們在耕作在勞動的時候，地主正在家裏睡覺，不聞不問。在這裏，只有僱農在生產上比較失去獨立性。所謂個體經濟，就是指這些獨立生產的農民而言的。

除了富農以外，中農、貧農和僱農，都是受到剝削的。中農貧農，大多數缺乏土地；缺乏土地，就必須從地主佃進土地；要佃進土地，自然要受到地主的封建剝削。土地足以自耕的中農，則負擔着田賦及其他苛捐雜稅的不公平的重負。貧農多半是佃戶，且時常受雇於人，故他們不但在租佃關係受剝削，而且也在僱傭關係上受到剝削。

抗戰八年，淪陷區及大後方的農民，都更加貧困了。敵偽的搜刮掠奪，使淪陷區農民的元氣，喪失完了。有人描寫江南的農村道：

「農民的貧乏，年甚一年，經過戰事的損失，農具耕牛，異常缺少，跑進農家去看，往往家

用的粗陋雜物，也破舊不全。

「江南農民在這八年之中，所以還能生活下去，全是靠了他們的智慧和勞力，向大自然作搏鬥。在宜、溧、高、蘇浙皖邊境邱陵山曲，山間的雜木毛草，都成爲農民求生的恩物。往往離山二三十里的農村，全家出動砍草，幼童和老人都都插足其間，自夏季野草叢生起割，到秋冬就成了光禿的童山。這是一個奇蹟。在戰前看不到這種「蠶食」的現象，這些農民割取的青毛柴，每担僅合一二升米。爲了飢餓，那細微的代價亦是「聊勝於無」的」（「文匯報」三十五年八月十二日「中國農村」）。

花這麼大的勞力去換得一二升米，是不合算的，可是，爲了飢餓，不合算亦得幹下去。這證明農民們在種種剝削之下，單靠幾畝田地是沒法維持生活的。

勝利以後，軍糧、苛雜、徵實徵借，一件一件的加在農民身上。田賦增加，地租增加，農民所需要的油、鹽、洋火、布疋及紙張等貨價，亦不斷的増加，反之，農民唯一賴以換錢的穀子，却一天天的下跌。結果，祇好乞靈於高利貸。近年農村的放賬方式亦與昔不同了。現在都以稻或米計算，譬如三十五年七月間穀價每担二萬元左右，但急需用錢而又沒有糧食出賣的農民，只好硬着頭皮去拿五千元一石的稻場還稻的稻錢了。這是促使新稻上場時稻價狂跌到四五千元一石還找不到顧主的最大原因。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怎能不破產呢？

戰後農村經濟的破產，可以歸納為荒地增加、田賤米貴和高利貸猖獗三個特點。這是本書第五章所已提示的。在這裏，棄田逃荒所引起的荒地增加，是比較嚴重的事情，就是一些農民還能維持生產的地方，因為貧困的關係，亦呈現出極其嚴重的危機來。三十五年八月十二日文匯報的「中國農村」曾有這麼一段記載：

「在耕種期內，農民最大的苦惱是無力施肥，目下一石穀子祇換到九張豆餅，諸如緣肥河泥亦因人工昂貴，貧農無力取得。江南農田已有一半以上沒有足夠的肥料或竟至沒有肥料，在五年內不施肥的亦司空見慣，缺乏肥料的稻麥收穫量，一年年在減少。每畝可收五石的，減到二石」。

在斷絕肥料減少收穫的情況下，固定租的佃農只能維持其貢獻地主的地租；分租的佃農雖比較好一點，但生產量降低，自己分得的穀子亦必然減低；自耕農呢，收穫雖則減少，但徵實徵借的田賦則反在增加。這一切，處處都在表示農民的個體經濟是在破產的。

大後方的農民，在抗戰期間，因為穀價上漲，表面上似乎改善一點，可是實際却並不如此。因為穀價上漲的好處，祇有歸於地主，農民是缺乏糧食上的。他們在新穀登場穀價下跌時出賣，而在青黃不接穀價上漲時購入。因此，穀價上漲，對他們說來，是一種災害！抗戰勝利以後，形勢一點亦沒有改善。一切徵實徵購，徵派壯丁和苛捐雜稅是沒有一點減少的。飢荒的地方，人民固然在「榜腹從

公」的供應政府；而收成較好的地方則在大鬧踐毀傷農的現象，四川產米區每石跌到只售二千元，即重慶附近亦售四千元而已（見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新聞報）。二千元連一担肥料亦不夠的。這又怎能不叫農民破產呢？

大後方和收復區農民的個體經濟是破產了。但解放區的農民，却在走着直綫而上昇着！這一點，上一章已經提到了，在這裏，我們雖不想重複，但仍須申明一下的是：農民的個體經濟，不管是佃戶亦好，不管是自耕農亦好。如果沒有民主政治作保障，則地租、稅租和種種借貸關係之剝削是免不了。在這些封建剝削之下，農民的個體經濟只能在支細、負債和破產的泥坑中打滾而不能自拔！

只有民主政治，只有實行土地改革，才能使農民免於封建剝削，才能使他們的個體經濟欣欣向榮的發展起來！不過，個體經濟如果永遠保持孤立，那就會使生產技術和生產效率極限於極其低下的水準之下。若從整個國民經濟和工業化的眼光看來，那是很成問題的。因此在取消了封建剝削之後，農民的個體經濟的前途，必定是集體化——合作社的道路。

要使農民參加合作運動，絕對不是一紙告示所能奏效，更不是用強迫或欺騙所能成功的。一句話，只有使農民懂得，只有使農民自動自願才能成功，解放區的可喜的成績，已經告訴我們：在中國要使農民的個體經濟走上集體化，已經不是遙遠的事了。「變工隊」和「扎工隊」已經替農業生產集體化，打開了一條康莊大道！今天的問題乃是在於如何減弱封建剝削，如何廢除封建剝削。實現了這

一任務之後，才能談到集體化的問題。

二 手工業者

在抗戰以前，中國的手工業在外貨和新式工業的打擊之下，黯然失色了。抗戰時期，因為交通阻滯，外貨之進口驟形減少。這就刺激了手工業的復甦。四川的紡織業，手搖機的產量佔了後方供給總量的四分之一。據三十三年三月四日大公報所載，『全川手工織布機約二萬台，其中璧山佔一萬台，重慶六千台，但重慶一地即產布五萬餘疋。後方總產量每年九百萬疋，機布四百萬疋，土布五百萬疋』。此外，四川土法煉成的灰口鐵，亦成為煉鋼的鋼材的主要來源。其在解放區，因為民主政府的大力倡導與援助，手工業發展得更快。婦紡運動震撼了每一個村落，把成千成萬的農村婦女捲入紡織的巨潮中去了。

解放區與大後方及收復區的手工業，亦走着不同的二條路。在解放區，因為苛捐雜稅之免除，因為運銷合作社之普遍設立，手工業者就去掉捐稅的重負和中間人的剝削，所以，他們的營業就日形發展了。反之，大後方和收復區的手工業則是受着苛捐雜稅、高利貸、中間商人和外國商品之不斷打擊的。特別在抗戰勝利以後，美國貨像潮水一般的湧進來。美國商品之侵入，打擊了民族工業，亦打擊了舊式手工業。所以，勝利以來的手工業者亦同民族工業一般的陷於破產了，而且，因為手工業者的資本很微小，他們經不起外國商品的一擊，所以，他們的運命，較諸民族工業家，是來得更淒慘的！

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同農民的一樣，都是以集體化爲其出路。手工業者如果不團結起來，如果不進行集體化，則他們就沒法與大工業抵抗。這是很明顯的。但在美國獨占資本與中國官僚資本狼狽爲奸的局面之下，手工業者要組織合作社是不可能的。他們沒法可以領到工貸；他們沒法可以解決運銷的困難。中國工業協會成立到現在已經八九年了。結果有什麼成績呢？「工合」之貧乏，不能單單歸咎於主持者及從事於該項工作者之做得不好，客觀環境的影響是很大的。因此，在軍閥黨棍和官僚統治下的中國，工業合作運動是沒有希望的。只有在政治民主化之後，只有確立了正確的財政經濟政策之後，中國的手工業者，才能獲得集體化的前途！

解放區在工業合作方面，亦替中國打開了一條道路，以陝甘寧邊區爲例，那兒有四種合作社。第一是延安南區綜合式的合作社，它包括了生產、消費、運輸和信用四種業務；第二是運輸合作；第三是手工業合作；第四是農民生產合作。由此可見，手工業合作在陝甘寧邊區整個合作運動中所佔的地位了。解放區的工業合作社團結了手工業者，提高了他們的技術水準和設備，解決了一部份的物資問題。在抗戰時是如此；抗戰結束以後亦如此。這樣發展下去，中國的手工業者是有其光明的前途的！

三 工資勞動者

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時候，我們只從資本方面去着眼。其實資本主義經濟還有另一方面，需要我們去研究的。這就是在生產中的工資勞動者的工作時間、條件和工資等問題。

中國現代產業工人之出現，是十九世紀下半期之事。在鴉片戰爭之後，沿海商埠不斷開闢，官營企業跟着發生了。特別是馬關條約之訂立，日本帝國主義首先動手，英美列強則以利益均霑的片面權益爲護符，肆無忌憚的對華投資，於是外國工廠便不斷在各商埠出現了。就這樣，現代的產業工人遂貿然在這個破落的古國中站立起來！

由於外國資本在華的擴展，由於民族工業的不斷掙扎，中國的現代工人就一天天的發展了。據民國十九年工商部的調查，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山東、兩廣及福建九省的二十九個城市的工人的數量爲一百二十萬四千三百七十七人；至民國二十二年，據中國勞動年鑑（實業部編）所載，上海、天津等二十二省市工業勞動人數增加至二百萬零二百五十六人了。抗戰前夜，據「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所載，增長到三百五十萬人。抗戰時期，因爲敵僞的破壞摧殘。因爲民族工業的遭受打擊，中國現代產業工人的數量就大大減少了。有一部份工人因工廠關門而失業改行；有一部份工人因激於愛國熱誠而參加游擊戰爭。其在大後方，雖有二三千家新廠礦之開設，但，數量並不多。因爲戰時大後方的工廠規模很小，所雇用的工人數亦有限。最高的估計，戰時大後方的工人數約爲七十萬人。這一數字比戰前上海所有工人，還來得少。抗戰結束之後，各地工廠又因內戰及美貨之傾銷而關門。復工的工廠，寥若晨星。上海的產業工人，亦從戰前的八十萬跌至二十萬以內了。

靠工資維持生活的人，除了工廠的工人之外，還有：

(一) 手工業工場的工人。這類工人，包括着製鹽、製陶以及舊式的礦坑夫和紡織業的工人。他們亦如工廠工人一般，出賣勞動力給廠主，所不同的是他們的生產不用機器而以手藝為要件。這類工人的數量很多，單以鹽業工人而言，包括長蘆、兩淮和四川各處在內，約在七十萬以上；鹽業的工人，單單江西的景德鎮在戰前就有十五萬人。如果把手工業工場和家庭手工業的工人合在一起，這類勞動者的人數約在一千五百萬之間。

(二) 苦力。這包括腳夫、挑夫、碼頭工人、船夫及人力車夫等。在這裏，人力車夫的人數最多，總數當在一百五十萬以上。

(三) 雇農。雇農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長工及短工都屬於這一類人，大約在三千萬以上。如果把這些人都計算在一起，中國出賣勞動力的人，當在五千萬以上。

中國工人的勞動時間，是在十小時至十五小時之間。以前上海紗廠每天分為日夜二班，各為十二小時；抗戰時期在重慶，依政府的規定是八小時，如在八小時之外做了三小時，則以半工計算，超過六小時則以一工計算，但是一些廠，仍做十二時的工作，每日除付八小時工資外，其餘四小時，每時僅加六分。至於工廠以外的工人，如打石工，那是不計鐘點的，從太陽上山一直做到電燈發亮。勝利以後的上海，紡織業規定為十小時；機器業規定為九小時；做十小時以上的並不是沒有。

關於勞動強度，以日本在華的紗廠做得最兇。在「一二八」以後，日廠不斷加重生活，如細紗間

接頭女工，從前每人至多派五十至六十木棍；至一九三六年則增至八九十木棍；粗紗值車女工，從前每人值車一台，尙有助手一名，此時期一人值二台，反將助手減去；布機間的女工，以前每人當車八部，此時增至二十部。對於增加勞動強度，華商廠家是比不上日本廠家的！

至於工人的工資，可以歸納下列的形式：

(一)計時制或計件制。上海工人稱前者爲「呆工錢」，後者爲「活工錢」。上海紗廠裏的男工，除去打包間的男工以外，工資一般論工計算；女工之中，亦有一半是論工計算的。

(二)獎金和分紅。這是工資的一種變態，它的作用是在於鼓勵工人用心做工，並迫使工人緊張地工作。獎金的種類有「年賞」、「節賞」、「升工」及「賞工」各項。年賞的多少沒有一定，表面上是按照廠方所得的紅利去決定的。「升工」和「賞工」是每一個月或每一「關餉」，在工人的應得工資上再加上幾天的工資。

(三)滑準工資與股份制。滑準工資是隨商品出賣的價格而變動的。在中國的工廠，雖然沒有明白的滑準制，但在營業不佳時，廠方動輒削減工人的工資。如一九三〇年美亞綢廠把工人工資打九折並剝奪一九二九年份紅利百分之八十；一九三四年又將工資再打九折。這是反面的滑準制。至於股份制則是每月扣去工人之工資以入股，在中國還不多見。

(四)泰羅制與福特制。因爲中國工業落後，各廠少有足夠而科學的設備，故福特制在中國尙不

實行，但類似秦羅制却在紡織與絲織等業中流行着。以絲廠來說，它的所謂生產快賞就是一種變相的秦羅制，依照這個辦法，在一個限期內（半個月），由廠方規定標準限度的生產額，超出規定生產限度的生產量，論其多少，分等給賞。過去的快賞金，在工人的收入中，是一筆大數目，有的工人竟拿到本位工資百分之二十以上。

（五）血汗制與工頭包工制。血汗制是按件工資的一種最野蠻的方法，工作領回家裏去做而勞動的報酬則異常低微。中國各地火柴廠製盒子的工作，多採用這種制度。這種制度甚且伸入牢獄，去剝削那些失掉自由的囚徒。工頭包工制在過去會流行於上海的紗廠中。廠主用招標方式將工作包給工頭，由工頭招工人進行生產，後來各廠多採用直接管理制，直接雇工進行生產。但開煤與建築等業，還流行這種制度。包工制要經過幾層剝削，對於工人最爲不利。

（六）學徒制與長期雇傭制。學徒制不但存在於手工工場中，而且存在於現代工廠之中。學徒要拜老師，在「入學」時，每年還要以一定款項送老師作報酬。在學徒時期，無工資之可言，除吃飯外，每月僅得到幾元錢的零用費，年底可得一點「壓歲錢」。長期雇傭制流行於農村。所謂長工，就是代表。

（七）養成工與包身工。養成工在紡織業中最爲流行，由廠方或其代理人（在上海大多數是「包飯作」的老板），招收一些失業的女工或沒有職業的貧苦婦女，到廠裏去學習「生活」，規定在一定

時期內（一個月至五個月），廠方不給工資，只供給三餐像牢獄一樣的飯；有的廠則發給一角八分工資，並規定「學出」以後之幾年內不准掉廠，由廠方給與比一般女工還要低的工資。至於包身工則由一個老板（包飯作之老板），到農村去招來一些破產的農家女兒，以極低的代價（二三十元）換取她三年至五年的身體自由。在這三五年中，由老板與廠方訂立合同，做得的工資，都歸老板所有，生活是像牢獄一般的，就是害病亦要做工。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些女工，就悄悄地結束她的灰色的人生旅行了！包身工不但見之於紡織廠，而且見之於礦山中。在抗戰以前，山西各礦，存在一種大規模的所謂「公司窩」，其中的工人大部份是包身工。每個包身工在接到二十幾元的年金以後，就把一切身體生命的自由都歸於公司所有。有的「公司」，常時把工人關在窩裏，三五個月不得出來，每日強迫他們做極強烈的的工作，不從者給以野蠻的極刑，而三餐呢，則只有不足維持生命的粗糙食物。公司設賭，工人往往中其圈套，往往把包身的錢輸光了，沒辦法，只得向公司預支。這樣積欠下來，就一輩子不能贖回自己的身子。這類包身工大抵不到幾年就會被礦坑吞沒下去！

從工資的形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剝削關係是複雜而且落後的。一般工廠所通行的計時工資、計件工資、獎金、分紅、滑準制、股份制、泰羅制、血汗制及包工制，是屬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形態的；學徒制與長期雇傭制是具有封建剝削意味的；而養成工與包身工簡直就是奴隸制度的剝削。這些工資形式深刻地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點！

在形態上，還有現物資與貨幣工資之別。中國各地多數採用貨幣工資。抗戰以來，由於財政破產而引起的通貨膨脹，特別是在抗戰結束以後，政府為進行內戰，法幣價值不及戰前七八千分之一。在貨幣工資支付之下，工人更加痛苦了！

除了上述種種之外，還有一些經濟的剝削。這就是：

(一) 罰款制度。日本紡廠在這方面幹得最兇，但中國的紗廠老板，在這一方面，亦不見得落後。如「申新第九」，工人打一個火結每個罰五分；結打好紗沒拉直每次罰五角；紗頭沒拉斷每根罰五分；接頭紗時紗繞三個手指，每次罰五分。申新紗廠的工資本來很低，再加上這種罰款，有些工人往往做了一天工還不够罰！

(二) 露骨的勒索。在抗戰以前，五台峯頭煤礦工人要受到三種剝削。當工人還沒有掘煤時，礦上的地主就講好先抽去工人所掘的煤賣價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其次，工人在掘煤時生產工具要自備，連峯內燈亦要自備，而這燈一定要買礦主的油；礦主一定從油裏賺去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油利作為利潤，叫做涇油利，假若工人不用礦主之油而自買，亦仍須要納同數油利，這叫做乾油利。挖上煤以後，礦主還要分去所有煤炭賣價百分之二十。經過三除二扣之後，工人的所得便寥寥無幾了。這種露骨的剝削，不但見之於抗戰以前的華北煤礦（抗戰以後解放區民主政府已澈底把這些剝削取消了），而且見之於其他地方一些比較落後的生產部門之中。

(三) 緩發工資與存工制度。有不少廠家經常拖欠工資，拿去生利或經營別種生意；有些工廠則在「關餉」時扣存尾數，等下次再發，這樣集腋成裘，廠方便可節省下一筆錢來了。存工制度流行於上海的紗廠，這就是每個工人最初半個月的工資不發，存在廠裏抵押，以防工人跳廠。工人如果跳廠，「存工」便被沒收了。這是廠方的另一種特殊剝削！

這是超經濟的一些剝削，但工人們所遭受的還不止此，打罵制度是使人最不能忍受的！打罵制度做得最殘酷的是日本強盜；但中國一些官營的工廠，特別是軍事工業，動輒以軍法從事。在抗戰時期的後方，正不知有若干工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生命！勝利以後，重慶大渡口等處的血案，更是把統治者的猙獰面目暴露無遺了！

抗戰勝利以後，大後方的工人極大部份是失業了；收復區的一部份獲得工作的工人，貨幣工資雖比戰前高，「底薪」雖亦比戰前的正薪高些，可是當局編製的生活指數却不合於事實，所以底薪雖然高了一點，工人的實際收入並不見得改善！如果把失業的狀況，如果把特務的橫迫都計算在內，則抗戰勝利後的工人，仍然是重複着過去那些辛酸的生活的！

但在解放區，情形却正正兩樣。工人的工資、工作時間都改善了；他們的生命都獲得保障；他們有自己的工會；他們參加了工廠管理與各級民主政府。這不獨城市現代工廠為然，就是窮鄉僻壤的雇農亦翻了身。這與大後方和收復區，剛剛是一個對照！

在抗戰中，工人階級的貢獻是極其偉大的。他們流血汗為供應物資而努力生產；有的組織游擊隊在前線直接和敵人戰鬥。這是萬目共睹的事情！其在淪陷區，工人們在表面上雖在生產，但怠工運動的執行，使敵偽遭受了無比的損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這次民族解放戰爭中，工人確無負於祖國！在反內戰和建設的時候，工人階級的作用，更加重大，這是可以斷言的。我們相信：英勇的工人階級將必為中國打出一條生路來！

第八章 中國經濟的展望

根據上面的分析，現代中國經濟顯然存在着下列一些矛盾：

第一是美國獨占資本與中國國民經濟的矛盾。從「九一八」一直到三十四年日寇投降的十餘年間，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這個矛盾不但降低了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而且增強了國際間，特別是遠東方面，英美對日的矛盾。這種情形，在三十四年八月間日本投降以後便改變了。美國的獨占資本、孤立派和軍閥，一心一意的發動以反蘇反民主為內容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日本過去在遠東的地位已經被美國承繼下來了；而因為美國國力的強大與場面的寬廣，所以還位山姆大叔在遠東所構成的矛盾，亦非日本強盜所能企及。美國在勝利後從中國所取得的權益已經超過抗戰時期的日本，它的商品砲彈，它的剩餘物資，它的租借物資，它的財政借款和直接投資，配合着他們的海陸空軍把中國完全全控制住了。美國獨占資本的這種幹法，推進了中國的內戰，使中國完全變成它的殖民地。在過去，日本所要求的是「工業日本農業中國」；在今天，美國獨占資本所要求的是「生產的美國，消費的中國」。「農業的中國」還是能够生產的；到了「消費的中國」的時候，完全變成寄生，變成附庸了！抗戰勝利後的民族危機，不但沒有減輕，反而是一天天的在增長着！

第二是官僚資本與民間資本的對立。官僚資本在抗戰時期的大後方，已經得到迅速的發展了；勝利以後，因為在收復區接收了敵偽財產，因為惡性通貨膨脹之更加發展，因為政治之更加腐敗與內戰之更形擴大，官僚資本又更進一步的肥胖起來！官僚資本是中國式的獨占資本，它是大銀行大買辦和大地主的綜合體。官僚資本利用政治上的特殊條件，從事於壟斷操縱，打擊了民族工業和金融商業。因為官僚資本的買辦機能，使民族工業沒法開展；而它的壟斷金融，緊縮銀行資金對工業的放款，則是使民族工業（特別是民營工業）沒法週轉的。至於民營的中小銀行和商行，亦同樣受到官僚資本的排斥與逼迫的。故官僚資本的發展，不但犧牲了民族工業，而且犧牲了許許多多中小生產和中小商行銀行。這個矛盾是越來越嚴重了。

第三是地主與農民間的矛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候，中國土地問題中所包含的地主與農民的對立，被中日間的民族矛盾所沖淡了，那時的土地問題，雖然一方面存在着「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中國土地是屬於日寇，抑屬於中國人民」的矛盾，後面這一個矛盾，在日寇投降以後就被取消了；故當前的中國土地問題乃是土地屬於生產者抑屬於寄生階級的問題。當然，勝利後的中國，因為美帝國主義之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但因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方式與日寇不同，所以土地問題在形式上所呈現的嚴重性，並不若「九一八」以後那樣的尖銳；另一方面，有一部份開明地主在抗戰時期致力於抗戰；在民主運動中致力於推動，因而，戰後地主與

農民間在土地問題上的矛盾，既不同於抗戰時期，亦不同於戰前的內戰時期。但無論如何，戰後地主與農民的對立，較諸戰時，是嚴重得多的。倘若我們回頭來看看一些實際鬥爭的情形，那就更可以知道。在解放區，廣大人民在肅奸運動發展之後，就自然而然的清算了漢奸和惡霸的土地；反之，頑固派的軍隊在攻進解放區之後，則殘酷地進行反清算。不但恢復地主原來的土地，不但恢復地主原來的高額地租和種種額外剝削，而且連農民的身體妻子和廬舍亦被清算了。這個慘痛的現實，說明了中國現代土地問題的嚴重性！

第四是資本家與勞工的矛盾。在抗戰的時候，爲了抵抗共同敵人——日本，中國的廠家與工人，合作了八年；在抗戰勝利以後，爲了對抗美國獨占資本的侵略，爲了對抗官僚資本和黑暗的獨裁政治，中國的廠家和工人亦是繼續合作下去的。但在這裏，我們不應抹殺這一矛盾，不應否認這一矛盾。中國的廠家和工人是有矛盾的。在通貨膨脹之下，工人們要求增加工資；但廠方却以增加成本爲理由，時常在這個問題上鬧整扭。到了美貨大量傾銷，國貨銷路停滯以後，中國廠家又在工資問題上進行反攻了。有一些廠家眼見投機有利，竟不惜解僱關門，把產業資本轉化爲投資的商業資本。這麼一來，勞資間的糾紛就更嚴重了。

這幾個矛盾並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的。如果沒有美國的獨占資本的侵略，則中國的官僚資本就顯然不能見容於抗戰勝利後的中國。美國帝國主義需要中國的官僚資本替他推廣它

的政治經濟的勢力，替他管理它的在華權益，替他掃清美國統治中國的道路；反之，中國的官僚資本則需要美國獨占資本作它的靠山，需要美國獨占資本的物資以至財政軍事支助，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則中國的軍閥官僚的統治便會被廣大人民的民主力量所淹沒。故我們說：美國的獨占資本與中國的官僚資本是狼狽為奸的。至於大地主，一般說來，亦是與官僚資本結不解緣的。官僚資本很多投資於地皮；而大地主亦很容易化身作官僚資本，別的不說，單單看抗戰勝利後的內戰就可明白了。美國帝國主義派飛機替好戰份子運兵，供給軍火，供給美金，供給物資，甚且公然護路，直接參加內戰；官僚資本則資助好戰份子以戰費並為美國獨占資本打開市場；地主地痞們則拚命地在火幹其武裝還鄉殺人放火的勾當。美國的獨占資本，中國的官僚資本和大地主地痞是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他們的共同對象是廣大的農民、中小生產者和民族資本。今天中國的內戰，就是這些矛盾的綜合的表現。

至於勞資間的矛盾，顯然沒有前面幾個矛盾一樣的嚴重，可是，這個矛盾，亦是經常受到前面幾個矛盾的影響的。軟弱的中國民族資本沒力足以抵抗外國獨占資本與本國官僚資本的壓迫，它沒力足以反抗這種黑暗政治下的苛捐雜稅和惡性通貨膨脹的進攻，却常常回首來向那些貧困交加胼胝手足的工人們轉念頭。這麼一來，糾紛便發生了。故外國獨占資本及本國官僚資本對於民族資本之壓迫，常常促成中國工業中勞資間的鬥爭。這是中國民族資本的軟弱性和依賴性的表現。其實，中國的民族資本只有與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合作，才能得到生路，因為只有聯合工人農民以及城市小資產階

級，才能把外國獨占本趕出中國，才能消滅官僚資本及封建勢力，才能擴大中國的市場和使中國走上工業化的大道。如果中國的市場擴大了，如果中國工業化了，中國的民族資本不是可以大大地發展起來麼？

中國經濟將要走什麼道路？擺在我們眼前顯然有二條：一條是美國獨占資本駕御着中國的軍閥官僚及大地主所統治的殖民地經濟；一條是實行土地改革發展工業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將要走那一條路，無疑是上列一些矛盾鬥爭的結果。

以目下的情況而言，殖民地化的危機是很嚴重的。美帝國主義在事實上已經控制了中國的經濟、財政以至軍事政治；官僚資本則在外國力量支持之下，炙手可熱！在大後方和收復區，我們所看到的不是生產建設，而是腐爛投機和破壞。絕大部份的東西，甚或打內戰用的食品，亦都是從美國送來。就這樣，中國就變成了菲律賓第二了！

可是，事情的發展是循着辯證法的途徑前進的。炙手可熱的官僚資本，乃是以目下的黑暗而腐爛的專制政治作爲溫床；日益沒落的封建地主，亦是以目下的黑暗而腐爛的專制政治爲保鏢的。目下這種黑暗而腐爛的專制政治，雖然得到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但這種支持是沒法使這種統治延長下去的。一向苦口婆心處替政府打算的王芸生先生，亦竟把「十月革命」作爲中國的一個去向了。他說：

「中共現在還沒有這麼大的野心，因爲他們的主觀力量還沒有這麼大；但是客觀的條件却在

駁駁進展着：一、政治攤淺到解體，今天國民政府治下的政治，一片攤淺現象，慼慼無生氣。優良的公務人員待遇低薄到無以維持肚皮，相對的就是貪污公行，滔滔天下，廉潔成了難能之事。再不有爲，則弄到政治解體，一非不可能。二、經濟恐慌到崩潰，這個問題更深了。今日中國的經濟，一面倒的洋貨輸入；國家的財政，又一面倒的靠通貨膨脹。物價狂漲，工資奇昂，人民憔悴，工業窒息，獨獨發了官僚資本與買辦階級。政府天天在飲鴆吸毒，人民天天在揮扎呻吟，如此下去，則洪水到來，經濟崩潰，已經不是太意外的事了。三、最後是軍事。現在國民政府的聲光，實際是靠中上級軍官對中共還有一股敵愾之氣，但，這是很不可靠的。因為抗戰已經勝利，中國人打中國人，實在不能持久維持士氣，尤其士兵生活之苦，拖久了，難免要生變化」。

（見「觀察」創刊號中「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

從革命性質而言，中國今天並不需要十月革命，因為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今天所需要的是發展生產並且保護私有財產（特別是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民族資本的現代產業的私有權）底新民主主義經濟。故從此說來，把「十月革命」作為中國時局前途的一個去向，似不妥當，但今天中國統治者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之解體、崩潰與瓦解，却是無可置辯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之下，試問美國帝國主義的強心針能把一個垂死的人挽救回來嗎？何況在另一方面，民主力最正在雄飛突進地發展呢？一方面，專制政治正在急速地走向解體和崩潰的道路；另一方面，中國的



3. 再版

9.60